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 马礼逊 ——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英〕汤森 著

〔中〕王振华 译



大象出版社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 马礼逊 ——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英] 汤森 著

[中] 王振华 译



大象出版社

# ROBERT MORRISON

THE

## Pioneer of Chinese Missions

BY

WILLIAM JOHN TOWNSEND

AUTHOR OF "THE GREAT SCHOOLMEN OF THE MIDDLE AGES"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Edition

---

LONDON

S. W. PARTRIDGE & Co., 9, PATERNOSTER ROW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英)汤森著;吴相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9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ISBN 7-5347-2858-4

I. 马… II. ①汤…②吴… III. 马礼逊, R. (1782 ~ 1834) —生平事迹 IV.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7850 号

责任编辑 耿相新 王 月

责任校对 钟 骄

书籍设计 张 胜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8 千字

印 数 1—1 650 册

定 价 15.50 元



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一—三卷)
- 中国来信(一七一六—一七三五)
- 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  
· 视野里的中国景观

· 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
- 孔子与中国之道
-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
- 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
- 『神体儒用』的辨析  
——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
- 汉学发达史



##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sup>①</sup>。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从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

---

<sup>①</sup>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的程度,却也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像。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 21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 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 编辑委员会

- 顾 问：陈乃芳 (Chen Naifang) 陈翰生 (Chen Hansheng)  
季羨林 (Ji Xianlin) 李学勤 (Li Xueqin)  
饶宗颐 (Rao Zongyi) 汤一介 (Tang Yijie)  
王元化 (Wang Yuanhua) 周一良 (Zhou Yiliang)
- 主 编：任继愈 (Ren Jiyu)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 执行主编：张西平 (Zhang Xiping) 杨煦生 (Yang Xusheng)
- 编 委：耿 昇 (Geng Sheng) 程裕祯 (Cheng Yuzhen)  
柴剑虹 (Chai Jianhong) 何其莘 (He Qishen)  
高建平 (Gao Jianping) 孟 华 (Meng Hua)  
李明滨 (Li Mingbin) 黄 勃 (Huang Bo)  
任大援 (Ren Dayuan) 谢 方 (Xie Fang)  
吴隽深 (Wu Junshen) 阎纯德 (Yan Chunde)  
严安生 (Yan Ansheng) 杨保筠 (Yang Baoyun)  
严绍璁 (Yan Shaotang)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张德鑫 (Zhang Dexin) 汪前进 (Wang Qianjin)  
周发祥 (Zhou Faxiang)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 国际编委：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陈志让 (Jerome Chen) 柳存仁 (Liu Ts' un-yan)  
谢和耐 (Jacques Gernt)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陈荣照 (Tan Eng-Chaw)  
安乐哲 (Roger T. Ames) 杜维明 (Tu Weiming)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弥维礼 (Wilhelm R. K. Müller) 伊维德 (Wilt L. Idema)



## 译者的话

卡尔·波普说：“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但是也需要严肃的观念化的冲突。没有冲突的社会是无人性的。”他又说：“文化的冲突未必总是导致流血的战斗和破坏性战争，而可能也是富有成效的和促进生命发展的原因。”（见其《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版）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代西方传教士传教的历史，我们或许会得出较以往的评价更丰富、更全面的结论。

在以往的历史教科书或史学著作中，我们对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动机和性质的评判，常常停留在“传教加条约的破坏性”的模式上。传教士来华固然有此性质，但事实上，传教事业的性质是具有多重性的，有时甚至颇为模糊。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极为复杂，引起了中国人的一些不同的反应，而且这些影响和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因时因地而异（《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传教事业放到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视为一个文化冲突、文化交流的事件，而不只是政治的和宗教的侵略了。

中国近代社会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造成了紊乱的影响，发生了全方位的激烈变化。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西



方在数百年间发生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同时它还需要适应一个为此起伏的革命所疯狂了的世界(王德昭《世界历史与中国文化》,第377页,香港三联书店版)。这样一个社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充满了变数,是难以预料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在这个时刻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枪炮和贸易而来,它承担的角色所产生的影响很难用一种思想定式来描述。传教士的角色在思想态度上不仅与商人和外交官不同,而且在传教士之间也不一律。有的传教士具有多重身份,比如郭实腊,曾在中国沿海刺探情报;但多数传教士应该说在传教之外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医务等工作。他们的角色很难用“传教加条约的破坏性”模式来统而论之。

当然,传教士与中国既存秩序是相冲突的。他们的积极态度兼有商人取利和打开中国大门的意图,但他们的身份也是西方与中国民众联系的惟一纽带。他们希望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更深入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文化、教育、医务、慈善救济等方面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是与以往中国漫长而厚重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

初期的新教来华传教士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英国政府由于担心新教传教士会影响英国在华的贸易利益,并不支持他们来华;在华的天主教会不愿意出现新教这个竞争者;中国政府也视新教传教士为异端,认为他们比鸦片更可怕,因为他们传播的新教教义与正统的儒家学说大相径庭,故而,中国政府对新教的控制比对鸦片贸易的控制还要严厉。新教传教士只能在地下传教,或者只能学习语言,以等待时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教士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支持。从技术层面上说,当时中西交流还处于草创时期,传教士们不像后来的汉学家有那么好的条件。他们没有必要的语言资料,没有图书馆,甚至没有字典可用,只能自编字典。他们的语言知识主要是从中国助手那里获得的,同时还得避开中国政府的怀疑。通过长时间的实践和具体运用,他们才掌握了中文。为了获得

中国人对新教的理解和信奉,传教士们往往必须做很多传教以外的工作以博得中国公众的信任,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使中国人认识到了了解全球知识的迫切需要,来达到传教的目的。

由于这一原因,新教传教士作为文化媒介的作用甚至要超过其神学意义。为了得到本国赞助者的继续支持,他们要把中国的情况报告给他们,即使所报告的内容是有选择的。他们既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要向西方传输中国的形象和信息;同时为了得到中国人的信任、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又必须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宗教观念和思想文化,构造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他们的个人目标是以宗教影响中国,但其历史性作用已经转为在中西双方双向地传达观念和形象。这种双重角色给他们带来了矛盾心理,使他们既是救世者,也是中国人的善人,同时又是文化帝国主义者。

如果把新教在华传教事业当做一个文化冲突与交流的事件来看,恰好可以印证波普的论断,即文化冲突也会带来积极的成果,文化冲突本身也存在着积极的意义,从文化冲突中会创造出新的、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中国文化的盛世是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因为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包容性,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扩展自身文化的内涵。但在积弱深重的近代,中国却丧失了这种开放的文化气度,趋向于封闭保守。明清以来的海禁、拒斥西方宗教,其结果只能使中国积重难返,需要革命性的突变来改变社会的进程。

本书传主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从他的生平事业中颇能反映新教来华传教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马礼逊来华传教的动机是单纯的,虽然他抱有进入中国内地的宏愿,但他初抵中国时根本没有传教的可能。语言不通,中国政府禁止传教,使他只能辗转在广州、澳门之间先学习语言,继而在东印度公司谋得一职以暂且栖身。尽管他随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到过北京,一生中担任过不少职务,做过很多工作,但他说,他第一位的身份还是传教士。他强调的是“西方宗教思想文化内容,而不是宗教教义本身”。为了传教,他翻译《圣经》,撰写劝世小册子,创办英华书院,编纂《华英字

典》，还参与了许多慈善事业，等等。这些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基础性的工作，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圣经》的汉译，还是《华英字典》的编纂，后人的工作都是在他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没有他开创性的工作，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还要往后推多少年也未可知。从这一点看，马礼逊的传教即具有文化交流的意义。赫德评价他说：“马礼逊在屡次失败和绝望中努力奋斗，卒获胜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马礼逊就是我们在平民阶级中所找到的英雄。”（引自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54页，青年协会1948年版）就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称他英雄也许并不为过。

翻译这本马礼逊的传记，源自笔者在考察中国近代出版向现代出版演进的过程中，认识到传教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创办了一批基督教出版机构，引进了铅活字印刷，由此笔者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文化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产生了兴趣。马礼逊作为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其生平事业自然更引人注目。有关马礼逊的传记，较权威的有马礼逊第二任夫人所编辑的马礼逊两卷本回忆录，1839年伦敦出版。中文的马礼逊传记有：海恩博著、梅益盛译的《马礼逊传》，1932年广学会出版；清洁理著、费佩德、杨荫浏译的《马礼逊小传》；1960年，香港出版了海恩波著、简又文译的《传教伟人马礼逊》。这些中文书，或者年代久远，或者在海外发行，已难得见到。译本依据的是伦敦差会增订纪念版，原书没有出版年份。作者所见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珍本书店（The Old and Odd Books）鉴定为1888年出版，杨树林的博士论文《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所列参考文献，也定为1888年版（纽约），但本书末章收录了1890年5月上海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的讲词，又记施密士牧师死于1891年，则本书出版时间当在1891年、1892年前后。本书记录了马礼逊来华传教的全过程，较全面生动地介绍了马礼逊的生平事迹，引用了不少材料。在介绍马礼逊生平事迹的同时，也介绍了基督教新教各派来华传教的历史，并对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有趣的比较。



书中又附有大量插图,对我们了解马氏生平、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的活动及当时中国社会的风尚,颇有裨益。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牵涉到大量有关中国的史实,外国传教士一般也都有中文名字,由于译者接触到的材料有限,虽然尽可能做了还原,查找了外国传教士的中文姓名,还有几处只能采取音译。尚待高明指教。

本书原版颇为珍贵,由刘珣先生慷慨提供,谨致衷心感谢。



## 序言

随着中华帝国福音派势力的日益增长,作者要为第一位在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撰写一部简短的传记的兴趣也日益增长。这是一个良机,它可以让我们教会和主日学校的青年扩大对其生活和性格特征的了解。

这本增订版是特意为在主日学校和伦敦差会的青少年传教团体中发行而撰写的。希望这部传记的精神能深深印在年青一代的心里。

虽然作者为了撰写本书,从难以计数的原始资料中搜集了大量文献,但他还是希望借此表达他对马礼逊博士的女儿——年迈的、和蔼可亲的霍布森太太的诚挚感谢,霍布森太太概允作者接触和采用马礼逊博士迄今尚未发表的大量书信。作者还要感谢神学博士 J. C. 布鲁斯牧师。1859 年,布鲁斯牧师以同样的热情,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把他的未刊讲稿《马礼逊和中国传教事业》赠给作者。



神学博士马礼逊牧师和他的中国助手在翻译中文版《圣经》。由霍尔依程耐里先生原画刻板



# 目录

□ 译者的话 .....	(001)
□ 序言 .....	(001)
第一章 中国及其人民 .....	(001)
第二章 中国的宗教 .....	(007)
第三章 早期在中国的布道尝试 .....	(013)
第四章 马礼逊:青少年时代 .....	(018)
第五章 为伟大的事业 .....	(025)
第六章 初抵华夏 .....	(036)
第七章 对成功的渴望 .....	(047)
第八章 传教同道 .....	(056)
第九章 北上京师——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	(065)
第十章 《圣经》中文版译成——米怜博士去世 .....	(074)
第十一章 在英国的工作 .....	(090)
第十二章 给孩子们的信 .....	(106)
第十三章 新的领域 .....	(113)
第十四章 马礼逊的足迹和成就 .....	(131)
第十五章 伦敦差会 .....	(135)
第十六章 后有来者:美国和大陆差会 .....	(142)

第十七章 后有来者:不列颠差会 .....	(149)
第十八章 中国的鸦片生意 .....	(158)
第十九章 寻求基督的中国 .....	(162)
<input type="checkbox"/> 译名对照表 .....	(174)
<input type="checkbox"/> 图版说明 .....	(185)

---

## 第一章 中国及其人民

只有基督能引领中国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其文明。

——杨格非

中国是一个位于东亚的伟大帝国,坐落于北纬 20~40 度,东经 100~122 度。这个国家的领土构成非常紧凑,东西和南北的距离几乎相等,土地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英里。总体而言,她是个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国度。这个国家的中部流淌着两条壮丽的长河,她们冲刷、沃衍了广袤的平原和秀丽的山谷。被无数岛屿所点缀的海洋拍打着她的东南沿岸。青藏高原在西方形成天然屏障,而北方则由 1300 英里的长城来护卫。长城的大部分如今已经倾圮,但在 2000 年前,却是集举国之力修筑的。在群山和长城之外是凄凉而贫瘠的荒漠,恰与该国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以致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把他们富饶的土地称为“鲜花盛开的土地”(flowery land)。虽然中国的疆域如此辽阔,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仍然需要珍惜每一寸土地。据帝国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国的人口总数大概在 392 000 000 人,换句话说,它超过了全球人口的 1/4。要养活这么多人,每一个零星的空间都要精打细算地加以利用。人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拥挤,而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这种生活方式是令人惊讶的。由于要充分利



用每一寸土地,谷子的播种和收获都在小得难以插足的地方进行。在多产的土地上,中国人每年收两季谷子,其余的多数土地都是水面,它养育了大批靠水为生的人们。每一条大河上都会有那种漂浮的村庄。中国有大量的土地不宜耕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就显得更为必要。西部群山环绕,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山势多变。满山遍野覆以杉木和松林。中部省份则属丘陵地带,点缀着肥沃的平原,平原上茶树茂密翠绿。再向东及至广阔的东南沿海,密布着繁华的城市和海港。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为无数的村庄和广袤的农村所环绕,赋予这些省份一种地主庄园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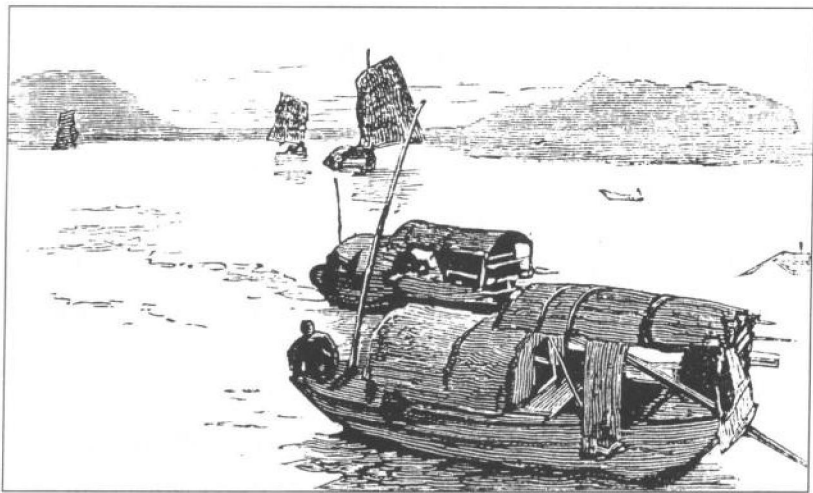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篷船

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发达的文明的故乡。当我们的祖先尚在皮肤上涂染靛蓝时,她的人民已经穿戴丝绸和亚麻布品了。当不列颠人还在原始森林里游荡时,中国人已经建成了伟大的城市。他们在欧洲人揭示造纸这门实用艺术前900年已经造出了纸。在德国人懂得把字母刻在树上前500年,他们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中国人使用航海指南针后的500年,马可·波罗才把它带到欧洲。中国人广泛使用陶瓷制品,远在古代希腊人和伊特鲁斯坎人之前就已经创造

出了优美的造型。罗马共和国尚未诞生,中国人已经对精深的哲学和奇妙的科学有了了解。民众教育从远古时代起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通过科举制度,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职位对哪怕是最贫困的人都敞开了大门。中国,这个伟大而文明的国度,与古老的埃及、叙利亚和印度帝国一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衰微。这些古老帝国曾经继承了希腊、罗马的辉煌文明,现在却被更年轻、更富有活力的欧美国家取而代之。但中国没有衰亡,像她同时期的文明古国一样,中国今天人口更稠密,国力更强大;像她的过去一样,对未来一如既往地充满了信心。

一切进步都源自缺陷,这是千真万确的。华夏文明就束缚了中国的发展。中国人长久以来听信那种令人麻痹的、宣称他们已善尽善美的见解。他们把自己奉为“天朝”(The Celestial Empire),因此,中国人鄙视所有的新生事物。在他们错误的思路中,他们怀旧、崇旧;在制造业中,陈旧的形式和格局总是不断地被重复。这对中国全面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幸的。陈规陋习也被维护着,惟恐失掉,而人民才智的发展总是停滞不前。这还不够,中国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简单自我模仿的民族。他们不仅远远落在西方民族前进脚步的后面,而且也落在东方更为进步的民族后面。这些前进的东西方民族,迎接和培育了这些现代观念和发明,并利用其优势,推进他们的发展和繁荣。

这里的人民恬然自得,爱好和平,遵纪守法。从表面上看,他们非常讲究礼节,有勤劳的习性和优雅的风范。同时,像所有异教民族那样,他们也有很多恶习,也在堕落,但他们的恶习表现得较为温和,尚未表现出更粗鲁的方式。他们也以淫逸、虚妄、伪善为耻,他们并不暴戾也不残忍,他们与西方好战的民族不同,通常会谋求避免战争,不受干扰地在自己的家园安居乐业。他们热衷于建设家园,培养家族情感,但从不考虑别人。然而,与其他地方的民族一样,他们男尊女卑,以致有许多溺死女婴的事被曝光。他们的许多社会习俗与我们相悖。我们遇到友人以握手相对,而中国人则作揖(握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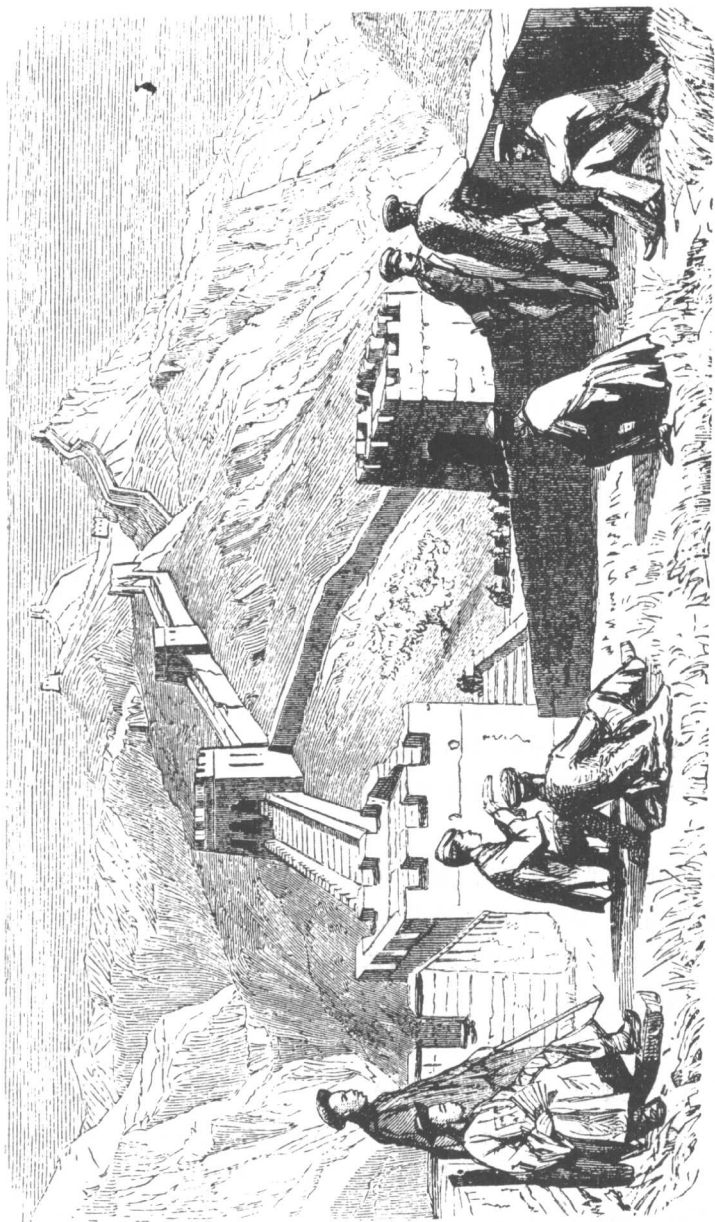


图2 长城

手)。我们招呼朋友道“早安”、“晚安”，而他们则是问别人“你吃了  
吗？”“喝茶吗？”“令尊还硬朗？”“阁下有几个孩子？”上司来的时候，  
我们行脱帽礼表示尊敬，而他们却是带上帽子以示尊敬。我们与妇  
女平等相待，他们却视妇女为家庭中最愚笨的一群，把她们养在深



图3 着夏装的中国官员

闺。我们的丧服是黑色的，而他们的却是白色的。他们请人来号丧，  
我们则是亲致哀唁。我们读书写字是从左到右，横行；他们却是从右  
到左，竖行。我们的妇女束腰，他们的妇女缠足。我们视右为尊，他  
们以左为尊。我们的青年自由择偶，他们青年的婚事由父母包办。  
我们用刀叉进食，他们用筷子进餐。我们的图书页码标在书眉上，他

们的图书页码则印在页边上。我们的书双面印刷,而他们的书只印一面。我们的书名印在书脊上,而他们的则印在页边。我们把卷数标在页边,而他们则标在地脚。我们让女孩子受教育,他们则让女孩子去做女红。我们的制造业采用机器制造,而他们用手工制作。我们的图书用机器印刷,而他们采用手工印刷,速度极慢。诸如此类还有许多事情,都显示出巨大的差异。他们与西方国家相距多么远,差距就多么大。

他们的服装由缎子、丝绸、棉布、麻、苧麻和羽毛制成。男人留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着宽袖衫、缅甸裤。女人穿绣花裙、宽松的短上衣,三寸金莲。他们的服装样式相同而一成不变,但远比那些饰物丁当作响的衣服要舒适和方便。在这方面,他们显示出比我们更丰富的感性。

普通人的居住环境破败而肮脏。他们蜗居在只有一扇窗户的小屋里。屋子依家庭的财力,分别用石头、砖瓦或土坯建成。但中国人善于顺应环境,在地角水边都能安然入眠。他们的食物花样翻新,而且他们吃鸡、鱼、狗、鼠,还有猫。

他们种植的主要粮食是稻子、玉米、高粱、小麦和大麦,另外还种植土豆、萝卜、番茄、梨、桃、葡萄、番石榴、菠萝、石榴及其他蔬菜果类。社会的上层非常富有,其中许多人可称为巨富。普通百姓则很贫穷。一旦黄河泛滥,颗粒无收,便会遍地饿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四处游走。

中国人的语言与英国人的语言大异其趣。它没有变体、变格,没有词缀、词尾,没有音节和字母。它由4万多个符号或字组成,其中有许多同音字,一词多义。它们的不同只能由音调来区分,或者强调语气,或者转调。4万多个字又被排成214韵,每一韵有一定的表音的词根。这个表音部分是每一个字的构成成分。这多少简化了字典的检索方法,对识字也有帮助。汉语虽然是一种滞重而难学的语言,方言众多,但在所有讲汉语的地区,文字却是统一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掌握了一个诀窍,不仅可以了解中国,还可以了解日本、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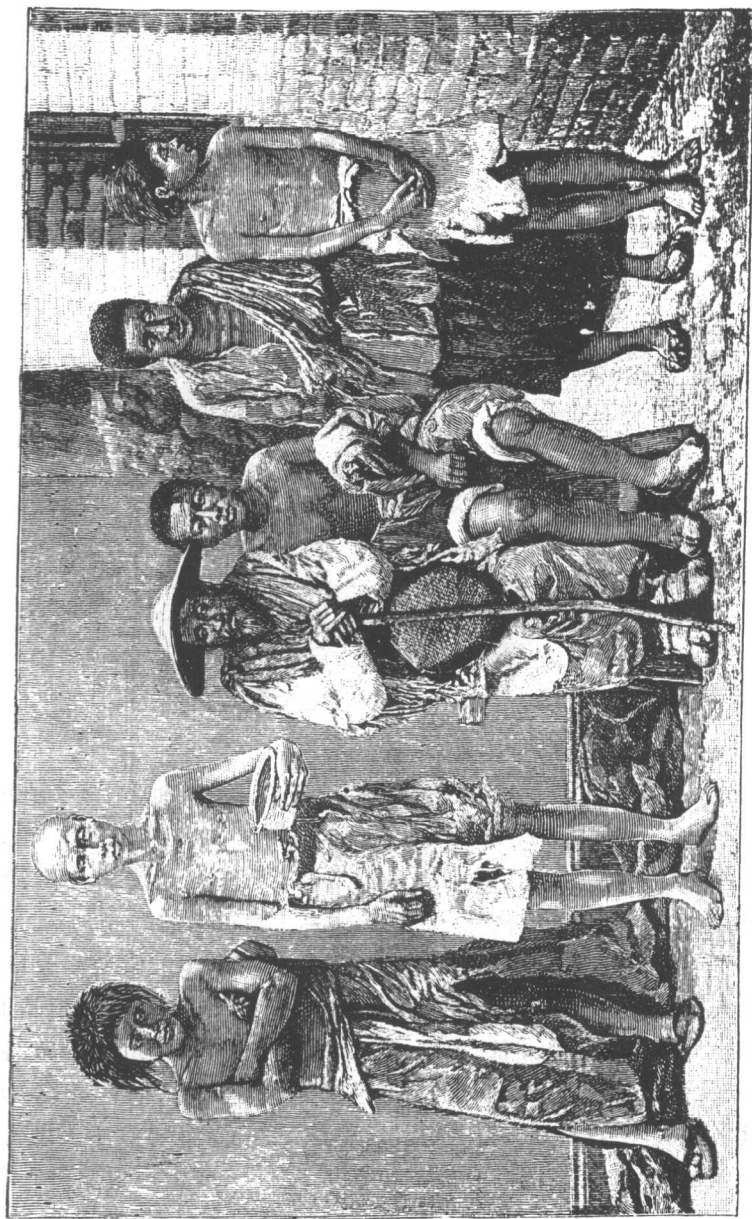


图4 一群中国乞丐





图5 卖灯笼的人

丽、交趾、支那以及长城以外的许多民族，还有居住在暹罗、婆罗洲的几百万华人、巽他海峡的居民，尚不谈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印度的移民。世上尚无一种语言如此宽泛地散布开来，运用如此之广，可能只有希伯来语是一个例外。后者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语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享宴乐的民族。一年中有众多的假期和节日，  
/ 中国人在其中倾注了非同寻常的热情。这些节日中最重要的便是正月初一。节前要精心准备，房屋、商店和公共场所都要清扫干净，装饰一新，张灯结彩，披上节日的盛装。天刚破晓，除了拜年、串门、大摆筵席欢庆外，万事都搁置一边。这种喜庆的气氛得持续十天之久。然后就是“立春”，按世俗的规矩和套路，这一天要由当地父母官或其他官员开犁并献祭。“清明节”是祭奠亡灵的节日，经常采取全家

郊游的方式,或舟行,或陆路,来到灵山,举行一个虔诚的仪式,接着便是一顿丰盛的大餐。随后还有其他许多公共假日,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秋季举行的“灯节”。在中国,灯节是安顿那些溺死的亡灵,取悦河神的节日。每逢此日,长长的灯船在河面上漂流,每艘小船上都点着烛火。道士身着红色道袍,分列左右,祈祷祭祀,敲锣打鼓地招来神的祝福,把烧着的锡箔纸扔进溪流里。那种壮观的场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儿子娶亲时则大摆筵席。娶亲当日,男女双方的亲友齐集到新郎家,喝酒寻乐。新娘经过精心装扮后,被请进轿子里,从娘家抬到未来的夫家。新娘到达时,鞭炮齐放,喜筵开席。新娘穿着结婚的礼服,双手掩在宽大的袍袖中,抬着胳膊,垂落的袍袖半遮着脸面,躲着人们的注视。在两位伴娘的搀扶下,新娘为到场的嘉宾斟茶,接受贺喜,鞠躬回礼。人们说着不干不净的荤笑话,常常在新娘敬茶的时候,窘得新娘手足无措,或是拉下她举得酸乏的胳膊,让大家看到她的脸面。在这样的场合,如果她稍稍显出一丝不快,那便是她一生不幸的预兆,且新郎也别想有什么远大前程了。

中国的戏院遍及全国。在我们的城市里没有中国戏院那样重要的建筑,但中国的戏院是用悠悠晃动的竹竿建成的,房子里铺着蒲席,漆上红色,屋顶上盖着棕榈叶的织席,舞台和看台是用粗糙的木板在竹竿上搭成的,场内可容纳上千人。上演的戏长而又长,有时候观众要好几周才能看完一出戏,但演员们有本事根据经理人或观众的需要删节剧本。这真是奇妙的场景。演员的服装俗艳,戴着假须,以一种荒诞至极的方式诵读台词。每一幕间,锣钹声震耳欲聋。游走四方的戏班子在中国也非常普遍。

中国的首都是北京。该城人口众多,大约有200万人,坐落在北方,隶属直隶省。北京有帝王的宫殿、政府的衙门和作为国家最高祭坛的天坛。天坛是皇帝每年一度祭天的地方。在北京,神像和彩色玻璃都已经是机械制造的,大批量印制印刷品也在实施当中。广东是南方省份,有125万人。该省盛产稻米,也多桑树,养蚕业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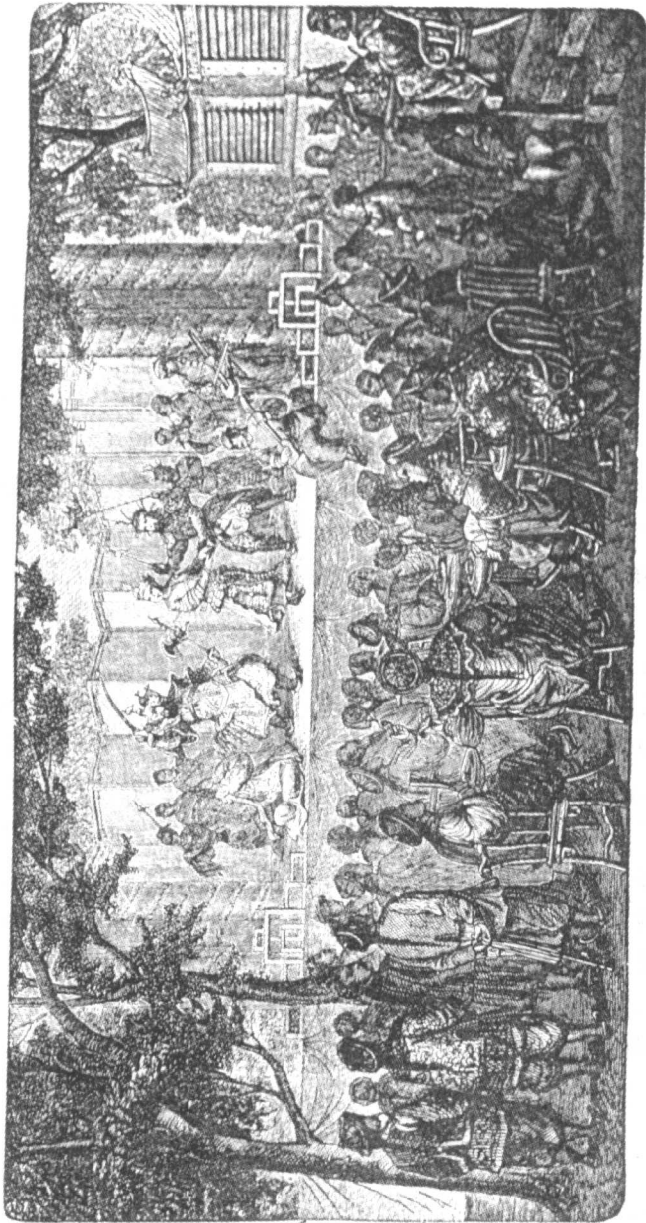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的戏曲演出

广东的城市有许多铁器、铜器和石器的制造厂。汉口是一个内陆城市,坐落在扬子江畔,是茶叶贸易中心。福州出口茶叶、木材和竹子。厦门生产瓷器和纸。南京过去是六朝古都以及丝绸和土布的产地,可惜现在已经衰落,这些贸易也转移到别处去了。香港是珠江出海口上的一个岛,在 1842 年“割让”给了英国。从那时起,英中贸易大幅度增加。伟大的中国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绵延 700 英里,通过这条人工河道,东北省份的产品得以运抵北方的港口。

所有这些地方的都市都很壮美,生机盎然。河流和运河串起流经省份的城镇和乡村,这些地方的人口从 10 万到 50 万不等。在北方,煤矿和银矿是开放的,并得到有效的开采。铁路、电报、电话和现代其他奇珍异物都已引入。这一切对这片古老灰暗的土地来说,都预示着日趋发达的商业繁荣及其重要性。



## 第二章 中国的宗教

当奴隶悲叹镣铐，  
当孤子无望地祈求，  
当婴儿啾呀学语，  
    毛发随时日新生。  
当嘴唇为亲吻而成熟，  
当呻吟绞痛人心，  
每一个梦想和祈愿的人，  
    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年轻。

——金斯利

中华帝国的早期历史中很可能具有关于真神的正确观念，但这种观念却在其后四处蔓延的偶像崇拜中失却了。中国的神和偶像多不胜数。有天公和地母，有与星象对应的的神，有风神、雨神、四季神、山神、牧神、河神、湖神、雷电神、火神、财神、战神、行业神、农神，各种生意、职业、行当都有其神灵，甚至恶魔都受到崇拜。因为中国人认为崇拜一个善神并没有实际的用处，神并不会伤害人，但搞好和恶魔的关系却非常重要。

中国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三大宗教即儒、释、道分布其间。第一大教儒教是由孔子创立的。孔子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550

年。他生于山东,是一位政治家的儿子。他所创立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体系,因为他的学说与人们崇拜的或将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心灵至上之神(上帝)并没有什么关联。孔子主要采取道德格言的方式来表述他的思想,谆谆强调的是高玄的德性,其中一些看起来和所罗门的格言很相像。

孔子3岁丧父,在贫贱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等到年岁稍长后,他发愤苦读,在他24岁时决心致力于开启民智,提高国人品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著书阐述自己的见解。孔子一生授徒三千,其中一些人成为遍布中国的孔子学说的鼓吹者。他曾经周游列国,在野外讲道,就像其他圣人和先知一样,他从日常生活和自然客体中总结出教义并作出了说明。

许多年过去后,孔子回到故里。他的家成了思想和探索真理的公共场所。孔子不同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主要采取问难的形式来教导弟子,而孔子则鼓励弟子向他提出关涉道德、政治和文学的所有问题,以探寻他的思想。弟子们衷心爱戴他,在全国宣传他的思想。后来孔子官拜大司寇,实行行政改革,倡导贸易和实业,人民日益安康和富足。但对他的嫉妒和敌视也随之而起。孔子于是退而居隐,十余年间删削诗书。当他自感终期将近时,便集诸弟子在他居所附近的小山上建书冢,面北跪拜,感谢上苍让他完成赋予他的使命,祈求上苍因他的辛勤劳作而降福于他的国家。孔子72岁时逝世,时在公元前479年。他生活在世界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其时,犹太人从奴役中获得解放,第二座犹太教圣殿建成,希腊被薛西斯(Xerxes)入侵,埃及被亚述人征服,波斯帝国稳固地建立。孔子逝世7年后,在异教世界也许惟一不亚于孔子的苏格拉底诞生了。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孝”的观念上的道德和国家经济体系。孔子从孩子对父母应有的责任与服从,推演出一个国家中不同年龄段和各个阶层的人的责任和义务。他不仅强调信、义和仁,而且也认可或是灌输过偶像崇拜、一夫多妻和激烈的报复行为的思想。他是中国最受欢迎和尊敬的圣人,他的名字具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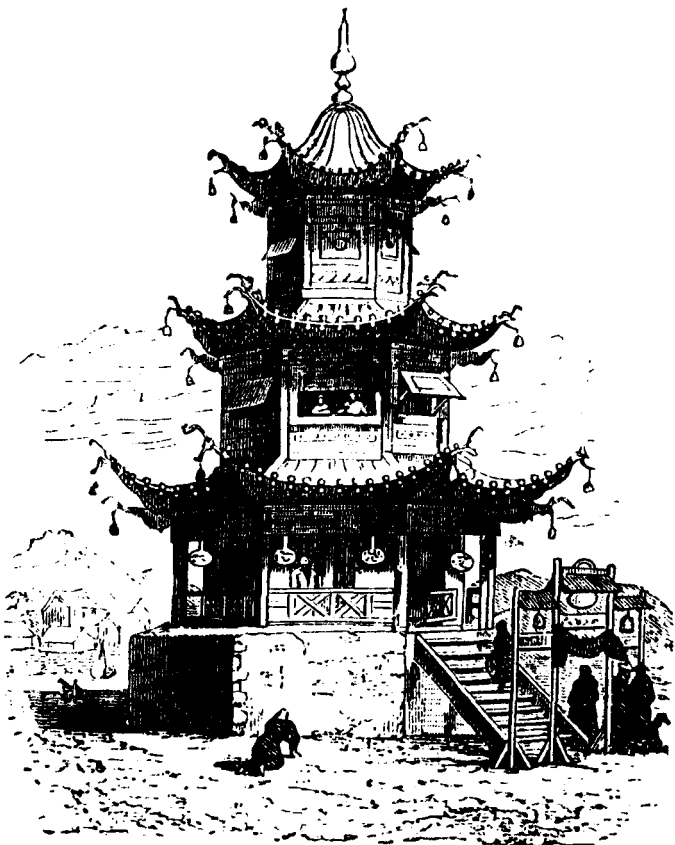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古庙

论家喻户晓,他的著作是每个私塾学堂的教材。他的思想原则为每一位官员所自觉实践。他过着一种高尚的生活,身后为国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孔庙遍地都是。崇圣就是对他的纪念。孔子的思想一方面纯洁而崇高,另一方面也对神性、未来生活、罪恶的本质和拯救人性的手段作了原原本本的论述。孔教是中国的国教,它的信徒几乎遍及学术界、政界和政府衙门等各行各业。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服膺儒家的学说,又尊崇其他宗教体系的仪轨和戒律。

佛教是东亚的一大宗教。它在公元60年(原著者所说不确,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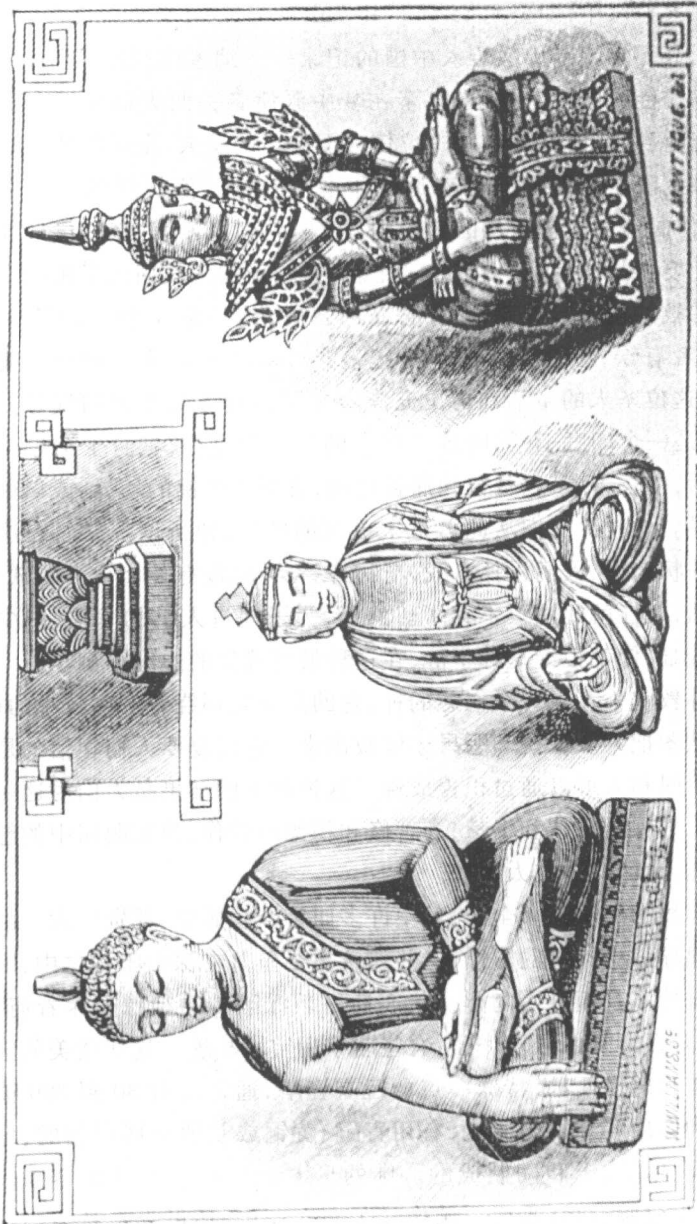


图 8 佛的流行形象

为东汉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其实史籍记载,在公元前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就有佛教传入中国的记录——编者注)以一种奇妙有趣的方式传入中国。据说,皇帝在梦中派使者去西天取经。孔子很久前曾断言,在西方将出现一位伟大而神圣的圣人,皇帝的梦正是出自这种说法。使者们的足迹远及印度,在印度,他们遇到了一位高僧,高僧向他们传授了佛的知识和教义。使者们断言,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要寻找的东西,便带着一个新的神、新的宗教回到了祖国。

27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或称智者,他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原著者有误,应为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或5世纪下半叶——编者注)。这位圣人的生活和历史充满着神秘的迷雾与浪漫的气息。据说,他是一个印度王子,厌倦了宫中的浮华和空虚,献身于沉思冥想的生活,广行善事,以贫穷和痛苦自困,直至达到佛的境界,或曰彻悟的境界。他教导人们从此可进入更高的境界,即所谓涅槃。在这种涅槃的状态下,人们丢掉自我,与物齐一,再也没有什么个人的欲望。一句话,人性就此湮灭不存了。然而,为了促进人类的幸福,减少人类的苦难,佛都拒绝这种宁静,在这种最高境界的边缘徘徊。

佛教宣称存在一个仁慈的神,它的周围还环绕着一些较小的神。他们试图把人从恶行和恶果中解救出来。它反复要人们相信的是灵魂的轮回和人可以通过积善成佛。这种教义的结果是人们对这一体系中无数神的祈祷和奉献,为苦修和积德而劳作,为在阴间中的想像的灵魂、为已逝的友人超度。

25 佛教的庙宇遍布全国,其中许多庙宇金碧辉煌、耗资巨大。由于佛教倡导静思冥想的习惯,这些建筑主要坐落在深山幽谷之中,因周围的自然风景而令人陶醉。代表这一教派诸神的神像充斥着庙宇,有时,几百尊神像居于一庙,有些庙宇用宝塔相连。这些优美的宝塔有石塔和砖塔两种,特殊一点的还有瓷塔,通常都有80到200英尺高。神像用各种材料制成,有用青铜、黄铜或其他金属所制的,也有用石头、木头、土和陶制成的。佛的形象是以睡着了的面容来表现的,双手过膝,双耳垂肩。佛像除了立在庙中,还可立在私宅门前的

石阶、门廊上，几乎无所不在。

中国到处有和尚，他们的修行在很多方面与天主教徒相似。他们削发、吃素、终生独守、念经诵佛。他们接受和享用善男信女的供奉，早晚做法事。如有葬礼或什么节日，和尚们去念经、讲经，经常被请到私家做法事。他们每天坚持在外化缘，自己动手做僧袍。尼姑庵也随处可见。在这些女性汇集之所，她们也削发、操法事，苦练入戒修为。

佛教是中国最普及的宗教，是一种与人的环境和状况惊人吻合的体系。它承认宗教的渴望，承认让人类痛苦的苦难。它通过把人身上的宗教元素转变为偶像崇拜，引导灵魂；通过传授积德的观念，培养人性；并传授让人最终会从痛苦中解脱的观念。

道教虽然在其影响程度和信徒数量上都远逊于佛教，但却是中国第三大教。生于公元前604年的哲学家老子创立了道教。他写了一部书叫《道德经》，这部书现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伟大经典。“道”，意为真理，它不只是这本书书名的前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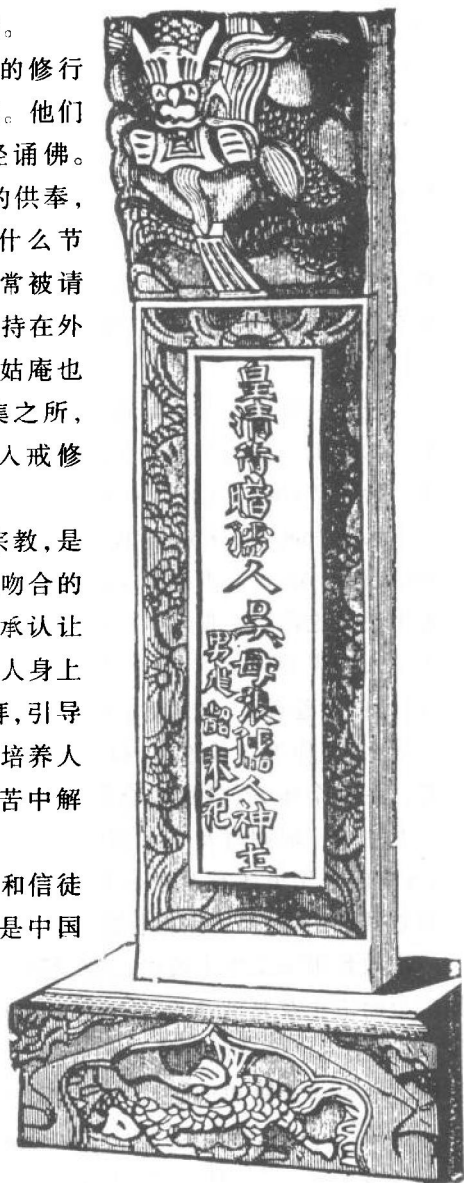


图9 祖宗牌位

字,还是全书的主要主题。据说孔子曾向老子问道,和他讨论过一些重要话题。道教从其早期的单纯朴质中大大退化了,被迷信掺杂于其中,也吸收了许多怪异的占星术和炼金术。观察星象,寻找长生不老仙丹、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是一些偶像崇拜形式。从其根源上来说,这是一个纯唯物论的体系。它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物质的本体每况愈下,渐渐成为泥土;而物质的精髓是向上的,它渐渐便孕育出个体和生命。星体就是这样一些物质,它们被假想为一种可见的形式,从天上兴致盎然地鸟瞰人间。人的身心也代表着某种本质或是自然法则。

这一体系宣称在天地创造很久以前,老子学说就是遍布宇宙的活生生的法则。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这一法则发展为人格神,即:玉清元始天尊(holy ruler of wonderful identity)。后来,这一神又以上清灵宝天尊(holy ruler of entity)出现,不久以后第三度演化为太上玄元皇帝(holy ruler of chaotic confusion)。以这种隐语为开端,推演出一种半泛神论体系。据说,在人类出现于天地间之后,老子就用几位伟大圣人和先知的名字活着,最终,一位童女生下了他。老子降生时,已是白发苍苍,一如老者。他的信徒声称他具有惊人的禀赋和才能。现在,他作为道教的神,和佛一样,与其他诸神一起受到人们的崇拜。在各个地方、各种场合揭示神性。在各种神灵中,必须提到龙。龙主宰江河湖海及居于其中的生物,主宰所有的风雨雷电。据说,在它的王国里还有无数小龙,那些小龙都是它的部属的化身。至于道教其他的神,要占用很长的篇幅来介绍,本书只能从略。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所以要早于佛教为中国帝王所接受。故而道士及其法事会在国祭中出现。道观和道士相对来说较少,女道士也不像尼姑那样比比皆是,道教的教义太过玄妙,就像是要阐述各种极端思想的奇妙聚会,因此难以广为流行。道教用它的降神附体(rapping)和桌灵转(table turning)一直在实践着现代唯灵论的所有形式。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道教的巫术随处可见。只要略付薄资,道士就会为你预测未来,或者让你与故人沟通,并呈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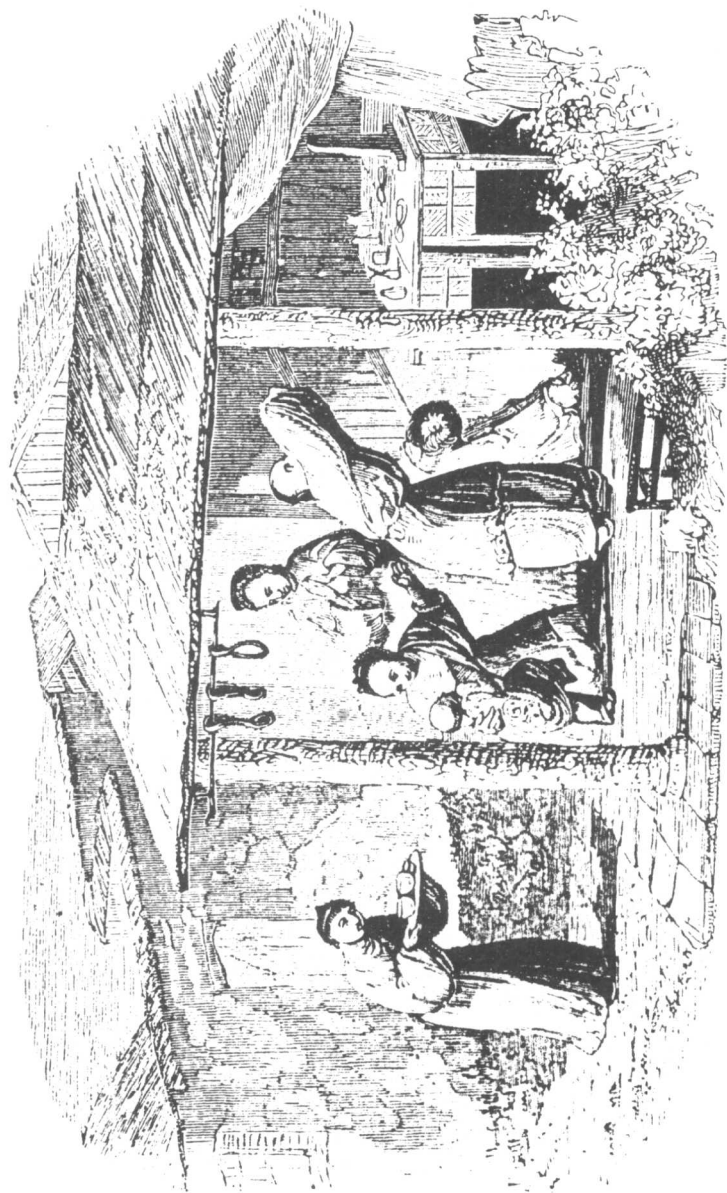



图 10 在供桌前祭祀的中国家庭

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所有这些宗教确实存在众所周知的迷信活动,这些迷信活动将宗教维系在民族的历史和信仰中。这其中主要的和惟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祖先崇拜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宗教生活中,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它的规矩礼仪被看做孝顺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国家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责任强迫自己以最积极的态度遵守孝的形式。因此,每个家庭都要求保留祖宗牌位或供奉先人画像。祖先牌位用木制,大约 12 英寸长,上面刻有逝者的名讳、谥号和生卒年月以及子孙的姓名。画像是死后画的,很少能作为可信的肖像。这些牌位在新年和逝者的诞辰时被请出来祭祀。祭奠祖先要经过跪拜、上供、烧香、上烛、烧纸钱、唱大戏等几个程序才完事。祭奠可随意选择在宅中、家庙或墓地举行。

中国的所有宗教中,没有一种宗教能有效地限制邪恶的活动,或把人引向神圣的生活。孔子的学说忽视了神的存在和心灵的不朽,不能净化人的灵魂,或激发高尚而纯粹的生活。佛教只是指出,寂灭是人性的最高目标,所以它不能满足或填补灵魂对永无止境的幸福的渴望。道教只是表明道教的教义。从这种省察出发,我们以一种无言的宽慰转向纯粹的基督教及其教义,并且怀着深深的感恩呼唤:  
惟有耶稣,惟有耶稣。

第三章 早期在中国的布道尝试

. . .

听！那曲调汹涌的旋律，  
像充盈于心灵的潮水；  
当它们涌向浪尖，  
正是我们伟业的肇始。

——林奇

很早以来，那些把全身心奉献给基督教的牧师们心中就涌动着与中国对话的强烈渴望。在教会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中，总有人力图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福音。这根本不足为奇。因为4000年以来，这个国家的生命绵延不绝，这个帝国在时代的风雨中从全盛走向衰败，但仍然幸存于世。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身上有一圈传奇的光晕，正是这一切，燃起了基督徒们的探险精神。中国人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他们在各门科学中的成就，在工艺和制造业方面的精湛技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丰富的矿藏，所有这一切在吸引学者、商人和政治家的关注方面都起了作用，也激发了慈善家的仁爱之心，燃起了每一位基督徒的热情，基督徒们为这样的召唤而振奋：“到世界各地去，向每一个人传播福音。”

. . .

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阻碍了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推进与中华帝国对话的努力。这个国家顽固地、坚定地反对与外国人的接触，特别



是反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与那些企图让人们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人接触。因此,这个国家尽一切可能将自己与基督教传教士隔绝开来。结果是,截至到本世纪初,没有任何一个福音派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直到本世纪中叶,福音派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

其实,上溯到 1000 年前,基督教传教士就开始尝试进入中国了。在 6 世纪或 7 世纪,景教派使者前往中国。他们苦心经营的一个著名的遗迹便是保留在西安府的景教纪念碑。景教碑的内容包含了景教这一教派自 630 年至 781 年的简短历史,和对基督教的一个概括性介绍。很少有什么人的工作能以这种形式保存下来。14 世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时,发现景教徒在中国的富人和穷人都有很大影响。也许他们有理由希望,通过景教在这片土地上存在 800 年的历史,无数中国人会匍匐在福音的神圣力量下。但景教最终丧失了其信仰的质朴性而渐渐湮没不闻,徘徊的残余也被罗马教会所吸纳。

在 12 世纪,不断有传闻径自传到西方,这些传闻中有关铎德约翰(Prester John)的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成分。据说铎德约翰是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他统治临近华北的这一地区的基督教教民。传闻还说他一人兼任国王和牧师的职责,他的后继者用同样的方式一直统治了好几代人。

13 世纪和 14 世纪,来自欧洲的先遣使者——他们既有奉献精神又才华出众——踏上了中国之旅,向人们传播福音的真谛。他们中的领袖就是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目光敏锐的史学家尼德耳(Neander)证实,孟高维诺属于那种真正的传教士。他径直到了北京,成功地在朝廷中谋得了一席职位。他渐渐精通了汉语,曾把《新约》和《诗篇》译成中文。作为一个真正有远见的人,他潜心做青年人的工作,培养当地的传教人员,以便在乡民中传播新的教义。他为 6000 人施了洗礼,还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其中一座就挨近皇宫,这样,赞美基督的甜美歌声就乘着清晨的微风吹送到皇宫中。孟高维诺由于多方着力,操劳过度,加上贫困交加,58

岁时便去世了，未能尽享天年。

两个半世纪过去后，一位具有真正的使徒精神的人进行了另一番进入这片巨大的道德荒漠的尝试。1553年，圣洁而崇高的方济各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抵达上川岛(Island of Sancian)。虽然他曾经在印度和日本艰难地传道，但在抵达中国、向百万民众宣布耶稣到来之前，他仍不满足，心里仍然涌动着渴望。许多困难摆在他面前，他都不屈不挠地一一克服了。看起来，他似乎将要如愿以偿了。他从小岛上睁大了眼睛，紧盯着他渴望进入的那片土地的石滩，急切地盼望着能有一叶扁舟载他渡过阻隔之水。他想登上黑暗之光笼罩着的土地。他预料自己会被抓住并投入监狱，但保罗和西拉斯(Silas)在腓立比也经历过同样的遭遇，伟大的复兴就是从迫害中诞生的。如果他做不了什么事，那么，就让他倒下在中国人心中播下一些种子，上帝仍然能用天罚来褒奖自己，这些种子会带来收获。但鼓励这种观念、奖赏这种奉献精神的全知全能的统治者，还不允许这一目的就此实现。当沙勿略等待船只渡他过海时，高烧击垮了他。他躺在海滩上，深冬刺骨的寒风在他周围肆虐。在神志谵妄中，他的心灵似乎充盈着使徒般的热忱。他大喊：“再来一些，再多一些！”(amplius, amplius)随着高烧的减退，他的体力也在消失，他准备好迎接最后一个恶魔，但他脸上的光泽非人间光彩所能及，神圣的欢悦令他喜极而泣。他不由得喊：“哦，主啊，我崇信你，你从未让我慌乱失措。”他成功地度过了人间隆冬的寒冷而进入了永恒的天国之夏。

另外一些具有类似精神的人物很快决定再做尝试，进入那片笼罩着沉沉黑暗的异教土地。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Valignani, Alexandre)赴日本途中曾在澳门短暂逗留，他远眺着仍向福音派关闭着大门的中国沿岸，大声叫道：“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他急切地想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说服了他的两位同道——两位个性鲜明且才华卓异的人——试着去攻克这座坚不可摧的堡垒。由于团结一致的决心和智巧的力量，天命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他们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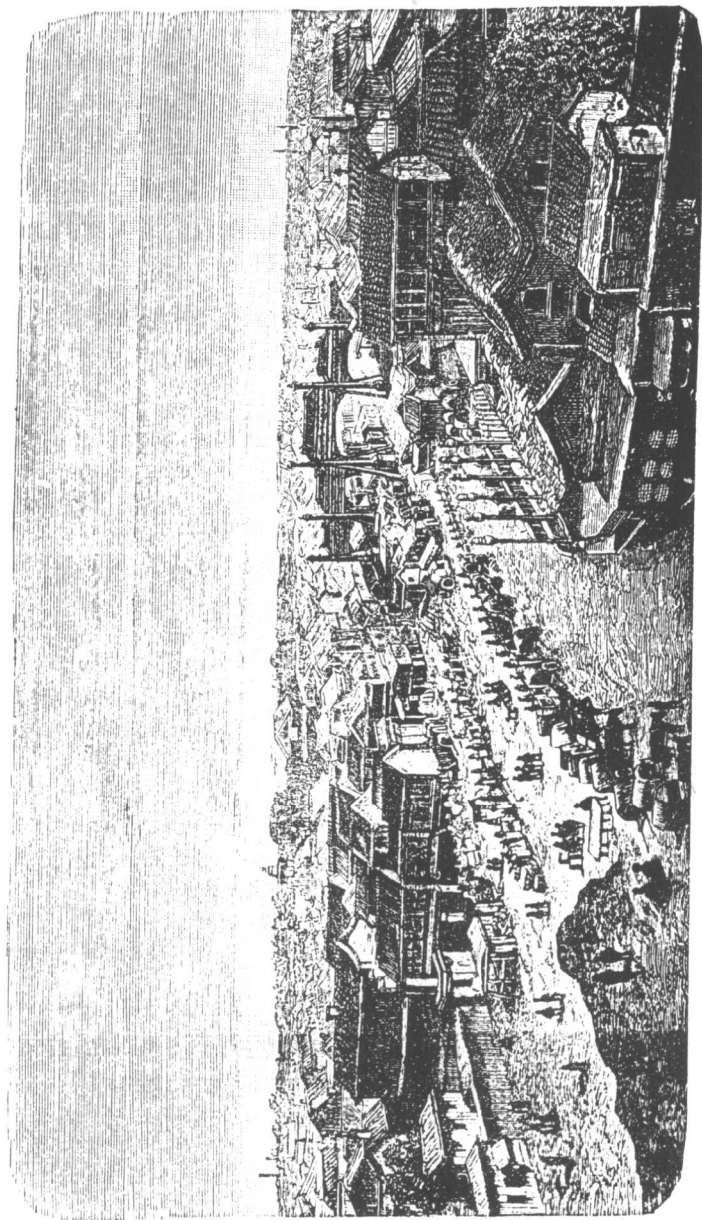


图11 北京一瞥

扮成佛教徒,以中国的文人学士(Literati)的面目出现。结果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一个人——利玛窦(Mathew Ricci)获得了北京的一个重要的文职,成了皇帝的宠臣。然而,在他的官员身份之外,利玛窦从未放弃他执著的传教努力,为了建立和传扬他的信念,他在中国度过了27年光景,1610年去世。在他的指导下建立的基督教社团和传教同道都为他的死而沉浸在深深的悲悼中。他身后留下的300多个基督教团体成为他的热情和勤勉的最好纪念。他的身后追随着一些具有同样精神的人,同样审慎而明辨,但却没有既定的目标。这些人中的主要代表就是汤若望(Adam Schaal,死于1666年)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死于1688年)。这两位科学和其他各学科都训练有素,是博学的哲人。他们编制历法,指导铸造大炮和其他国家谈判。承认他们的超凡学识会忽略他们传教士的角色,但统观他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他们依然故我,是真正的、纯粹的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是他们的本色行当。他们在北京和皇宫中宣讲他们的启示,在各边远省份和城市里庇护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兄弟。他们竭力促使一些新来者能获准进入中国,打开这个国家的大门。

宗教迫害开始了,并且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在这段时期,基督教会被迫关闭,教徒四处星散。但到了1671年,这场磨难终于到了头,残存的教会重又开放,虽然更进一步拓展的尝试仍被禁止,但据报道,有不下2万人受洗入教。这些受洗者大部分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有名无实,他们皈依基督教仅仅是做表面文章;也许从福音派的立场看,要传播的教义可能存在令人痛惜的缺憾,也可能教皇制度的毒素和他们的体系搅在一起,以致在我们看来非常不信任他们的工作。但请让我们公正地甚至宽厚地对待他们。他们散发到全国的小册子远超过罗马天主教后来分发的那些粗陋而浅显且充满荒诞传说的作品。那些作品中,福音派教徒对原罪的性质、基督的诞生,还有救赎的现实可能性的表述都非常清晰。他们拥有许多真正的皈依者,这些人都准备把信仰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作为第一批到这个伟大的异教国家的中心传教的基督徒,作为树立了一个值得归正会(The

Reformed Churches)仿效的榜样的基督徒,对他们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不论如何估价,让他们保有这个与他们的付出相符的荣耀,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到目前为止,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范围很广,大概有 200 座教堂,250 000 名教徒。他们对中国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干扰,激起了中国官方和平民百姓两方面的嫉恨和不满,但这样反而使传教士们比过去更快地推进工作。

18 世纪福音派伟大复兴的一个后果就是使规正异教徒的愿望更趋向强烈,由于这一愿望的驱使,再加上一些手段所发挥的作用,现代传道会随之而兴起。本世纪伟大的福音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急于向仍然沉湎于迷信和偶像崇拜的国度传播福音是不可能的,中国可能被忽视,或是她难以让自己引起更多的虔诚者的关注。由于服务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对中国的征服,她的风俗习惯,她的排外性,她的独特的文明,她的日趋膨胀的人口,立刻就以其最有趣、最艰难和最广阔的领域赢得了耶稣基督教会的青睐。由于使徒们已经出发去进攻罗马帝国的罪恶堡垒,在他们面前就没有比中国更宏大而宽阔的领域了。他们的伟大使命,所要求的信念、热情和热心,是担负着进攻这个迄今为止最无懈可击的罪恶堡垒的人所迫切需要的。

第一位前往中国的现代使徒以不气馁、不动摇的热情来从事这一伟大事业。他的生平事业构成了本书的篇章。笔者真诚地希望叙述这个故事能点燃许多人心中的慷慨而神圣的热情,以有助于规正这个大国的伟大事业。现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座右铭都应该是:

中国需要基督,就在当下。

## 第四章 马礼逊:青少年时代

清亮的少年,我并无意于描绘

你人生的羁旅,

从亮丽青春的欢快日子,

到成年旅程的壮美。

你心中需要什么戒律?

什么样的乌云遮蔽了你的阳光?

惟有神灵的双眼能看透,

并让他的意志实现。

1782年1月5日,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生于诺森伯兰郡莫珀斯的布勒氏格林(Buller's Green),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马礼逊的父亲詹姆斯·马礼逊(James Morrison)是一位农场的工人,在罗伯特3岁时,詹姆斯就迁居到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他在那儿的“四便士市场”做起了一份生意,经营鞋楦制造。他和他的全家在那儿居住已经很久了,以致他著名的儿子在回忆录中把那儿称为“马礼逊场院”。他在那儿雇了几个人,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并培养他的8个儿女敬畏上帝。

按出生地来说,詹姆斯是苏格兰人,他妻子是诺森伯兰人。他们

俩都是热忱的、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他们是海布里奇长老会的成员，到那里去必须要经过一个酒馆庭院。老马礼逊先生在该教会极受尊重。一位熟悉马礼逊父子、也是同一教会成员的老妇人最近证实，老马礼逊是一位极高尚的人，该教会没有任何其他成员或官员受到如此敬重。多年来，老马礼逊都是教会最令人尊敬的长老。那时的教长是约翰·赫顿牧师(John Hutton)，一个忠实地把自己奉献给教民利益的人，他也是对本书主人公的思想给予了健康而积极的影响的人。

罗伯特·马礼逊被送往学校入学，由他的母舅詹姆斯·尼科尔森(James Nicholson)——一位令人尊敬的才识之士——监管。马礼逊在学校接受了全面的基础教育。有一段时间，他的学习进步显得非常缓慢，甚至被列入最劣等生的行列。但后来，他在学习上豁然开窍，取得了迅速的、令人满意的进步。

在经文知识和宗教责任方面，他也受到了他的引路人赫顿牧师的严格训练。不管在家中还是在公开场合，赫顿经常和他仿照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流行甚久的时尚，进行辩难。这个故事是纽卡斯尔津津乐道的传说，常被前已提及的那位老妇人说起。据说，还在马礼逊12岁时，有个安息日的晚上，他在小教堂里全文背诵了赞美诗第119首。为了进一步测试马礼逊的记忆力，引路人赫顿先生以各种方式把不同的章节拿来考他。这个男孩竟然毫无差错地通过了口试。

马礼逊14岁时离开了学校。对他的父亲来说，孩子是个循规蹈矩的学徒，并以他绝顶的聪明和勤奋帮他做生意。有一个不长的时期，马礼逊受不良少年的引诱，似乎走上了邪路。但在家中，马礼逊表现得很有责任感，所以他父亲很少出语呵斥他。他对母亲则是爱敬有加，几乎到了女性崇拜的地步。他酷爱真实，从不知道撒谎，惟有一次被发现说了假话。当时，虽然他不必担心有什么让别人看穿，但他还是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于是当众做了忏悔。1798年，他改掉了他的坏习惯，和所有染有恶习的朋友、不良青年分道扬镳，完全

转化为侍奉上帝的人。这个巨大变化与其说是借助于一些特殊的手段，不如说是得益于先前的长期训练，得益于围绕在他身边的健康的宗教影响。他马上与教会融为一体，并开始参加星期一晚上在他父亲的工房里举行的祈祷会。他也开始上读经课，主要是读各种宗教典籍。他把时间做了精心的安排，并认真地遵守他制定的计划。他甚至还学会了速记方法，以便学习起来更方便。他还和希尔兹（Shields），一位同样狂热的年轻教徒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几乎每天与祈祷者见面，进行宗教对话。他们也一起访问那些穷苦人，一有机会就以各种方式为上帝工作。

渐渐地，他的心灵深深地浸淫在宗教事务中。1800年，为了不受干扰，他把床搬到了工房里，经常到凌晨一两点还在阅读罗曼（Romaine）的《虔敬的生活》、赫维（Hervey）的《沉思集》、马歇尔（Marshall）的《论神圣》或默谢姆（Mosheim）的《教会史》，但多数时间他是在研究马修·亨利（Matthew Henry）的无与伦比的《经注》。他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文法水平，仔细探究基督教的真谛。马礼逊还定期从一位朋友那儿借阅《传教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这份杂志起初是由爱丁堡的出版商出版的。可能正是从这份杂志中，马礼逊心里对传教事业有了一个初步的看法。一直到他离开那儿，他进行研究和睡觉的工房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原样。1859年，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发起了对马礼逊博士回忆录的粗暴的抨击，发起人是威尔伯福斯牧师（R. I. Wilberforce），接下来又遭到罗马天主教派的曲解。神学博士布鲁斯牧师（J. C. Bruce）在一次讲座上提到这件事，并作出了回应。我们从中摘录以下文字：

“这座工房现在被一个小木匠占据了。上周，我和朋友约翰·芬威克先生（John Fenwick）拜访了那间屋子。那个地方目前有某种程度的破损。从各个方面看，它非但激发不了高尚的情操，反而会让人有些消沉。我的朋友一进屋，就感觉像回到了50年前。他指着马礼逊的写字台告诉我，他常常看见马礼逊在那儿工作，面前总是打开着一本书。诺森伯兰的两位伟大人物——马礼逊和乔治·斯蒂芬森



(George Stephenson)想必常在这个简陋的屋子里会晤,他们两个家族是世交。斯蒂芬森先生在青年时代,用做鞋来打发空闲时间。他穿的鞋是自做的,并且颇以精于此道而自夸。有一次,斯蒂芬森先生和一位同道比试,为了排除裁判不公的可能性,他征得马礼逊父子的同意,把马礼逊家的戳记压在鞋子上。”

年轻的马礼逊先生还在潘登幽谷租了一个小花园,当时花园就坐落在纽卡斯尔风景宜人的郊区。但那地方在房地产业和商业发展之前就已经消失不见了。马礼逊经常去那个小花园,在那儿冥思和祈祷。甚至在工作时,他的面前也总是摊着一本《圣经》或其他什么书。这样,他的手虽然忙碌,却不影响他的心灵和思想不断地更新。每逢安息日,他按例为教会服务。他还经常在父亲家里指导家庭礼拜活动,定期去看望病人,并把有限的收入奉献出一部分来救济病人。在安息日礼拜的间隙,他通常指导穷孩子们。他的父亲有一个年轻的徒弟——他正争取那年轻人皈依基督教,他经常把年轻人拉到一边,和他私下里祷告。他心里真诚地请求他的亲朋好友们皈依基督教。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吸引了一位年轻的亲戚——一名水手,恳求水手皈依主。年轻人说,在他被引导皈依耶稣之前,马礼逊时时刻刻给他宣讲道理。从他早期的基督徒生活可以看出,他对意义深远的责任的认识、对既定目标的执著、对拯救心灵的渴望,都显示了他后来一生的特征。

1802年,在一封致霍克斯顿学院校务委员会的信中,马礼逊表明自己愿意献身于牧师的工作。他在信中写道:

“在我生命的早年,曾经享有我虔信基督的父母的无量恩惠(我一直想对此表达感激之情)。福音布道我总是每场必到,极守规律。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我们家庭对上帝的信仰,教导我要恪守教规。为了增进认识,我参加了约翰·赫顿牧师的公开问难。在他的指导下,我获益匪浅。通过这些方式(在上帝的正确引导下),我的宗教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和提高。虽然我生活在没有基督、没有上帝的指引,也没有希望的世界,但我不再沉湎于浪荡中,而有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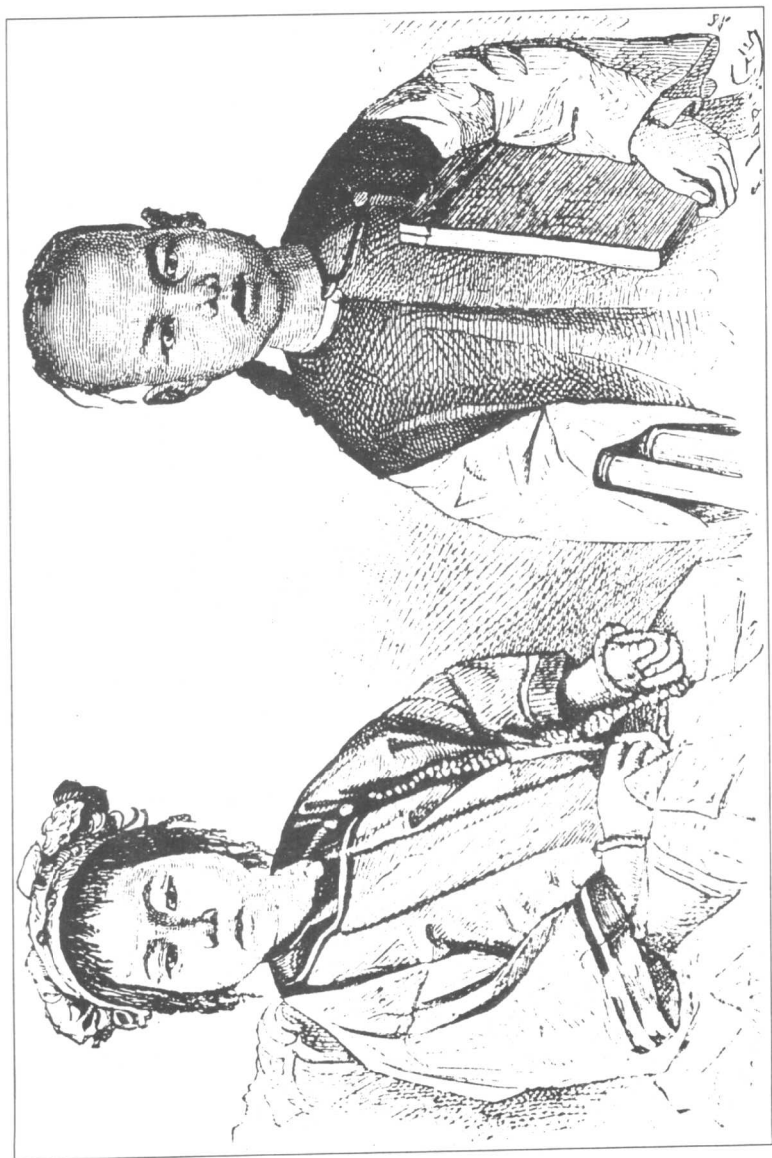


图12 中国儿童

多人还沉湎于其中不能自拔。尽管我时常受到良心的责备而深深懊悔,我对自己心灵的蒙昧并不感到突兀;尽管我率性而为地走自己的路,我仍自以为多少可以保持心境的平和。

“大约5年前,我开始觉悟到一种强烈的罪恶意识,要不就是那时候我变得有点散漫和渎神,还不止一次被坏心眼的同伴拖离正道(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否则我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导致这种情形。我也变得有些陶醉于其中。我的这些丢脸的行为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使我对自己的灵魂感到担忧,我害怕那种无休止的负罪感。死亡的恐惧笼罩在我心头,我整夜在祈求上帝饶恕我的罪过,祈求上帝慨允我向耶稣基督赎罪。他会重塑我思想的灵魂。罪恶是一种负担。正是在那時候,我经历了生命中的转变,相信那也是心灵的转变。我和昔日那些不良伙伴断绝了来往,自觉地读经、沉思和祷告。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会向我默示做他的儿子。还是那时候,我充分地体验了‘青春的仁慈和对信仰的热爱’,虽然原罪已经消失了,但我相信,我对救世主的爱和了解却与日俱增。打那以后——经我现在的引路人约翰·赫顿牧师引荐——我与教会建立了联系,不久成了祈祷团的成员。仁慈的主就一直在考验我,并使我谦恭待人,虽然我在诚信中经常能体验到更多的欢悦和平和。同时,我也更多地从与主对立的存在于内心深处的罪恶中体验到——‘灵魂与肉体相对,肉体也与灵魂相对。’这就构成了一组对立,‘我不能为所欲为’。我渐渐发现我所体验到的神圣性、灵性和神圣律则,体会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和在上帝眼中的卑微,体会到至高无上的神的慷慨和丰厚的仁慈。我的罪过大了,‘由于上帝的仁厚,我复为我’。”

有好几年,马礼逊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记录了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人生体验。日记以自然而轻松的笔调,揭示了马礼逊思想的真实倾向。从1800年的日记中摘录的两三条日记,可以作为大量实例中的范例。

2月5日,5时即起。念经文《那鸿书》第一章,第七节。“耶和華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多么熨帖的词句。晚上，我四处漫步，欣喜地感受着上帝的杰作。太阳下山了，月色皎洁，夜已深沉。大海在远处呢喃。上帝是我的创造者，也是我的救护者。那一晚，我独居一室，祈祷上帝。睡了5小时。

2月23日，星期日：晨6:30起床，出门散步至弗斯。雾浓返家。在工房祷告。哦，可爱的孤独，我爱你。我并非孑然一身，因为上帝与我同在。诵读罗曼先生悼念赫维先生去世的一段祷文。去教友会所，听关于西蒙(Simon Magus)的讲座。午餐后，带杰姆(Jem)去工房，和他一起祷告。然后和他进行教义问答。下午，听《论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讲道，和教友托马斯(C. H. Thomas)饮茶。我们一起唱诗、祷告、读经。读《圣经》本文和赞美诗第48篇第14节。我被一些虚幻的空想所困扰：“当我行善，邪恶也伴随左右。”

6月18日，晨5时即起。祷告后，我坐到6时，然后开始工作。写作到将近下午8时，托马斯来访。我们一起唱诗、祷告、阅读布道文，然后一起在花园里散步。我们拜访了赫顿先生，做了一次认真的交谈。哦，当我的主降临时，我能够见证他，并保持清醒。

1801年，马礼逊开始有了明确的信念，他打算以基督教牧师为他的终生职业。他准备有系统地研究他即将面对的这项工作。接下来的这段日记表明了他在这段时间的情感状态：

6月19日，星期五，今天我开始跟莱德勒先生(Laidler)<sup>①</sup>学习拉丁文。我付了10先令6便士的学费，等于每一刻钟付一个几尼。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上帝乐于宽容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希望他给我机会传播基督的福音。哦，主啊，我的上帝，我所有的希望都是你所赐予的。惟有你！如果上帝宽容的话，会通过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仁慈地对待我这个罪人，赐福于我的努力。如果这能令你愉悦的话。阿门。”

这段平白的摘录显示了马礼逊思想的取向，他的全部活动都按照其想法来安排。从早6时到晚6时，他经营他的生意。此外，从9

<sup>①</sup> 纽卡斯尔教区教长。——原注

时到10时,他随莱德勒先生学习。为了方便学习,他对吃饭时间都重新做了安排。夜晚,家人入睡后,他还在刻苦攻读。如此的勤奋使他的知识日渐丰富。18个月后,他进入霍克斯顿学院就读。他不仅拉丁文知识了得,希腊文、希伯来文也颇为精通。

在他全身心地为未来的成功做准备时,他到森德兰去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去了解他父亲的另一宗生意。在森德兰,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威尔逊(Wilson)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讲述了下面这件事:

“我们四五个年轻人在一起谈论一些被白发苍苍的基督徒视为上帝的隐秘的事情,他以沉默的谦卑表示敬畏。因为马礼逊先生没有说话,所以我们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使我们获得教益。他答道:‘无论怎么说,我并不熟悉这些事,我所知道的一点就是,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这一评论出自我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着实让我们感到震惊。”

在马礼逊母子之间,有一种最温柔的情感。马礼逊是母亲的宠儿,出于一种真实的本能的母爱,母亲很快猜出了马礼逊一心要为教会服务。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力的衰弱,她更依恋儿子了。想到儿子要离家远走,她就感到忧伤。马礼逊是孝子,他侍奉母亲,答应母亲,母亲在,不远游。这样母亲就更依赖儿子了。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旅程,只要看到儿子,她就感到舒心和宽慰。1802年,马礼逊的母亲永别家人,辞世归西。母亲病重期间,马礼逊陪侍在母亲的病榻前,一切遂母所愿。送汤送药,祈祷上苍。母亲为儿子做了最后一次祝福后,就撒手而去。

## 第五章 为伟大的事业

57

高位须有大才，上帝赋予每个人  
品德、性情、悟性和趣味。  
令他青云直上，也令他落入  
恰好他意欲填补的虚位。

——库珀

在马礼逊先生不知疲倦地做着准备的同时，他的目标变得更明朗、更坚定。通往基督长老会教长的道路还没有敞开，他想去的是公理会神学院，也即当时的霍克斯顿学院，后来的海伯里学院。下面两段摘录表明，在他内心深处，他要在神圣生活和牧师课程两方面都取得进步的强烈愿望：

“哦，神圣的耶稣，很久以来我一直追求心灵的安宁。有时候，我满足于世俗的欲望；有时候，又渴望灵魂的满足。年轻的时候，我与酒鬼、不守安息日的玩闹者和渎神之徒为伍，但我的灵魂却颇受惩罚，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于是，我研习上帝的训诲和典籍，但这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我走近你。‘靠近我，你们所有人都以为劳作是沉重的苦役，而我会给你们安宁。’追求幸福的失败使我们疲惫，罪恶感让我们感到压抑。耶稣，你，上帝之子，靠近你，或许我会焕然一新，消除重负。”

耶稣，我主！  
你让万有充满永恒的神性。  
哦，请让我疲惫的心获得安宁，  
请把我压在身上的罪清除净尽。”

1802年9月25日，马礼逊这样写道：

“今天我写了一封信，我想了解有关霍克斯顿学院的一些情况。在这一天将尽的时刻，我有什么值得记下的？哦，主啊，原谅我的罪过。在你收集你的珠宝时，把我也当做你的宝贝吧。在‘上帝以耶稣基督来审视人的秘密的那一天’，‘以全身心信仰耶和華，但不能仗仗你自己的理解力。在你信仰上帝的所有途径上，上帝都会给你指引’，‘你应该全心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首要的戒命’。”

11月24日，马礼逊正式申请进入霍克斯顿学院。他的申请书以很长的篇幅谈论他早期的宗教观和他对上帝的皈依。在下面的句子里，他提到他的宗教情感和牧师职位对他的感召。

“就一封信来说，还不足以让我就我的原则多加阐述，但它足以让你们清楚，我受过威斯敏斯特信纲（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中苏格兰教教义的培训，尽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它们，但我信奉它的教义。因此，我关于浸礼派戒律的看法也便为众人所知。

“吸引我做一名牧师的动因，就是我真诚地希望，它有助于我（在上帝的援手下）把罪人从黑暗引向光明，把罪人从撒旦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引向上帝，因为我寻求彰显教会的教义，所以，在神的赐予下，传教有助于教会的发展——我渴望去传教，因为传教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劝诫，给人以慰藉。而我进一步明白，这些事情不仅表示我的动机，而且也包含对我目下工作的认可。因为他们那些来自科林多教会的使徒，以劝诫的形式告诉我，‘追寻，你就可以超越’，‘追寻，就是对预言的渴望’。

“然而，我愿意顺从上天之父的指引。他全知全能，会选择和任

用他所见所遇的工具。他的意志将会实现。”

马礼逊很快被教会任用,应召去伦敦。1803年1月6日,马礼逊抵达伦敦。

当时,霍克斯顿学院由辛普森博士(Simpson)和阿特金森(W. Atkinson)两位牧师管理。马礼逊在学生们中间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即后来著名的伯德牧师(H. F. Burder),一位来自哈克尼的神学博士;还有来自曼彻斯特的法学博士克卢尼(J. Clunie);来自斯特普尼的神学博士弗莱彻(J. Fletcher);来自埃克塞特的法学博士佩恩(G. Payne)。这些人都是马礼逊的忠实朋友。前两位甚至是他的终生友人。

在那场深深影响他心灵的考验来临以前,马礼逊很少住在霍克斯顿学院。他父亲的身体有段时间非常虚弱,生意都仰仗罗伯特来料理。后来马礼逊父亲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急切地希望亲情能召唤他的爱子回家,重新回到他以前的岗位上。但马礼逊心意已定,他对传播新教的热情太热切,以致他无法答应满足他父亲的心愿。他写信告诉家里,字里行间充满着温情与孝敬,但同时也表达了他不可动摇的追寻神圣天职的决心。

“父亲大人并弟妹们:

上月19日信悉,父亲腿病日趋恶化,为人子者内心俱焚,但我又无可奈何。我只能求助我主上帝——也是我父亲的上帝。‘他已经尽心尽力。’上帝会为那些爱他的人把所有事情料理停当。我父,我的兄弟姐妹,我把你们和我自己托付给上帝,我相信上帝会关爱我们。我们来日方长,不是吗?我也希望,如果主概允,他会从人的角度,在你们人生旅途的某段时间里,给你们金钱上的资助。我相信,上帝会乐意这样做。愿仁慈而智慧的上帝因你们的善意而赐福予你们。你们建议我回家,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帝会因你们的好意赐福予你们。但我不想这样做。我着手的工作正在起步。我不能回头。这工作会取悦上帝,让我取得成功,恩准我获得人们的宠爱。



1803年2月5日”

马礼逊的家人仍然不满意他的决定。对马礼逊来说,写这封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他从未有片刻背离他坚信的神圣职责。与他的父亲、兄弟姐妹朝夕相处,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他选择的道路上,神意正引领着他。

马礼逊去见神学博士沃牧师(Waugh)——一位虔诚而感情丰富的教长,他主持威尔士街、牛津街的大教堂——之前,并没有在伦敦待很久。他被吸纳为教会的一员,不久在圣路加济贫院做他的首次布道。打那以后,他频繁地在伦敦周围的乡村布道。他也经常去探访问病人和穷人,那是他在纽卡斯尔时养成的习惯。

马礼逊在霍克斯顿学院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前面提到的他的同学们就他热诚地探求精神与灵魂的完满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克卢尼博士这样总结马礼逊在霍克斯顿学院的生活:“他是一个模范学生,总想着学业有成,甚至在一些他似乎很难适应的分支学科也表现出色,但无论多么勤奋、多么坚持不懈,他寄希望于获得成功的不是任何个人努力,而是基于上帝的赐福。很少有什么人能如此圆满地验证路德的伟大公理:‘虔诚的祈祷是完满的学习。’因为马礼逊的行为恰恰可以说明,祷告是心灵得以快乐地呼吸的一个要素。虽然很难理解,但马礼逊很快应召去填补一个可想而知非常艰巨的重要职位,而且很快声名鹊起,并博得基督教各阶层人士和普通团体的赞许。回想他在霍克斯顿学院的勤奋和专心致志的学习,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未来的全部成就就肇端于此。其他人或许拥有更炫目的才华、更丰富的想像、更出色的辩才、更优雅的举止——但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更乐意关注崇高道德的三大要素——热忱的信仰、不倦的勤奋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奉献的热情。”

马礼逊在霍克斯顿学院进行短期学习之后,原本在家中偶然兴起的到国外传教的渴望变成了他心中明确而坚定的目标。他把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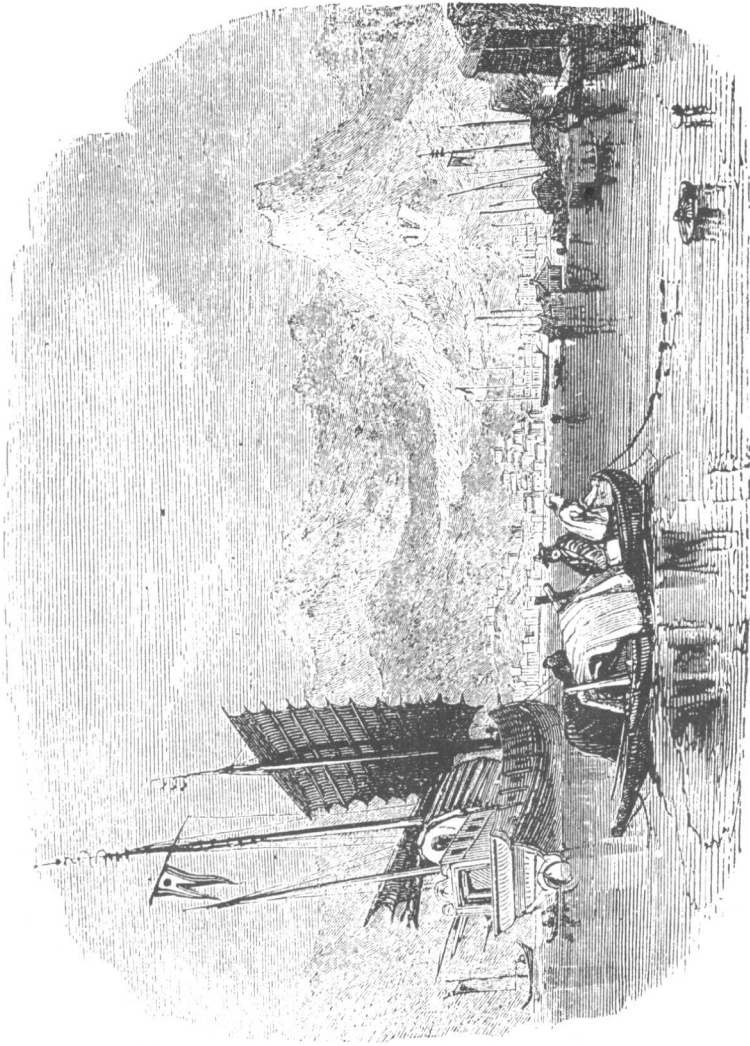


图 13 位于珠江入口处的香港岛

想法告诉了老师和学院的司库。他们向他描绘了这一工作的艰巨性,给了他一个对他从事这一行极有益的特殊机会,推荐他到苏格兰的一所大学接受培训。他们建议他多祷告,仔细考虑一下传教的事。马礼逊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1804年5月27日,他怀着坚定的目标,致信时任伦敦差会资格检查委员会主席的A.沃牧师,为自己争取到外国传教的工作。马礼逊的信常被作为书翰范本而提及。在信中,他简要记述了他皈依的事实和他从事传教的愿望,以及他对传教工作日益浓厚的兴趣。他说:

“我的首要愿望是做一个传教士,这是我祷告的主旨。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朋友们。我进入霍克斯顿学院时,做一名传教士是我心中的愿望,但我应该坦承,我也有一个疑惑,我并不想对此有任何隐瞒。当时我考虑自己并不胜任传教工作,需要进行学习。虽然我对传教这一行一无所知,但我仍然抱着做一名传教士的愿望,却又觉得很快作出决定未免为时过早,因此,先在霍克斯顿学院打好基础。在学院里,我了解到‘耶稣希望其福音遍播世界’和‘主的救赎’是为了超越所有的宗亲、语言和民族的团结,而且,我回想起上帝的召唤:‘融入世间,把福音播向每一个生灵。’作为一个众人向往的神职的候选人,我想这就是我,一个候选的神职人员的责任。我在乡村的亲属,在镇上的好友与城里的老主顾都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们警告我,肯定会遇到重重困难。为了让我留在家里,他们向我允诺了很多事情。我仔细考虑过这些情形,祷告主指引我,助我权衡利害得失,不至于做一个愚蠢的创业者。我很怀疑自己,我小心地守护着对上帝的爱以经受这个考验,但是,凭借对上帝的爱,先生,我现在开始振作精神。如果主愿意,我会‘舍弃一切而追随主’,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都是为了主的遴选。这样,那些人们便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得救赎和永恒的荣耀。”

马礼逊作出了这一重大决定后,开始了和家人的痛苦斗争。他们坚决反对他从事传教工作。马礼逊以最大的耐心和情感试图打动父亲。父亲曾要他打消传教的念头,“我父亲和其他友人能否给我

提出我不能迈出这一步的理由,而让我将来在冥床上感到死而无憾呢?”但他们并不能给出这样的理由来,马礼逊忍受的心灵冲突从这样的文字中可以想见。他在致挚友卡斯伯特·汉德森(Cuthbert Henderson)的信中写道:“我兄弟托马斯寄给我一封信,大大地伤害了我。他从一种让人痛苦的角度描述了我父亲的情况……接着又故意责备我,说我可以帮助他们,而我却撒手不管。难道我忍心看父亲的惊惶失措吗?我的好兄弟,我自己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主正日复一日地彷徨,我在父亲责备的目光下惶惶然,在自己的无知和脆弱下惶惶然。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好几年过去了,为了那些主乐于带来的一切,我日以继夜地祈愿、祷告、苦心经营。现在,在我如愿以偿、我的祷告得到回答之际,我该回头倒转吗?哦,我的主,我把整个心灵奉献给你。如果我现在遇到困难,舍弃上帝,舍弃他的事业,在审判日,我该怎么站在上帝的面前呢?哦,我的朋友,祈祷主饶恕我的罪过,使我的前途平展如画,祈祷他贴近我宝贵的不朽灵魂,也为我的兄弟和父亲祈祷。我恳求你,我的好友,经常去看望他们。主会保佑你,让你保有你的信念,直到获得永恒的救赎。”

5月28日,星期一。马礼逊来到传教委员会(Missionary Board)。第一次面谈令人满意,以致例行的第二次面试都免了。他当即被接纳,受派遣前往设在高斯坡的传教学院,接受尊贵的博格博士(Bogue)的指导。

马礼逊立刻准备服从这一安排。在一次联合祈祷会上,他的同学热情地赞扬他是“上帝的一个特别恩赐”。星期三,马礼逊接受了安排后,前往高斯坡,受到学院负责人的热烈欢迎。他在这里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对传教工作的能力和为此所做的精心准备,很快就得到了验证。不久,他受指派负责劳工领域的传教。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目标有些茫然。7月31日,在致友人克卢尼的信中写道:

“未来的目标对我来说虽然并未了然,但到中国传教却很让我激动。博格先生似乎热衷于此事。我早就想去非洲内陆(廷巴克图)传教。我献身于与主有关的事务,我希望上帝能敞开到世上一

些地方传教的大门,赋予我从事这项事业的灵魂。”

他同时在致姐姐汉娜(Hannah)的信中说:“派我到中国传教真是激动人心,但现在还不太确定。我想去非洲的廷巴克图。我希望主派我到他会让我在拯救人们的灵魂方面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去。”

有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廷巴克图的事。那位勇敢但不走运的旅行者芒戈·帕克(Mungo Park)当时正打算在那儿建立英国人的定居点,同时还在考虑派遣安德森医生和一位传教士结伴去非洲。马礼逊似乎很想同往,但伦敦差会对他另有安排,他们首先安排他去马六甲海峡的威尔士亲王岛。

关于他的目的地确定不下来的情况并未拖得太久。他被派往中国,并被要求集中精力掌握中国语言的基本知识,目标是能胜任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工作。马礼逊一直坚信,到中国传教是上帝的派遣。他把委派作为一个特殊事件,长久地祷告。他甚至倾吐了他的诉求——具有崇高的忘我精神才是真正的使徒,也就是说,“在传教领域难度最大、在所有人看来也最难以制胜的领域,上帝会与你同在”。结果似乎表明,这一祷告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作出这一委派的伦敦差会有一个想法,受到遴选、到中国去的上帝的代表,或是在中国本土上建立定居点,或者在邻近岛屿中建立一个定居点。在那儿学习语言、翻译《圣经》,此外不做他想。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才可能考虑下一步的事。

委员会的安排还包括指派两三个人陪伴马礼逊。著名的牧师约翰·布朗博士(John Brown)之子哈丁顿(Haddington)被选中,但他拒绝了这一安排。随后,范德尔坎普博士(Vanderkemp)被要求离开非洲,前往中国,主管传教事务,但也不了了之。很显然,主的旨意在以难以辨别的方式指导着教会的活动。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一群教会的代表去了中国,他们会将自己置于与统治者不共戴天的对立面,倾全力徒劳地在中国传播福音。虽然委员会没有为马礼逊找到同行的伴侣和承担传教任务的同事,但对马礼逊的

委派还是保留了下来。

1805年8月,马礼逊离开高斯坡,前往伦敦,学习天文学和一些实用的医学知识,也像学习汉语一样,收集去中国有用的知识。他到圣巴特洛梅医院听了布莱尔博士(Blaire)的医学讲座,去了格林尼治天文台,随赫顿博士研究天文学。他借居在主教门街(Bishopsgate),携带各种计算器和仪器来往于格林尼治,一路上读着书。他也找好了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中文教师容三德(Yang-Sam-Tak)。此人有些学识,但脾气躁烈,好动气,又孤傲不羁。马礼逊饱尝了他自言自语的坏脾气之苦。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也为了他自己强烈渴望的精神幸福,马礼逊以超人的耐心忍受了一切。有一次,马礼逊曾烧过一张容三德写有几个汉字的纸。他已经认识了那些字,对他来说那已经没有太多的用处。但他这样做令老师大为恼火,容三德连续三天拒绝授课,以避免类似的冒犯。后来弟子把字写在一块锡铁皮上,可以擦掉那些不再需要的字。让人高兴的是,容三德被学生的耐心和善意所打动,因此他和马礼逊一起攻读经文,也一起做家庭礼拜——而在此以前,他是蔑视这种事情的。由于马礼逊的影响,他后来在香港一个商人的货栈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位置。

北安普顿郡朗巴克比的公理会牧师莫斯利(W. Moseley)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了一份手稿,该手稿包括译成中文的《新约》主体部分。那是一个对开本,错误地印上了 *Evangelia Quatuor Sinice* (中文版四福音书) 字样。在卷首的扉页上写着:

“此稿本受霍奇森先生(Hodgson)之嘱,1737~1738年成于广州。霍奇森先生说,此书乃精心编纂而成,完美无瑕。由准男爵汉斯·斯隆先生(Hans Sloane)于1739年交给他。”

莫斯利先生为这一发现而感到振奋,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中文版〈圣经〉翻译出版的重要性和实践意义》。马礼逊先生认识了一些中文字后,开始誊抄这一稿本以及皇家学会所藏借给马礼逊使用的《拉丁语汉语词典》稿本。经过特别的申请,马礼逊花了数月时间在伦敦的寓所里誊录了这部稿本。此外,他还满怀热情地探究上述

的各种学问,参与很多慈善活动。这表明他正在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米怜博士说:“后来证明,学到的语言作用不是太大,倒是拉丁语汉语词典和对照本四福音书更有些。”这两部书原本是一些在华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何时、由何人编成,还无法确定。但上帝因它有用而将它保留了下来。毋庸置疑,有一天,我们能从书中看到作者的功德。

在这段准备时期,马礼逊心里一直牵挂着帮助他的兄弟姐妹及其孩子们。他给他们写了很多信,通篇是对他们幸福的关爱和期望。7月,马礼逊回家向兄弟姐妹们辞行。友人们也聚在一起。亲友们显然与他感情深厚,想方设法改变他的想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决定。他和亲友们欢聚了四个夜晚,做了13次布道,拜会了所有的亲友和故交,还去了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然后回到伦敦,准备远行。10月23日,他写信给父亲:“上个星期二,我会见了董事们。董事会同意派遣我前往马德拉斯,从那儿前往马六甲,在马六甲卸下行李,再启程前往广州,看能否在广州立足。如果能,我会派人去马六甲取我的书;如果不能,我会回到马六甲建立基地。马六甲有几千华人,在那儿我可以努力学习汉语,而且尽可能快地向马来人布道福音。”

还有,12月23日,马礼逊致信其兄弟托马斯:“我本来希望在启程前往中国的前夜给你写最后一封信。但由于哈德堡(Hardcastle)和考伊先生(Cowie)不太舒服,耽搁了必要的步骤,事情成了这样,完全是朋友们的意思。你得知道,如果没有东印度公司的明文许可,传教士中没有任何人能乘坐英国船只出国去印度。设在靠近加尔各答的塞兰泊尔(Serampore)的浸礼会恳求东印度公司发放许可,而东印度公司拒绝了。我们现已在印度的传教士是乘坐中立国的船只去印度的。我们伦敦会从不要求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但现在却为了我考虑要这样做。”

然而,马礼逊仍未得到许可,他和获准到另一区域传教的两位同事戈登先生(Gordon)和利先生(Lee)及其家属,乘坐“雷米登斯号”(Remittance)货船前往纽约,从那儿他再直航广州或途经印度前往广

州。看起来,取道美洲也许是最合适的路线。

在即将告别的时刻,马礼逊的情感可以从他的日记中来体会。1807年1月2日,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哦,主啊,没有你陪我同往,就无法引领我向上。愿全能的主的护佑,可以陪伴我。愿主的使者在我前面引领我。我并不感到沮丧。今晚,我努力回忆起我寄之以希望的一些诺言,我的脑海里闪现着‘不害怕,因为我和你同在’;还有‘不要言怕,往前走吧,雅各’。我希望能够永远并只是倚靠在上帝的臂弯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

1807年1月8日,在斯瓦洛街苏格兰教堂,马礼逊和上述两位同事一起接受委派出任神职,把自己奉献给神圣的传教事业。祈祷、读经和规诫都是在T.汤森牧师(T. Townsend)的主持下进行。神学博士G.伯德(G. Burder)提了很多问题。这些传教士就传播给异教徒的神圣真理做了一次庄严的祷告。接着,由年高德劭的牧师——马礼逊的引路人沃博士做献礼祷告,沃博士由马礼逊双手搀扶着到场;接下来,牧师尼科尔博士(Nicol)朗读了《使徒行传》第20章第17~27节一段非常感人的段落,最后由C.巴克牧师(C. Buck)做总结祷告。这是一个动人的、给人印象至深的场面,后来一直铭记在在场诸位的心里。这不仅因为令人难忘的演讲和可敬的教友的祷告,而且更多地是由于马礼逊先生对其经历和信念的简洁而自然的陈述。

马礼逊在向英格兰告别时,在给父亲、兄弟姊妹的信中洋溢着真挚的感情,并特别谈到了那些尚未信奉基督教的人。他在给姐姐汉娜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亲爱的汉娜:

一想到你的灵魂,就想起是一个上天入地、渴望拯救世人的救世主在你的面前。我把兄弟般的爱赠与你亲爱的伴侣,告诉他我跟你说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一起向上帝膜拜吧。请求上帝的保佑。我希望明天或至迟礼拜三清晨出发,前往格雷夫森德,乘船赴纽约。



我身体情况良好,情绪高昂。但离开你们大家,我很难过。我真诚地希望而且为之祈祷(哦,上帝赐予这一切),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带来永生的荣耀。我亲爱的汉娜姐姐,我忍受不了怀疑你不信教的紧张和焦虑。宽恕我,宽恕我。对你宝贵的心灵而言,我所说的不是尖利的苛责,而是爱。皈依基督,皈依基督吧。除了皈依基督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了。”这一急切而强烈的恳求,展示了真正的福音派传教士的精神风貌。

马礼逊在致父亲的辞别信中,对他的远行和居留安排做了如下叙述:“我有一封给纽约教友的介绍信,他们会尽力为我在广州的美国商馆里居留做努力。教会给我 150 英镑作为盘缠。在抵达中国之前,我不打算动用这笔钱,因为我的旅费已经付清了。我另外还有 20 英镑,作为平常开销。他们还给我一封类似信用证明的信,我可以在广州、马六甲、威尔士亲王岛支取 200 英镑的钱。对我的指导很细致,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了。如果我可以说的话,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因此,你瞧,用不着为我操心了。所有能做的预防措施都做好了。”

马礼逊先生启程去格雷夫森德,登上了一艘带他横越大西洋的船。他的感情似乎凝固了。他写道:“我如此独自一人,只身前往。哦,我可能并不孤独,因为上帝的圣手会托举着我。它的化身天使会在我面前引路。我离乡背井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第一位的,我至今仍然确信我的目标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拯救可怜的罪人。哦,为了对主耶稣的信仰,为了坚强的信念,去实现那伟大而无上的誓言!”

1 月 31 日,星期六。马礼逊登舟远行,踏上他受遴选的旅程,服从那召喚!

## 第六章 初抵华夏

67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  
义无反顾、热忱而真挚的情感。  
——狄更斯

祈祷和勤奋可以成就任何大业。  
——约翰·艾略特

离开格雷夫森德后,载着马礼逊和去印度传教的同伴的“雷米登斯号”被阻在多佛尔海峡的停泊地当斯(Downs),等待顺风。1807年2月7日,一场飓风袭来,船只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许多船沉入了海底,还有许多被刮到了岸上。因为在当斯抛锚,“雷米登斯号”得以幸免。她成了惟一可以继续航行的船。这确是一个严峻的时刻。马礼逊在19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神保佑我们。昨天早晨,我打算请领航员送信到岸上,但大风甚急,以致领航员未能离船。在黎明前,船锚折断了两次,后桅和前帆都裂开了。我们的船降下风帆,被风推着在海峡航行。海浪翻腾着有山一般高,天空中雾雪交加,我们几乎看不见船舷以外的任何东西。正在极度危急的时刻,船上又响起了火警。火灾是由一些硫酸桶爆炸引起的。领航员和一名船员攀上了后桅链,企图跃入水中——他们要把自己投入死亡的怀抱,他们宁愿选择那种死亡方式,而不愿被

68

烧死。然而幸运的是，有胆大的人抓住硫酸桶，把它们推入海中。在事发过程中，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交给了上帝。”

经过漫长、乏味而冒险的旅程，马礼逊先生终于于4月20日抵达纽约。一到纽约，他马上着手办理去广州的签证。在纽约他获得了和几位重要的基督教牧师及该城的普通信徒交流的机会。接着他又去了费城，以期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和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保护。在费城，他结识了几位朋友，这些人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重大影响，成功地得到国务卿麦迪逊先生(Maddison)致广州总领事卡灵顿先生(Carrington)的信函，要求卡灵顿先生尽其所能、通过他的关系，来促成这位传教士的计划。

马礼逊前往中国的旅程困难重重。惟一一艘开往印度的船，由于船长害怕引起来自英国政府的麻烦，坚决拒绝搭载任何乘客。另一艘船倒是准备去中国，但船主要求乘客付100英镑才让搭载。最后，梅森博士(Mason)引荐给马礼逊一位绅士——纽约的一位神职领袖，安排马礼逊搭乘“三叉戟号”(Trident)。该船的船长是布莱克曼先生(Blakeman)，他慷慨地答应马礼逊搭船去广州，只把他当做船上货物的一部分而已。

在纽约布莱克曼先生家里，马礼逊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许多年后，这位绅士给《观察家报》撰文，叙述了这次访问的许多有趣事情。从这一文献中摘取的一些段落更加显示了马礼逊的性格和他投身传教事业的精神动因。作者写道：

“我从未忘记那一晚，传教同道们由梅森先生带领来到我家。那时，出现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是很罕见的事，出现一群传教士就更罕见了。马礼逊的表情显得很有风度，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坚强和某种程度的傲慢。但与其说他的态度谦恭，不如说他是彬彬有礼，神情中充满了奉献的虔诚。会见很严肃，却不乏欢悦。我们出生在大西洋两岸，互不相识，我们之间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很快获得认同的、隐藏在基督徒心中尚未封上的宝库，神圣的‘神秘之结’。会见结束时，我们屈膝祈祷，大家洒下的泪水证明了对上帝的奇异情感。所有

爱上帝的人,大海和高山、时间和空间对他们都不存在。

“一两天后,马礼逊先生突然身患小恙。我坐在他的病榻前,他执着我的手,谈到难以确诊的病症,言语间轻松表露出他听从神意的安排,准备为基督的荣耀奉献一切。他敦促我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奉献给荣耀的、上帝的事业。然后就不再说这个话题了。我后来发现他一直在念叨着:‘亲爱的兄弟,要高瞻远瞩,要志向远大。’

“由于此前我们很晚才被告知来不及安排,所以第一晚他被安顿在我们自家的屋子里。在他床边放着一个摇篮,睡着我们的孩子。早晨孩子醒来,她像往常一样翻身和她母亲絮语。她在原以为会看见父母的地方,看见了一个陌生人。她爬起来,露出惊恐的表情,但当她注意到陌生人的脸时,她问道:‘先生,你向上帝祈祷了吗?’‘哦,当然,我亲爱的。’马礼逊答道,‘每一天都祈祷。上帝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小姑娘马上就安心了,满意地倒在床上,沉沉睡去。此后,她一直很喜欢马礼逊。”

“有关马礼逊的非议一概没有。一个不太友好、过分挑剔的人会说,他过于自傲,以致显得自负。一个基督徒更情愿说他虔诚得无法骄傲。没有什么人比他的态度更率直、简单、不拘小节,他的传教同伴们像尊崇父亲一样地尊崇他,常去他的房间和他一起祷告,所有活动也都听从他的建议。马礼逊表现出的基督教徒的温情,比同伴们要少得多。他的虔诚像一棵老树,而同伴们依然是青青的嫩芽。他坚毅、坦诚、有主见,而他们依赖他的支撑,聚集在一起寻求他的庇护……我只愿再简单地说一下,他将离开我们奔向目的地的情况。他启程的那个早晨,与他同行的传教同伴们聚集在他的房间,举行了一次庄严的会晤——这是他们在西方的最后一次聚会。可怜的戈登完全被折服了。马礼逊既理智又冷静,他责怪兄弟们过于悲伤,应该以镇定自若的态度来对待离别。然后,在他上船之前,我们一起去了轮船公司的办公室。我忘不了办公室里那种压抑的气氛和商人话里话外对马礼逊的猜测。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对马礼逊的宗教狂热很遗憾。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私下里佩服他的自我牺牲、奉献精神、

勇气和事业心。所有的事情安排停当后,商人从办公桌后转了出来,对着马礼逊脸上带着一丝嘲笑,好像马礼逊的脸就是一本能读出许多奇情异事的书。那人对马礼逊说:‘那么,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指望对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做点什么?’‘不,先生,’马礼逊以一种异于常情而坚定说,‘是上帝要这样。’很快,我们离开了那个一身铜臭的人。当马礼逊一脚踏上那艘要把他送往停泊在海湾的大船的小艇时,我们与这位前往中国传教的人做了最后的告别。马礼逊先生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他冷峻的神色和庄重的表情像一座凝固的塑像。他显然思绪纷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看来他的思绪已到了上帝身边,对周围的一切已经恍若无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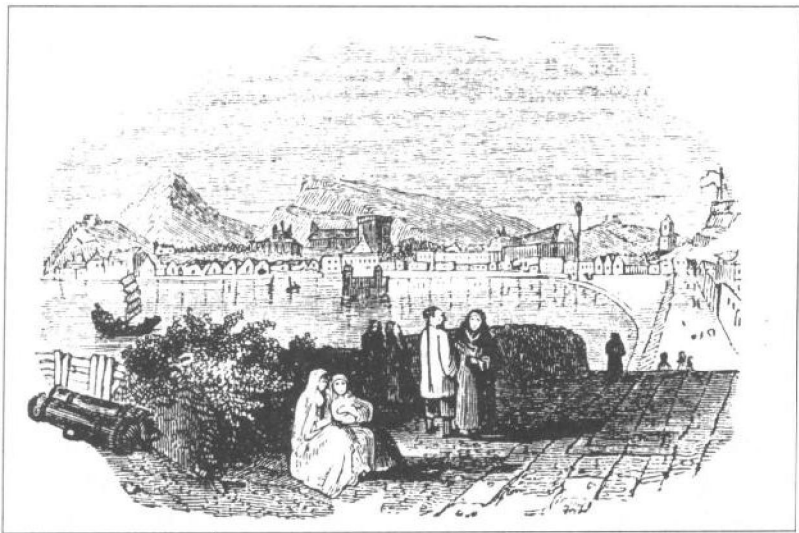


图 14 澳门

5月中旬,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航前往中国,于1807年9月抵达。航程中,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事。但马礼逊怀着热切的心情频繁地到甲板上布道,并坚持不懈地一边对船上所有信仰宗教的人进行宗教活动,一边钻研自己的学问。他还对穿越赤道的情形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并记述了当时水手们在穿越赤道时常做的胡

闹把戏。

“我们越过赤道时,所有的人都拥到甲板上参加穿越仪式。海神尼普顿和安菲特律特装扮得最为滑稽。尼普顿戴着长长的胡须和尾巴,一只手里举着三叉鱼叉,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大喇叭。安菲特律特穿着一身毛糙的衣服,站到了前甲板上。那些以前穿过赤道的男人们簇拥在两位海神身边,裤腿和袖子都高高地卷起,袒露出赤裸的或绘有图案的胳膊和腿。有的干脆就随随便便地乱画一通。尼普顿和安菲特律特以及那帮簇拥者一边向后甲板走去,一边向全船打着招呼。船舱里的一个人回应着:‘我明白。’他用一种沉闷的声音说道,‘这儿还有几个孩子从来没有穿越过赤道,帮个忙,把他们带上来,让我看看!’立刻,一个蒙着眼睛的人被两个人带了上来。两人各用一根短棒子架在那人的肩上。他们把他拖到尼普顿面前,让他坐在一个装满水的特大形桶上。‘嗨,我的孩子,’海神说道,‘很高兴见到你穿越赤道。现在,你必须向赤道致敬。’他把喇叭凑到那人嘴边,那人大叫起来:‘赤道,好哇!’就在这时,一个水手拎起一桶盐水猛地顺着喇叭倒进那人嘴里。‘理发的,现在该你给这孩子下剃刀了。’尼普顿说着,一个拿着一把大笔刷的人上前一步,用蘸了焦油或是黑颜料的笔刷在那人脸上脖子上乱涂乱画。安菲特律特也兴高采烈地向他致意——就是向他泼了一杯盐水,然后又用一把锈迹斑斑老掉牙的刀子在他脸上刮来刮去。焦油被刮掉后,又把剃刀在他唇间来回刮擦比画。‘好了!’尼普顿说,‘你必须对我发誓,第一,有白面包吃就永远不要吃黑面包,除非你更喜欢吃黑面包。’‘是的。’那人答道,他的唇间衔着一根涂了柏油的木棍。这样他就可以像他们所说的‘吻着《圣经》发誓’了。‘有酒或黑啤酒时,你就得不再喝水。在未获得真知前,你绝不能放弃探求。你必须致力于让所有人皈依此道。’每说完一句,那人都必须回答一句。当他张开嘴时,那根涂了油的木棍就捅到了他的嘴里,6个或8个水桶随即泼向他,冲得他的座位移动,摔倒在黑暗里,在船友的大笑声中几乎要窒息。船上一半的人都受到了这样的礼遇。但幸运的是,由于船长的干预,

我躲过了这场折磨。”

在抵达中国之前,马礼逊在澳门做了一次短暂的停留。澳门是距离广州 90 英里的一个岛。当时,那里属于葡萄牙统治。东印度公司在那里设有商馆。登岸后,他惊讶地遇到了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George Thomas Staunton)——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主席。他还见到了湛约翰先生(Chalmers)——澳门一家商馆的馆主。马礼逊向湛约翰先生递交了考伊先生(Cowie)的引荐信,考伊先生是伦敦差会的领导人之一。湛约翰先生衷心地欢迎马礼逊先生的到来,并预祝他取得成功,但他又说:“欧洲人难以想像在中国定居或担任教职有多么困难。”他告诉马礼逊,中国人被禁止信教,否则会处以死刑。他还答应和乔治爵士、喇佛先生——广州英国商馆的馆主——谈谈马礼逊的事。马礼逊先生拜访了乔治爵士,并呈上了皇家学会主席约瑟·班克斯先生(Joseph Banks)的引荐信。乔治爵士也严肃地谈到了公司的重重困难,他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在这里逗留,以节省贸易开支,但他最终允诺,他将倾全力推动马礼逊心中的计划。乔治爵士被认为是当时健在的精通中文的惟一一位英国人。他是一位具有高尚精神的绅士。这封引荐信缔结了他与马礼逊之间终生的真挚友情。

马礼逊一抵达广州,就拜会了美国总领事卡灵顿先生,呈上了麦迪逊先生的信函。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卡灵顿先生在领事馆为马礼逊安排了一个房间,马礼逊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但领事馆里宾客熙攘,所以他不久移到米尔诺先生(Milnor)原先住的房间。这一下就更安静了,花费也少了。这所房子是广州一家老法国商馆的一部分,是作为大型仓库使用的。当时这家商馆的负责人是米尔诺先生和他的生意伙伴布尔先生(Bull)。他感受到诸位先生的善意,并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处于他们的庇护下。但作为一个英国人会怎样,他不敢想。

马礼逊从广州致信乔治·斯当东爵士,全文如下:

“马礼逊禀告尊敬的乔治爵士,本人已在广州一家法国商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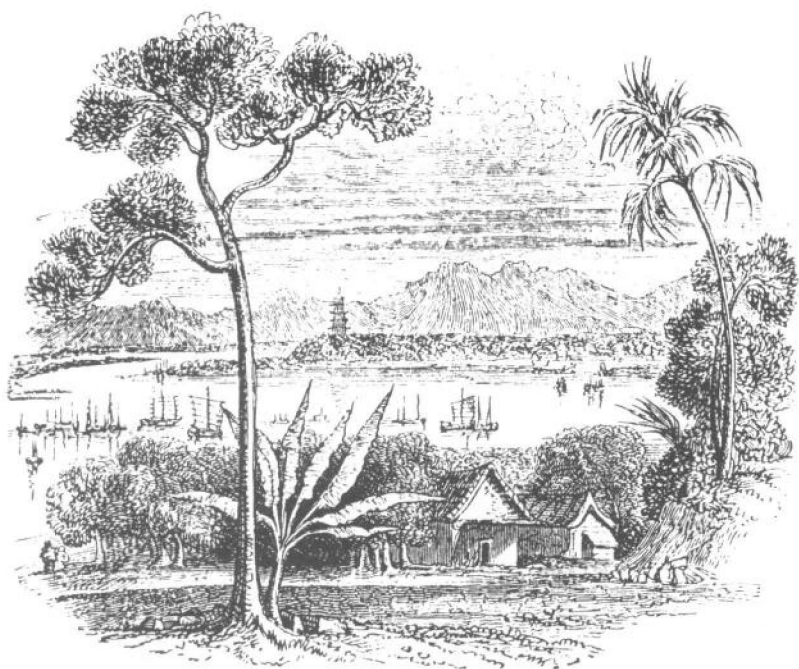


图 15 广州一瞥

公寓里安下身来。如果阁下认为,为了获得在广州的居留许可,有必要让我遵循一些特殊的行为准则,敬请赐教。本人将恭候阁下抵穗。此前,本人将专司学习语言,以有利于计划的实施。”

乔治爵士一到广州,即引荐马礼逊先生去见英国商馆馆主喇佛先生,又为马礼逊找了一位中文教师,此人就是殷坤明( Abel Yun),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天主教徒。从这时起,马礼逊就勤奋刻苦地学习汉语。对我们来说,可能不太能意识到,从那时起,马礼逊在他的一生中都要小心谨慎,走错一步都会结束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但他周围的艰难似乎只是激起了他的热情,开发了他天性中的能量。在致传教会的文书中,马礼逊用很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他的各种活动,表达了他胸中深藏的情感。他这样写道:“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同时又是确定无疑的事业。何谓确定无疑?我的意思



是,或者我们是对的,或者我们是错的。我们不必因为在一群无知、蒙昧的罪人中间传播福音真理而责备自己。耶稣传教促使他自责,以致他侍奉主更为周全,尽管他还是个传教士。哦,骷髅地啊,当我看见耶稣的血流淌在你的土地上,我惊讶于自己还在假装对主冷酷,惊讶于自己疏于执行主赋予的职责。但我应该说,耶稣的爱对我影响至深。是的,我的天父。你的爱赋予了耶稣。哦,我的救世主,你为我牺牲了你自己的爱,这是你的爱。哦,圣灵啊,把耶稣的救赎施与我有罪的灵魂,合力制服我,约束我为你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

他也谈到自己有了一个学习语言的机会。要想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预先做一些准备和铺垫。

“我希望这两个中国人能帮助我。迄今为止,他们还行。他们中的一位李先生(Le Seen-sang),中文造诣颇深,写得一手好字,中过举,不像一些商人那样可怕。另一位叫殷坤明,是乔治爵士举荐的。殷坤明祖籍山西,他是罗马天主教在北京的代表。北京话是中国的官话。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大概有30年)都在北京传教。天主教会教他拉丁语,所以他能讲流利的拉丁语。今天,他由另一位基督徒陪着来见我,由于今天是主日,我不能听他讲课。现在我的案头就放了几本拉丁文译本的经书。在他翻阅时,我们读起那些经书。我提到《出埃及记》的第四戒和《以赛亚书》第58章的末尾。他一边诵读着,一边讲解给中国友人听。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他在这里所说的关于主日的解释都是错的。他那么随随便便地谈到主关于安息日的说法。有人认为,他在那一天纠正书中的提法是对主的亵渎。”

马礼逊先生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因为他非常孤立,一切都不确定。他清楚任何时候他都可能被驱逐出境。他的开销也非常大。他在商馆的房间每年需要350美元,他的膳食费需要400多美元。他还得雇佣一个男仆,每年需要100美元。此外,他还得请一位老师,买些蜡烛、家具、书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除此而外,他在好些场合成了当地那些坑蒙拐骗的贪婪之徒的敲诈对象,他在城里请一个

当地人为他买几本书,此人买通了一个男孩,让男孩帮他一起哄骗马礼逊,结果,他们赚了他 30 美元。马礼逊对中国人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最初印象在他致纽卡斯尔友人卡斯伯特·汉德森的信中有过描述:

“靠上帝的庇佑,我在学习中文的紧张过程中身体状况还很不错。我还有机会在些私下场合用中文谈谈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虽然可能有些辞不达意。我发现谈论上帝困难颇多,因为中国人没有关于生命和上帝的概念,因此,无法用恰当的词语来表达。亲爱的卡斯伯特,看到中国人在人形的神像前匍匐在地上,或曰五体投地时,你一定会感到难过的。有时候,他们会用一幅人物像来代替雕像。拜祭的人屈膝跪在地上,接着直立起来,然后再躬身前仆,手扶着地,支撑着上身,用前额叩碰脚下的地面或石头。接着抬起身子,再重复来做,如是者三。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无生命的偶像这样崇拜呢?感谢《圣经》,它向人们昭示了实实在在的上帝,也向人们揭示了实实在在的自己的自己。感谢耶稣,他在天父的天国里向我们宣告了天父的存在。” 29

马礼逊租赁的房间在广州叫做“下屋”(go down)。事实上,那屋子就在地下,一直用来作为普通的仓库。马礼逊在那里吃、住、学习。他为了不引人注目,衣食住行都尽量与中国人相仿,头上也挂一根辫子,穿上了中国人的袍服,吃饭用中国筷子,手指甲也留得老长。他学习极为刻苦,吃得又很少,以致在不长的时间内他的健康大为受损,生命都有了危险。毫无疑问,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正如米怜博士在《中国传教最初十年史》(*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Chinese Mission*)一文中主要引自马礼逊先生本人的描述所说的,后来他自己也怀疑过这样做是否明智。米怜写道:

“他起初设想,采用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会极大地有助于他的工作。基于这种想法,他让自己使用中国人通常使用的诸如吃、穿之类的东西。但他很快察觉到自己的想法是错的。让自己的外貌太与众不同,实际上是向中国人宣告他不属于广州的外国侨民圈子,宣告他和商人们的目的不一样,而商人们的活动才是当地政府惟一批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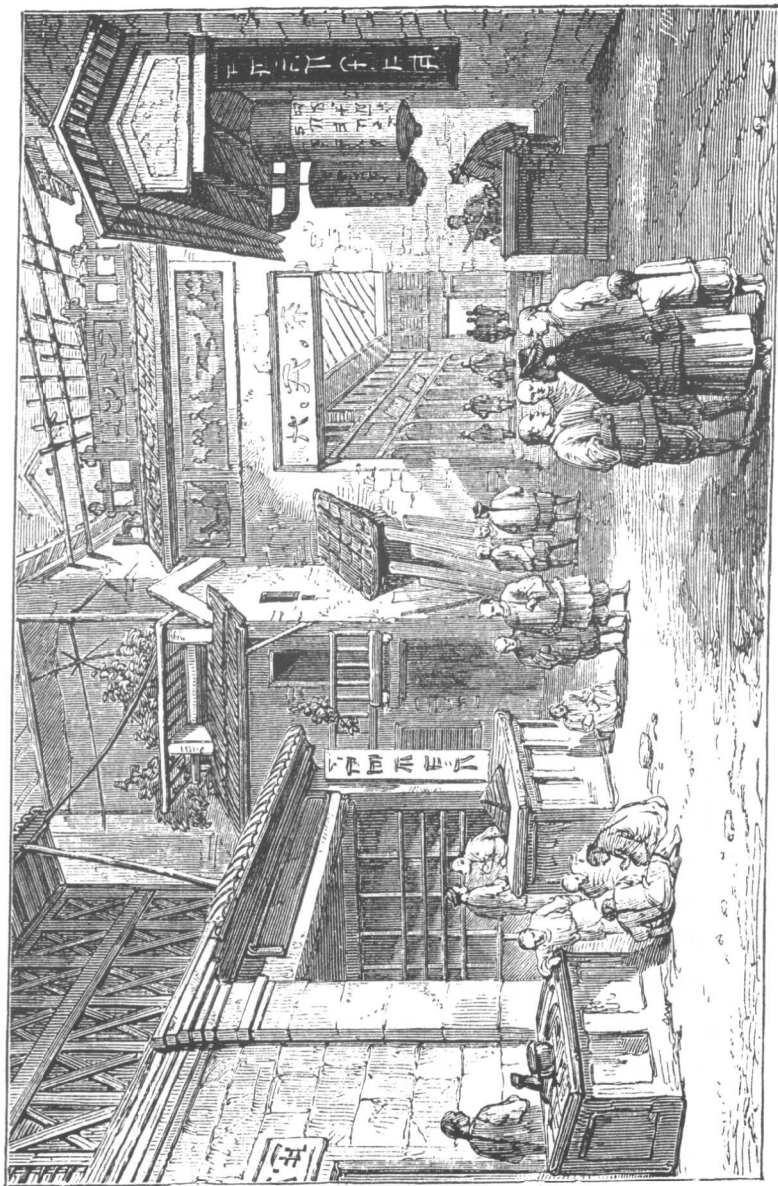


图16 广州街景

活动。再者,宗教的意义并不在于一个人的衣着样式和颜色,所以马礼逊不仅不穿当地的服饰了,而且也不坚持总是穿着传教士的黑衣服,他也像其他欧洲人在温暖的天气里那样,穿上了白外套,戴上了草帽。不管怎么样,在那些其政府讨厌传播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传教士最好把自己的外部特征收敛起来,这样会更好一些。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的仁慈就是他们区别于他人的特点。”



图 17 中国人拜祭

最初,正如上文所述的,马礼逊按中国方式进餐,也和他的中文老师一起吃饭。他的生活方式精简节约,用一盏陶制羊油灯作为照明。对折的《圣经》马太·亨利评注本立在灯的一侧,像是一个挡风屏,可以避免风把油灯吹熄。然而,他发觉和中国人一起进餐并未拓展他的语言知识,这种吃饭方式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同样的道理也使他剪掉了指甲,剪短了头发,把中国服装送给了别人,也使他不再坚持那些奇怪的吃饭方式。他的手指甲起初像中国人一样长得很长很长。他还留了一段尾巴(即一束发辫),能熟练使用筷子。他披着中国式的上衣,穿着中式的厚底鞋,在商行的周围漫步。这方面,他都做得不错。但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不久他就确信,他的想法不对。

他在广州定居后不久,曾想在住处搞一个公开礼拜,邀请几位美国和英国绅士出席。结果却令他非常沮丧。为了争取一些英格兰教会成员的支持,他采用了英国的礼拜仪式,但他发现,居住在异教国土上的英国人已经冷淡了对神的敬仰,这使他大失所望。

从居住在中国开始,马礼逊先生就竭力劝说他的中文老师和仆人过大安息日。当然,他在那一天也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忙于私人的和公开的礼拜。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为他们做示范的机会,并希望取得很好的效果。只要他能让他们和自己在一起,他就每天为他们读经书的影印本,这些经书是他在伦敦时就预备好的。一有机会,他就会拿出书来,派上用场。他也试着让他们和他一起唱诗和祷告,虽然他并不奢望于他们做得如何。

因为马礼逊已经渐渐习惯了他的处境,所以他从那间又小又不卫生的下屋搬了出来,租了一所所谓“商馆”的房子(归法国人所有),是帕里先生(Parry)提供给他的,里面的房间更多,也更方便些。他住在这儿,直到因为健康不佳被迫离开广州为止。

他的性格和他所从事的事业使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和广州的外侨首领的关系和友谊上。英国商馆馆主喇佛先生进一步表现出他在文学研究和传教两方面的意向。鲍尔先生(Ball)是东印度公司的一



图 18 用筷子吃饭

位高级雇员,也给他提供了很多支持。益花臣先生(J. Elphenstone)赠送给他一本《拉丁文—中文字典》,价值 50 英镑。皮尔逊医生(Pearson),东印度公司的医护,25 年来一直关心着马礼逊及其一家,并给了他最大的支持。除此而外,乔治·斯当东爵士给了他最真诚的友谊,终其一生,尽力为马礼逊提供所需的一切。

马礼逊的情形让人非常焦心,他专心致志于学习,又没有足够的新鲜空气和锻炼,这对他的体力影响很大。他甚至不能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的医生建议他换一下环境,通过原先在澳门为马礼逊提供住所的那位绅士的帮助,6 月 1 日,马礼逊精神抑郁地来到澳门。毫无疑问,为了节省使用教会的资金,他让自己忙得超出了人的忍耐程度,就是最强壮的体格也会受到损害。但对于从事传教事业,马礼逊始终保持着最坚强的信念:“热情和希望还在,就要勇敢地坚持

住。”

1808年8月底以前,马礼逊一直留在澳门和他的中国助手一起学习。他的健康状况也有了好转,可以回广州了。11月,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所有英国侨民接到指令离开这座城市。马礼逊在船上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澳门,还住在原来的老地方。几天后,他的一位老师罗谦(Low Heen)也冒险来到澳门。但他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他的同胞强烈反对任何中国人和外国人同住。

马礼逊到澳门几天后,一位年轻的绅士来访,他告诉马礼逊,他的父亲默顿先生(Morton)给他带来了洛夫莱斯牧师(Loveless)的一封信。这次造访对马礼逊的未来有很大的影响。马礼逊邀请默顿夫妇及其全家到家中做客,并请他们和他一起做公开祷告。在接下来的那个安息日里,默顿全家和马礼逊一起度过了一天,他们一起做了礼拜。年轻的威廉·默顿表露出拯救自己灵魂的巨大渴望。马礼逊先生希望能引导他与自己一起献身于传教事业。与这个基督教家庭的交往,大大缓解了他的孤独感。不久他和默顿小姐产生了感情,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由于马礼逊的引导,默顿小姐也全身心地投入了上帝的事业。马礼逊是她灵魂得救的重要因素。

## 第七章 对成功的渴望

85

一些人的生活近于上帝,像我的右臂之  
近于我,于是,他们四处游走,  
以信仰的铠甲护身,还要驱遣一种魔力,  
嘲弄恐惧,摒弃怀疑,  
放胆挑战不可能性。

——布莱基

由于马礼逊先生继续以传教士的身份居住在澳门或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因他而起的麻烦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严重到他甚至决定离开澳门,到槟榔屿去继续他的语言学习,等到条件成熟后再重返中国。他开始打点行装,但天意却阻止他离去。马礼逊的对手主要是中国人的嫉妒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团的敌意。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  
一些商馆的高级雇员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因此,下面这事肯定让马礼逊感到惊讶。1809年2月20日,在他和默顿小姐的婚礼上,东印度公司聘请他担任公司的中文译员,年薪500英镑。如果有什么事能够用来说明他在语言学习上的进步和他性格方面的坚毅和深思熟虑的话,这就是最充分的例证。这份邀请决定了他的命运,也拓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领域。现在没有必要去槟榔屿了,澳门和广州都向马礼逊敞开了大门。他可以在这里居住,可以在这里从事他生命中

86



的伟大事业。

马礼逊先生的中文知识已有了相当的造诣。除了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正在进行中的《圣经·新约》的汉译工作以外,他还编纂了一本中文词汇,在《英华字典》的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马礼逊很头疼他的中国助手们喜怒无常的坏脾气。其中一个助手趁马礼逊先生晚间一个人的时候,从背后撕破了他的外衣,准备袭击他。当时,房东喊了一些住在附近的外国人赶来给马礼逊帮忙。马礼逊打发走了另外两名助手,聘请从国外回来的容三德教他中文,但容三德的暴脾气和独断专行让马礼逊更加头疼。马礼逊还不敢对这种糟糕的处境有什么抱怨,没有老师他也不能住在这里。相反,他对他们仍很有耐心,和他们一起祷告,向他们详细阐释生命的意义,日夜为他们寻求拯救。后来,他的房子又出了毛病,屋顶塌了。要不是房东又提高了三成的租金,他本来还要继续住下去的。房东说,提高房租的原因是他把房子变成了一座小教堂。马礼逊只得另寻他处。他不希望引起澳门当地人的注意,所以,他从不敢出门。这对他的健康非常有害。他第一次冒险到城郊去散步是在一个月夜,还有他的两个老师陪着。的确,他在澳门的身份还没有确定,他的压力很大,惟恐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这种极度的精神压力又会引起他头疼病发作,头疼又连带出别的毛病。他和默顿小姐的婚姻也增加了他在其他方面的烦恼。婚后不久,默顿小姐的身体每况愈下,总是病恹恹的。一件让他更为沮丧的事情是,他的妻兄威廉·默顿因为身体十分虚弱,被迫放弃学业,放弃了上帝的召唤,到一个气候更相宜的地方去了。

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无疑解除了他的精神负担。他接受了这个聘请,也得到了伦敦差会的完全认可。有些人责备他接受了世俗的职位,这个职位的职能是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之外的,但持此责备的人并未完全领会他的困难处境。刚刚上任,马礼逊就明白了这个新职位给他提供了一个熟悉语言的新场所。这样,他就能留在这个国家了,他也不再让伦敦差会烦恼了。因此,他仍然可以把主要时间奉献于

他的终生事业,还能更好地为东印度公司履行职责。事情的进程完全证明了预想的步骤,他成为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公司的职员,公司的保护可以使他免受当地人和罗马密使的敌意。

马礼逊所做的使中国人了解福音的每一步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隐秘地进行。的确,在中国的环境没有完全改善之前,公开布道从来就不是伦敦差会的目的。不做些什么让自己周围的异教徒们了解救赎之路,马礼逊就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老师和仆人是他的第一批听众。在安息日,他取出中文版的福音书与他们诵读。对一个学习语言的英国人来说,语言的困难使他长时间内不可能对基督教发表任何公正的看法,也不能和中国人就他们虚假的体系进行辩论。但成果总是有的,一个、两个,有时候是4个到10个中国人聚在一间房门紧闭的内室,传教士有了一个宣讲基督福音的机会。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足以鼓励和奖赏他的信念的成果。

1810年岁杪,马礼逊致信友人约翰·克卢尼神父,描述他的工作进展和状况。他写道:

“自从上次去信后,我又经受了很大的折磨。倒并不是我个人,而是我亲爱的玛丽,精神病使她的身心都遭到了重创。感谢我主,她现在已有所好转。我希望她能恢复她以前健康和安祥的状态。在异域的土地上,这种折磨是一种双重的负担。没有至亲好友的支持,没有教友的祝福,我清楚地知道,完美平和的心灵能承受住任何磨难或者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但,谁能承受住一颗受伤的心灵?我现在的工作仍和年初我写信给你时一样,千篇一律。从那以后,我去了广州,在那儿一直待到3月,和中国官员讨论一桩涉及中国人的谋杀案。对证人的公开讯问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人都惊讶我在两年时间内能够书写和用中国官话或方言土语与中国人交流。结果东印度公司的三位雇员准备学习汉语。在整个夏季,我成了正规的汉语教师。除了这三名雇员,一位在中国住了20多年的绅士也来了,每天学习两个小时。我的第五个学生是一个荷兰年轻人,他整天都待在这儿。这一夏,我为公司做了许多翻译工作,和中国官员频繁地

开会。我很遗憾地说,所有的人都不客气。中国官员极端傲慢、专横、嚣张。有时候,三四个人同时开腔,说话声音就像在吵架。我的老师高先生(Ko-Seen-Sang)还和我一起,还有助手罗谦。我让他印刷了1000部中文版的《使徒行传》。我比正常价格多付了25到30英镑,他也视若无睹。今天晚上,他和我说了这件事,承认了错误。这使我很伤心。我不能再信任他了。”

这以后不久,《使徒行传》的中译本付梓出版,印刷了1000部,而印刷费用过高,每部大约要半元钱。整部《新约》随后也以这一价格印刷,但考虑到这是一部禁书,印刷商要冒一些风险,他们当然希望能得到适当的补偿。此外,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可以随意地、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占外国人的便宜。从琉球群岛来向中国朝贡的两位大使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获赠《新约》中文本。马礼逊利用一切机会向外推出这本书。

马礼逊先生又撰写了一篇短论,题为《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这篇短论也印刷了1000册。接着,他翻译《路加福音》,也印刷发行了。他还编纂了教义问答,分发给慕道者。就在这时,中国当局决定开始禁止宣扬与帝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宗教信仰相悖的其他宗教观点。国家在一份公告中指出:禁止传播基督教教义。随后四位罗马天主教徒被逐出北京。这些举动使马礼逊对他以后的行动格外小心谨慎。

他的《中国文法》(*Chinese Grammar*)已经编纂了好长一段时间,但他发现要想付梓出版还很困难。他将书稿呈送给乔治·斯当东爵士,后者热情地赞扬了他的工作,说了这样一席话:

“大作已认真拜读。我以满意的心情完璧奉还。我很高兴地祝贺你,你的书将会证明,在创意和写作两方面,这本书对学习中文的读者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学习者将不必再通过福尔蒙特(Fourmont)、博耶(Boyer)和其他人卷帙浩繁的著作来学习。那些著作毕竟不准确,有错误。因此,我希望尊作能早日付梓。”

马礼逊把《中国文法》一书改送给印度总督明托爵士(Minto),

以便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因为一些从未经解释的原因,该书被搁置近三年,1815年,在塞兰波尔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印行。这部书对那些到当时为止仍对学习汉语感到犯难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凡的贡献。

1812年马礼逊家中出了几件大事。马礼逊善良而虔诚的父亲去世;接着,他的两个兄弟也相继辞世,而他本人喜得一女。后一件喜事使他多病的妻子身体有所改善。

乔治·斯当东爵士离开中国以后,马礼逊所担负的责任更重大了。他的年薪被增加到1000英镑,并以允许在教师公共食堂吃饭,另加上其他优惠作为补贴。他的工作被认为具有极高的价值。当要求核准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任命时,董事会表示了“某种同意”。这个明显拖沓迟到的同意,其含意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英国的和在中国的)把马礼逊尝试使中国人与基督教对话的工作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事业,也担心他的活动可能会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相冲突。虽然无法估量马礼逊工作的价值,但他的谨慎和低调还是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赞誉,使他们对他充满了信心。

现在,马礼逊重又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英华字典》的编纂工作——一项惊人的工程。编纂工作必须熟悉中国古典文学,这是英国人或其他欧洲人以往从未接触过的。

马礼逊把三部《使徒行传》的中译本寄到英格兰,激起了那些热爱传教之士的极大兴趣。伦敦差会的董事们把其中一部送给“不列颠和外国圣经公会”,该会慷慨地捐助了500英镑,赞助在中国印刷整部《圣经》。另一部《使徒行传》则在翻译工作完成后拆散,把书页分赠给大英帝国各个地区的差会友人。在他们看来,这是证明福音最终征服整个异教帝国的第一步。他们为此而欢欣鼓舞。好消息终于传来了,他们写信告诉马礼逊,为回应他频繁而诚恳的请求,他们已经为他任命了一位助手,来分担他的工作。在同一封信中,他们还告诉他,他们很高兴地收到了他的译本。这个助手就是威廉·米怜先生(William Milne),一位虔诚奉献的年轻人,有足够的 ability 胜任安

排给他的这项工作。

22 皇帝发布上谕禁止传播基督教,使马礼逊忧心忡忡。从他 1812 年 4 月 2 日致伦敦差会的信中摘出的以下这段话,即可看出他的处境和他冷静的处理手法:

“一个月前发出的书函和奉寄的一册《路加福音》译本、一册中文小册子《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我希望都已平安寄达。现在我寄上中文上谕的译文,从中你们可看到在中国印刷基督教书籍是要犯重罪的。然而,我必须信赖上帝,勇往直前。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敕令还没有与全能的主的要求相冲突,所以,我们要一丝不苟地服从管理,我会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引起政府的注意。虽然我明白自己微不足道,但我并不灰心。我很欣慰我怀有超越现实的最乐观的希望。在这种阻力中,我已经证明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学习语言、翻译经书并在中国印行是可行的。我很感激神圣的主遴选我从事这一荣耀的工作,假如我不久即离世,这会在我最后的时刻给我快慰。”

对基督教的未来的沉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这从摘自上谕中的片段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迷惑民众,欧洲人私印书籍、建立布道场所。受欧洲人的委派,鞑靼人、中国人也在传播他们的宗教,接受洗礼。这些受蛊惑的人应该当心,为首者和主谋者将被处以死刑。无论谁传教,就算没有滋生事端,没有蛊惑多数人众,没有教名,也将被捕入狱,等待判以极刑。赞成这种宗教者也将被流放。”

23 伦敦差会的董事们在刊行这份迫害文本时评论道:“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这个上谕,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没有气馁。他已经坚定了继续主的事业的决心。令人欣慰的是,全能的主已将无微不至的关怀交付给了他。可以肯定,主的阳光普照中国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现在,这份布告的作用和经文中最彻底的声明一样,激发起了成百万计的中国人细读推敲的好奇心;这份布告不仅将被废除,而且会由一份支持基督教的布告来取代。”

马礼逊先生勤勉地翻译《圣经》,编纂《英华字典》。他印刷了《使徒行传》的大部分,《路加福音》也准备付梓,但他发现,字典的编

纂工作是对他的耐心和财力的严峻考验。至于印刷《中国文法》一事,书仍在东印度公司手中,等待他们作出是否印刷的决定。他还给《中国文法》一书增加了一卷《对话》。

他日夜渴望看到自己的努力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他渴望自己的成果能感动那些他所接触的本地人的心灵。广州一位警察的故事给了他极大的安慰。这位警察通过阅读马礼逊刊行的宗教小册子《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而洗心革面。这位警察是在偶然的机会有一个亲戚家得到这本小册子的。他原本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坏人,按分发小册子的人估计,他坏到了不该得到这本小册子的地步。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但他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

另一个似乎有了成功迹象的转变让他的心情开朗起来。他的中国助手渐渐熟悉了《圣经》,也渐渐意识到人生的罪孽和偶像崇拜的荒谬。马礼逊在日记中对这件事作了记载:

“10月11日,主日——谈论关于浪子的寓言。我的教民像往常一样注意力都颇为专注。晚上,阿冲(A-Tso)阅读了小册子,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对之作了解释。他将人类的善良说成是与生俱来的。阿发(A-Fo)也读了这段经文,还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感想。但他误解了经文的范畴。他计划参加主日活动和日常的礼拜。晚上,我听到男孩们重复他们的教义问答,并阅读《路加福音》中的一章。他们像往常一样打发走了祷告者,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感到了偶像崇拜的荒谬。高先生看起来更对此感到羞愧,现在,真理已经对他有了某种程度的启迪。不久前,我问他,他所认识的同胞中是否有人证明世界上没有上帝。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天地和世间万物都由他创造,还用任何证明吗?”高先生年愈不惑,他父亲曾担任过一定级别的官员。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和蔼、品行端正、乐于教人的人。罗谦刚过而立之年,性情温和,为人忠厚。他写得一手好字,对出版正好有用。高先生修订我的译文,两人都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

梁阿发对经文的研究日益虔诚,这使马礼逊非常欣悦。高先生

对经文也显得兴趣日浓。这些年轻人肯定给了他最大的欢乐和勇气。一天,阿发带来一些木偶让他看,他不希望他的同胞知道他带了这些,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会极为愤怒。他们特别反对出售或失去他们的偶像,他们生怕受到侮辱。“就我来说,”阿发说,“我信奉耶稣,我明白你说的木偶、泥偶和其他偶像崇拜的虚幻和无用。”1812年11月8日,阿发要求受洗,他说愿意加入浸礼会,但不能让他的兄弟们知道这一切。马礼逊先生尽力给他作了解释,如果他的动机是谨小慎微,是为了避免引起地方当局对他的注意,可以按他的要求做,但如果他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就不能做。几个星期来,阿发一再请求马礼逊和自己一起祷告,或为自己举行祈祷。他获得救赎的愿望看来是很真诚的。

在澳门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对任何与马礼逊交往的人,或者接收了马礼逊小册子的人,以及向马礼逊提供中文书的人都予以强烈的谴责。这一切对马礼逊的工作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他致力于与当地人的交流,他报告道:“我通过口头谈话与少数人交流关于真理的知识(这里列了11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和我谈话都很认真和严肃。在澳门的每一个安息日,我都和上述那些人一起参加礼拜。我以祷告开场,接着读一段经文。有些篇章我已事先印好,或者事先翻译好。对这些篇章我都尽力作了解释或强调,最后以祷告和唱赞美诗而结束礼拜。”另一个表明礼拜已日渐严肃认真的证据见于下面这段日记:“12月18日:——高先生在家中操办其子的婚事已经数日,今日归来。晚上他又回家。他因此要求我在家中举行祷告,这样他就可以参加祷告了。几天不祷告,他已经感到心有不安。我为这个觉醒的灵魂而祈祷上帝。哦,主啊,通过耶稣基督带上这颗完全皈依的心吧。”

正是这时,马礼逊首次向伦敦差会的董事们提出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多半在几年后才得以实施,即在马六甲建立传教书院。他说:“我希望我们在马六甲有一个训练欧洲的和当地的传教士的学院,招收恒河外所有国家的人。这里也将成为出版的强大基地。福音最

终的胜利会通过当地传教士和《圣经》来获得，上帝和欧洲的基督徒是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源泉。我们希望亚洲的传教工作有一个中心；我们想联合起来；我们想从事出版印刷；我们想有一个传教委员会，一个负责在异教地区进行传教事业的委员会；这样一个委员会能对异教国家的传教事情作出评判，而一个身在英国、从未离开过书斋和书桌的英国人是不可能作出评判的。这样的委员会会了解传教士的心思。当然，每件事的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董事们手里。”

马礼逊先生的时间一半花在广州，一半花在澳门。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住在澳门。马礼逊先生一年中有半年要忍受与妻女睽隔的苦痛。

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领导人益花臣先生(John F. Elphinstone)让他担任公司教士的职务，并付给他相应的薪水。他说，因为住在澳门的生活开销不菲，为了提高马礼逊的生活水准，他才提出让马礼逊担任公司的教士，但马礼逊只需读经，无需布道。马礼逊提出要在主日提供完整的礼拜指导，而且不要酬劳。除非该职位可以宣讲耶稣福音，否则他不接受这一职位。因此，这一安排最终不了了之。这一时期，澳门反对福音派的趋向已经显露。澳门政府是一个混合政府，部分是中国人，部分是葡萄牙人。中国人规定，不允许更多的欧洲人登上这个小岛居留。葡萄牙人规定，只有和欧洲人的商馆有联系的人才可获允接受。紧接着，中国最高当局又颁下一道上谕，禁止任何中国人信奉基督教。

在马礼逊先生的请求下，伦敦差会决定在爪哇建立传道会。爪哇有 3000 万居民，其中 50 万是华人。经文——被迅速翻译和印刷成书——可以在这些华人中随意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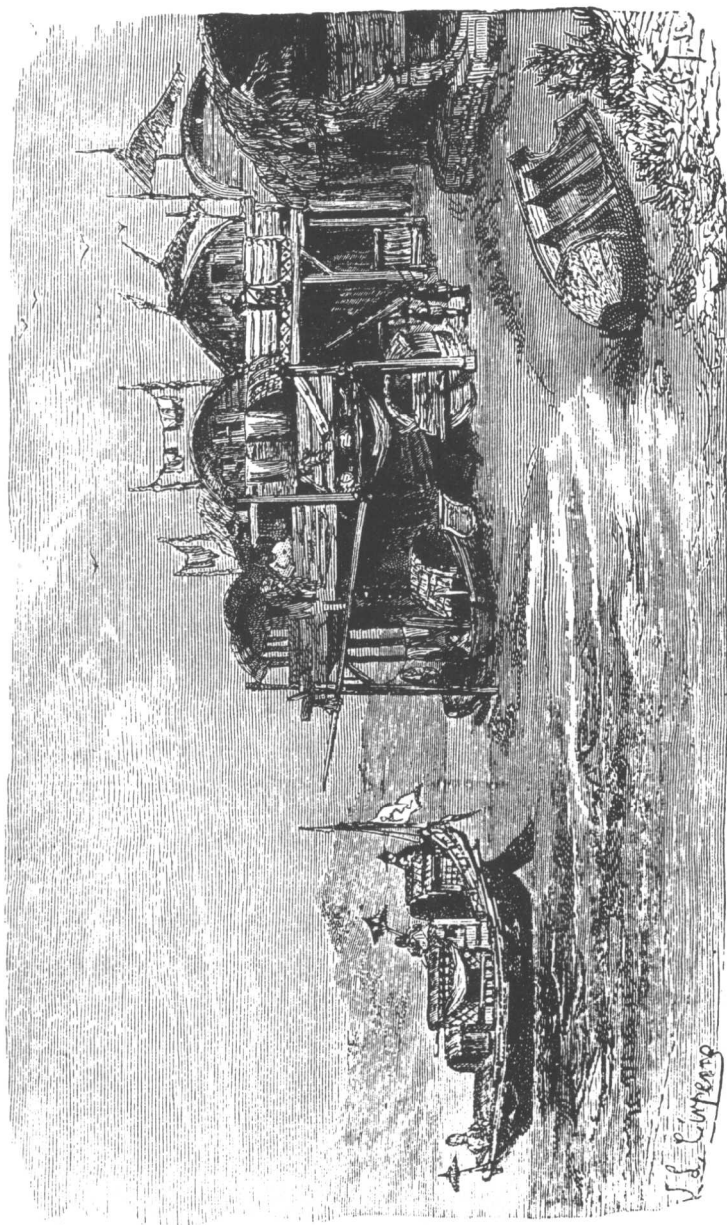


图19 澳门海滩

## 第八章 传教同道

99

与那懦弱的畏惧无话可谈，  
天责召唤，他便无畏地承担。  
即使面临千千万万的险阻，  
信奉主，将它一一克服。

——库珀

要想对马礼逊夫妇 1813 年 7 月 4 日安息日那天坐在圣餐台前的欢悦心情有个恰当的认识，根本不太可能。当时，一封文书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喜讯。米怜先生，他们期待已久的传教同道已经偕夫人抵达澳门。此前，还没有哪位投身传教领域的同道像这样广受欢迎和赞美。就这一点而言，用寥寥几笔介绍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以及他在传教事业上受过的训练也许可以对读者有所帮助。

1785 年，米怜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郡。他 6 岁丧父，母亲使他接受了每一个贫穷的孩子所可能受的教育。父亲逝世后不久，他被委托给一个亲戚监护。那位亲戚在他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顽童，特别是有了读神的语言后，才开始注意对他的道德教育。但他陷入罪孽的时间并不太长。早年，他进了一所安息日夜校，受教于他的邻居。在这所学校里，他逐渐增长了有关福音真理的知识。福音派宣传的价值观念在他心中打下了烙印。有时候，他从学校独自回家，要翻越一座约 1 英里长的山脊，一路上他都在不停地祷告。在这段时间

里,他已开始在他母亲家里主持礼拜。他还把姐妹和别的孩子召集在母亲的谷仓里做祷告。

从家中搬出来后,米怜所住的地方与一位非常贫穷但在信念和神性方面却很富有的人相邻。他经常在家庭祷告时到那人家中,和他一起祷告。读经后,那个邻居习惯向孩子们阐释经文,他的讲道深深吸引了年轻的米怜,加深了米怜对《圣经》的热爱。在这个家庭中,宗教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全身心地选择把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和朋友。他自己寄居的这个家庭不仅缺乏宗教精神,而且还把他的虔诚当做幼稚来加以嘲笑,这使他的处境极为尴尬。惟一可以冥思和祈祷的地方是羊圈,冬天在那儿,他经常在动物的围绕下,跪在特意铺的一层羊皮上祷告。他就这样度过了许多冬天的夜晚。当他的房东家的人还在挖空心思地为他的灵魂寻找寄托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感受到了新生。这段时间,他读的一些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那本《见证的云彩》和波士顿(Boston)所著的《四重性》(*Fourfold of State*)。当米怜成了亨特利这个地方的公理会的一员时,在欢迎他的聚会上,他说:“我对自己感到不可思议!主肯定把他施恩于任何堕落民族的无上的慈恩施加与我。”每天,他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祈祷——祈祷整个世界都皈依基督。到他20岁时,他不再整日祷告了,他开始献身于传教事业,但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很多障碍。他努力工作了5年,为他孀居的母亲和姐妹们准备一些生活费。这个计划完成后,他马上投身于伦敦差会的当地分会。

在阿伯丁的伦敦差会分会委员们的眼里,米怜样子很土气,看上去不会有什么出息,以致一位谨慎的会员把菲利普博士拉到一边,对米怜是否有资格从事传教工作表示怀疑。但他又说,他不反对推荐米怜担任一位传教士的随从,只要他愿意做那份工作。“在我尊敬的朋友的建议下,”菲利普博士说,“我打算和他单独谈谈,把我们反对他担任传教士的理由和他说清楚,并征求他的意见,看他是否同意我们的提议。”米怜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兴奋,用毫不犹豫的口气答道:“是的,先生,毫无疑问。只要有工作,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对我

来说,为上帝的房屋添砖加瓦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他被伦敦差会的委员会接纳,然后被委派去高斯坡。在那里,他在博格博士指导下接受了系统的训练。他说:“我投身传教事业之始,没有抱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我即使失败,也不能因为是懒惰而造成的。”后来的发展表明,他既富有才干又有毅力,这使他在时代的峭壁上为自己竖立起了一座永恒的界标。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学院的课程。1812年7月,他被授予牧师一职,把自己终生奉献给了在异教国家传播基督福音的事业。不久,他和阿伯丁的查尔斯·考伊先生(Charles Cowie)的女儿——考伊小姐结为连理。考伊小姐是一位极其虔诚而又精明过人的女性。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米怜的幸福和工作。她死于1819年。



图 20 米怜夫妇

米怜接受任命后一个月，他们夫妇便从普茨茅斯登船前往中国，在好望角和法兰西岛（Isle of France）做了短暂停留，又在澳门受到马礼逊夫妇的热烈欢迎。马礼逊先生说：“我立刻离家往客栈走去，客栈离我们家大概有 10 分钟的路程。一路上，我都高兴地祷告上帝，为他的赐福和对一切事情的指引。我和米怜相互认识后，米怜夫人坐四人大轿回住处。我和米怜兄弟则根据当地的惯例，去拜会驻澳门公使和总督。他们两位都客气地接待了我们，那一刻他们没有对米怜先生提出任何异议。”

“第二天，我去拜访某先生，告诉他，米怜先生到了。请求他允许米怜先生留下来。他迟疑了一会儿，声言再没有什么人能获准在这儿居留——当地的英国侨民的目的全都被说成是纯粹商业性的——因为中国人不允许建立任何宗教团体，等等。最终，他同意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只把米怜当做一个学中文的学生来看待。”

在马礼逊的日记里记录了如下的祷告：

“那扇大门已经为你敞开了（但愿事情都会得到解决）。哦，主的仆人不会有健康之忧，会很快掌握异教徒的语言，会成为耶稣基督信心十足的传道者！”

有关米怜夫妇到来的消息四处传播开来，在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敌对行动也立刻开始了。罗马天主教会向总督呼吁，议员们也召开会议，并在全体会议上裁决“米怜先生不能留在此地”。不几天，总督的信使带着给马礼逊的口信，来到他的寓所，让马礼逊到总督府去一趟。当传教士到了总督府后，受到了冷遇。接着就开始了这样的对话：“在你家的神父是打算留下来吗？”总督问。“阁下，恳求你暂且恩准他留下。”马礼逊答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总督答道，“他必须在 8 天内离开。”马礼逊先生单腿下跪，恳请他收回成命，至少也要放宽期限。总督说，他的命令不能有任何人拒不执行，何况议员和罗马天主教主教要求他采取行动，他们甚至向他呼吁，要他马上禁止马礼逊在澳门印刷中文书籍。但本着友好的原因，他已经推迟采取行动了。最后，他同意把米怜的逗留期

限宽延至 18 天。在这方面做任何进一步的努力都以徒劳告终。

7 月 20 日,米怜先生乘坐一艘中国快船离开澳门。他没有拿到合法的交通许可,因此,只得偷偷地前往黄埔,再从那里乘船去广州。澳门当局的这种处置方式使马礼逊先生感到非常难受。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向他暗示,他应该放弃传教事业,只把精力放在处理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上。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的话,那他们就没有正确地理解他。马礼逊先生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位传教者。他受雇于东印度公司,是为了东印度公司的便利,也是为了他个人的便利。

几天后,他去了广州。在那里,他看到米怜先生情况很好,正忙于他的学习,但他的居住条件很差。马礼逊从广州回到澳门后,9 月 30 日,他刚刚结束了把《圣经·新约》译成中文的工作,又再次去了广州。现在,他开始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英华字典》的编纂工作中。这项工程耗尽了他的精力和才智。在编纂《英华字典》期间,由于喇佛先生(Roberts)故世,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喇佛先生是一位英国商馆的馆主,自马礼逊先生抵达中国以来,一直是他的亲密朋友。

1814 年,中国当局又公然开始了与基督徒的新一轮对抗。巡抚向朝廷报告,马礼逊先生是一位精通中国语言、了解中国风土人情的人,朝廷所收到的英国官方文书都是由他翻译的。朝廷发表了一份文告,以严厉的措辞斥责所有那些在公文写作上给予过马礼逊帮助的人。巡抚甚至下令,逮捕那些人。高先生父子因此被解雇,并被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另一方面,《圣经·新约》已经印成,准备发行流通,因此可望进入千家万户。《圣经·新约》初版采取木刻形式,印了 2000 册。这种木版可以印刷 10 万册而不至于毁坏。马礼逊先生同时加印了 1 万册阐述基督教学体系的小册子,另外还加印了 5000 册《教义问答》。

不久他们就发觉,米怜先生不可能获准留在广州,他必须另觅他处栖身。因此,马礼逊先生就他们的下一步工作给米怜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他说:“为了在主的庇佑下达到我们的目标,在中国的

中心地带找到一个自由的、不受拘束的住处,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眼下这种想法尚不实际,退而求其次,在广州附近或澳门找一个住处似乎也有必要。如果我们要自由地发挥我们传教士的作用,那么就成这样,但如果限于一室之内,禁止和当地人自由交谈,那么,我们最初要建立传教场所的要求现在已没有那样迫切了……由于这里不让我们居留,我们就把传教的耶路撒冷圣地建到别处。我们最好有一个大本营,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聚会、研经,由这个大本营派人到各处传教,万一出现什么不测,这里也是我们可以退守的家。如果这是神意安排的话,我们最好办一所青年学校,用来接待和指导来自欧洲的年轻传教士。寻找和建立一个重要的基地正是你的责任。也许可以把这个基地设在马六甲,或者设在爪哇岛。你会找到那扇敞开的大门的。”

106 由此他们决定,米怜博士应该在马来群岛的主要华人定居点中居住下来,并为以下目标而奋斗:1. 在生活在那些岛屿的数万华人中分发《新约》和刚刚出版的劝世小册子;2. 寻找一个宁静的、安全的营地,把它建成向中国传教的主要基地,且那里没有对宗教怀有偏见和排斥心理的政府对宗教的迫害;3. 收集人口情报等,为在这些人中传教寻找最佳途径提供参考材料;4. 确定印刷一卷本的英汉对话集的时机,以帮助其他传教代表掌握中文这门语言。本着这种明确的目标,米怜先生计划陆续访问爪哇、马六甲、槟榔屿等地。

米怜先生不在中国时,马礼逊先生一步步实施其出版计划。他撰写了中文小册子,介绍《旧约》的历史纲要,主要是《创世记》、《洪水灭

吾等父在天者愿爾名成聖爾宰王臨至爾旨奉行於地如於天焉賜我等今日日所用糧免我負債如我等免負債與我等者也不引我等進誘惑乃救我等出凶蓋國者權者及榮者皆屬爾于世世焉心願正是

图 21 中文的主祷文

世》和《出埃及记》，记述了以色列王国的法律和基本历史事件。他还翻译、印行了《赞美诗》的选段，以便在礼拜仪式上使用。这些“赞美诗”主要由苏格兰版的《诗篇》以及沃茨（Watts）、考珀（Cowper）和牛顿（Newton）的赞美诗组成。一般是在家庭中使用。

米怜先生要很多本《新约》，以便在旅行中奉赠各界人士，这样《新约》的新版本很快就问世了。这种版本以前印成大 8 开本，现在马礼逊先生决定把它印成 12 开本，这样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此外，在传教工作目前比较危险的情况下，藏有两副雕版是很必要的，而且要分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如果其中一副落入对手手中，还有一副可以保存下来。新刻的一副雕版已经准备就绪，值 500 西班牙元<sup>①</sup>，此外，每本书的印刷费用还要加半西班牙元。后来这个价格大大提高了。

现在，《英华字典》已经接近完成。这部书花费了马礼逊先生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但字典的出版成了让马礼逊先生非常揪心的一件事。如以手稿形式保存这部书，相比较而言没有什么大的用处，把字典印出来则可以供其他传教士使用，对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也会极有帮助。字典的印刷先前准备由罗马传教会出资 200 西班牙元，而这只是马礼逊先生要筹集的出版资金的 1/6。用于购买排字材料的费用已经非常之大，出版费用几乎超出了作者和教会的财力。因此，经过多次商谈后，马礼逊先生怀着感激而又释然的心情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承诺，由公司出资来印刷字典。很快，负责这项工作的特选委员会组成了。不久，汤姆斯先生（P. P. Thoms）带着印刷机、铅字和所有必备材料，从英格兰被派往中国，负责监督字典的出版工作。

《旧约》的翻译工作当时也在进行当中。1815 年初，马礼逊先生译完了《创世记》，单独印刷成书。

与此同时，米怜先生旅行回来了。他访问了爪哇。他从开明的、虔信基督教的总督莱佛士爵士（T. Stamford Raffles）那里获得了从事

<sup>①</sup> 每 1 西班牙元相当于 5 先令。——原注



传教事业的勇气和帮助。在访问过其他地方后,他在马六甲作了短暂停留,受到当地驻节公使、陆军指挥官法夸尔上校(Farquhar)的热烈欢迎。这位绅士对传教事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表明,他们是他们未来事业的热情支持者。米怜先生回到广州后,和马礼逊先生商定,应该把马六甲当做他们未来的居住点,作为他们全新的传教事业的基地。这一选择有好几个理由,而且是很充分的理由。马六甲靠近中国,它和东方群岛的所有岛屿之间有很频繁而便利的往来,而且那里居住了众多的中国人。这个地方所处的地理位置毗邻印度支那、暹罗和槟榔屿,是广州与印度之间的必经之地。在这片海域航行的船只经常要在此停泊,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更便于交流和传播书籍等事宜了。这里气候宜人,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基地,任何患病和健康不佳的传教士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一个值得考虑的居所。再者,这里宁静安祥,地方当局非常友善,法夸尔上校也很热情,如果能在这里建立一个传教基地,就可以着手从事马礼逊先生已经在心里琢磨了好几个月的各种综合项目了。米怜草拟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和一份以此报告为基础的建议,提交给伦敦差会董事会(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London)审议。

4月17日,马礼逊沉浸在儿子降生的喜悦中。5月1日,他为孩子洗礼,给孩子取名叫约翰·罗伯特(马儒翰)。他的小女儿丽贝卡此时大概有20个月大。两个孩子都被他虔诚地奉献给主,交付给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

1814年这一年带给了马礼逊截止到当时为止他从狂热的事业中所体验到的最大快乐。7年来,他希望、祈求,播撒天国的种子,希望这种子可以落在沃土之上,开花结果。但流逝的时间似乎只想更严酷地考验他的信念和耐心。但最终,他因为使一个人皈依了基督教、加入到他漫长的传教生涯中来而感到精神振奋。这个人叫蔡高(Tsae-Ako),是他早年的一位老师、阿兴(A-Hëen)的兄弟,现在仍然受雇于他。蔡高请求加入浸礼会,他作了以下的告白以表明他的信念:

“耶稣救赎我们是一大福音。语言和思想两者都不适合穷尽耶稣的仁慈和他值得称道的善良愿望。现在,我信奉耶稣,仰仗他的大德获得释罪。我们有种种罪过和缺陷,如果不信奉主以求得释罪,那我们永远都是可悲的。现在通过主耶稣,我们闻知我们的罪过得到了宽恕,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倚仗主的大德。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不是一个好人。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倚仗我自己的善。当我反躬自问,我明白,从小到现在,我没有力量、没有功德、没有学问。到如今我 27 岁了,但我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从未做过什么来报答主的恩惠。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我的仁慈的朋友、父母和亲戚们。我应该抱怨吗?我应该寄希望于自己的善心吗?我呼喊上帝、天父来免除我的罪过,我也呼求上帝让我与神灵达成一致。”

马礼逊描述了通过新教的传教事业而皈依基督的第一批皈依者,他的描述是颇为有趣的:“蔡高 16 岁丧父,21 岁时来到我家中,听我谈论耶稣。但他说,他不能清楚地理解我的意思。那是我在中国的第一年。三年后,当我的中文说写能力有所进步时,蔡高也更好地理解了我的意思。蔡高是由监管《新约》印刷的他的兄弟雇来的。他说,他开始明白了耶稣的大德可以拯救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所有人。至此,他听从主、信奉主。”

“他本来脾气不好,经常和兄弟们以及其他家人意见不合。我当时认为他最好辞去在我这儿的工作,但他依然留在这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在方圆几里内,他总要去参加安息日的礼拜。他早晚虔诚地祈祷,诵读《教义问答》中讲解的诫律(Decalogue)。他说,从“十诫”和朋友们和指导中,他看出了自己方方面面的错误。他的性格有问题,而且一直不诚实。他对兄弟、朋友们还有其他人也未尽到责任。当然,他的知识非常有限,他的见解或许有些模糊不清,但我希望他信奉上帝的心是真诚的。我把我的指导当做腓利(Philip)对太监所说的:‘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净化心灵。’哦,在那个重大的日子,他可以证明他是从濒临毁灭中得救的灵魂。祈愿上帝从他永恒的救赎中获得荣耀!”

“蔡高的书法还算过得去。他父亲略有薄产,但在从巴达维亚返回中国途中,在中国海因帆船失事而丢尽。蔡高当时在学校念书,经常生病,不能像他弟弟阿兴那样学业精进。阿兴现在也和我在一起。阿兴性情温和,有见识,但我担心他内心里与福音有抵触。他也一直参加主日的讲道,但缺乏真诚和求真之心,这要归因于中国人的性格。”

蔡高为成为基督徒做了长期准备。他内心的皈依是缓慢的、渐进的。他得拿出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皈依是真诚的。马礼逊先生以他一贯的谨慎,除了为他祈祷、在宗教事务上精心地指导他以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加速这最后的一步。所以,马礼逊先生是怀着充分的信心,接受了他的信仰忏悔。接着蔡高受洗加入了耶稣会。

马礼逊先生在1814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受洗的情形:

“在人们注意不到的海边山脚下的一股清泉旁边,我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蔡高施洗。那个受洗者,他的名字、性格如上所述。哦,主会用耶稣的血洗净他所有的罪孽,用圣灵的感召净化他的心,愿他成为收获季节的第一个果实。他是几百万被感化从而获得拯救的人之一!”

蔡高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福音传教事业。1819年他因患肺结核而辞世。他死时,马礼逊先生不在他身旁,但他从未怀疑蔡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主耶稣的信仰!

## 第九章 北上京师——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112

世上每一个伟大而庄严的运动都是热情的胜利。

——爱默生

马礼逊先生对其职位稳定与否的担心,通过他收到的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一封信完全得到了证实。这封写于1815年10月14日的信,包括以下段落:

“我们感到有必要通知你,公司董事会已经获悉,你在中国印刷和出版《新约》,同时还将印行若干译成中文的讲经小册子。嗣后董事会又进一步了解到,在中国散发这些小册子将被视为无视中国皇帝的上谕来对待,这些作品的出版者会受到罚款处罚。董事会担心,这些译本可能会给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带来严重损害,结果将导致你不能继续保持目前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董事会同时还表明,不管怎样,他们仍然对你的才干、行为和人品怀有敬意,并充分体会到从你的工作中所得到的益处。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指派我们在执行这项命令时,奉上4000美元作为对你的补偿。”

“尽管我们已经将命令的大旨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还是对你在处理东印度公司的事务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印象深刻,这是确信无疑的。从我们个人的了解和以往的经验来看,你通过与商馆的联系、小心谨慎地避免将自己置于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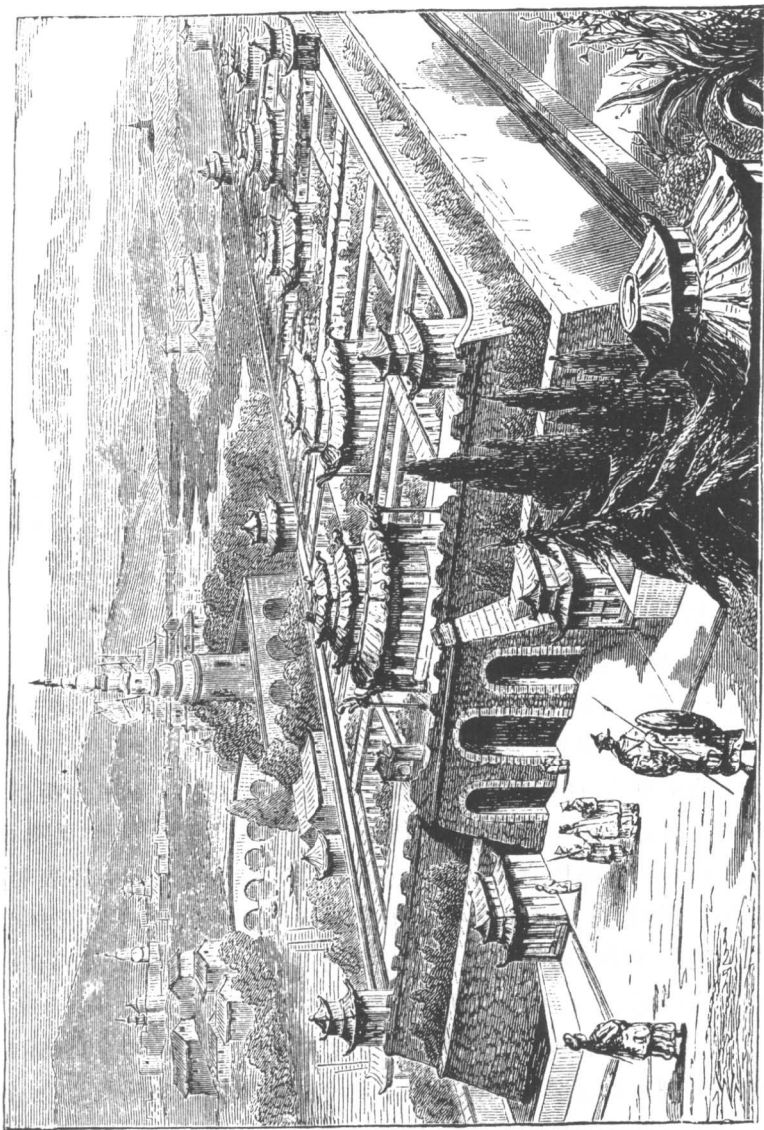


图22 北京中国皇宫

地,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收到进一步的指示之前,暂缓执行上述指示。”

必须借用马礼逊卷帙浩繁的书信来理解和判断他所扮演的角色。从他的书信看,有一点是很显然的,东印度公司的当地主管人员不情愿执行董事会的决定。几个星期后,在中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之间发生了纠纷。由阿美士德爵士(Ameherst)任特命全权大使的英国使团遭遣从英国前往北京的宫廷调解和处理双方的争执,马礼逊先生的工作是担任秘书和译员。这样的角色,使团是决不能或缺的。马礼逊应邀陪同阿美士德特使前往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礼逊夫人的健康一直让她的丈夫和朋友们非常焦虑。她的医疗顾问坚决要求她应该尝试到海上旅行,改变一下环境。这对她的健康是有益的。她的丈夫在中国错综复杂的情势中正处于特殊的枢纽位置,这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他无法分身。因此,马礼逊夫人在没有丈夫而只有两个孩子陪同的情况下,于1815年1月21日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船。

这一年,等待马礼逊先生的不仅是一件麻烦事。中国不满于宗教的气氛正日渐高涨。那位请来准备印刷字典的字模刻字工已经被逮捕,印刷工人害怕被官府发现,在惶然中毁掉了为印刷新版《新约》和《创世记》而准备的模板。这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印刷经文的马礼逊沮丧极了。但他很快鼓起了勇气,着手准备一副新的活字。不久,有消息传来,不列颠和外国圣经公会同意捐助1000英镑,这一举动既慷慨又及时,使他能够刻制新的模板了,不仅可以刻制印刷12开本版的《新约》的模板,还可刻制印刷《诗篇》的模板,当时《诗篇》的翻译工作才刚刚完成。圣经协会的干事欧文爵士(J. Owen)在给他的信中通知他:

“你的《圣经》译本在总体上应该是其原文的忠实翻版,中国人对《圣经》的理解要通过《圣经》作者对《圣经》的理解和赞美来拓展。你的辛勤劳动将会带来多么大的荣誉啊!你将会获得多大的天佑啊!出于分享这份荣耀与神恩的愿望,不列颠和外国圣经公会一

一次又一次以捐款的方式给你提供金钱上的资助,你可以相信,我们会继续支持你从事这项其预定目标与其经营者的愿望如此协调一致的事业。”

这里还应该提到,此前不久,一个英国商人在中国逝世,他给马礼逊先生留下了1000英镑,用于马礼逊的传教事业。这笔款项被用来印刷《新约》和其他基督教图书。

阿美士德爵士及其随行官员于1816年7月13日乘“阿尔塞斯特号”(Alceste)抵达广州。乔治·斯当东爵士和马礼逊先生上了船,随后,轮船继续航行。7月28日,船在白河(Peiho)<sup>①</sup>河口停泊。8月13日,他们在天津出席一个盛大的宴会,宴会是由两位钦差大臣以皇帝的名义举行的。马礼逊先生对他们受到的款待作了有趣的描述。钦差大臣和英国特使还有传教士坐在非常低的垫子上,垫子只有约6英寸高,而皇帝的随员则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上。

8月20日,使团全体成员抵达通州,那里距北京只需一天的路程。他们在通州花了8天时间来争论礼仪方面的问题。英国特使被要求在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其方式就是,某人在觐见皇帝时要下跪,然后匍匐在地上,手向前,前额叩地三次,接着,起身,再跪下,重复刚才的动作。接着,再起身,再重复动作。整个大礼要重复三次。这是中国人对神表示崇敬的做法——对有的神叩三次头,有的神叩六次头,还有的叩九次头,这要根据神受崇敬的程度而定。阿美士德爵士很不情愿行这种愚蠢而卑微的大礼。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中国大臣表示不强求那些要求。29日,英国使团到达了皇宫,由皇帝钦定的召见时间安排也送达使团成员手中。因为英国特使及其一行整晚都在赶路,还没有来得及沐浴更衣,觐见皇帝的准备工作也非常仓促,所以,阿美士德爵士知会接待他们的那位大臣,说当晚他太疲倦了,不得不请求皇帝陛下把接见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以后。结果,钦差大臣禀告皇帝,说英国特使病了,举步维艰。皇帝仁

<sup>①</sup> 即永定河,又称白利桑干河。——译注

慈地恩准英国特使在他的宫中小憩,并派御医前往探视。御医发现,阿美士德爵士并没有患病。他当然向皇帝作了如实禀告,这就造成了不言而喻的恶果。皇帝陛下认为他被人愚弄了,于是召集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没有人敢出来解释事件的真相。内阁会议下达了一道命令,即英国特使必须立即离开。英国使团服从了这一命令。使团全体成员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北京。经过了来回5万英里的长途跋涉之后,阿美士德爵士不得不宣告自己的使命一无所获。皇帝后来发现了事件的真相,把亲王——皇帝的兄弟——从其所处的高位上贬黜。其他三人也遭到了降级处理。皇帝还发布了一道上谕。在上谕中,皇帝痛惜他的朝臣们对公共事务是如此自私地麻木不仁。他斥责亲王的朋党,说他们虽然表白自己效忠皇上,在他面前谄笑和极尽奉承之能事,但他们看见皇上为谣言所迷惑,却并不告诉皇上事实真相,只简单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哎呀!”他说,“一国之君的位置就像站在险恶的悬崖上。如果你连那些王公大臣都管不了,你还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呢?”皇帝虚伪的自尊不允许他去解释和纠正对英国特使的做法,但他命令臣下,要礼数周全地殷勤待客。他接受了英国国王赠送的三件礼物,也回赠三件礼物给英国国王。出于同样孩子气的想法——他要胜过所有君王——他把送给英王礼物叫“赐”,而他接受的礼物叫“贡品”。

虽然英国特使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此次北上的旅行使马礼逊先生有好几个月的轻松愉快,这对他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他可以借机增进他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这次旅行,他收集了足迹所至的各省的方言知识。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

他和那个著名的使团经过直隶、山东,跨过黄河和大运河回到广州。他们为一路上那些优美的宝塔和寺庙所叹服,那些宝塔和寺庙装点了沿路的风景。但是,道德和宗教现象更吸引了马礼逊的注意。他遇见过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先生,两人相与畅谈。那人向他详细介绍了他所信奉的宗教的特别之处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位。马礼逊惊讶地发现,相对于基督教尚未获准在中国立足来说,伊斯兰教





图 23 中国皇帝

徒却可以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伊斯兰教徒甚至可以进入政府工作,而且在某些省份里,伊斯兰教徒占了人口的大多数。马礼逊还发现,在河南省,有一些家庭属于“挑筋教”(Teaou Kin Keaou),这个教派的名称源于他们吃牛羊肉时要挑筋。他们有礼拜的寺庙,还保留了

第7日为安息日的习俗。马礼逊博士逝世后,有一次维多利亚主教派遣的代表团去访问了这些人。代表团发现那是些犹太人,这些人对他们的历史已经全然无知。他们有不少希伯来文的书籍,但已经没有人能够阅读。经过鉴别,那些书是《圣经·旧约》的一部分,有些用漂亮的花体写在白羊皮上,又缝接在一起,大约有20码长,粘贴起来卷在一起。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发现了犹太人群。所有这一切都对关于犹太人的神圣预言给予了证明:“国家被劫掠,人民遭受蹂躏,颠沛流离。”

特使团经过山东时顺访了孔子故里。在鄱阳湖,他们发现了白鹿洞书院——最受尊崇的《四书》的评注者、最伟大的哲人朱熹大约 120  
600年前曾在此设坛讲学。书院坐落在一个幽谷的上面。幽谷中一条晶莹清澈的小溪静静地流淌着。幽谷上方,耸起一座巨大的、乌黑而嶙峋的山峰,好像在为白鹿洞书院遮风避雨,让朱夫子在这里授业解惑。经过指点,他们看到了一块磐石,朱夫子当年在这里格物致知,苦心求索,他当年亲手种植的一棵树也枝叶繁茂,但从树上采摘树叶是主人严格禁止的。

在跨越江西和广东两省的边界时,他们穿过了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深山小径。1000年前这条路由一位退隐的大臣慷慨出资所筑。他的画像就挂在附近的寺庙中,享受着神的荣耀。在离开广州6个月后,使团重又回到了这里。在马礼逊北上期间,由他预先编写好的一卷《华英对话集》由英国商馆的一位先生监管,已经在广州一家印刷厂里开印了。

米怜先生及其全家已经离开中国到马六甲定居,去实施马礼逊梦寐以求的伟大计划。现在这项计划通过他忠诚的伙伴的帮助,大部分已渐渐成为现实。米怜先生收集了中文书籍、印刷用纸和其他必需的材料,还聘请了一位中文教师,雇佣了几名工人,于1815年4月17日出发前往他的新家。在海上,他们家添了一对双生子。经过35天的航行,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受到了法夸尔上校的热烈欢迎。法夸尔上校的确是一位值得他交往的友人。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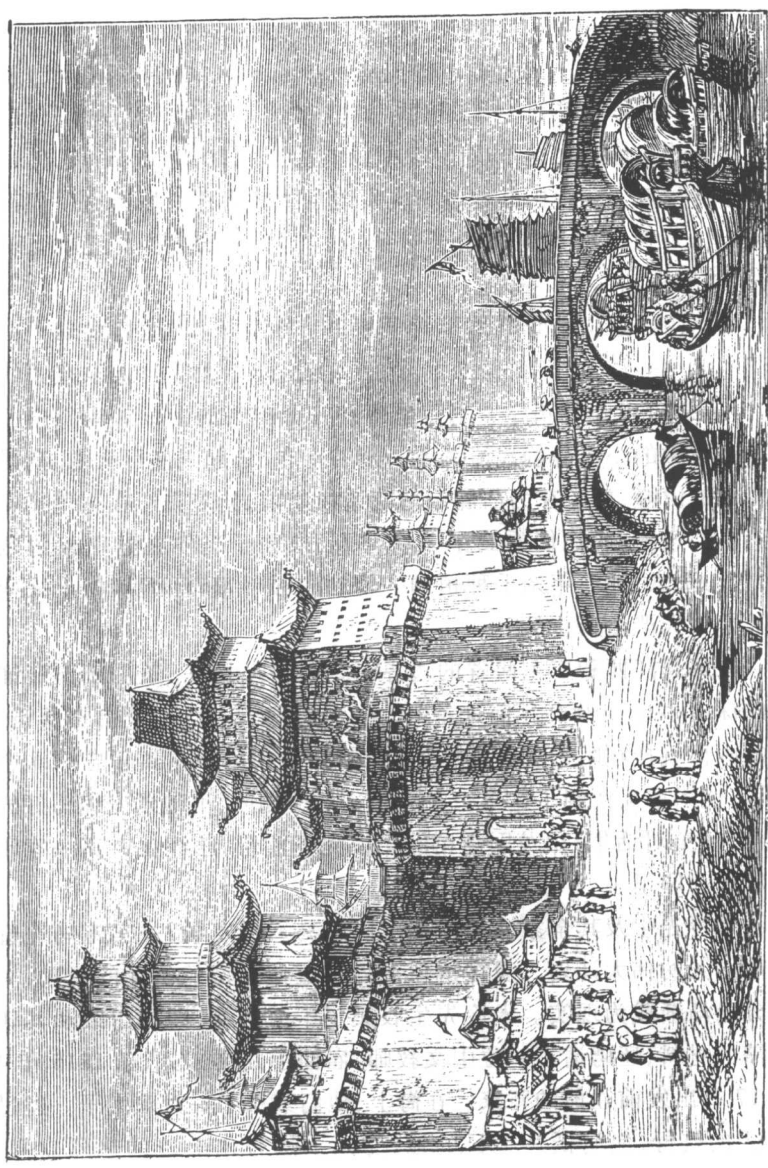


图24 北京西直门

先前谈到的有关在马六甲传教的计划,已经由两位先生精心拟定了方案。马礼逊和米怜向伦敦差会呈报的方案获得了完全的赞同和认可。这一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要想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就要靠创业者的财力,因为仅仅依靠创业者的信仰和对事业的忠诚并不现实。根据初步拟定的计划,他们要购买一块土地,这样可以在上面盖起几间早已琢磨好用途的建筑;要创办一所免费学校,为将来创办更高级的神学院打下基础,而这所学校还可以教育和培训本地的牧师;还要创办一份中文月刊;要安装一台印刷机并使之投入生产,以便印刷发行中文的宗教书籍,传播基督教文学。他们还打算创办一份英文期刊,其目的是倡导在东方传教的教会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传教机构都已建立起来了,进行礼拜的场所也已竣工,整个计划的名称是“恒河外方传道计划”,这个名称表明了这一传教计划所覆盖的区域和范围。 122

米怜先生很快开始尝试实施这一计划。在英国人的圈地里有一间小屋,以前是用来做马厩的。现在正好用来办学校。他们在城里贴上用中文写的公告,宣布学校是为穷苦孩子而开设的。起初人们似乎不太情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8月5日开学时,学校仅仅收到5名学生。但经过不懈的劝说、引导和说明,学生人数有所增加。到第一年年末,每天到校的学生达到14名,他们都受过中文基础教育。不久,马礼逊先生撰写的《教义问答》被引进了课堂。孩子们熟悉了最主要的宗教词汇,如上帝、造物主、灵魂和死亡,等等。接着,师生一起进行礼拜活动。在这里,小心谨慎也是必不可少的。开始他们只吸收一些从广州带来的佣人参加礼拜活动,后来又让学校师生来参加。这样,米怜先生非常缓慢、但一步步地接近了他要达到的伟大目标。当时马六甲荷兰基督教会的小教堂里缺少一名牧师。他们邀请米怜先生填补这一空缺。米怜谢绝了这一邀请,原因是他正忙于另一个目标,但他仍答应帮他们忙,每周去一次指导圣事。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找到可用来建设礼拜场所的土地。到了1816年年初,米怜先生从英国驻槟榔屿总督那里得到了大片土地,当然,还必须得 123

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批准。那片土地距城镇有相当一段距离,不太适合作传教用。因此,他们用这一大片地换了城门边的一小块土地,还付了大约 200 英镑来补偿城门边的那些摊贩。这片土地是所能得到的最佳地点。有必要提到那些陪伴米怜先生从中国来的印刷工人。米怜先生现在弄到了一台印刷机、两副英文和马来文铅字,还有开工所必需的所有设备。为了留住他雇来的工人,他印刷了英文版的多德里奇(Doddridge)的著作《心灵中宗教的兴起和进步》和博格的著作《论基督教的真》,出售或分发给在中国、印度和东方群岛的英国侨民和冒险家。

121 马礼逊先生重新恢复他在广州的传教工作,但很快就面对让他头疼的新的困难的考验。他印刷厂的工人发生了争吵,其中一位声称要对对方进行报复,他把字典里的一页纸送给了一位严厉的地方官周党(Tso Tang)<sup>①</sup>。这个官员大喜过望,这似乎给他提供捞钱的机会了。他派出捕快去没收印刷物资,抓捕正忙于帮助外国人非法印刷中文材料的本地人。英国商馆的馆主觅加府爵士(Theophilus John Metcalfe)果断插手干预,阻止了印刷机和铅字被没收充公。广州巡抚迅速下令严禁当地人帮助外国人印刷中文书籍。容三德、阿发和阿兴被拘捕,高先生潜逃,马礼逊的老师 and 誊写员则受到通缉。结果不得不让葡萄牙工人毁掉准备用来印刷字典的中文模版。

在通常情况下,马礼逊每天要连续工作 6~8 个小时,编纂字典。除此而外,还要忙于翻译和出版用于早晚祷告的祈祷文,作为他们的公共祈祷书;还有《中国春神》(*Horae Sinicae*),这是一系列中国经典和中文入门读物的译本。所有这些,加上其他已有著录的著作,证明这种热情和勤奋必须经受严峻的对耐心和体格的考验。《圣经》汉译的进展在以下 1817 年 11 月 24 日致圣经公会的信中,有简要的说明:

“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和米怜先生都希望能完成整部《圣

<sup>①</sup> 此为音译。——译注

经》的汉译工作,他已经完成了《申命记》和《约书亚记》,《创世记》已经付梓了一段时间。我也译出了《出埃及记》和《路德记》的初稿。《诗篇》我已经完成,正在印刷中。《以赛亚书》完成了大约一半,几个字模工已受雇前往马六甲,在那儿印刷《申命记》、《约书亚记》和《诗篇》的12开版。我在这里印的这本书,比《新约》的12开版要小。”

这时候,一封美国来信告诉马礼逊先生,有一位来自澳门的中国青年,大约26岁,现定居于纽约,他通过阅读中文版的《新约》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且已证实极为虔诚和坚定。这一消息使马礼逊在枯燥无味的翻译推敲中心情特别舒畅。 125

马礼逊先生的辛勤劳动现在开始引起整个大英帝国的关注和兴趣,也引起欧美许多地方人士的关注。他收到了德国、法国一些学识渊博的教授的来信。他们都热情地肯定他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法特博士(Vater)和法兰西皇家学院的中文教授、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之一——雷慕沙先生(M. Remuset),还有其他学者,都真诚地、衷心地祝贺他掌握了精深而多方面的汉语语言文学知识,为他的后继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格拉斯哥大学的资深研究员们高度肯定他作为一个语文学家 and 基督教教士所取得的成就,他被全体一致地、理所当然地封为神学博士(Doctor of Divine)。

现在,他已在远离祖国的异乡工作了10年。这10年来,他一直在从事艰巨而又磨人的劳动;这10年,他一直处于中国当局的纠缠、迫害和对英国商人不加掩饰的诸多不满中;这10年,他一直因当地人所表现出的对福音真理冥顽不灵的态度而备感冷酷、令人压抑的失望。马礼逊先生天生的优秀品格,使他在自身所处的危难处境中仍然积极地、精神饱满地投入了他的事业。每逢形势艰难,神都要用特有的方式代表他出面,使他在这个国家站稳了脚跟,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受行政当局干扰地传播福音。从他工作的开始一直到最后,上帝都赋予他得以维系希望与勇气的宁静、舒心的鲜明澄静之感,使他寄希望于“从容和自信是你的力量”的允诺,为实现自己的 126

诺言而奋斗。这10年所取得的成果当然是他从事将来的工作的永久的资本。他已经充分掌握了中文这门最难学的语言、最晦涩的学问。成套的印刷设备、铅字、木版及其他材料都已经积攒起来，大开本的中文版《新约》已经开始印刷和装订。另一种印刷了9000份的版本也已经接近完工。作为他本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他已经出版了一本中文语法、一卷中国典籍的译文、《诗篇》、《祈祷书》和几本基督教教义和历史的小册子，更不用说早已译完的《旧约》了。这本《旧约》部分已经印刷成书，只等全部印成后一起发行流通。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他对米怜先生在语言学习和建立马六甲传教基地事宜上所给予的帮助。所有这一切成果，都是马礼逊先生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官方译员和秘书，在为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宝贵贡献之余所做的事。

至于基督教传教的主要任务——让众心皈依上帝，这10年来，并不能说一无所成。至少有两个人放弃了偶像崇拜而表示信奉基督。其中一位受了洗，一直坚持虔诚忏悔；另一位则承诺要不断提高对基督教的了解和虔敬，以保证不久以后接受洗礼。其他新教传教先驱的经历与马礼逊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得面对来自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的巨大危险，他们经历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冒险和罗曼蒂克的考验，也为巨大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但我们拿不准的是，面对三番五次的失望，他们中是否有谁在面临危险时比马礼逊更能保持沉着冷静，更具英雄气概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呢？

## 第十章 《圣经》中文版译成—— 米怜博士去世

128

上帝用它香气四播的油膏涂抹你的头，  
去搏斗，而不是去统治；它让你的  
泪水像纯净的水晶漫溢。

因为土地上更年轻的耕作者们  
佩戴着护身符，所以别人  
应该耐心地用他们的心和手去经营，  
用你的手、你的心，和你的勇气。

——勃朗宁

1818年11月10日，马六甲英华书院由W.法夸尔上校主持奠基，总督泰森阁下(J. S. T. Thyson)、槟榔屿省法官厄斯金阁下(J. J. Erskine)、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其他许多著名人士都出席了奠基式。米怜先生代表马礼逊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辞得体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宣布，英华书院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和欧洲学术的交流，它的机构设置是建立一个图书馆，收藏有关欧洲和东方各国的语言、历史和科学等方面的书籍。欧洲的中文教授可以在当地华人教师的帮助下传授知识。书院还要建立一个有多种用途的印刷中心，并筹划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一座植物园，它将成为汇集东方诸岛各种植物的一个中心。英华书院的好处是可以接纳而且适于培训在东方从事传教、商

129



务、科学研究和官方事务的欧洲人,以及渴望来这里接受训练,准备将来为欧洲人或基督教会服务的来自华语国家的年轻人。马礼逊先生为书院的创办捐助了1000英镑,并且慨允在5年内每年捐助100英镑以维持书院的建设费用。他还另外给书院捐助了大笔款项,其中多数用于图书馆建设。另一位绅士捐了一笔总共4000西班牙元的赞助用于房舍建设。伦敦差会捐了500英镑,在广州的欧洲侨民也捐了500英镑。一位友人写道:

“我承认,这一计划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是一个大大的善行和慷慨之举,但同时也是花费巨大的工程,因此,我们理应做点捐赠。就我所赠的420美元(相当于100几尼)而言,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我支取,我都将乐于听命。

“这个世界的信念和希望会有不同,  
但全人类关注的中心是博爱。  
于是,神和自然构成在一个大的架构,  
愿自我之爱和社群之爱融而为一。”

至于英华书院的作用,没有什么词汇可以用来描述马礼逊博士对之所具有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马六甲不仅是东方的雅典,还是东方的耶路撒冷。在中文世界被净化之前,知识和宗教的影响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中文世界。马六甲是欧洲人在亚洲占领的第一批领地之一,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成功地远航东方后没几年,就被葡萄牙人所占领。但葡萄牙人并未致力于改善当地人的精神面貌。圣·方济各·沙勿略访问了这个地方后证实,只凭葡萄牙人所犯暴行的恶劣程度和犯罪次数,就可以区别出基督徒和异教徒。这座城市后来被英国人占领,并被马礼逊选为实现其心中伟大目标的最便利和最有希望的传教中心。

英华书院的建筑是一栋没有任何装饰的坚固的大厦。大厦高90英尺,宽34英尺。前后有石柱支撑的回廊。回廊有103英尺长,16.5英尺宽。大厦内部设计十分合理。一边是中英文印刷所以及学校和为当地老师及个人准备的房间;另一边是书院主管及其助手

的住处。书院面海,掩映在一排排番豆树丛中,四周环绕着平整的耕地。

有一段时间,英华书院的创办人非常失望,因为当地人拒绝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书院来。直到米怜先生被迫允诺每周给每个孩子提供一点犒赏,才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由于当地人渐渐对书院的熟悉以及对其导师的志向的理解,他们渐渐信赖书院了,而书院也由此兴盛起来。大小学生们开始接受学习和培训,在米怜先生的一生中,学生人数每次由 20 人到 60 人不等,其中还有几人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坚定的教徒。书籍——有些是很重要的书籍——从印刷所源源不断地出来,期刊也按期发行,各种强有力的手段把马六甲塑造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基督教传教中心。英华书院建立并运作几年后,特选委员会主席 J. C. 梅杰里班克斯先生(C. Majoribanks)访问了书院。他对这次访问有一段饶有兴味的描述:“我访问书院时,那儿有 30 多名学员,如果书院的资金再雄厚一些,那么她成功的机会必然更大。我们满意地听到,几乎每个孩子都能流利地用中文和英文阅读《圣经》。他们中的很多人还能写一手漂亮的中英文,并熟练掌握了算术和地理知识,会使用地球仪,了解一般的历史常识。马六甲一位农民的儿子所受过的启蒙教育,是中国皇帝的儿子所没有受过的。”1820 年,米怜先生说:“总共有 13 所学校和传教差会有关,这些学校大概有 300 名青少年学员。”

皈依这种更深层次的事情,似乎也在一些人身上有了进展。有位叫梁阿发的中国印刷工人,做的是教师的工作,他表示信奉基督,在他的真诚得到证实后,便接受了洗礼,成了教会的一员。他编纂和印刷了《新约》的几个部分的释文。当宗教迫害开始时,他以极大的坚韧忍受了痛苦,并自始至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使他经受了倾家荡产、受刑和入狱的考验。作为一个福音派教徒,他在中国好几个地区传教,也是伦敦差会任命的第一位从事传教的中国人。正是由于阅读梁阿发所写的小册子,太平天国的领袖才对基督教有了认识,他们所认同和倡导的某些真理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起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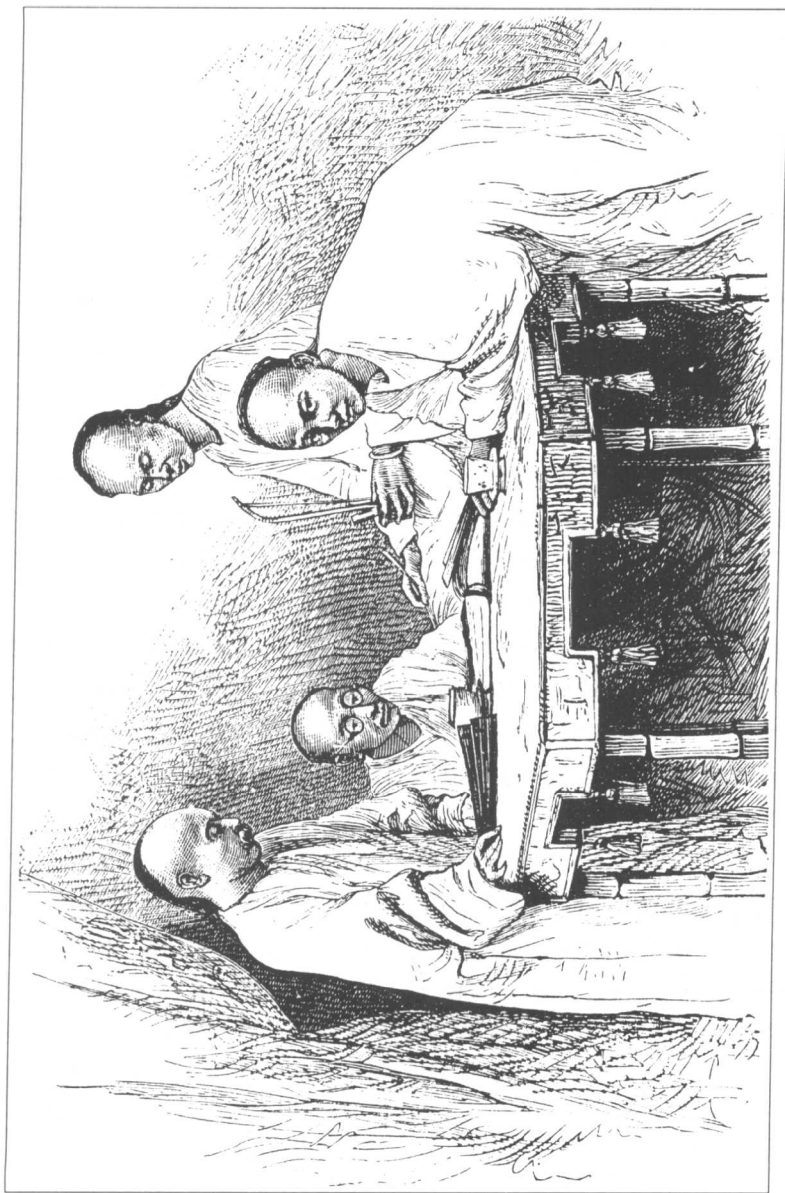


图25 中国书生

的中西合璧的政府。

那部篇幅巨大的《英华字典》有几卷现在已经完成并付梓,但在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博士即以无以言表的喜悦致信伦敦差会的董事会,说他生命中的伟大目标、他心目中的最大希望已经实现了,整部《圣经》现在已经译成了中文。 *ASP*

当然,他承担了这一伟大过程的绝大部分工作,但米怜先生在掌握了中文后,贡献了他最富成效、最心甘情愿的劳动,他对中文的掌握已使他能够驾轻就熟。全部《新约》是马礼逊翻译的,以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部分《新约》中译稿为基础。马礼逊还完成了除米怜译成中文的《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约伯记》以外的全部《旧约》的翻译。马礼逊在致伦敦差会的信中明确表示,《圣经》中译本不敢说尽善尽美,他只希望为新译本的出现打下一个基础,更希望在几年后有更完备的译本问世。从这封信中摘录的以下几段话会令人感兴趣。马礼逊写道: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马礼逊与米怜的《圣经》中译本在中国所占的地位可以与威克利夫(Wickliff)或廷达尔(Tyndale)的英文版《圣经》在今天所拥有的地位相当,很多人将为这一努力而盛赞上帝。伦敦差会和圣经公会都不会后悔在这个项目上的投资,而且还会追加投资。

“自威克利夫的遗骨被掘出焚烧至今,过去还不到500年,他主要因为翻译《圣经》而遭此厄运;出于同样的原因,廷达尔被野蛮的刽子手绞死,接着又遭焚尸,过去也还不到300年。威克利夫的译本和廷达尔的译本中那些无法证实的不准确之处,成了那些吹毛求疵之徒拒绝《圣经》的任何新译本的理由。自从英国议会规定‘《新旧约全书》的所有文体的版本,以及那些戏仿之作、错误之作和廷达尔不忠实的译本,应立刻予以废弃,禁止采用和收藏’以来,大约才过去了277年的时间。如果最近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对当代的译者来说,他们的译本受到审查和贬斥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ASP*

“钦定本《圣经》的译者总共有 54 位，他们在国王的资助下，把《圣经》译成他们祖国当时的语言。我们的译本是由两个人完成的，最多只有 3 人（包括经文的原作者），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从事翻译工作，将《圣经》译成一种外国语，一种新近掌握的语言，一种世界上最难学、在欧洲很少有人能掌握的语言。要对这部著作作公正的评价，不能不考虑这诸种条件。

1335 “在我的译本中，我考虑了译文的准确性、明晰性和简洁性。我宁可选用普通词汇，也不用罕见的词和古词。我也避免采用在异教的哲学和宗教中出现的术语。我宁可选择似乎不雅的词，也不让人觉得晦涩难懂。在这一困难的过程中，我早已接受的广受认同的最庄严、最少偏执的神性，赋予了我智慧。

“为了这项任务，我长期忍受着艰辛和与世隔绝。冷静而公正地说，我译《圣经》并不是着眼于这种事的新奇和古怪，我也不会仅仅因为它的古老就固执于一种观点，我希望带着惟恐错译上帝语言的责任感，表达一种正确的思考方式。这样的条件也许同语法训练一样，在翻译《圣经》这类书时是不可或缺的。

1336 “让摩西、大卫和诸先知，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使用他们自己的语汇，对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宣布上帝的杰作，我希望，这将预示在世界的这些地方一个幸福时代的迅速到来；我相信，异教怀疑主义的暗影将会被天空中黎明的到来所驱散。充斥着我国土的那些镀金像和无数的偶像，有一天肯定会在上帝的话语的力量下，完全破灭，就像大衮神像仆倒在约柜前一样。<sup>①</sup>

“当廷达尔被绑在火刑柱上时，他满怀热忱地高喊着亨利八世：‘陛下，请睁开英国国王的慧眼吧。’他的祝愿似乎被听见了，也得到了回应。让我们对中华帝国的君主抱有同样热忱的祝愿吧。

“我以使徒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最后，教友们，为我们祷告吧，上帝的语言可以不拘泥于任何语言而被光耀，正如他的话与你同

<sup>①</sup> 参见《圣经·撒母耳记上》第 5 章，第 2~7 节。——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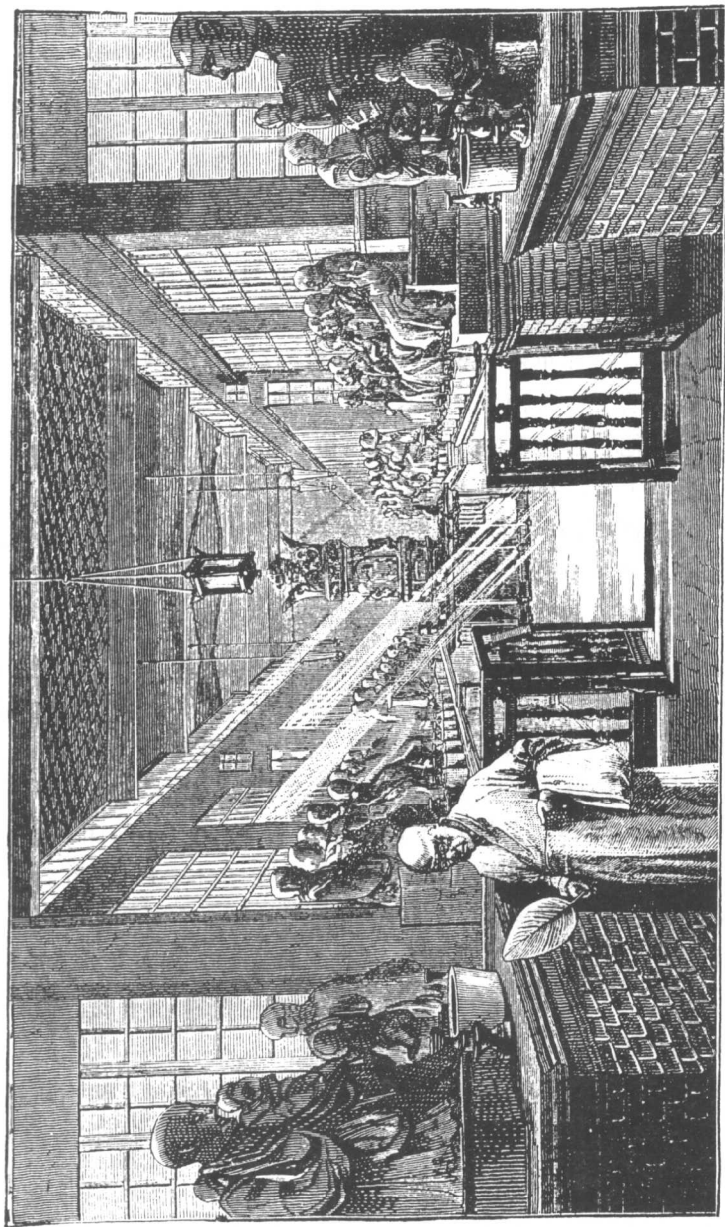


图26 广州五百罗汉堂

在。’”

遍布欧美的传播基督教的同道们为这一伟大工程的成功而欢欣鼓舞。对马礼逊先生和米怜先生的道贺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而来。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米怜先生神学博士学位,表达了对仁慈的上帝由衷的感激,是仁慈的上帝主宰着他们埋头苦干。伦敦差会干事、神学博士 G. 伯登牧师写道:

“这样艰巨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是上帝对这一伟大工程施加了影响力;是他使工程的预期目的得以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就是对人类心灵加以启蒙和革新。仅对上帝来说,这是当下和永远的荣耀。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应该、不愿意,也不能忘记勤勉的传教代表,上帝乐于用他们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我们因你和你的助手米怜先生而感谢上帝。我们赞美上帝,是他延续你们在一个湿热气候中的生命,保持你们身心的力量,让你们看到你们的辛勤劳动的结晶……不必介意对手们说什么,工作已经完成了,上帝会保佑它的;当上帝向所有的人展示它的作品时,它不会忘记这一种为信仰而不计回报的奉献。我亲爱的先生,感谢上帝让你来到这个世上,让你获得重生,使你得以完成这一伟大的工程。你活着是因为一个美好的目标,你活着是为中文版《圣经》的出版。感谢主,鼓起勇气吧!”

不列颠及国外圣经公会委员会同样以感恩和祝贺的口吻写来一封信,另外致送 1000 英镑用于资助中文版《圣经》的加印和流通。美国圣经公会委员会送给马礼逊博士一本 8 开本《圣经》的最佳版本,该书装帧精美,以示对马礼逊的敬意和赞许。美国外国传教士委员会也来函向马礼逊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和祝贺。除此之外,乔治·斯当东博士及许多杰出的学者也以同样的笔调,来信表明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这一伟大成就的强烈兴趣。

这一引人注目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马礼逊博士又不知疲倦地着手进行他另一方面的事业。阿伯丁大学校长、神父贝尔德博士(Baird)曾经来信询问有关中国贫困人口的情况。这使他和李文斯顿医生(Livingston)——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医生——一起,开始关



图 27 广州药铺街



注遍布中国城乡的大量身无分文或者疾病缠身的人们。在中国的大街上,常见盲人、跛子和麻风病人在游荡。他们的生存环境极少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同情。这些饱受痛苦的人们处于如此令人忧虑的生存环境只能揭示出他们在医学领域里同样无知。在路边和市场的摊位上,随处可见摆放着出售不加遮盖的干巴巴的蔬菜。这些菜有的售出了一部分,有的全部售出了。有人抱怨,却不做任何努力去加以制止。广州的一家药店,号称店里大约有 300 种药,但只有 30 种是常用药。而当时的一位名医主要只用一种药,即大黄。这位医生姓王,针对他的行医手段,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叫“大黄王”。为了解决这个突出的弊病,马礼逊开了一家诊所给穷人看病、发放药品。他自己每天要花一到二个小时亲自主持诊病,李文斯顿医生则协助药房的管理。他还买下了一家中医药图书馆,里面藏有 800 多卷图书,包括一整套的中医药书籍。他还雇用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夫和药剂师。一位草药商偶尔来诊所(马礼逊买下了他的货物交给李文斯顿博士做分析研究之用),讲解他采集并卖给马礼逊的各种草药的药性。

广州及其临近地区那些病魔缠身的中国人都涌向这个诊所。几个月内,他们接纳了几千个病人,并成功地进行了治疗,结果令人满意。这家诊所可以被视为是一批同类机构的先行者,它的建立与在东方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密切相关,它也证明了马礼逊希望诊所成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想法,是切实可行的。

马礼逊博士身兼很多重要的工作,他还找机会,从印刷物中挑选出几种成本不大但很实用的读物去派送。一篇是把中国宗教的原理与基督教原理进行比较的小论文;另一篇是《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目的在于拓展和启发中国人关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对于基督教和实用宗教的看法;第三篇是关于英格兰教会早晚祷告和《诗篇》的说明。这本书由祈祷书和布道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订了 2000 册,以便分发给中国人。

1820 年 4 月 23 日,身体状况已大有改善的马礼逊夫人和她的

两个孩子一起,登上“伊利侯爵夫人”号(*Marchioness of Ely*),前往中国与丈夫团聚。8月23日,马礼逊先生高兴地在澳门迎接母子三人,并和他们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几个星期,享受家人团聚之乐。然后,他不得不离开他们,再度履行他在广州的职责。

与此同时,米怜先生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马六甲英华书院的管理工作,同时还要负责其他的传教事宜。这种奉献精神使他一向不很健壮的身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在他忘我工作的同时,经受了极大的痛苦。1819年3月,他又经受了一次人间最严酷的磨难。死亡已经夺走了他挚爱的两个孩子,现在他的亲密伴侣又要离他而去。她是在一种安详的、憧憬着荣耀的永生的气氛中死去的。极度的痛苦落在这位失去爱妻和孩子的丈夫和父亲身上。从米怜夫人去世之日直到他自己辞世,他的日记常被泪水打湿。“哦,雷切尔,雷切尔!”他写道:“每一个与你相关的事都使我感到亲切!但我竭力不因此而悲伤,就像你临终前要求我的那样。我试图留有对你音容笑貌的记忆,把它们传给你留在世上的孩子们。‘主给你的,主已经把它拿走。祝福你,以主的名义。’”

这时他仍然努力 working,但4个活着的孩子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英华书院的巨大开支和种种困难引起了马礼逊先生和他本人的焦虑。财力雄厚的东印度公司答应每年资助1200元以维持书院的运作,但威廉·本廷克爵士(*William Bentinck*)就任印度总督后,这项承诺被取消了。然而,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特选委员会成员对书院的作用具有充分的信心。他们联名致信马礼逊,对取消这一承诺表达他们深深的遗憾。他们同时又说,已经决定由他们来补上这笔款项,这样,仍能使书院对促进东方的进步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伦敦差会特派遣了几个传教士前往巴达维亚(雅加达)、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开展工作。一个经验丰富的印刷工人也抵达了马六甲,协助米怜博士在整个居住区中传播基督教的文献。

1821年春天,马礼逊博士回到澳门,他获准在澳门短暂停留,得以享受了一段欢快而无忧无虑的天伦之乐。但一片乌云一直盘桓在



图28 一群中国商人

他们全家人的心头,有段时间家里充满了一种忧郁的气氛。他不久有机会写信给他的岳父默顿先生:“我挚爱的玛丽抵达中国后最初的一段日子,身体还相当好,很少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们高高兴兴地安顿下来。在澳门海边我们寓所前有一大片空地,每天晚上,我们在那儿和孩子们一起散步。做过家庭祈祷后,我们围坐在桌边,要不做些家务,要不做些娱乐活动。我的玛丽真诚而欢快地为她期待中的孩子做衣服。把她所有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舒适宜人。但她迄今也未获得休养的条件,由于没有读过多少《圣经》,她也应付不了工作。自从她来中国后,我相信,她读完了米尔纳著的一部《教会史》,并从中得到了很多教益。”

6月8日,她突然病倒了。虽然医生、丈夫和朋友们尽了人力和情感所能做到的一切,她还是在10日即星期日的晚上死在她丈夫马礼逊的怀里。马礼逊先生希望把爱妻和他已故的幼子詹姆斯葬在一起——詹姆斯就埋葬在群山之中,但中国人不能忍受开棺合葬。罗马天主教会也拒绝允许新教徒的遗骸在他们的墓地里长眠。因此,英国商馆的委员会买下了一片土地,耗资1000英镑,作为新教徒的安葬处。马礼逊夫人的遗体被人们恭敬地安葬在这里。

对马礼逊来说,这一打击如此突然,使他饱受丧妻之痛,那种凄凉的感觉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似乎被击垮了。他在身心两方面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过程。后来,在他勤奋地履行他的公职的同时,他以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投身于《英华字典》的编纂。他的对外联系仅仅限于几位至亲好友,书信洋洋洒洒而又内容博杂。如公务需要他留在广州,他就把儿子带在身边,女儿则托付给他在澳门的好友李文斯顿夫妇照看。他打算一有便利的机会就把两个孩子送回英格兰。

作为一名译员和外交人员,马礼逊的语言技巧和处事手段,在他抵达广州时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因为当时在英中当局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执(a fracas),原因是一艘英国军舰上的几名军人登上了靠近中国海岸的伶仃岛,目的是为了补给淡水。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还

是遭到一群中国人的袭击,有几个人负了伤。英国人从军舰上派了一队人去保护自己人,双方争斗时有两名中国人被杀。当地政府要求捉拿凶手。按他们的说法,应该把凶手引渡给中国,按中国法律对凶手执行死刑。但英国方面否认在本案中有任何人有罪,拒绝了这一要求。英中双方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结果两国贸易中断,两国关系陷于僵局。在广州的英国商馆被迫关闭,商馆的人员和物资也被迫撤到了船上,还出现了一些对英商不友好的举动。一些中国商人对事态的发展深感遗憾,他们想方设法劝英国人稍稍做些让步,尽最大努力以结束这场不幸的纠纷。他们甚至建议舰船的指挥官,要他们说他们中有两个人从船上失踪了。因为那两个人就是凶手,所以也无所谓引渡可言了。英国人不愿意让这件事像一个荒唐故事一样就此罢了;但他们的尊严又不允许自己承认这个案子是因英国人出于自卫而杀死两个中国人引起的。英国人不会做任何让步,特别是不会引渡他们的人,让他们被绞死,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如果他们投降,肯定会遭此厄运。结果那两个月,英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既烦琐不堪又令人厌倦的公文磋商,最后双方以妥协告终。于是英中重建友好关系,恢复通商。在此前提下,英国政府才开始全面检查这场群殴(Melee)发生的原因。马礼逊先生在双方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詹姆斯·厄姆斯顿先生(James Urmston)就此事件提交的一份报告的结论部分,有这样的话:“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卷入了一场与在中国人的交往中最棘手、最烦心而又让人焦虑不安的谈判。在谈判中,马礼逊博士一直坚持不懈,尽心尽力。他在文字和交谈两方面对中国语言广泛而精深的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体系、性质和机构设置的熟稔,使他能够清楚而完整地理解中国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意图,也使他能够察觉官方文书的误记和与案子不相干的提法,甚至是对文件的篡改。这些都不幸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地方当局的官方文书中,也出现在广州商行的商人的言谈和看法中。而商行常常是政府和外国人之间交流的中介。马礼逊对中方文书的准确理解和洞察,证明他对东印度公司特选委

员会极其具有重要性,他使特选委员会能撰写在格式、语言和态度上得体的致中国人的文书和通报,去面对和抵制广东巡抚及其同僚们的傲慢言论和狂妄自负以及非分的要求。这些文书由马礼逊博士译成措辞得体的中文,决不致使中国政府产生误解,哪怕是假装出的对东印度公司代表的看法、观点和决定的误解。这种情况在与中国人谈判和讨论的任何时刻都是非常重要的。马礼逊博士的杰出才华和勤奋敬业受到那些与此事利益相关的人士的充分理解和赞赏,他在这件事上和在此前许多事情上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回到了它们平常的停泊地,贸易又回到了正常轨道。马礼逊博士也筹划着让他的两个孩子回英国的事宜。他女儿由马洛尼夫妇(Maloney)照料乘“肯特号”(Kent)船回国,她从马洛尼夫妇那儿得到了父母般的关爱。他的小儿子在外科大夫迪尔先生(Dill)的监护下乘“阿拉斯”号(Atlas)返英。考虑到孩子们的远行,马礼逊在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孩子们一路上受到良好的照顾,我希望他们回国途中平安。但我首先希望他们学会敬畏‘时间’(The Lord betimes)——这就是智慧。”

现在,马礼逊博士住到他在澳门的冷清清的家中。他尽全力恢复他的传教工作和《英华字典》的编纂。然而,马六甲传来的消息却让他吓了一跳。消息说,他最欣赏的米怜博士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这似乎表明,随着米怜先生肩上的担子不断加重,他的健康也完全垮了。两年多来,马六甲的传教事务几乎全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和政府商谈,监管教会的房舍建筑,编辑《印支搜闻》(Anglo-China Gleaner)杂志,在英华书院授课,翻译劝世小册子和书籍,还要按时布道。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和撰写宣讲基督教的书籍。他在《旧约》的翻译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述及,但除此而外,他用中英文写了不下15种劝世小册子,每种小册子的篇幅在20页到140页不等。除了一部从《使徒书》到《以弗所书》的完整评注外,还有一种两卷本的精选读物,题为《灵魂篇》(Essays on the Soul)。他用中文撰写并发表了一些小册子,其接受程度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被采

纳程度,一时无出其右。

米怜逝世前不久,对他勤奋工作的成绩作过回顾。他这样说:“按我的能力而言,我是做不了这些事的,而且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还要照顾和挂念我的家人。但我不揣微末的希望,它们在现在和将来能对上帝会(Church of God)有所助益。但是,当我正视这些事情时,当我联想到这些事情本身乏味而又枯燥的特点以及我的行为方面的缺失时,我愿意用先知的语言说:‘非常丰富,但也非常乏味’。它们几乎都显得是陈腐之作。我是多么难过呀!我多么悲哀呀!我的死去的灵魂!主啊,让它像你一样,这样便会在我的全部劳动中注入生气!”

这样繁重的劳动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部分痊愈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危险的预兆。大量吐血显示他肺部患病,但随后确诊他的肝部才是病源。他乘船去了槟榔屿,希望在那儿恢复健康。但是,这次迁居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精疲力竭地回到马六甲,只想在自己的岗位上鞠躬尽瘁。在马六甲,他平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平静地升入天国,与他的忠实伴侣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他把四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托付给了上帝。1822年6月3日,他曾从槟榔屿写信给新近丧妻的友人马礼逊博士,以下是马礼逊的回信:

“我收到了你从槟榔屿寄来的信,为信中让人难过的消息而深感遗憾。哦,上帝会拯救你的生命,恢复你的健康!我现在正在服丧期——主啊,怜悯我!一个无用的仆人!”

117

“阿兴从广州来信了,说他已经悔悟到自己的罪过,希望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来洗刷他的罪。他问自己能否受洗。小伙子亚三(Asam),就是比阿兴小的那个,似乎理解了福音派的要义,他说他相信福音。即使这里面没有多少真诚的成分,我也希望阿兴是真诚的——他总是太傲慢,是一个自负的读书人(Tuh-shoo-jin)——说他现在悔罪了,希望获得拯救。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生性淡泊。如果他现在真的盼望获得救赎,那是上帝乐于把一些成果赐予微末的我的微不足道的劳动!哎呀!我真担心你拿到这封信已经太晚了,我

恐怕你已经等不及看到我的信了。”

这封信的确到得太晚了。6月2日,这个受神圣力量的驱使,历经磨难,已经学有所成、事业有成的传教先驱,这个年方37岁、来自苏格兰山地的牧羊人,被上帝召唤入永恒的居所。

从5月24日米怜从槟榔屿回来的那天,所有见到他的人都已明白,他勤劳而成就丰硕的一生即将走到尽头。但可以确信,无论对异教徒还是对未来的传教事业都极有益处的几项工作已经启动。他真诚地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些工作,但情形似乎难遂人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除了交代他自己的事情或者他所负责的书院事务以外,他很少说别的。对他来说,谈论这些真是太痛苦了。临终之际,他表达了对通过耶稣的神性大德来拯救人类的坚定信念,神情显得比患病以来的这段时间要轻松好多。他的友人以为这是因为他身体有所好转所致,其实这是回光返照。因为不一会儿,他就静静地撒手而去。他的遗体从英华书院运往荷兰人的墓地,埋葬在他早已为妻儿修好的墓地。出席葬礼的有当地人士和外国人士、政府官员、外国使节、荷兰教会人士以及马六甲大部分上层人士,还有数百位华人和马来人也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马礼逊博士准确地总结了他的人品:“米怜博士天性非常热忱、率直、果敢,易被感染。他弃恶向善之后,依然保持了他的热情和率直,只是转向了新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目标。现在,他完全确信传教事业是上天的事业。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它的进程。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忠诚奋斗了10年,最后因艰辛而成就卓著的工作而鞠躬尽瘁,以身殉职。”

马礼逊博士此时正在考虑重返英格兰,目的是探访老友和亲戚,享受他理应享受的休假。但米怜先生的死讯使他放弃了眼下休假的打算,决定改去马六甲,安排传教和英华书院将来的工作。出于怜悯之心,他还决定将和自己同名的小罗伯特·米怜当做自己的孩子,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拥有正常的生活,接受教育。

这一年的11月份,广州城西距欧洲人商馆大约一英里以北发生



了一场火灾。大火熊熊燃烧了数天之久，烧毁了商馆以西一英里半的所有建筑，直到一切都化为瓦砾，大火才停熄下来。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店铺和房屋被毁，数百万英镑的财产毁于一旦。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估计在 100 万英镑左右。因为在大火、恐慌和踩踏以及盗匪的残忍劫掠中，无数人丧失了生命，情形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对马礼逊博士来说，这一意外事件使他在大火中失去了大部分财产，特别是价值 100 磅的纸张。这是他准备运到马六甲用来印刷新版《新约》的。

1823 年 1 月 17 日，马礼逊博士离开广州前往马六甲。当月 29 日，他在新加坡上岸，然后到达马来群岛新建的一个英国人定居点。在那里，他受到中尉总督——莱佛士爵士的热情款待。他们俩彼此志趣相投，为了殖民地和马来群岛人民的福祉，他们在马礼逊访问期间，认真地商谈了几个项目。商谈的结果是决定在新加坡建立一个类似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机构，由于马六甲定居点是在荷兰当局的管辖下，他们决定要以“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e）的名义，对两家进行统一管理。他们召集定居点的重要人物来开会，把这一计划提交给他们。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方案，即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继续按它现有的专门学科进行教学，而新设立的新加坡书院则设立英华书院所没有的分支学科。接着便是对书院认捐，数量不拘。马礼逊博士被任命为副院长，他还认捐了 1500 多美元。除了花费大量金钱以外，还要花更多的钱用在政府划拨的那块土地的清理上。2 月 1 日，他抵达马六甲，发现所有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生气勃勃。他说：“英华书院和当地学生让我非常满意，这些华人青年们已经能按路德的调子唱第 100 首赞美诗了。它的中文歌词是由我以前的助手高先生作的。看到我亲爱的威廉充分利用了我的中文藏书和我捐助的款项，其信教自由也没有受到官方的干扰，我心头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愉悦感。哦，我是多么地欢快！”马礼逊任命 1822 年受伦敦差会之遣来中国传教的高大卫神父（David Collie）填补英华书院的主管空缺，高大卫神父在学习中文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直到他 1828

年辞世为止,高大卫先生以其超凡的才能圆满地履行了其职责。

1823年在马礼逊博士的一生中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英华字典》出版了,这是他生命中的伟大成就,他为此奋斗了16年。为了编纂这部字典,他积聚了约1万卷中文图书,现在,这些藏书被东印度公司以1.2万英镑售出。《英华字典》是4开本6大卷,每一卷的尺寸和家用《圣经》相当,有4595页,收录了4万个中文字。完成了如此惊人的著作,马礼逊的名字广为人知就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了。这部字典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得到了一致的公认,赞誉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德累斯顿的蒙杜齐博士(Dr. Montucci)是一位博学的东方学者,他说:“我很坦率地说,马礼逊博士花了10年的时间出版的这部多卷本的字典,对欧洲学者的作用远胜过上个世纪所有传教团印制的著作和手稿。”巴黎的雷慕沙博士(M. Remusat)说:“马礼逊博士的《英华字典》比起任何同类著作来说,其优越性都是无可比拟的。”这部字典,几乎既可以当做一部字典,又可以当做一部百科全书来使用,它包括了有关中国的传记资料、历史和民族风情、礼仪和国家制度的评介,是一部汇集了有关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文献的最丰富的资料的工具书。

马礼逊在1823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阿发,我们亲爱的米怜为其洗礼的阿发,已经使他的妻子皈依了基督教,他还打算让他的小儿子也受洗。”在20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今天,梁阿发,我们的中国同道,把他的儿子梁进德(tsin-tih)带了来,让他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下受洗。哦,这个小小的基督教家庭可能是在这片异教土地上传扬真理的工具啊。”

马礼逊觉得现在是他可以实现他一再推迟的回国探亲的愿望的时候了,他想和他远方的亲戚们相处一段时间。因此,他致信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我在中国待了16年,一直伏案工作,翻译、编纂中文字典及其他著作,现在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因缺乏锻炼而大受影响。我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请求公司董事会慨允我回英格兰探亲。我打算和阿尔萨奇上尉(Alsage)乘‘滑铁卢号’(Waterloo),在

1823年12月底离开中国。计划在1824年12月底离英,经孟加拉湾返回中国。这样,我希望在1825年8月恢复我在商馆的职位。

“为了让英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学,我设想,把我收藏的数千卷中文藏书运回英国。我请求公司特选委员会允许我将书带上‘滑铁卢号’,我希望得到特选委员会的准许。另外,如果特选委员会同意在我离开期间给我一点津贴的话,那我到达英国后生活会方便一些,也算是特选委员会对我的恩惠。”

特选委员会愿意满足他所要求的一切。马礼逊在1823年12月初乘坐东印度公司的“滑铁卢号”启航,于1824年3月抵达英格兰。与他同行的有一个中国仆人,这位仆人已经伺候他多年,已经理解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马礼逊离开中国时的一个深切遗憾是在他离去后不能另有一个传教士继续他在广州或澳门的传教。他急切地恳求英美的教会团体为他任命一名助手,在他死后可以继续他的事业,但传道会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他只得任命梁阿发担任福音派的宣教士。8年来,梁阿发坚持虔诚的忏悔,现在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受委任在广州他的同胞中开展宗教活动。

## 第十一章 在英国的工作

158

我从未拥有如此完美之爱，  
从同一个根，同一个茎中生长，  
不结饱满的籽实，只会开花  
慵懒地隐逸在生命的冠冕上：  
它应该不停地生长，像东方的树  
枝枝杈杈生长蔓延；  
爱某个人，而不能博爱一切人，  
不过是一件不足道的事情。

——洛威尔

马礼逊博士，以他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献身精神和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博学，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这种声誉使他在抵达英格兰时受到各界人士、许多慈善和学术团体的热烈欢迎。然而，他随身携带的大量中文图书一到，麻烦和烦恼也就来了。正如先前他离开中国时向英国当局所说的，他的目的是把这些书带到英国，赠送给几个公共机构。通过这些图书，可以激发人们学习中文的愿望。这是一批

极其珍贵的中文书籍<sup>①</sup>，有些书还是罕见的珍本，非常值钱，以至于马礼逊博士为了收集这些书花去了2000多英镑。其中很多书得之非易，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严禁本地人把他们的书籍卖给外国人。马礼逊打算就这批书陈告财政大臣，请求他免除对这批在国外收集到的珍本书原本要征收的关税。要作出这样的特许，必须考虑到诸多重要的反对意见。马礼逊博士忧心忡忡地等待了一段时间，才得到通知，要由预定接受这批图书的公共机构提出申请，这批书才能获准免税进入英国。这真让他忐忑不安。马礼逊没有找到接受这批图书的公共机构，他也不准备像海关要求的那样支付大笔款子，使这批书放行。回顾整个事件的发生，坚持要对捐赠给公共机构的一批图书征税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这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是一种基于集体名义的个人之间的联合行为。至于要他下决心支付关税，真让他沮丧极了。当时有一群绅士，特别是他的老友乔治·斯当东爵士在内阁大臣们面前就此事竭力进言，才使得这批书获准免税入关。这批书一直存放在伦敦差会名下的一间屋里，直到这些书得到了妥善保存为止。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与此同时重要的是，马礼逊博士被引见给了国王陛下。乔治爵士以这样的语言向马礼逊简要通报了这一消息：“温先生(Wynn)非常高兴地答应，星期三由他把你引荐给国王。他还要和皮尔先生(Peel)商量把你的《圣经》中译本以最佳方式呈献给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便和你同往了。但你是一个陌生人，温先生希望我能陪你，以便保证你能准时和他见面，这是我乐意效劳的。因此，按照我们约定的，我星期三一点半钟到伯纳斯街接你。”

到了约定的时候，马礼逊在乔治·斯当东爵士的陪同下在王宫早早上觐见英王。他被引到英王面前时，英王陛下向他致意的方式

<sup>①</sup> 有关马礼逊藏书，读者可以参阅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一书，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版。——译注



图 29 中国书商

表明,他非常了解他的品格和他在公益事业方面的价值。英王很高兴地接受了《圣经》的中文本——《神天圣书》和一幅北京地图。这件事在下面引用的函件中得到了证实。第一封信出自尊贵的皮尔爵士,他当时任内务大臣,后来出任首相。另一封信出自萨姆纳博士(Sumner),他后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致乔治·斯当东准男爵,以及各位

我亲爱的爵士:——把中文版《圣经》进呈给国王陛下时,我没有忘记向陛下提及,马礼逊博士在东方传播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所付出的非凡的、功勋卓著的努力。 156

陛下责成我通过阁下传达他对马礼逊的嘉许,对他以往富有成效的劳动深感欣慰。

我亲爱的爵士,做您最忠实而谦卑的仆人,我深感荣幸。

罗伯特·皮尔

1824年4月12日,于白厅

致神学博士马礼逊牧师等

先生:我奉英王陛下之命,向阁下传达陛下的嘉许。阁下通过皮尔先生向陛下精心进呈的中文版《圣经》,陛下留有深刻印象。

陛下高兴地指示敝人对其加以特别关照,使之作为皇家图书馆中一个重要的、极珍贵的新增藏品。

先生,我深感荣幸地做您谦卑而忠实的仆人。

图书馆员 查尔斯·R. 萨姆纳

1824年4月14日,于卡尔顿宫

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也用如下极尽奉承的辞藻把马礼逊先生介绍给公司董事会。这表明,所有有关马礼逊和公司的公务往来将不利于公司的商业利益的担心都是毫无根据的:

“1823年12月5日,我们不能允许马礼逊博士从他工作了16年、并对公司重大利益有突出帮助的位置上离开,而不就他在中国工作的重要意义、他的能力和他的品德表达我们的心声。我们相信,如蒙允诺,我们会把马礼逊博士引荐给尊贵的董事会,敦请诸位先生考虑。”

167

这封信由特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签署。后来,马礼逊又收到了董事会礼节性的致意函以及董事会成员个人给他的致意信。董事会允许他在休假期间享受半薪,并邀请他参加社交宴会,作为对他的一种嘉奖。在宴会上,他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许多著名人士。马礼逊的社交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他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享受与朋友们之间的私人交往。只要能从伦敦的那些强加于人的聚会中分身,他就回到他的故乡诺森伯兰郡纽卡斯尔,置身于热情款待他的亲朋好友之中。4月18日他抵达故乡,在安息日向济济一堂的听众讲道,当时有数百人聚集在会场外聆听他的讲道。23日,他前往爱

丁堡看望他的爱女,又由女儿陪伴回到纽卡斯尔。为了让儿子和他一起去伦敦,去出席5月份各慈善团体和宗教团体举行的各种会议,途中他又去了一趟曼彻斯特。地方官员们来拜访他,请他出席当地的欢迎会。一位仍然健在的德高望重的老人,还清晰地记得马礼逊先生重访纽卡斯尔的情景。这位受人尊敬的J. C. 布鲁斯牧师拥有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头衔,他回忆马礼逊拜访他父亲时谈到马礼逊先生的外表,他说:“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皮肤黝黑、有一头卷发的英俊男子。”布鲁斯牧师还藏有一本马礼逊译的中文版《圣经》和一本《英华字典》。

关于这次访问,马礼逊在致斯当东爵士的信中写道:

“我在该镇受到的款待像我可能想像到的一样友善。对我而言,重访这里的街衢和田园是有趣的……这是30年前,我,一个胆小羞怯的少年曾经快乐地生活过的地方。”后来他在回中国的途中给他的侄女写信,描述了他旧地重游的体验。他说:“重访少年时代曾经生活的地方让我兴味盎然。圣约翰教堂、福思河、少女巷、河畔,对我而言,都是曾经让我快乐的地方。现在肮脏的采煤传送带破坏了那里的景致,已经不能在高高的河岸上和河对面的风车山上进行有益于健康的漫步了。无论冬夏,早晨四五点钟,我都要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地方散散步……但是,唉!现在一切已无复旧时模样。圣经、祷告者、安息日,还有上帝的子民的集会,那时我倾心的快乐时光都不会重来了。但这儿有一个美好的国度,汉娜,在中国,我可以重温在英格兰的这一切。”

来自英国各地、代表不同传教团体和机构,请他前去布道和讲演的邀请弄得马礼逊难以招架。他不得不恳求他的友人们更多地体谅他的能力和精力。无论他在哪儿出现,都会受到衷心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中国对福音真理的需要得到了更充分的认识。他还出席了几个主要宗教团体的5月集会,其中包括伦敦差会、大不列颠和外国圣经公会、劝世小册子祈祷书和布道会(The Religious Tract, the Prayer Books and Homily)以及公谊会伦敦分会(Part of London Society)。由



于他在中国的工作，马礼逊和这些团体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这种联系越紧密，他呆在英国的时间也就越久。在这次集会上，有关马礼逊博士及其工作的重大意义和他不事张扬的谦逊品格都受到了热烈的称赞。T. S. 格里姆肖牧师后来记述了一件发生在“圣经公会百年纪念会”上的趣事。他说：“那天，马礼逊博士因在济济一堂的尊贵听众面前向泰莫斯(Teighmouth)主席朗诵中文版《圣经》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中文版《圣经》是由马礼逊博士和后来的米怜博士共同完成的。这一工程据说是近20年辛勤劳动和潜心研究的成果，恰好可以当做对基督徒的虔敬和不屈不挠精神的绝妙纪念。我从未淡忘那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场合。马礼逊博士站在台前，手捧那珍贵的典籍。他的身旁站着他年轻的儿子。他被带上前来时，就像另一个汉尼拔，他并不是要对他祖国的敌人发誓，而是要在圣经公会的圣坛上要他们归顺于主，分享天父拓展他的永恒王国的荣耀……”巴特沃斯先生(Butterworth)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这是距今好多年前的事了，在访问大英博物馆时，我经常见到一个年轻人，他显然全神贯注在他的学习中，他阅读的书的语言和文字我全然不知。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请他原谅我的无礼，然后冒昧地问他，如此吸引他注意力的是什么语言。他答道：‘是中文。’‘你懂这一种语言吗？’我问，‘我正在努力掌握这门语言，’他谦逊地答道，‘但学起来很困难。’我问：‘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欧洲人的能力和勤奋来说，要掌握这门语言其困难几乎是不可克服的。’‘我很难说清我的动机，’他指出，‘我只知道我的心中有某种强烈的、难以描述的冲动在起作用。我想做一个试验，看看由于人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人们能否掌握这种语言。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只有时间能渐渐使之揭晓。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出掌握这门语言本身之外的目标。’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看到了一项事业的萌芽，就像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见证的是那一事业的完成，如此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却导致了这么重大的成果。那天在我眼前的这位尊贵的人，受上帝意旨的召唤，为了唤醒整个人类中如此众多的一群人，为了把他们带到福音真理的统

领下而在努力着。”

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都耗在访问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各地了。马礼逊还希望激发起人们对中国和东方各国精神状况的浓厚兴趣。他顾不上休息,全身心地投身于解说对异教国家进行规劝的必要性,敦促各个基督教会恢复向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国家传播福音的努力,使这些国家皈依基督教。他不知疲倦地努力的成果是唤醒了人们对迄今为止知之甚少的东方国家社会状况和宗教状况的浓厚而广泛的兴趣。几个虔诚而前程远大的年轻人受到吸引,投身传教事业,他们后来都在东方国家传播福音的事业中成为成就斐然、声誉卓著的人。英国各大城市还成立了协会,帮助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工作。遍及英伦的传教精神蓬蓬勃勃地兴起。马礼逊博士说,那几个月来,他“大多是在公共马车和旅馆里度过的”。他的信都是寥寥数语,匆匆写就,而他的生活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约会组成的。为了增进人们对中国和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了解,他渡海前往法国。乔治·斯当东爵士和其他友人写信给巴黎的一些名流,向他们引荐马礼逊。在前往加来的海上,他遇到了威廉爵士和本廷克夫人。他们给了他很大的照顾,带他去自己下榻的饭店,为他在巴黎停留期间请了一个讨人喜欢的向导和翻译。本廷克夫人颇具同情地听取了马礼逊对在东方各国进行基督教启蒙的看法。后来,本廷克夫人的丈夫出任印度总督,她则满腔热忱地致力于利用她的影响来促使知识和宗教更有效地传播。

在巴黎,马礼逊会见了不少人,如:洪堡男爵(Humboldt)、雷慕沙先生(M. Remusat)、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德·斯达尔准男爵(Bart. De Stael)、萨奇先生(M. de Sacy)以及其他著名的法国文人,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他被引荐给亚洲协会(The Asiatic Society)、国民协会(The National Society)和其他团体。转回英国时,他非常满意自己已经让东方各国的道德水平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从法国返英途中,他赶往爱尔兰,途中在巴斯、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对济济一堂的听众做了讲道。在爱尔兰,马礼逊所到

之处都能引起巨大的宗教热情。在都柏林，他做了两次讲道，出席了四次集会。在这些集会上，和在爱尔兰的所有集会上一样，各种宗教派别，包括国教教会、互相敌对的教派都一致向他致敬。他在罗登伯爵 (Earl of Roden) 的塔利莫尔庄园住了两天，随后前往贝尔法斯特，在汉娜博士的教堂布道，从那儿他又去了巨人堤道 (Giant's Causeway)，欣赏绝妙的自然景观，然后再乘汽船渡海去格里诺克。

在苏格兰，他访问了格拉斯哥、爱丁堡和珀斯，就他伟大的事业四处演讲、布道。他又北上阿伯丁，去看望米怜博士的孤儿，他们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严肃地要求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当做兄弟姐妹相待。在苏格兰，像他访问过的巴黎和都柏林一样，对他的工作极尽赞美和推崇的言辞铺天盖地而来。在许多社会名流的邀访中，有一封信来自瓦尔特·司各特爵士 (Walter Scott)，他邀请马礼逊到阿波茨福德和他见面。然而，对这一盛情，还有其他许多邀请，他都不得不婉言谢绝。

金伯勒爵士 (Kingborough) 向英华书院捐赠了 1500 英镑，并向英华书院的图书馆赠送了 300 卷珍本图书，这使马礼逊深受鼓舞。乔治·斯当东爵士也捐了 200 英镑，他此前还向该书院慷慨捐赠了礼物。不列颠及国外圣经公会拨出了追加的 1000 英镑，用于《圣经》的流通，并授权马礼逊雇用代理人 and 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在他需要他们帮忙时——以便有效地开展工作。为了促进马礼逊心中念念不忘的众多计划的实施，许多人主动提供了赞助和帮助。

对于他丰富的中文藏书的归宿，马礼逊的焦虑日益增长。那些书当时还堆放在伦敦差会里。他曾经想劝说一所著名的国立大学设立中文教授一职，接受与之相关的这批藏书。但这个希望至少两代人以后才能实现。英国的学者和宗教领袖至今为止还没有准备采纳或具体实施这位中国传教士心中为中国的未来勾画的远景。这批藏书的处置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最后，伦敦的大学学院 (College University) 委员会以藏书可被各个教派的学生自由使用为条件，接受了这批藏书，建立了“马礼逊藏书室” (Morrison Library)。

一个星期日,马礼逊在沃博上的教堂讲道,他在讲道中回忆了许多深藏在心中的往事。时已高龄、德高望重的沃博士也在场,他后来告诉马礼逊,他理解和赞同马礼逊所表达的每一种情感。如果他能得到马礼逊讲道的副本的话,他会把它印出来。

各宗教团体和马礼逊博士一起,就在东方传播福音的现存方法中,哪些是最佳方法以及可以采纳的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了探讨。马礼逊提出的在东方传播基督教的建议,是像此前建立的一些大项目一样,建立一所他所称的“语言学院”。这一计划可以表述为为了让神圣的真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应该借助于一个“以促进人类所有语言的学习和交流的团体,为那些为了在各个层面上把基督教的知识引入异教国家而离开自己祖国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马礼逊受伦敦差会、圣公会、浸礼会和美以美会的敦请,就此计划写了一份呼吁书。而东文书社则在罗登伯爵、卡尔瑟普(Calthorpe)和贝克斯利公爵(Bexley)、乔治·斯当东爵士、莱佛士爵士、英格利斯准男爵(R. H. Inglis)、威尔伯福斯先生(W. Wilberforce)和其他许多著名的慈善家的大力赞助下开办起来。他们在霍尔本找到了一幢适用的楼房。东文书社的事情开始着手进行。马礼逊博士同意东文书社使用他的藏书和收藏品,还开办了为期三个月的系列中文讲座课程。13名学员饶有兴趣地聆听了他的讲座,其中有4人自愿担任基督教传教士,投身到马六甲和印度群岛的传教事业中。人们热情地找他讲演和布道,他们相信他的讲演十分重要,以致他因此把在英国的停留期延长了一年。他开办了青年男女的学习班,就他们有关在异教国家传教生活的问题进行指导。他深信,除非依靠基督教妇女的力量,否则东方国家的女人就不能提高地位和受到尊重。这一信念是他对已婚妇女不得抛头露面的观察的结果。从她们结婚的那天起,这种戒律就伴随着她们的一生。对一个中国姑娘来说,婚约一旦订立,就要批八字、算命,要动用各种不可思议的手法(Magic Arts)来选择良辰吉日。为了确保大礼在吉日举行,有时要等待几个月。婚礼那天,各种贺礼堆满了新郎和新娘的家。合卺之夜,抬花轿和提着

灯笼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去迎娶新娘。新娘到了夫家，要跨过放在门槛上的火盆才能进屋。从这一刻起，中国妇女就被断绝了社会交往。她的主要乐趣除了操持家务以外，就是留意各种敬神拜祭，吃斋念佛。马礼逊博士早就意识到了聘用信仰基督教的妇女的重要作用，只有她们才能接近东方妇女的心灵并影响她们信仰福音。

自从马礼逊回到中国后，东文书社就没有能一直办下去。但在1828年学校停办之前这段短暂的办学期间，几位杰出的传教士已经做好了胜任他们伟大事业的准备工作。撒缪尔·戴尔(Samuel Dyer)在槟榔屿传教了16年，卓有成效，证实他们夫妇通过马礼逊博士的讲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们可以在抵达后六七个星期内就能和中国人交谈，戴尔先生当时就用中文讲道，即以中国人能够理解无碍的语言布道。

因为马礼逊博士决定滞留英国较长时间，所以他搬到位于哈克尼的一处较安静的宅子，然而每周在东文书社讲三次课，另外三天在自己家中教一个女子班，这些女士学习语言是为了进入传教这一行。马礼逊博士也出席了很多人集会，在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的语言、宗教和哲学，还出版了两三本这类主题的著作。事实上，即使最强壮的体格也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工作，也不能把弦绷得这么紧，所以，马礼逊先生因尽忠职守而患病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他的病情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他被说服接受主人的一再敦请，到汉普郡的雷庄园(leigh Park)和乔治·斯当东爵士小住数日。他在这个宜人住处并未住满一周，但已经算是他在英国的两年中所能享受的最长的假期了。其间，他被迫放弃了其他社交活动，只是暂时离开了繁忙的公务，匆匆造访了剑桥的威尔伯福斯先生和西缅牧师(C. Simeon)。

伦敦差会授予他荣誉称号，任命他为差会的董事之一，虽然这有违差会的原则。皇家学会也自发地选举他为皇家学会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同所有那些事业有成的公益事业家一样，他也不得不忍受来自一些团体的冷落和漠视以及来自他人的批评，以致报刊上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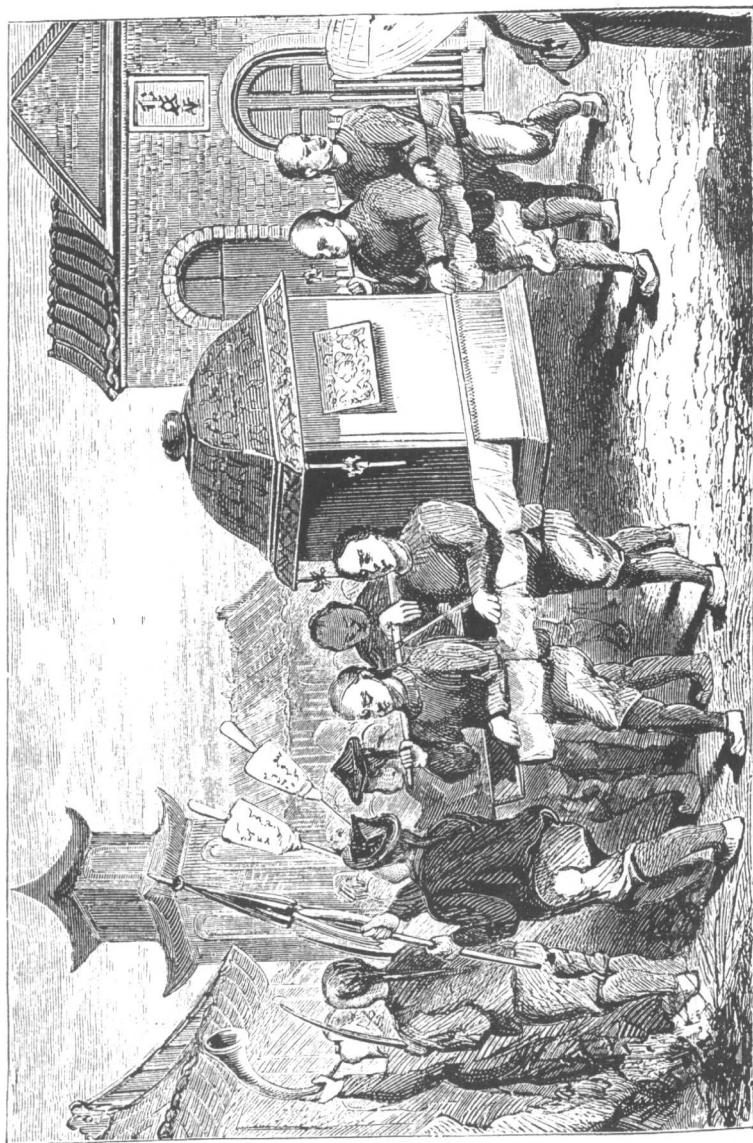


图30 中国人的迎亲队伍

一篇文章,该文以同情的口吻,列数了马礼逊为这个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篇文章的一些章节表达了他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和一名传教士的价值的普遍看法。“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一个博学的才智之士,他把自己奉献给了宗教事业,在今天却被列为第一流的信奉受蔑视的拿撒勒人信仰的异教哲学家——而被其同道蔑视和不满。如果马礼逊博士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是源自于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专家,这些博学之士博学到连孔子和基督谁更高明都无法分辨,那么,这个世界还有谁相信,一直以来在各种评论、杂志和报纸上,遍及文明世界的对他的赞美?……既然我们必须很快作出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就必须回顾他所做过的一切。中文已经学成,中文的劝世小册子已经写就,《圣经》已经译成中文,中文语法和字典也已经编讫,4开本整整6卷;其他几部书也已经用所有语言中最难懂的这门语言写成或译完;一所学院的庞大计划已经拟就并开始付诸实施。所有这些都是马礼逊的多方指导下、由马礼逊博士及其同事们的辛劳而完成的。但凭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吗?为什么,我们把文人奉为最出色者之列,我们把约翰逊博士称为‘文学巨擘’,伟大的英语辞典编纂家,在我们心中他当然堪当此盛誉。我们尊敬那些把《圣经》译成他们或我们的母语的学者,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公正而已。如果我们声称希望拓展基督教甚至是文字的影响,我们又不尊重、不关心甚至没有合作之心去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把基督教的一套体系传给了外国人,并用世界上最伟大帝国的语言把《圣经》的全译本带给了当地人,那么我们所做的将是多么的不公正。”

在英国居留期间,马礼逊娶了来自利物浦的伊莱扎·阿姆斯特朗小姐(Eliza Armstrong)为妻,后来证明这是一位最温良的、与马礼逊志趣相投的伴侣。1826年初,马礼逊打算和她及孩子们重返中国,他计划把他们培养成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接班人。一些著名学者和慈善家纷纷给他来信表示惜别和祝福。慈善团体举行集会,祈祷上帝保佑他,并向他致以感情诚挚的良好祝愿。从评论家亚

当·克拉克博士(Adam Clark)的来信中摘引的一段,可以视为许多友好交往的一个代表。就他的《圣经》评注一书,克拉克说:

“你一定要满足我的愿望,否则你就会让我烦恼。很久以来,我一直打算请你把这部书的一个副本收入你的藏书。我很抱歉这部书不是大开本,但它已存世无多——这部书已绝版很久了。出于对你的劳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及对你个人魅力的喜爱,我把此书赠送给你,我已经把书精装了一遍,只是书装订时总会有损坏(有些书例外),比如纸张背面的墨迹还没有干透,会蹭到后一页上。在你摘记的结论部分,你为我祷告,抵得上我的1000本书。我借你的话回赠我对你的祝福:‘愿主的力量加于你身,加于你的家庭和你辛勤的劳动。’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以为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孩子。我曾经把他们抱在膝上,亲吻他们,抱着他们。从我初见到他们至今,已经几年过去了,他们可能已不记得我了;但请告诉他们,他们还拥有一个老人的护佑和最真诚的祝愿。等你们远行时,上帝会和你们同在,让你们心安。阿门!”

根据惯例,马礼逊把他重返中国的打算通知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请求董事会准许他仍可担任他在商馆的旧职,并准许他的家人与他同行。要等接到董事会对其申请的正式答复之后,马礼逊才开始为远行做最后的准备,但他没有料到公司会对他的请求有所保留。因此,当他接到公司的通知,得知他已获准重返公司为公司服务,“为期三年”,但他的两个孩子却不能和他同行时,他大为吃惊。马礼逊只能以尽可能礼貌的态度就这一无礼的拒绝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行政当局他已经在中国为公司服务了16年,表达了他连一点小小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的失望之情。对于这一申请,东印度公司几个星期也未予以答复,几个星期后,马礼逊收到通知,说只要两个孩子已长大成人,他可以随时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这才使马礼逊免除了与骨肉再次分离的痛苦。

告别仪式在霍克斯顿的小教堂举行,有许多著名的牧师出席。年高德劭的沃博士也到场了,令人十分感动。马礼逊博士发表了感



人至深的讲演,他说:“我们这些将要去到异教王国、试图使其人民摆脱异教束缚的是些什么人呢?我们没有从国王和王储的手中获得任何权势。我们既不能言善辩,也没有外交手腕或诡辩之才。我们不是善于辞令之人,如果我们有这些能耐,我们也会声明放弃对它们的依赖。我们所依赖的是上帝的出现,他对摩西说过:‘现在,去吧。我将赐予你口才,教你说什么。’上帝的出现是我们的希望,因此我们说:‘如果你的出现不与我们同在,从此就不能率领我们。’”他总结道:“让我们追随基督,沐浴在基督的爱和仁慈中,追随基督,让这一切永驻在我们心间。那么,我们无论身在任何地方都像是在家里一样。再会吧!”

1826年4月21日,马礼逊和他的妻子及孩子们在一群友人的陪伴下,前往格雷夫森德。他计划乘坐“奥威尔号”(Orwell),这是一艘因为其膳宿水准较低,所以不被水手们看好的船,但该船船长笃信基督教,而马礼逊博士宁愿选择意气相投的旅伴,而不太在乎住宿和饮食。然而,该船延宕至5月1日才抵达格雷夫森德。在等待启程的日子里,马礼逊高兴地收到了他最可信赖的老友乔治·斯当东爵士的礼物,一件漂亮而且价钱不菲的墨水台。对此,他这样答谢:“我收到了你赠送给我的这件精致的墨水台,上面镌刻着你的名字是我的莫大荣幸。20年来,你在中国和英国一直屈尊俯就,施惠于人,我虽然人微言轻,但我可以说,你一直都让我感受到你的友情。这件作为临别赠礼的墨水台,我会当成善意的关怀好好保存在家里。亲爱的乔治爵士,为了你的好意,为了你对我们神圣宗教事业的切实帮助——通过我,上帝谦卑的仆人所给予的帮助,也为了在我们临别之际你所表达的深厚友情,请接受我对你的由衷的感谢!愿上帝——我们的救世主保佑你!”

马礼逊在一群忠实的老友的陪同下前往格雷夫森德。他说:“今天11点左右,一群老友、伯德兄弟神父(G和H. Burder)、汤利(Townley),还有其他人,跪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以他的仁爱照拂我们。从‘奥威尔号’的船舱往外看,毗邻的还有另一艘前往中国的船

‘哈里斯将军号’(General Harris),她将会在我们的船之前启航。弗雷泽爵士(W. Fraser)在那艘船上,他是我的老熟人,准备出任我们英国商馆的馆主。”

6月24日,船还在航行中,船上的水手发生了严重的骚乱。骚乱的人硬说上司对他们太苛刻,一些胆大妄为之徒甚至怂恿他们的同伙以《圣经》之名发誓相互支持,他们制定了一个对付高级船员的计划。首先枪一响,每个人都拔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子来冲向上司,要不就杀死他们,要不就将他们制服。船长和高级船员们召集了一个紧急协商会,马礼逊也去了。这时,或许是由于意外,或许是出于精心的策划,几把枪响了。其中有一人打伤了炮手的脚,后来炮手的脚被截了肢。马礼逊博士主动提出和暴乱者谈判,并得到了准许。在接近船首水手舱时,马礼逊对他们喊话,软硬兼施,直到说服那些人服从命令,让船正常航行。那些人离开了船首水手舱,各自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时一个暴乱头目以威胁的态度在一个高级船员面前挥舞一件铁器。这家伙被制服了,被捆起来受到了鞭打。另有三个跑来帮他们的头目的家伙也得到了同样的下场,都被铐上了镣铐。

事情就这么平息了,但马礼逊博士在这种场合下的沉着和镇静使很多人避免了伤亡。当他无畏地接近那些狂怒的暴乱者时,他们没有抵抗,而是怀着极度的尊敬倾听他的谈话。马礼逊唤醒了他们的良知,敦促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名水手的说法是对马礼逊的努力的最高奖赏。那个水手说:“那个炮手已经认识到最要紧的是他灵魂的拯救。我希望这是真正的忏悔。我每天去看他,和他一起祈祷,每天按他的意愿读书给他听。他看到了许多走上歧途的同伴已经改邪归正。虽然他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上帝保佑,他还没在这次事件中丧生。感谢主竭尽全力的拯救,没有马礼逊的工作,他的心灵得不到安宁。”

8月8日,船停泊在巽他海峡的安吉尔(Anjier),麦都思神父(Medhurst)正在那里恭候着,他想见见马礼逊,并和他交换一下意见。麦都思神父在爪哇的传教工作让他灰心极了。他主要是挨家挨

户地向华人和马来人传道,但收效甚微。

8月20日,经过了近5个月艰苦的海上航行后,马礼逊博士及其一家抵达新加坡,受到弗林特上尉(Captain Flint)的友好款待。弗林特上尉是莱佛士爵士的妹婿。在新加坡,马礼逊一家呆了近两个星期。马礼逊博士有机会弄清了由莱佛士爵士来实施计划和由他自己来实施有多大的差别。考察的结果令他非常苦恼,非常失望。他发现大笔款项几乎都花在了建造那座大厦上,而到目前为止那座大厦还未盖到一半。马来的专家领着薪水但并没有努力履行职责。前任总督批给了他们一片土地,马礼逊博士在那片地上花了大笔金钱,而负责这项工程的代理人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莱佛士爵士采取了各种方法来改善居住点的道德风纪,最后也只得听任其不了了之。这项工作似乎需要全面的整顿。马礼逊博士请求罗伯特·伯恩牧师(Robert Burn)协助,请他担任定居点的驻地牧师。这个虔诚而能力出众的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计划。他成了新加坡书院的理事(trustee),很显然,他对这项计划的成功怀有浓厚的兴趣。马礼逊博士自掏腰包,买下了邻近中国区的一片土地作为传教基地。然后,他和全家去了澳门。澳门的情况更让他失望,他的屋子和家具破烂不堪,要恢复原样需要真正的重建,有一些则需要更换新的。他还发现,他的藏书几乎被白蚁和别的虫子彻底毁了。这些虫子在东方的气候条件下到处都是。他尽快为家人布置了一个舒适的居所,然后前往广州。10月份,他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

马礼逊博士致信伦敦差会,欣喜而又兴趣盎然地谈到他走后负责传教工作的梁阿发。他把阿发留下来负责传教方面的事务。信中写道:“我们9月6日离开新加坡,19日晚抵达澳门。我以前雇用的当地佣人和中文教师全都在码头上迎接我。第二天,当地的基督徒梁阿发露面了。在一个公共祷告仪式上,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主——仁慈地护佑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仍然追随着耶稣。第二天的安息日,我们仍然按以前的方式重新开始了宗教活动。

“梁阿发送给我一本中文小册子,是一本《希伯来书》的注释,这

本书是他在返英期间写的。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向异教徒传播一些宗教观点,这些宗教观点是他从已故的米怜先生那儿获得的。我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觉得阿发对此有一些心得,虽然书中的有些部分在遣词造句方面还留有他从异教信仰中受到的影响,但他的书显示他对《圣经》曾下过一番工夫。他还写了一篇赞美基督教信仰的短论,题为《真传救世文》(*The True Principle of the world's Salvation*)。〇〇〇

梁阿发对托付给他的事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曾经兴高采烈地描述他和当地人谈论宗教话题时的情景。其中的一次讲道是在渡船上进行的。当时阿发碰巧在读《马可福音》,一位乘客拿过书,扫了一眼第9章第9节:“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位乘客问道,“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阿发宣讲道:“耶稣的死和复活都是为了救赎人类的罪,表白他自己的信念,是为了向所有那些因他的名而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宣讲救世的教义。”他还宣讲了耶稣行善的神迹。与他同船的乘客问,他是否亲眼目睹过这些神迹。“没有,”阿发说,“这些神迹都写在出版于朱迪亚地区(Judea)的圣书里,那里是西方世界。许多民族都相信那些神迹是千真万确的。”周围的听众问他:“你就不知道孟夫子的话吗?孟夫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虽然西方民族相信这些书,我们中国人却不必信之无疑。你相信吗?”阿发回答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关这些神迹的记载,但我确信《圣经》里的这些原理和教义。我知道我过去做过一些不好的事,如果没有救世主救赎我们的罪,我就不可能逃避上帝公正的审判。”

马礼逊博士还发现,他所灌输的真理在其他人的心中已经牢固地生根,特别是在梁阿发——第一个帮助他刻出中文版《新约》的雕板以供印刷使用的人身上。〇〇〇

广州商馆的先生们热情地欢迎马礼逊的到来,主动为马六甲英华书院搞了一个募捐活动,筹到的款项超过了500英镑。

按照圣经公会的指示,马礼逊安排麦都思神父(后来成为神学博士)巡游印度群岛。麦都思当时正在爪哇,他将访问婆罗洲、暹罗

等地,分发经书和各种劝世小册子。为了这一安排,马六甲的传教印刷厂不停地运转。数千页的基督教文字从这个工厂里源源而出。麦都思先生在传教这一行已经做了10年,对中文非常精通,没有人比麦都思先生更适合做这个工作了。

## 第十二章 给孩子们的信

175

真实的雄心独自在一边扎根，  
那里有正义显现和智慧引领；  
那里内心的尊严与外在的世界交汇，  
我们的目的是善，一如我们的成就伟烈；  
那里，公众的祈祷和赞美，出现  
那里，荣耀是我们的目的却不是我们的终点。  
你愿意得到什么名声？美景在望  
勇敢者会行动起来，即使接踵而至的是流言。

——杨 格

到这里为止，马礼逊博士作为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一般特性已经在前面几章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体现在他牧师职责和笔耕生涯中以及他为东印度公司的服务中的自尊而正直的行为和持久不变的良知以及不知疲倦的奉献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现在我们需要从更个人化和更温情的亲戚关系中，特别是从他所表现出来的对孩子们的幸福的深情关注和热切期待中来把握他。他仍健在的长女玛丽·丽贝卡(Marry Rebecca)精心保存了他的许多书信，其中一些信已经摘选出来公之于世。她和她的兄弟幼年丧母，这使马礼逊对孩子们疼爱有加，更让他怀着一种强烈的父爱切盼他们皈依宗教。对

176

他来说,很少不在书信中想方设法使孩子们感受到宗教的美好和主的呼唤的。他在写信时,笔下自然流露出许多充满真知灼见的谆谆告诫。这些书信的见解显示出马礼逊把他自己最坚定不移的原则性与温和可亲的仁慈合而为一。我们摘录的就是这样一些既有指导意义又生动有趣的段落。

下面这封信写于1824年9月14日,当时他的儿子就读于风车山学校。

“你和玛丽非常关心传教士和马达加斯加的孩子,让我深感欣慰,因为传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儒翰,我亲爱的孩子,秉承天意吧,像上帝所赞赏的那样去思考、言说和行动,就是明智而幸福的。我希望,儒翰,你和贝克(Bec),不要忘了在中国的时候,在妈妈辞世的时候,一位祈祷者教导你们的一句话:‘主啊,帮助我们铭记我们母亲的指引。’如果你记得你母亲的话,并按她的话去做,我亲爱的儒翰,我敢肯定你会幸福的,因为妈妈把你引向上帝和基督,愿主帮助你,我亲爱的孩子。把寻找主的至爱当做你的至善吧。

“我希望,我亲爱的,你的实际知识每天都有提高,继起的每一天都会修正你前一天的错误言行。如果上帝占去了你的一些时间,你必须用勤奋来补上。因此,好好珍惜时间,这样做人才能赢得你朋友和熟人的尊重。学会了这一切就能指望全能的主引领你,保佑你,让你免受邪恶的诱惑。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希望我们大家全都幸福。但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服从良知的声音、圣灵的努力和《圣经》的训诲。愿上帝以基督之名让你成为这样的人!

“最近几天,我收到由两艘不同的船从马六甲海峡(The Straits)对岸带来的信——一封是高大卫(Collie)的,另一封是贝克的,但没有收到你的片言只字。这让你和我妈很挂念你。即使你是有意不写信或仅仅是疏忽,也仍等同于不负责任。你应该记得我们多么爱你,多么关心你。不要做任何让我们难过的事。保重,我亲爱的儒翰,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和冲动,骄傲在全能的上帝眼里是滔天大罪之一。让我们为你高兴,我亲爱的孩子,听听你父亲的参谋,不要忘了你妈

妈的叮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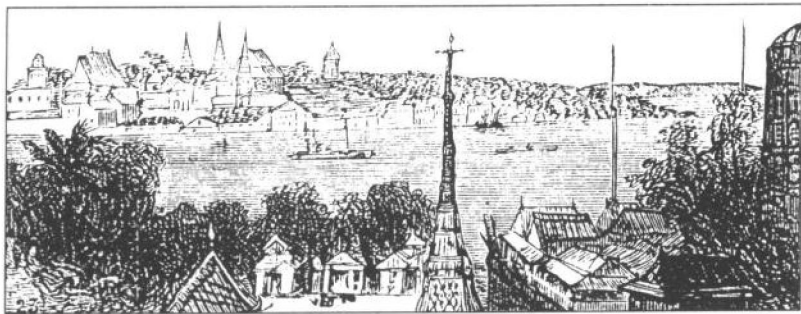


图 31 曼谷,暹罗

1830年,马礼逊博士的儿子有一个随美国商业远征队前往暹罗的机会。父亲写信给儿子谈及此事。“我亲爱的孩子,无论如何,我并非不喜欢你去暹罗的打算,同时,考虑到你年轻,去暹罗也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决定。我亲爱的孩子,我很高兴看到你充满热情,虽然我对你有别的安排,但计划常常会因为随后发生的事而毫无用处。追随神意的指引是最佳的计划。在你得到固定的工作之前,如果有闲暇再去欧洲看看也许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你可以读经,还可以读读各门知识中优秀的欧洲作家的作品。因此,只要你的健康并未显出有什么需要改变环境的迫切性,而且在这儿有事可做,我就不强求你尽早返回欧洲。不要太过疲劳,当然,另一方面也不要太懒。要劳逸结合,要以对宗教的关注来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要让自尊和学业上的雄心拖得自己劳累不堪。让基督之爱约束自己度过每一天,为主的事业尽心尽力。不必担心,你要相信,仁慈的上帝对罪人的慈悲是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哦,每一个饥渴中的人,请来饮此生命的活水。’你也处于饥渴中吗,我的孩子?那么,就啜饮此神的安慰。是的,尽情地啜饮吧!‘无论谁愿意如此,让他随意饮此生命之水。’”

这时候,他的儿子正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现在已经是确定终生目标的时候了。他的父亲因此写



信给他：“我非常满意你能在书院有所作为。但你得为了你日后的生计尽快考虑一个职业。你现在去暹罗还太年轻。的确，我看不出人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处。我们有事可做就该集中精力，不能丢开手中的事去找更有趣、更愉快的事情。”

下面摘引的一段最充分地证明了马礼逊博士对他的儿子成为“圣经上所说的人”所抱有的强烈希望。

“我送给你一册巴格斯特先生(Bagster)编的英文版《圣经》，他称之为集注版《圣经》。一册我已经送给了英华书院，另一册我现在寄给你，供你自用。我的孩子，读一读非常富有启发的导言吧，比较一下那些相应的段落，让你的灵魂熟谙《圣经》的每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学有所得。”

到了1832年年底，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还是决定参加去暹罗及东方其他地方的远征队。他的父亲勉强同意了 this 决定。马礼逊就此事写信给他的女儿玛丽·丽贝卡：

“现在的情形表明你哥哥已决定离开我们，加入那些完全陌生的人和外国人的行列。我犹疑再三，考虑到他的意图是做一个基督徒商人，因此，我倾向于希望他告诉我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建议他与其做一个商人传教士——即一个倾其全部力量支持基督教在这个世界全方位传播的人，还不如就做一个商人。我确信他不乏热情，不会无所作为，因为他是一个义务的非神职传教士。如蒙神意宽佑，让他走好运，他不仅可以自立，而且可以施惠于我们全家，也施惠于异教徒。愿上帝在他危急之际保佑他，在他受诱惑之时给他以护佑。”

儿子在启程之际，收到了为他操心的父亲的来信。信中为他开列了若干条“行为规范”：

“知道你将远行，我有点难受。我真不放心你独自在这样的社会里奋斗。一旦你走向社会，你应时时警醒，天天祷告，上帝时时会看着你的诚心、听着你的祷告，会赐福予你。上帝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仁慈地引领着我们。

### 行为规范

1. 在所有事情上都要用心祈祷上帝的帮助；
2. 与陌生人和外国人要交谈，切忌争吵；
3. 在你翻译一个文件之前，首先必须仔细阅读这一文件，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因为只阅读一个部分，你就匆忙译了出来，然后下一段的意思又改变了，那么，这就显得好像你不懂得那门语言或者只是在猜测文件的含义；
4. 一些难解的段落，如果可能的话，可咨询一些当地人；
5. 对重要的文件要认真研究。英文文本在呈交之前，要做到尽善尽美。因此，切忌匆匆忙忙。做事不要拖延，拖延到最后总是急就而成。”

180

当儒翰参加远征队担任译员和秘书后，这些指导的作用很快就被认识到。也许人们会从中发现马礼逊父子擅长做译员的秘密。

“1832年1月1日，按我们的纪年法，新的一年开始了。无论哪种历法都一样，人们本能地在任何一个时间的分界前驻足，回顾以往的岁月。这也许是一件好事。评论过去，即使是在青年时代，也会给你带来惆怅和遗憾，当然也会有感念。

“当一个人垂垂老矣时，回顾过去会更加感慨万端！在早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多么幸运的事！我亲爱的儒翰，为了这一点，你和你妹妹都应该感恩。愿上帝激励你们一心向善，通过信仰基督，战胜每一个心灵的敌人，取得胜利。信仰基督吧！它是拯救你的引路人。按照它的话去做，赞成它的事业。把你自己完全置于它的律令和护佑之下。我的孩子，不要在两种意见间犹疑不决，把你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主，交给主的教会。”

马礼逊博士不断恳切地劝勉儿子要寻找和追随基督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一点在1832年11月23日的一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很高兴你已经作出决定，上帝帮助你，让你声称自己通过纪

181

念他的死,展示他的死直到他的复活来谦恭地依赖救世主。”

署 1833 年 9 月 6 日的一封信显示,基督教传教的初期和后来一样,撒都该人的风气到处弥漫着,他们爱财如命,却无情地斥责那些虽然陷入重重困难,但仍然勇敢的竭尽全力的人。

“改革派及其对这一时代的影响看来已经使严苛而怀疑一切的撒都该人的风气转变成了恶意。《基督教倡言报》(*Christian Advocates*)是一份极有能耐的报纸,一周复一周的专栏以极端非基督教的态度,通篇充满对伦敦差会的攻讦。伦敦差会的董事公无疑有问题,但谁又能说自己十全十美?被斥责的声名狼藉的传教士们在一位福布斯先生的谋划下,全都指责董事会。仁慈和宁和与你在一起。我的孩子,哦,你当竭尽所能地让你的心保持对上帝的敬畏!决不可轻忽上帝,不可堕入诱惑之渊,不可寻求邪恶的褒奖,不可模仿邪恶做事。保持纯洁和自然,但也不必害怕显示出你的非凡之处。”

马礼逊博士非常希望他的儿子从事传教事业,或者使自己终生都能对中国有用。故而,他在 1833 年 9 月 12 日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记住我的建议,应该尽可能多说汉语,一直练到非常流利的程度为止,还要多花时间研究口语的发声。我也建议你做我从未做过但现在却感到遗憾的事,收集所有语言中的精词丽句,这样你可以随心所欲为己所用。所以,首先,你可以随意地以‘流水账’的形式记下那些词句,以后如果你有时间,再按字头排列这些词句。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上帝保佑你,你是上帝赐予你的家人、你的亲友以及所有与你熟识的朋友的福分,你不要仅仅是不作恶,还要一心向善,让上帝的爱来约束你。”

马礼逊的信满是简洁的隽语和给人以教益的片言只句,我们可以相信,这些重要的人生指导被他的儿子铭记在心。以下这封信似乎是从一批书信中随意抽取出来的。

“你在短笺中说:‘匆忙写就’,不要染上在信中道歉的习惯,或者别的什么习惯。尽可能充分地表达清楚你要说的话,说完就罢。我以为这是个较为可取的普遍法则。”

“你所说的来自各方面的针对马礼逊家族的恶意,我担心是千真万确的。同时,很难指望其他派别尊重宗教情感和基督教的道德。我们不能属于反对‘福音真理’的派别。我们一直在寻求真理。所以,我们不被那些反对福音真理的人接受。”

“我亲爱的孩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天仔细做好你的私人备忘录,当日事当日毕,不要拖到明天。我初到中国时,每日祷告三次。但从清晨到正午,从正午到夜晚,我只用几个小时恳求上帝的保佑。”

还有一段摘自马礼逊写于伶仃洋上“赫尔克里斯号”(Hercules)的一封信。马礼逊在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后又在船上写了这封信,进一步表现了他温柔和深厚的家庭情感:

“昨天早晨在日光中,我看到‘英格里斯号’载着你们离开我的视野。我流着泪,为你们——我的爱妻,还有我亲爱的孩子们祷告上帝。在我前往广州前,儒翰去澳门为我取几件衣物。我把自己关在你们最后几天睡的小屋里,然而,我有一本《圣经》,还有一册《苏格兰国民盟约者痛史》。我在书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希望上帝的祝福今天与你同在。”

“儒翰把你们的近况告诉了我。你在领航员身边说:‘船上每个人看来都很善良。’感谢上帝!我衷心地、谦卑地赞美主,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上帝汇聚了更多的仁慈,特别是‘召集了许多好心的朋友’。我想把全部的我献给中国人,尤其是像我以前所决定的,献身于传播圣经的事业。我愿意用自己的印刷所编印《圣经》,愿上帝让我的事业顺遂兴旺。”

在后面的章节里,人们将会看到这两个孩子是如何出色地掌握了灌输给他们的信条。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作的预言是如何完美实现的!

1824

## 第十三章 新的领域

有一本大书

由六翼天使用天堂的光芒写就，  
在书上，神的目光并不难得显现，  
一部行动的编年史真实而明澈。

——库 珀

马礼逊博士很快安居下来，忙于履行他所钟爱的各项义务和职责。由于公职的需要，从8月份公司的船只抵达到翌年2月或3月他离开广州，有半年时间他都泡在广州的商馆里。后来，他又去澳门和家人团聚。他的生活充实而忙碌。他已经着手进行一项大的工程，那就是用中文来撰写《圣经》的注释。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准备付出惊人的耐心和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勤勉。他主持公共礼拜仪式和私人礼拜活动，尽可能不厌其烦地劝欧洲人或中国人参加礼拜活动。他在广州时每天都接到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传教士和朋友们委托他办事的请求。这些人被迫把各种文字的材料都送来广州。于是，马礼逊所有的印刷材料、书籍、老师和工人，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在东方其他各基地的传教士也请他担任顾问和指导，以便在遇到困难和复杂的情势时为他们提供咨询。他的丰富经验和绝佳的判断力使他成了一位在东方传教事务的

各个方面都不可多得的顾问。

他的传教工作也受到了阻碍。这些阻碍一部分来自那些对基督教传教事业缺乏同情的人的批评，一部分来自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一批盲目自大的人士。他们愿意利用马礼逊作为一位不可多得的汉学家对他们有益的一面，却不愿意他提倡基督教；他们希望从与中国的通商中获得大笔财富，却不肯对马礼逊以福音真理来为当地人启蒙的努力施以援手。马礼逊博士在日记中写道：

“我读了《路加福音》第12章第15节‘敬戒贪心’一节，贪婪意味着贪得无厌。我想利用这些段落撰写一篇英语祷文，但是我担心这样的文字对我的那些听众可能太过于一针见血了。

“今天早晨，我读到一则中国人的小故事，故事中的何劭(Hoo-Shaou)<sup>①</sup>是一个穷得丁当响的人，他每天感谢上苍的赐福。他的妻子对他说：‘我们一日三餐只有蔬菜、米饭和水，你怎么还叫这是享福呢？’他回答说：‘我们生活祥和就是享福，我们没有经历战乱造成的种种悲惨就是享福。我们家中没有任何人挨饿受冻就是享福。我们中没有人卧病床榻就是享福。如果这还不是享福，还有什么算是享福呢？’虽然这是一个异教徒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得为何劭所拥有的一切和更丰富的东西而感谢上帝。”

这一时期，英国基督徒在完全献身传教事业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马礼逊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徒的奉献》<sup>186</sup> (*Christian Devotedness*)的劝世小册子。在书中，他极力主张所有财富都取自上帝，并把它用之于上帝的正当性。事实上，这些钱是为上帝而花或者就花在上帝身上的。《中庸评论》(*Eclectic Review*)尖锐地批评了这本小册子。该刊称，这样写的人可能上不用养老、下不用养小。对此，马礼逊博士说：“我是有妻儿老小的，而且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尽力掘地藏金的人(anti-earth-treasure-hoarder)。但我的原则是‘用于上帝’——‘上帝会提供给你’。‘哦，’别人会说，

① 此为音译。——译注

‘还是要靠你自己的方式’，之后，他们就会把它说成是上帝强加给你的职责。《圣经》上说，‘耶和華一以勒’，注经者说：‘是的，主将让你去引领，你无法为自己去做任何准备了。’现在，我要问，这一理由是否已不能证明自己？因为根据这一点，相信天意仅仅意味着相信人自己，而上帝的话恰恰变得毫无意义了。”

大约在同时，《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也刊载了文章攻击他的《圣经》中译本在翻译上不是太完备，奚落他是“自学”出身，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用谦恭的托辞来对付批评”。文章还严厉地指责截至当时为止圣经公会所走过的每一步。这是毫无必要的恶意攻击。如果有人要承认这本中译本的缺点，那此人非马礼逊莫属。马礼逊一直坦承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抛砖引玉，是为他人盖起一座完美的大厦打好基础。因此，他觉得这些批评太尖刻了，就写了一篇回应文章。这篇文章并未发表，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还健在的优秀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哪一位不是‘自学’的？……但是，抛开此点不谈，他们的学问除了自己利用以外，有谁把梵语、汉语或 Otaheitean 语<sup>①</sup>传授给现代传教士？在英国传教士出现很久以前，印度就有了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官、指挥官和教士，在中国也有商业机构，但他们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吗？或者找到了教授当地语言的办法吗？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从英国人喝的中国茶中赚取了百万计的利润，但英国从未提供过一页《圣经》的译文，也没有设立过一所学校来教授中文，直到那位‘自学’的英国传教士来做这件事。”

发表上述不太妥当的指责的那份刊物，其编辑当时被人们指责为心胸狭隘、态度粗鲁，而且也没有把自己从一个鞋匠拔高到学者和作家的位置而受到人们的赞扬。

此时，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缺少一名教士，因此，在主日就没有人诵读通常应该读的祈祷文。马礼逊博士提议自己去读祈祷文，并讲道，直到他们有了另一名教士为止。他说不愿意看到公众的宗教

<sup>①</sup> 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岛土语。——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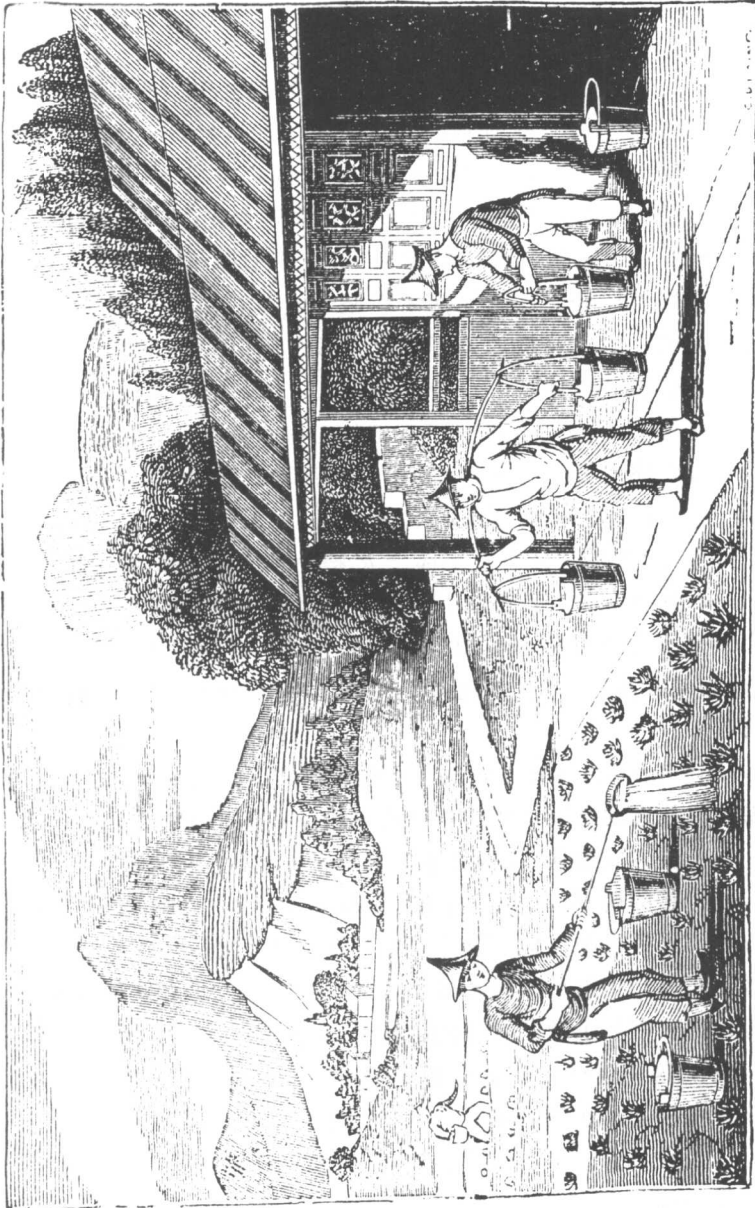


图32 中国茶园



活动中断是他这样做的惟一理由。为此他收到了弗雷泽爵士——特选委员会主席的如下答复：

“我已经把你的提议的大旨告诉了我的同事们。他们和我意见一致，即我们无权接受你如此善意的提议。我当然肯定你所做的一切只是出自最良好的动机和对我们的福祉的希望。”

马礼逊博士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宗教的悲哀，或非宗教情感的状况。以罗马天主教的真正精神来说，无论如何（除了为死者念超度的祷文），他们都应该和任何不屈服于绝对权威和不强求绝对一致的人交流。如果这样的人‘信仰’，那么他们并不与教义的条款‘与圣徒交流’相抵触。”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欧洲绅士把他的房间让给了马礼逊博士，马礼逊尽可能地邀集了一些人来进行宗教活动。参加者大约有 20 人，一个别开生面的精神聚会就这样举行了。

1829 每个月，他都会召集一小部分人来为中国皈依基督教而祈祷。中国的皈依者和慕道者再加上大约 7 名欧洲人，在那个异教大国，在这个最初的传教祈祷会上相聚在一起。每个参加者参与诵读赞美诗、读经或者祷告。在马礼逊博士心灰意冷时，这种聚会常常能使他振奋起来。

1827 年年初，马礼逊博士广州寓所的邻居家里发生了火灾。大火殃及马礼逊的房间。他的所有藏书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被付之一炬。一位友人安慰他，这是对他贪图美丽包装的一种报应。

一份新的期刊《广州纪事报》(Canto Register) 创刊了。刊物在东方的英国侨民中流传。这主要是一份商业报纸，但马礼逊博士也应邀定期为刊物供稿。马礼逊表示，只有在他可以自由地表达他对道德和宗教主题的看法的前提下，他才能供稿。刊物给他每年 300 美元，这使他有可能会用这笔钱向任何一家他所选择的慈善机构捐款。马礼逊为该刊供稿，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马礼逊博士注定要体验更多的失望，他一手创办的两家机构都失败了。在英国的东文书社是因为没人热心而停办的。这已经是距

今 50 年前的事了。新加坡书院由于那些受托具体执行这一计划的人管理不当,也彻底失败了。这样,马礼逊博士在此项目上投了 6000 美元的善举以及莱佛士爵士的好心都付诸东流。另一方面,他却因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成功而感到快慰。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向在英国的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地告诉董事会英华书院办得很出色。通过与中国日益增多的交流和欧洲人中文水平的提高,书院可能会在两国的贸易往来中发挥积极的影响。这份备忘录由英国商馆馆主弗雷泽先生和特选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联名签署。文中说:“我们要公正地指出,英华书院的创办完全归功于马礼逊先生,书院能继续办下去也归功于他的辛劳,归功于他的坚持不懈地努力以及他把中国文学当做一门有益的学问加以传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190

1827 年 12 月,马礼逊最亲密和得力的友人、英国商馆馆主弗雷泽先生病故,这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弗雷泽先生在病榻上延宕了一个月后辞世,被葬在东印度公司位于澳门的公墓。马礼逊博士主持了葬礼。弗雷泽先生是在准备返回英国时得的病。原本准备载他回国的那艘船在航行中、在他下葬的时刻施放了致哀礼炮。威廉先生享年 40 岁,非常富有,是少数居住在中国、和传教士非常亲近的英国侨民之一。澳门总督以及居住在澳门的所有欧洲人都出席了他的葬礼。

一方面,罗马天主教小心翼翼地监视着马礼逊博士;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也留意传教士的行动,所以,马礼逊根本不能向任何人传播或倡导福音。除了少数几个他雇用的中国人外,偶尔也有几个中国人被引荐参加他们的集会。因此他被迫尝试以出版的方式来打进异教世界,这几乎成了惟一的方法。为此目的,他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为了使当地的慕道者对神圣真理有清晰的了解,他对《圣经》的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都做了一个参考系,撰写了编年的、历史的和文学的注解。他还开始编广州方言辞典——《广东省土话字汇》(*Dictionary of the provincial dialect of Canton*)—

191

书,这本字典的用处几乎与北京官话(《英华字典》)的用处旗鼓相当。他采用了许多方法来传播《圣经》和劝世小册子,并成功地把大批宗教书籍传到了高丽、交趾、支那、暹罗和南洋群岛。通过商人们,他还把这些书送到了中国内地。

只要条件许可,中国老师梁阿发也常常为了他的同胞而勤奋工作。他下乡办了一所学校,指导一些孩子和他自己的族人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他有一封从乡下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信,信中写道:

“这里所有人都沉迷于偶像崇拜中。虽然我给他们带去了福音真理,并把福音真理呈现在他们面前,但我的全部力量就这么大,我无法说服如此广大的民众。眼下正是7月份,每一家都毫无例外地相信必须尽全力在祖先的牌位前、在大街上烧纸钱。那些来来回回游荡的缺钱花的亡灵和他们在冥府的先人就可以收用这些钱,在另一个世界有衣穿,有钱花。如果不烧纸钱,人们的心就不会安宁。不这样做,就是不孝顺、忤逆和不道德。当我看到他们这样愚蠢和荒谬时,禁不住悲哀至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只是夜不能寐,思虑无已。只能用心地、坚定地追随福音真理,仰视至高无上的主,祈祷他使众人之心皈依,引导百姓走上脱离苦海的康庄大道。”

192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但它恰好证明了马礼逊博士文字工作的价值。他那部大部头的字典被译成了日文。他还得知,在日本的拥趸者中普遍流行的一本字典是在《英华字典》的基础上摘编补充完成的,字典是按字母顺序排列,释文以极简练的笔法写成。

193 1828年年末,马礼逊应召去“奥威尔号”船上为两位年轻的官员做祷告,这艘船就是马礼逊由英国来华时乘坐的那艘船。这两位年轻官员得了急病,后来都死了。马礼逊给了他俩无微不至的关照。那两人都以上帝的名义证明马礼逊所给予他们的诚恳和善待,使他们的灵魂有幸得到拯救。

马礼逊在信中这样提到他们的最后时光:

“正在那儿的摩拉维亚(教派)的外科医生说,他的病人约翰斯通(Jahnston)——我今天已经看过他两次了——去世了。他死时还



图 33 中国僧侣

充满希望,他还能记起他以前念过的祈祷文的句子。在最后的弥留之际,我执着他冰冷的手,说:‘上帝与你同在。’他答道:‘也和你的心灵同在。’威尔逊(Wilson)很快昏迷了。一个月前,他和约翰斯通的健康还很好,两个人还出席了在黄埔举行的三次大型聚会,当时他们都毫无顾忌地尽情狂欢。约翰斯通给人的印象是渴望得到上帝的宽恕,威尔逊则几乎一言不发,但他也和约翰斯通一样抬着双眼,双

手交叉紧握，祈祷上帝与他同在。哦，他们是明智的！在最后的时刻想的是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虔诚地活着，让我们幸福得视死亡为我们真正的领受。”

前面提到的星期日晚上的聚会还在进行，而且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意思。关于星期日聚会，马礼逊博士在1829年1月1日的日记里有所记载：“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教派和信奉各种教义的教徒和宗教书籍齐聚在我广州的寓所里，常常激起我的赞叹和对上帝的感恩。”

这时，“奥威尔号”船上的那个炮手也来感谢马礼逊的好意和对他的指引。他在兵变后被截掉了一条腿。

194 马礼逊博士有时又像一个从刽子手里拯救无辜者的救世主。一艘驶往马尼拉的法国船的船长、船员和乘客，在离开澳门不远的海面上，几乎全都为这群中国人所杀害，只有一人幸免。当时船上装有财宝，这些财宝激起了这些中国人的贪婪之心。幸存者依靠一块厚木板漂在海上，后被一艘渔船救起带回澳门。他将这桩骇人听闻的大案告到了葡萄牙当局那里，消息又传到了广州的中国当局那里，中方迅速制定出方案逮捕凶犯。那些杀人犯终于露出了踪迹并被抓获，经过拷问、审判，罪犯被判处极刑。但在行刑前，囚犯被押到广州由幸存的船员验明正身。这一对质安排在广州商行的总部(Hong Merchant's Hall)进行。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到场，马礼逊博士亦在其间，坐在前排的位置上。凶犯们被锁在一个个竹笼里，竹笼小得不能容人坐直身子。凶犯的脖子、腿和手腕都带着镣铐。每个囚笼上还标着罪犯的姓名和对他的判决。法国船员认出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但最后带上来的一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人的相貌很引人注目，大约55岁上下的年纪，囚笼上标的名字是蔡公超(Tsae-Kung-Chau)<sup>①</sup>。他试图向公堂陈述什么，但别人却听不懂。现场也没有他的同胞可以为他翻译，因为他说的是福建方言，而福建话和广

<sup>①</sup> 此为音译。——译注

东话有很大差别。马礼逊博士因此走上前去和他交谈,弄清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判决。这个人根本没有参与那场骇人的犯罪,他完全是无辜的。于是,马礼逊代表那人向公堂陈述,由于他的陈述极有说服力,那人被还押,等待公正的调查。结果几天后,那人就来到马礼逊的寓所,对马礼逊救他一命千恩万谢。中国居民也大加赞赏这位英国人,因为他那么热诚地为他们自己的一位同胞声辩。

程耐里先生(George Chinery),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当时正在广州。他为马礼逊博士及其两位中国助手画了像。那幅画像栩栩如生,后由广州商馆的绅士们出钱镌刻,以表达他们对马礼逊的敬意。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为了书院的利益,将这幅画印刷出售(此画见书前插页)。196

一项在澳门建立一家“英侨博物馆”的计划获得了通过。为此,开始大规模收集当地和国外的珍奇古董,包括艺术品、自然博物等。马礼逊以他一贯的热心肠和慷慨参与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从促进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的研究的目的出发,他还开始召集学习中文的学生和老师每周在他的寓所聚会一次,就事先拟好的主题进行讨论,阅读有关书籍、习语和方言的论文,各种古董也拿到这里来供大家鉴赏。

1829年3月,马礼逊完成了《广东省土话字汇》的第三部分,接着就忙于和传播神圣真理有关的其他文字工作。梁阿发此时跑来投靠他,他已经被迫关闭了他的学校,为了保命而四处逃避。他被指控散布邪教、卖国,因此,他只得躲到澳门马礼逊这儿来避难。

现在,马礼逊在商馆的工作更加艰巨、更令人不快。虽然那些工作他一直不太喜欢,但马礼逊忠实而勤勉地履行着他的职责,只因为要想在这个国家站住脚,要想在伦敦差会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推行他的传教事业,就必须这样做。但自从弗雷泽爵士逝世后,接任者对他随心所欲地滥施权威,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程度。因此,他决定辞去职位,专心致志于更崇高的事业,虽然这样做可能必须把自己限制在澳门或马六甲。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特选委员会,表明了辞职197



图 34 中国公堂

的意愿。但东印度公司的执行官发生了突然而出人意外的变动,德庇时先生(J. F. Davis)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总裁(chief),后来的事情表明德庇时先生是传教事业的坚定的支持者。

12月,梁阿发离开了马礼逊,着手去印刷他自己撰写的两本劝世小册子。他希望在他的学校被封的情况下,通过这两本小册子来继续传播福音。马礼逊博士这样评论他:“他的临别祷告没有什么花哨的辞藻,但却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一心扑在他的事业上,就像他已习惯于祷告一样。他希望上帝所有的子民们祷告,这样他就可以一生有‘信’。但愿主会赐福予他,使他终生有福。”

1830年年初,马礼逊博士高兴地为另一个中国人施了洗,接受他作为新教的教民。此人就是屈亚昂(Kew-a-gong)。在认识马礼逊博士之前,他一直过着吊儿郎当、得过且过的日子,不养活妻儿,对他们不闻不问,也没有找任何固定的职业。但自从他接触到福音真理的那一刻起,他变得顾虑他的家庭幸福了,而此前他一直是满不在乎的。他跟梁阿发学习印刷技术,勤恳地从事印刷工作,同时接受马礼逊博士的指导。最后他表现出的坚定性和诚意足以使他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屈亚昂受洗后,成了梁阿发分发《圣经》、宗教书籍和劝世小册子的好帮手。

马礼逊博士恳请美国国外传教理事会(ABCFM)派员到中国,以帮助传播福音的事业。他非常高兴地得知美国方面有了回应,雅裨理牧师(David Abeel)作为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的牧师,受遣来广州为时常出入广州各港口的水手服务。一年后,他带着对广州的了解进入了美国国外传教理事会,目的是在东亚各国及其岛屿进行开拓,为外国传教事业寻找最佳基地。1829年10月14日,雅裨理由裨治文牧师(E. C. Bridgeman)陪同搭乘“罗马人号”(Roman)船前往广州,在1830年2月抵达花城。他和他的同伴受到马礼逊博士的热情欢迎。马礼逊即刻为他们提供了学习语言的书籍,还请了一位老师给他们单独辅导。美国传教理事会非常感激马礼逊对他们的好意,而马礼逊也欣喜地看到,他的传教事业终于有



了同道，现在的情况是，就算他马上离去，基督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永远也不会失去它热忱的见证人。

马礼逊也很高兴地在广州迎接他的长子马儒翰。儒翰在英国和马六甲的英华书院随父学习中文多年，他年方 16 岁，但已精通中文，并能运用自如，所以，被广州的英国商人聘为翻译。

长期以来，马礼逊一边工作，一边听着外界对他的诽谤和恶意的指责。对那些恶意的攻讦，他一般保持忍耐和缄默，他的动机纯粹出于传教，这使他感到问心无愧。他相信，时间会洗刷对他的极端误解，还他应有的声誉。1830 年，一位著名的法国语文学家克拉普罗特 (M. Klaproth) 曾向东印度公司行政当局的一位绅士——此人后来成为英王陛下的驻华商务监督——提议，如果他成为马礼逊博士的劲敌，他自己就负责在报纸上对他进行吹捧。德庇时先生，就是那位绅士，一如他在西学方面的渊博，被誉为他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学方面最博学之士。他的心像他无所不知的头脑一样让人尊敬。德庇时先生这样答复这种阴险的提议：

“你对马礼逊博士的敌意如此之深，我不禁深感遗憾。对于马礼逊先生，我必须坦承（如果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我是不会这样说的），我和斯当东先生一样，认为他是‘众所公认的欧洲汉学家中的第一人’。这在他的祖国（英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多年来，他在东印度公司负责与中国人进行联系，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他的中文书写和中国人一样轻松和流利。中国人很久以前就送给他一个雅号‘马博士’（Le Docteur Ma）。对马礼逊的这一评价就可以把全欧洲对其中文知识的喋喋不休视为道地的‘鼠蛙之战’（Bartrachomyomachia）。”

1831 年刚到，梁阿发就为三个人施了洗。这三个人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儿子。父亲 62 岁，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 22 岁，另一个 17 岁。做父亲的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的儿子们正在学习中文。梁阿发把儿子交到了裨治文的手下，由裨治文教他英文，并向他传授基督教真理。

截至目前为止,槟榔屿的英国当局每月拨给马六甲英华书院 100 美元。现在,由于本廷克爵士实行厉行节约的措施,这笔款子被撤消了。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按其一贯的慷慨气度,马上拨给英华书院同等数量的款项。在“确信书院的优越之处”后表示:“我们相信英华书院极适于在大英帝国最遥远的殖民地传播知识之光和实用技术,有助于改变这个国家长期束缚公众心灵的偏见。” 200

还有一位传教士也从美国来到了广州。让马礼逊高兴的是,他就是史第芬牧师(Edward Stevens)<sup>①</sup>。他乘坐和本书传主同名的“马礼逊号”船而来。船主是奥立芬先生(Olyphant),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传教事业可信赖的朋友。

马礼逊博士的《家庭布道》和《诵经课》现在已经出版印行。前一本书的印行,马礼逊自己支付了 200 英镑,印成了 8 开本的 4 卷。这两种著作旨在提供一种有关基督教历史的、教义的和实践的观点,现在已经由那些受雇发行这一本书的派发书贩广泛传播。

个人对慈善活动的需要和公众对仁慈活动的期待,每天都在使马礼逊博士付出他的同情之心。请求他慷慨解囊的事总是没完没了。那些看上去值得扶持的人从未被马礼逊拒绝过,尤其是他一心想着帮助的那些英国水手们。当地人让水手们喝烈酒,然后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激起他们的火暴脾气以至于发生暴行。为了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这类过度的放纵和明火执仗的行为,马礼逊博士约请了一位当地乡绅经营了一家咖啡屋,又在水手们中间分发小广告,请那些水手来享用咖啡屋提供的廉价的清凉饮料,并警告他们不能饮用当地人出于牟利目的出售给他们的掺有毒品的烈性饮料。

马礼逊先生把主日时为英国人做礼拜的事务都托付给了裨治文先生,而他自己则为中国人服务。在英华书院为一位中国教员施洗 202

<sup>①</sup> 原文如此。疑为 Edwin Stevens, 美国公理会教士, 1832 年抵达广州。——译注

是他最大的乐事,这位教员是朱先生(Choo-seen-sang)<sup>①</sup>。朱先生潜心研读基督教思想体系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有段时间他一直在吸食鸦片,还确信这是对的。最终他戒掉了恶习,表示他全身心地侍奉主耶稣。他公开表示,他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他信奉主的全部教诲,服从主的所有训诫,并期望着主的允诺。在从马六甲去广州的航程中,他差一点因船只失事而死。这使他明白了在他渐渐信服上帝的真理之后,还有未向上帝坦白的顽劣的一面。梁阿发也荣幸地为好几个人施了洗,其中有7个人是接受阿发的规劝而皈依的。

1832年年初,马礼逊博士写道:

“今天广州的中国人的社会面貌和1807年我所看到的已经迥然不同。从那时以来,公开表示信奉上帝的中国学者、传教学生、英文报章和中文经书的数量都有了很大的增加。我已尽了我毕生的力量,我可以——上帝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

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使他的前途受到了威胁。东印度公司在华的营业特许即将终止。在广州英国商馆做事的所有人的情况也将因此大受影响,但没有人比马礼逊受的影响更大。他为公司服务了20年,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动游说公司董事会,鉴于马礼逊对公司作出的重要贡献,为马礼逊提供一定的养老金。对这一呼吁,公司董事会没有任何答复。因此,他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找一份非神职的工作,要么是向伦敦差会求助,因为他在受雇于公司期间为差会无偿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决定等待神意为他指明道路。但在这两条路之间,他自己无疑更愿意选择后者,因为那样仍然可以把他的精力奉献给向异教徒宣讲福音的工作。生活来源不确定的状况还没有解决,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又接踵而来。马礼逊夫人长期以来健康状况堪忧,要想康复,最好是乘船回国休养。更让马礼逊焦急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接到了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来函,通知他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已接到主管教区的罗马天主教高层就其出版著作的事宜

<sup>①</sup> 指朱靖。——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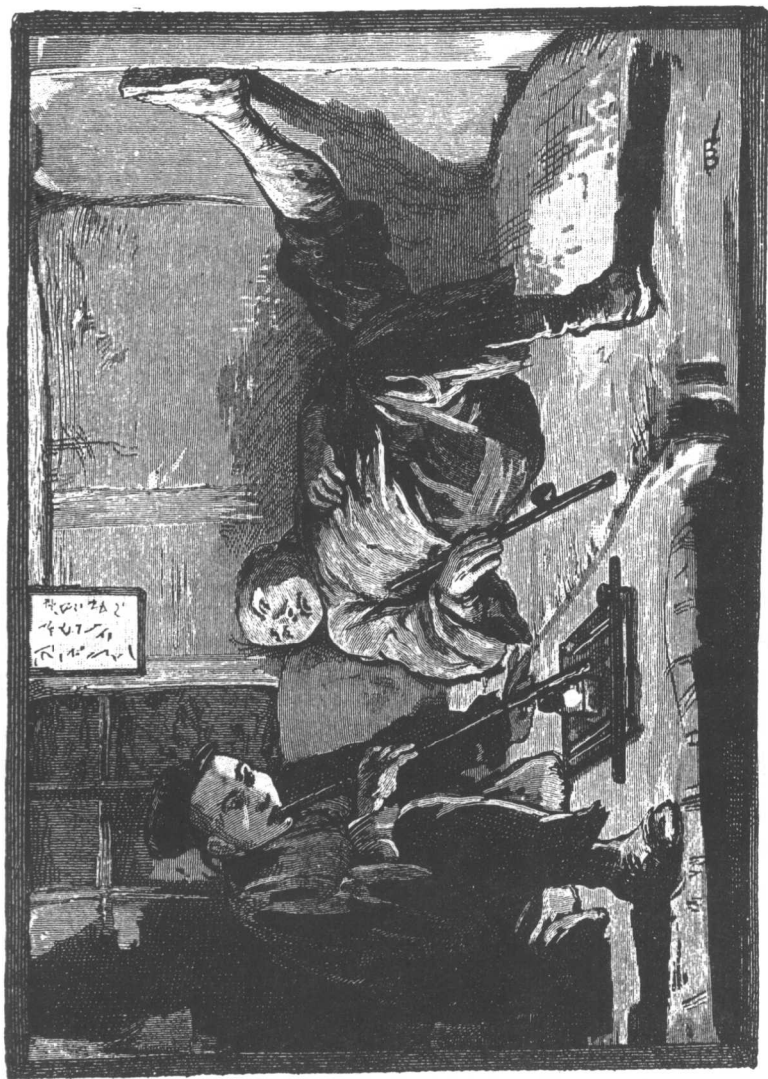


图35 鸦片瘾君子

所作的吁请。据说,他的著作与天主教教义相悖。而且,除非经过事先审查,使用印刷机印刷出版物在葡萄牙人的管辖区是严令禁止的。所以,新著的出版必须中止。特选委员会要求马礼逊博士暂时搁置他在澳门出版新书的计划。

这是一个不公正的而且让人厌恶的异说。但因为当局没有对这一吁请作出决定,不得拒绝服从、提出上诉,因此,只能满足于提出一份有力的辩辞。但他仍不遗余力地传播出自他自己和米怜博士、梁阿发及其他人笔下的传教书籍。现在,这些书籍的分发范围更加广泛了,其中有些已经分发到古老长城以北的地方。他还把不断增长的热情倾注在经文评注的撰写工作中,并继续为安息日的公共晨祷服务,由于在澳门外侨中有以消遣娱乐度过安息日之夜的习俗,所以马礼逊通过开办晚间讲座,带领他们进入一种更高的愉悦境界。在为侨民进行的晨祷结束后,他再为中国人举行一次晨祷。他在为中国人举行的圣事中甚至得到了更大的快乐,他从未省掉唱诗这一步骤,自己常常从头至尾参加整个唱诗过程。在祷告的间歇,他负责读经,或是倾听孩子们复诵赞美诗和经文。这段时间,他常去寓所前那个幽静的平台,那个平台外面就是群山环绕的澳门湾,平台被盛开着的美丽鲜花和灌木所掩映,四周种着西洋的花木。有时,他的全家和随从以及一只跑来跑去的纽芬兰犬也陪他同往平台,多数快乐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安息日通常连续站五个小时讲道的辛劳过后,他们在这里闲坐着交流生活的幸福和艰辛。假如有时候什么人问起他累不累,他会回答说:“累。工作是累,但工作本身并不让人累,我乐在其中。”

各种迹象在显示他的身体、曾经如此强壮而结实的身体开始在走下坡路。他感觉头很沉重,失眠,没胃口,身体右侧疼痛,体力衰竭,这引起了他和他身边的人的严重关切。他咨询了一位大夫,大夫为了宽慰他,只说那是肝区的毛病,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真的出了大问题,等到家人回国的那种分离之痛平息过后,他就能慢慢复原。为了处理一篇报道中涉及的一艘装运鸦片的船发生的骚乱,

他又镇定自若地回到了广州。在那次骚乱中曾有一名中国人被杀。马礼逊在广州一直呆到距他家人离开澳门还差两个星期的时候,才返回澳门。他回家后,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接纳他的长子马儒翰到公司任职。为他们安排的启程离澳的日期是在 1833 年 12 月 10 日。他们要去伶仃岛,那是距澳门 19 海里的一个安全停泊地。那天,他和家人(除了马儒翰外,其时他正在广州)乘上一条小舢板前往伶仃岛。经过一段痛苦的航程后才到了伶仃岛。所有的同行者因寒冷和晕船而情绪低落。在“英格里斯号”的甲板上他们举行了一个聚会,大家做过祷告,然后郑重道别。马礼逊一家就此分开,从此再也未能在这个世界上团聚。

205

在未来前途不确定的情形下,马礼逊博士很快离开他在澳门的家,回到广州。

由于英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管理层的变动在中国和英国议会之间造成了太多久拖不决的困难。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政府加大力度,致力于建立其乐于建立的贸易和海关等体系。律劳卑爵士(Lord Napier)被任命为英国皇家驻华商务监督,东印度公司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强烈敦促他和他的一班人确保马礼逊博士作为使馆译员并从事秘书工作。然而,英国政府的态度表明,他们对教会的态度比漠视教会还要坏,看来根本不会因为空缺的职位与公司的业务有极重要的关系而让公司雇用一名教徒。所以,在律劳卑爵士及其随行人员到来之前,不会作出具体的决定。

1834 年 5 月 1 日,马礼逊博士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至本月 28 日,从我在老伦敦桥的端区哈德卡斯尔先生(Hardcastle)的会议室中接受传教任务以来,已经过去 30 年了。当时罗兰·希尔(Rowland Hill)也在场。他问我能否像天使那样看待异教徒,因为我不知道天使的心思,我当然不能说‘能’。”

7 月 15 日,他在澳门写道:“律劳卑爵士昨天下午 3 点左右上岸。他离船时,舰船鸣炮致敬,而他登岸时,葡萄牙人也鸣炮。我去了中国海关,爵士要在那里入境。他把他从船上带来的一个女儿牵

206

到我的椅子前。上楼时,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他拉着我的手,说他很高兴结识我。他穿着一身海军服,进屋后,律劳卑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身,走过来握着我的手,微笑着以一种熟稔而亲切的语气,说她早就听说过我的大名,还说她好像与我相识已久似的。

“今天中午,商馆的全体人员被召集来,在律劳卑爵士住处听候宣读英王的任命。因为这事关系到你<sup>①</sup>和我们可爱的孩子,所以我要先告诉你一声。我被任命为‘中文秘书和译员’,年薪1300英镑,但没有诸如房租和车马费等其他补贴了。我到任后,可以着副领事的官服,佩戴英王的徽章。政府将代替东印度公司每月支付给英华书院100美元。爵士询问我是否接受这一任命,我马上回答我接受。他接着说,他会立刻起草委任书……为我祈祷吧,在我不得不接受的新岗位上,我会忠诚于神圣的救世主。对一个传教士来说,这事看着有点怪,一身副领事的制服替代了圣袍!”

在写给他幼子罗伯特的信中,马礼逊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你必须知道爹爹是英王的仆人,威廉国王是我的主人。但是,罗伯特,我亲爱的孩子,我还有一个比国王更伟大的主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所侍奉的主人。他将会在他天父的家园,为你、为我还有所有侍奉他的人准备一个家园。”这封信是他签名的最后一封信。

207 7月20日,律劳卑夫人希望他在澳门东印度公司的小教堂里举行一场祷告,他为此撰写了一篇祷文,恰好以“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约翰福音》14:2)作为其主题,但一些心胸狭隘的宗派主义分子提出了一个异议:即使没有任何宗教活动,也比活动被不恰当地委任由一位不合适的神职牧师来主持要好得多。

这篇祷文清楚地显示,马礼逊的心里仿佛在向往着那个充满荣耀的不可见世界,好像过早地辞世已是他意料中的事。祷文提出了如何抚慰处于苦难中的基督徒的四大原则:首先得相信天父是使她们心情平和的源泉,相信耶稣是应许他们的弥赛亚,会来把他的子民

<sup>①</sup> 指马礼逊夫人。——原注

救出苦难；第二，心中明白自己已经被上帝的家族所接纳；第三，他们有丰富的遗产；第四，他们正朝一个永远存在的天国前进。这个天国的幸福存在于在那里建立的社会，存在于上帝的家族中。来自不同国度的不同年龄的成员——主教、先知、使徒、殉教者和在迫害中坚守信仰的教徒，以及耶稣的追随者，都将面对面相见，当然首先要面对的是救世主。在对天国的描述中，作者呈现出非常生动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风格。

23日，马礼逊陪同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去广州，和中国政府官员会见，马礼逊的在场是不可缺少的。他在海上航行中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在虎门(Bogue)，他离开了一艘炮船，整夜都呆在一个没有遮篷的小船上，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酷热和暴雨中。因此，他上岸后，面对激烈的、让人焦心的谈判，已经精疲力竭。25日，他写道：“今天在毒日头下，在从我的住处去往律劳卑爵士所在公司驻地的途中，我差点晕倒在路上。从那时倒在床上呻吟到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第二天，他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一直在开议事会，负责书面翻译。27号是星期天，他主持了中国人的祈祷活动，也许这是上帝给他的莫大的荣幸，让他看见了这个最大规模的集会。同时，老李也让他特别高兴，一直以来，老李都在为他做誊抄工作，他告诉马礼逊，自己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前一天，他的名字和那些被国王委任的官员一起，列在那些随军医生、教士和私人秘书之上公布了出来。第二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去上班，置身于中国人和英国官员的争吵中，度过了熬人的一天，尘世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星期二，他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星期三，一位军医被派来了，大夫们、他的儿子还有仆人们尽了一切可能的尝试，但是，在他身上肆虐的高烧显然一点也没有减退。公司只好让他告假离开广州，但他虚弱得根本无法动身。星期五晚上，随侍在病床边的大夫们想尽方法来减轻他的病痛，但他很快就昏迷过去了。大约晚上10点钟，他闭上眼睛，溘然长逝。这是功德圆满的长眠。他会在天国的荣耀中苏醒，他会静静地进入救世主为他准备的天父的圣殿。这一切，如他在最后一篇布道



中论述的一样,好像早就有了预示。

马礼逊的长子(儒翰)以温情而充满抚慰的言辞把他父亲逝世的噩耗通知了他的继母:“7月25日,星期五,在睽隔近5个月后,我又高兴地看到了父亲。但我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父亲的身体已极度虚弱,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但体力的虚弱并没有影响他清晰的思维。27日是星期天,他还主持了一个中国人的祈祷会,并尽全身力气向与会者发表了一个演讲。在这片异教的土地上,在一个无视人格的帝国的一个最堕落的城市中,一群中国人聚在一起祈祷,赞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确是一件让人欢欣不已的景象。从这些中国人的嘴里说出的赞美词远比平时更庄严。赞美声消失后,我们都已明白,这些词语已深深植根在他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大声赞美主的献身、主的复活和主的永生。

“星期一和星期二,他更加虚弱,也更加痛苦了。星期一,他还两次乘轿子前往律劳卑爵士的官邸。第二天,轿夫都不敢来了,但即使他们来了,他也不能出门了。”

马儒翰先生详细地描述了截止到星期五晚上对他父亲所做的治疗情况。他这样写道:“由于前一天晚上使用的镇痛剂起了作用,父亲的痛苦有了一定的缓解。所以,第二天他请求用同样的方式来减轻他的痛苦。但他的身体发着烧,所以大夫们不敢在不给他放血的情况下给他用镇痛剂。他听任医生们的摆布,已经无所谓任何个人意愿可言了。他们打算给他放血,但为时已晚,扎上手臂时已不能放血了。因为他很快陷入昏迷状态,镇痛剂也不必用了。此刻他似乎已经摆脱了一切痛苦。但他仍然在床上动,安静不下来。我急忙出去取了一点药,等我回到他身边时,他已脸色苍白,但双目却炯炯发光。他的脚渐渐冰凉,我们用人工方法极力维持着他的血液循环,但我们的全部努力也只能如此了。唉,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他不能说话了,大约挣扎了20多分钟后,10点左右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了。那一瞬间,我们毫不怀疑他解脱的灵魂已身着基督的‘正义之袍’(robe of christ's righteousness)和已获得拯救的盛装,站在了上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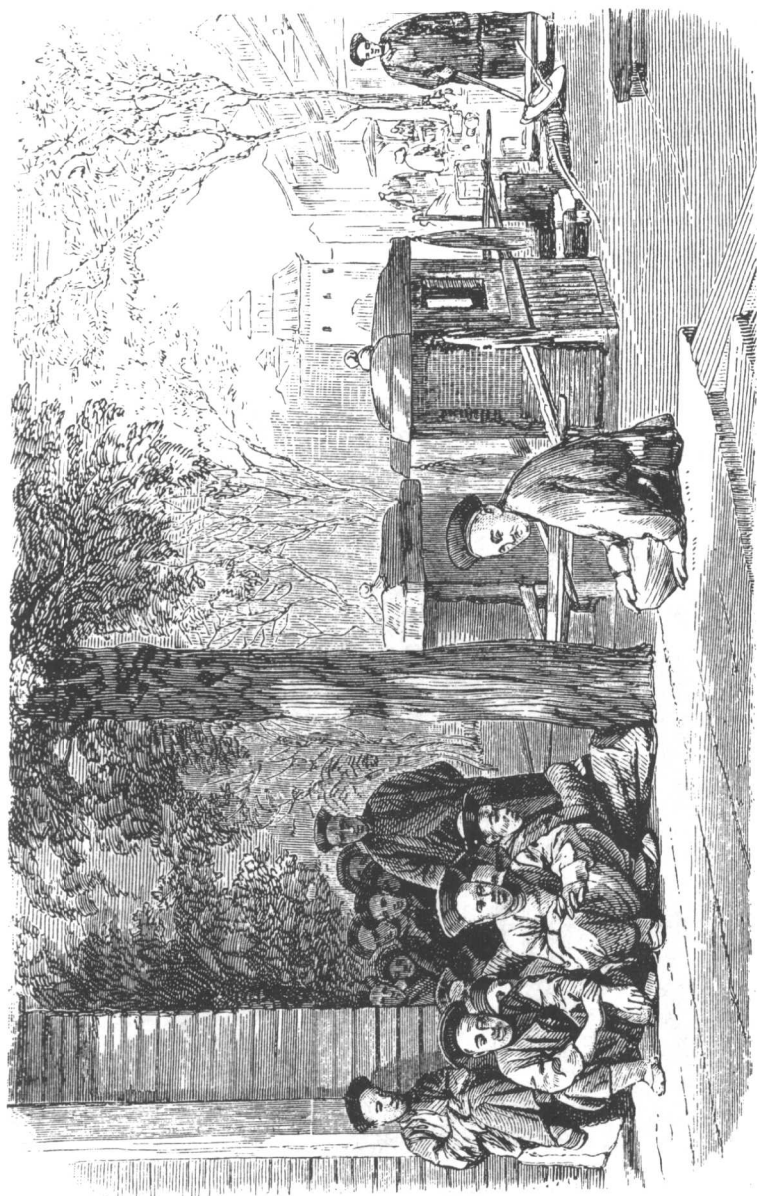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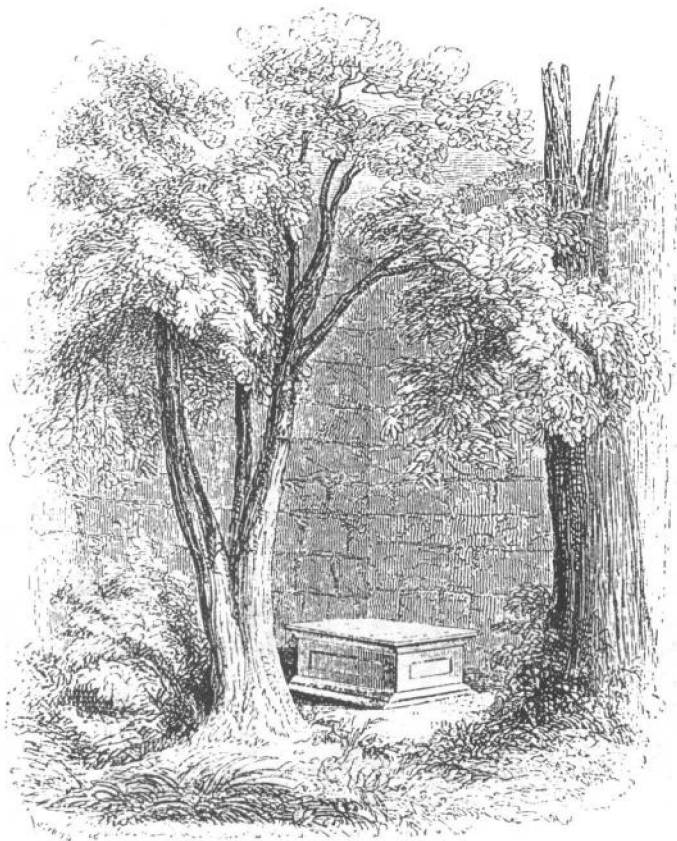


图36 轿夫

面前。

“星期六晚上，我把父亲的遗体运上停泊待发的船，护送遗体前往澳门。把他安葬在我生母的墓旁。”

律劳卑爵士以及所有在广州的欧洲人、美国人和亚裔英国人都来他家护送他的遗体，并一直护送到码头。乔治·罗宾臣爵士 (George Robinson) 和其他尊贵的绅士一直把灵柩护送到澳门，葬礼祷文由广州的海员之友会牧师史第芬宣读。



澳门的马礼逊墓(程耐里画)

以下是镌刻在墓上的铭文：

212

#### 纪念神学博士马礼逊

马礼逊博士是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徒，在华 27 年，致力于把精力奉献给拓展神圣救世主的事业。在此期间，他编纂出版了《英华字典》；创建了马六甲英华书院；数年来独自辛勤翻译《圣经》中文版；他见证了《圣经》中文本的出版及在那些注定该读此书的人们手中流传。现在，他已安睡在主耶稣的怀抱中。

马礼逊博士 1782 年 1 月 5 日生于诺森伯兰郡莫珀斯，1807 年受伦敦差会之遣来华，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任中英文翻译达 25 年之久。1834 年 8 月 1 日卒于广州。

为那些为主的事业而献身的圣者祈祷吧，从今以后，献身于主神圣事业的人尽享天国之福：

圣灵说，让他们安息吧，他们的业绩永垂青史！

## 第十四章 马礼逊的足迹和成就

“和泪播种者终将收获欢乐”，  
我如是思忖一如看见晶莹的雨，  
把那当做沉默的、悲哀的工作  
从中结出荣耀的硕果，并永远保有。  
上帝允诺把我们抬升到高处，而他  
却以真诚的谦卑把自己沉入深谷。

——基布尔

一个具有丰富而伟大的智慧的人从这个世上离去了，他的逝世不仅在中国和英国，而且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引起了极大的悲哀。英国、美国甚至欧洲大陆的宗教社团迅速对马礼逊的人品和他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伦敦差会安排了一次公祭来纪念马礼逊长期以来为传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在仪式上，由斯特普尼的神学博士弗莱彻牧师(Fletcher)对济济一堂前来参加公祭的人们讲道，给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马礼逊博士在中国的朋友为数众多，而且有些人还很有影响力，他们马上决定要成立一个纪念机构，以便永久保存马礼逊的部分成就，而公众对他的推崇亦同时可以得到适当的表达。一场慷慨的认捐活动就此展开，一共募集到大约 2000 英镑。1835 年，“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并启动运作。

马礼逊的一生就像是一个不断自我牺牲、努力完成一个伟大使命的过程。在他的学生生涯开始之初,他就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拯救异教徒。他在语文学上的成就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努力。多年来他所履行的民间和官方职责仅仅是出于在这个国家站住脚的目的,以便能不受干扰地追求更崇高的事业。他的工作成就得到了雇用他的财源富足、影响广泛的东印度公司最满意的认可和真诚的赞赏。这段时间他所得到的薪水使他不必依赖伦敦差会的基金生活,甚至可以用来慷慨捐赠,以推进在东方的传教和教育事业。在与博学多才之士和著名人物的交往过程中,这些人已将他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因为他个人在学术方面的广泛成就、他的天生的尊严感,缩短了他与别人之间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产生的距离。跟他一起工作的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都很尊敬他,将他视为自己的朋友,无拘无束地和他来往,充分地信赖他。他所完成的事业将作为孜孜不倦、勤奋刻苦的丰碑留在人们心中。主要以他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圣经》中译本很久以前就由别人的新译本取代了,后人的译本更完善、在风格上也更地道。但这并没有损害对马礼逊的译本的赞扬,因为他人是在马礼逊的不懈努力的基础上才建立起了了不起的成就。《英华字典》是一个奇迹,是艰苦、勤奋和智慧<sup>215</sup>的结晶,多年来一直在被使用。作为一部个人的著作,它的宏篇巨帙以及百科性质在人文著作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编著的其他著作的书目不胜枚举,仅就他笔下源源而出的论述基督教教义、历史和教育的书籍以及教义问答、祈祷书、赞美诗等,就令人不胜惊叹。麦都思博士在《中国:它的现状和展望》一书中说:“从1810年到1836年,有不少于751763册劝世小册子和书籍从中国的传教印刷所中分发到各地。这些书中相当数量的图书都是马礼逊博士撰写的。”而麦都思博士表示这个书目所提供的还不是完整的统计数字。

至于他的值得一记的成就还得加上他在建立宗教团体和帮助主持各种慈善活动上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团体的建立和活动的发起都归功于他的热情和干劲。马六甲英华书院牵扯了他的大部分精

力,为了书院的兴盛,他慷慨地付出了时间和金钱。虽然英华书院按照它的创建者的构想还有很大的不足,但毕竟已经相当不错地建立起来了。没有完成的计划还有很多,其中新加坡书院和东文书院的办学失败决不能归因于马礼逊博士,与其说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办事人员缺乏信心,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基督教未能及时认识到从这件事中可能获得的利益。

216 马礼逊的性格呈现出多种理应博得赞赏的特点和素质。他对知识有一种狂热的渴求;对正直的道德观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做事凭真正的良心;他有一种坚韧、不屈不挠和不畏劳苦的精神;他对基督之爱的持久激情和对基督荣耀的热望就像一种内在的火焰,一直在他内心里燃烧,这火焰激发了他心灵和脑海中所有美好的品性,形成了他高贵的人格。他非常胜任上帝所赋予他的使命。他的谨言慎行,他的判断能力及对事件的看法,从未让他失望过。所以,他在前进的路上从未退让过一步。受洗的仅仅只有少数几个人,有理由为他们高兴,因为这些经他施洗而进入教会的人,从来没有因为不履行教义或是背叛教义而让他遗憾过。如果说他没能集合百姓来听他宣讲福音,那么我们必须谨记,他当时所处的状况和环境不允许他举行公开的宗教仪式,他只能采取别的允许他做的方式,即通过出版物的感染力来接近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忍耐力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但他对这项事业取得最后的成功所持的信心从未动摇。他经常得面对宗教迫害,他的生命也由于皇帝对宗教的禁令而受到威胁。面对威胁,他镇定自若,依然倾心倾力地从事传教事业,而那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他生活在中华帝国,他对中华帝国的兴趣日益增长,对中华帝国显露出的皈依迹象充满信心。这种精神和禀性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它一定会在那些熟悉他的姓名、了解他的业绩的地方,在芳香和祝福中得到扩展和传播。

马礼逊博士死时,他的儿子虽然只有 19 岁,但已被任命为其父的继任者——英国使团的中文秘书和译员。他成熟的个性、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感悟力和对中国语言的精通与纯熟,再加上他对中国政

府的组织形式、一般惯例和原则立场的深入了解,使他的工作赢得了英国政府的高度赞赏。作为璞鼎查爵士(Henry Pottinger)的随从,他在整个中英战争期间担任璞鼎查爵士与中国当局谈判的首席译员,还担任与中国人一起草拟奠定英、中两国和解基础的条约的英方首席代表。他在谈判中精明强干,在谈判技巧上折中调和,既小心维护英国的尊严,也公正地对待中国,他以永不懈怠的热情专心致志于责任重大而又繁重的任务,直到他的政府和<sup>217</sup>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起了和平。

马儒翰是一个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上帝的基督徒,是在中国当地基督徒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对待时的劝慰者和保护者,是那些受遭到中华帝国或毗邻地区定居点传教的传教士的同道和赞助人。他的每一分努力都旨在提高东方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负责的公务虽然繁重,但他赢得了雇主的信任和赞赏。他太在意于他们对他的看法。他获准休假一段时间,那样他就可以恢复一下元气。但繁重的任务使他一再推迟假期,直到他发烧卧床不起。当时正值时疫蔓延。1843年8月29日,他因时疫在澳门辞世。他下葬在当地的公墓,与他的父母长眠在一起。

马儒翰除了担任驻华商务监督的汉文正使一职以外,还当选香港定例局与议政局议员,香港政府辅政司。他的死讯公布时,英国皇家商务监督璞鼎查爵士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他认为,马儒翰的辞世是大英帝国的损失,没有任何活着的人可以代替他的位置。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准男爵在英国下议院对马礼逊父子的逝世发表讲话,称在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再也找不出具有他们父子的高尚品格和忠诚的人了。

马礼逊博士的长女嫁给了合信医生(Hobson),一位在广州传教的学识渊博的开业医生。在一部18卷的医学著作中,他们留下了一段意义深长的记录,这段记录表明,她那荣耀而大名鼎鼎的父亲有一对多么值得夸耀的子女。



## 第十五章 伦敦差会

透过马其顿午夜的黑暗，  
无数的人齐声哭喊。  
在庄严的祈祷中，  
可怕的绝望之缄默意味深长。  
灵魂苦涩的呼号，  
从远方传来，帮帮我们，否则我们死亡！

219 伦敦差会曾经大胆地尝试进入中国传播福音。差会接连派出了许多人，他们都勤勤恳恳地开展工作，奠定了在东方各国华人圈中建设一个影响广泛的基督教教会的基础。米怜博士于1813年受遣赴华，紧接着是麦都思牧师于1817年赴华。麦都思先在马六甲服务，继而在爪哇岛巴达维亚的华人中传教。1842年五大通商口岸开埠后，他迁至上海。他是传教这一领域的资深传教士，对中文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他风度迷人，举止庄重。他的语言天赋使他善用中、英两种语言作动人的演讲。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以演讲形式传播基督教知识上，但在以文字传教方面他也用力甚勤。1835年，他出版了《麦都思中英文字典》（8开本，1500页），该字典非常适合普通学生使用。后来，他又编写了高丽文、日文和中文词典，译出了《新约》的一个新中文版，撰写了几种极有价值的阐述基督教的小册子。1836年，他在访问英国的时候出版了他最引人入

胜的一本书,题为《中国:它的现状和展望》,这部鸿篇巨制加深了教会那片土地的国计民生的关注。麦都思回到中国后,一心扑在他的事业上。直到1856年他再次回到祖国为中国的事情游说,在踏上祖国的海岸后不久,他的生命突然戛然而止。他死于1857年1月24日,享年60岁。留给世人的是虔诚无瑕的清誉和充满仁爱的事业的芳泽。

其他几位传教士服务于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主要是在华人居民中传教。这些人由于健康原因或其他原因,不久都返回了英国,就无需再作进一步的详述了。高大卫牧师是个前途无量的人,他在1822年被派往马六甲,接替米怜博士担任英华书院的负责人,翻译儒家“四书”。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中文,并以高昂的热情和显著的成效一直工作到1828年。后来,他的健康恶化,不得不启程回国,在回国的途中,他长眠于天国。

撒缪尔·戴耳(Samuel Dyer)是另一位值得称道的伦敦差会牧师。1804年,他出生于格林尼治,1827年抵达槟榔屿。马礼逊博士在英国时,曾和戴耳先生多次会面。主要是在马礼逊的指导下,他才有可能似懂非懂地阅读中文版的《圣经》,那还是他开始传教以前的事。在翻译、传教、刻字和教育年轻人诸方面,戴耳的确表现出色。在1843年他逝世之前,他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发挥他的影响。他去过香港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传道会议,并应召参与翻译一种更完善的《圣经》中文本。他被委任为那次会议的秘书,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劳。会议的目标是把采用同一种《圣经》中文本的在华福音派联合在一起。出席会议的先生们未能提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特别是在“God”一词译为“神”还是译为“上帝”这一术语的翻译上,分歧尤大。所以,经过数天的讨论,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戴耳接着去了广州,他在那儿经受了一场高烧的折磨,但刚刚病愈,就启程前往新加坡。船在澳门停留时,他的病又复发了,被送到岸上去治疗。上岸后不久,他就静静地去世了。启航的汽笛拉响时,他再也没有醒来。他的最后遗言是:“神圣的耶稣啊!慈爱的救世主啊!我去和为我而死的主同在!”他被葬在马礼逊博士的墓侧,两个在生活中亲密合作的伙伴长眠在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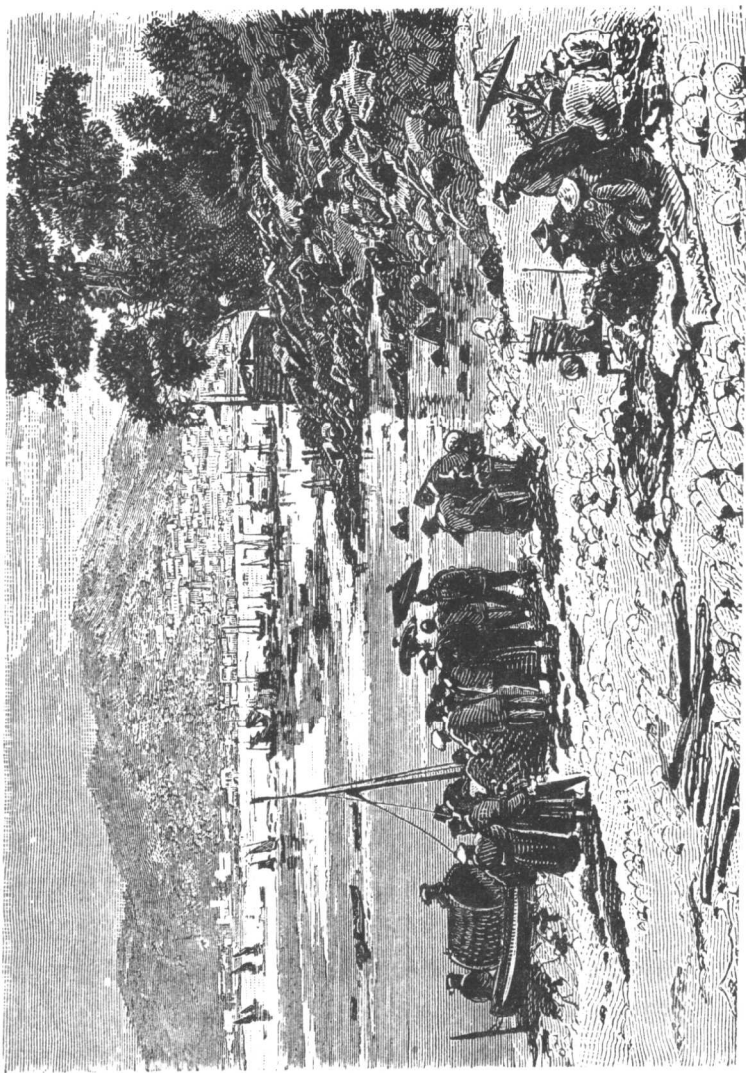


图38 宁波港

伦敦差会的传教代表们一直坚持不懈地试图在马六甲海峡华人定居点建立起基督教的基础。但 1842 年鸦片战争结束时,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宁波变成了五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香港岛变成了英国殖民地,传教代表们搬到了中国,并在一些城市建起了教堂、学校和大型印刷机构。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也迁到了香港,多年来一直由牧师理雅各博士 (James Legge) 出色地管理着。许多人在英华书院里接受了中英文教育和宗教方面的悉心指导,很多人表示笃信基督,有些人还成了基督教的传教代表,还有些人出任商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译员,他们在这些部门发挥着广泛而有益的影响。



图 39 葛雅各牧师,硕士

1839年,伦敦差会派出了第一位医务传教士雒魏林博士(W. Lockhart),这位雒魏林博士先在澳门服务,后来去了上海。与他同时和随后的牧师有理雅各牧师、美魏茶牧师(W. C. Milne,米怜博士之子)和合信医生(后来成为马礼逊的女婿),紧随其后的还有许多传教士,所有这些人的名字都永远镌刻在了中华帝国福音传教史的史册上。这些人中可以举出:慕维廉牧师(W. Muirhead);艾约瑟牧师(J. Edkins)、神学博士;湛约翰牧师(J. Chalmers)、神学博士;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神学博士;还有其他几位。他们在香港、广州、汉口、上海、天津和其他中国城市作出了切实而有益的贡献。

现在,伦敦差会传播福音的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他们在中国的五个省区都建有重要的机构,在以神圣之光照亮这个世界上最黑暗、最强大的异教帝国的工作中,依然保持着与传教先驱相称的地位。由伦敦差会的代表所负责的主要传教中心有下列几处:

北京:——不仅有一个布道中心,还有一所医院和一所女子职业培训学校。职员中有18位是欧洲传教士,另外还有许多当地信教的助手。文书田牧师(G. Owen)是当地的资深传教士。令人深以为憾的是,葛雅各牧师(J. Gilmour)最近去世了。他是一位极具有性格魅力和富有原创性的人。他善于入乡随俗,以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博得当地人的信任。因此他既能推动这项伟大的事业,又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他热情地投身到蒙古的传教事业中,以至于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老葛”。他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人们的赞颂。他全身心地从各方面为蒙古人着想。作为医生,他为解除当地人的病痛开方给药,而抛弃了个人舒适的家庭生活,自愿到各地出诊。他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他的花费大都用在工作上了。《观察家》(*Spectator*)杂志上刊载过一篇精彩的评论,评论他的引人入胜的著作《在蒙古人中间》,文章写道:“谈到危险,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要携带武器,他也从不因为异教徒们的突然举动而生气,虽然没有提到过这些,但他确实什么都不害怕——无论是狗还是小偷,无论饥饿还是气候,他对一切都处之泰然。这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说

的：‘他是受神的感召来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因为没有人能想到这么一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做着这么一些平平淡淡的小事。’”

京城的女子职业培训学校是一个出色的机构，管理井然有序，学校的主要目的是训练信奉基督教的妇女，这些妇女今后可能给女性们讲解《圣经》；或者可能成为传教士和当地传教代表虔诚而得力的助手。

天津：——伦敦差会在这个重要的滨海城市开展工作始于1861年。对中国的传教代表来说，很少有比天津的传教环境更好的地方。天津不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而且是一个中心，它的周围区域辽阔，四面八方、海陆两路的人都汇聚到这里；而且，这里是中国铁路和电信的中心枢纽，比其他地方更深地接触到西洋文明模式。因此，天津无疑是几大传道会的大本营。理一视牧师（Jonathan Lees）是一位资深传教代表，自1861年天津开展传教以来就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其他几位传教牧师、两位医务传教士和两位女传教士。几年前，主要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慷慨资助，天津建起了一家很漂亮的医院——马大夫医院。这家医院的创办主要得力于马根济大夫（Mackenzie）、霍华德小姐（Howard）和金夫人（King），两位大夫为总督夫人提供了帮助。多年来，医院一直由伦敦差会管理。由于一些中国官员的干预，医院在管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机构的正常运作并没有多少改变。

天津传教工作中一件令人很感兴趣的事情是布赖森夫人——布赖森牧师（T. Bryson）的妻子——管理下的女子学校。布赖森夫人有25年的传教经历。1885年，布赖森夫人为妇女开办了一个班，星期四下午授课。一开始，来参加学习的人员众多，无疑这些人是受了好奇心的驱使；但渐渐地，学员减少了，只有少数人坚持了下来。然而坚持下来的这少数人都极为认真，她们怀着极大的诚心学习进行祷告的方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所女子学校就开办起来。当地一位资质很好的女子受雇担任学校教师，她曾经在北京受过艾约瑟夫



图40 天津的布翰森学校

人的教育。学校中的 15 名女孩子都得到了老师的悉心指导,她们熟谙基督教方面的知识就是证明。从这所学校中出来的学生使传教多了一些虔诚的助手。对中国这样一个极度忽视妇女教育的异教国家,一个社会习俗禁止其妇女公开参加传播福音集会的国家来说,怎么评价这一机构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汉口:**——汉口传教士的灵魂人物一直是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他是一位博士。他于 1855 年前往中国,用一句恰如其分的话来说,他现在仍然是这一领域中坚定而经验丰富的老传教士。他的工作刚起步时,曾得到威尔逊牧师(R. Wilson)的帮助,后者是文学士,卒于 1863 年,葬在基督教公墓里。汉口市中心有一座小教堂,传教士和当地助手每日对那些川流不息的人群讲道,时间长达 4 至 5 个小时,从不间断。在英国租界附近有一家医院和一所男童学校,还有教师的宿舍,而传教士居住区的另一部分是一所女子学校和教师宿舍。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传教机构,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里还有几个乡村传教站。武昌也有一个传教站,有两个英国牧师居住在那里。汉口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使得在该地的传教活动极有前途,极具影响力。汉口一家由纪立生(T. Gillison)医生领导的医院,可以收留大约 70 位病人。除此之外,一家新兴的为女性服务的医院于最近落成。医院主要是由杨格非博士出资,以纪念他已故的妻子玛格丽特·约翰(Margaret John)。

**厦门:**——在厦门这个重要的海滨城市,施敦力兄弟(John 和 Alexander Stronach)在 1842 年《望厦条约》签订、厦门对外开放时,建立了一个传道会。施敦力兄弟以前在新加坡效力,分别于 1847 年和 1848 年追随何斯伯(Hirschberg)和喜施来(Hislop)两位博士而来。两兄弟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现在,资深的传教代表有玛高温牧师(J. Macgowan),他在 1859 年投身传教事业。紧跟着他的是山雅谷牧师(J. Sadler),他于 1866 年入行。这里还有两位从事传教工作的女传教士。除了通常采用的传教手段以外,他们还建成了一艘传教船。传教士们可以搭船到附近海岸上的几个传教站传教。船很漂





图41 纪里生博士和汉口医院的布道者

亮,是考虑到传教的特别需要而建造的。

上海:——老资格的传教士韦慕廉,很久以来一直在上海服务,并赢得了中国各教会团体的代表们的尊敬和信赖,他管理着日常工作;另有两位女传教助手,为该城的年轻姑娘们做了很多工作,管理着一所极出色的基督教会学校。的确,在这个城市里建立这样一个学校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这座声名远扬的城市中,有一代代的女婴被遗弃后,因饥饿而导致死亡。

香港:——从1842年这个小岛租让给英国那天起,理雅各牧师即后来的理雅各博士,就来到那里,积极从事各种传教活动。他是一个能力很强而又造诣颇深的人。他为中国基督教事业所做的大量文字工作,使他的名声家喻户晓。英华书院从马六甲搬迁到香港,就是因为他把创造一个适宜的氛围作为第一要务的结果。随后和他一起传教的有:纪里士卑牧师(W. Gillespie)、纪里兰牧师(J. F. Gleland)、湛约翰牧师(J. Chalmers)和医务代表何斯伯医生及合信医生。由一些有信仰的人来管理医院成了传教事业中的标志性工作。雅丽氏利济医院创立已有数年,现在在汤姆森(Thomson)医生的监管下,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里的资深传教士还有湛约翰牧师,其助手是文显理牧师(G. H. Bondfield)和罗小姐(Rowe)。

广州:——广州是在中国最早开展传教事业的中心。马礼逊博士所做的全部工作似乎都消失殆尽了。只有伯驾医生(Parker)还小心维护着一块传教基地。伯驾医生建立了一个医药传教团体——在华医药传道会,但只被允许在外国商馆的有限范围内开展活动。1848年,纪菲兰牧师(T. Gilfillan)抵达广州,重新开始活动。现在,广州的负责人是皮尔逊牧师(T. W. Peerse)。

伦敦差会保存的记录中,有关中国传教的部分非常可观。通过差会的医药传教士和为男儿童所开办的日校和寄宿学校,差会已经实现了许多重大的目标。但它主要是为中国和普世的传教事业带来博学的学者和热忱的教士,像理雅各博士、湛约翰博士和杨格非博士,还有传教伟人、作为本传传主的马礼逊博士,等等。在中国,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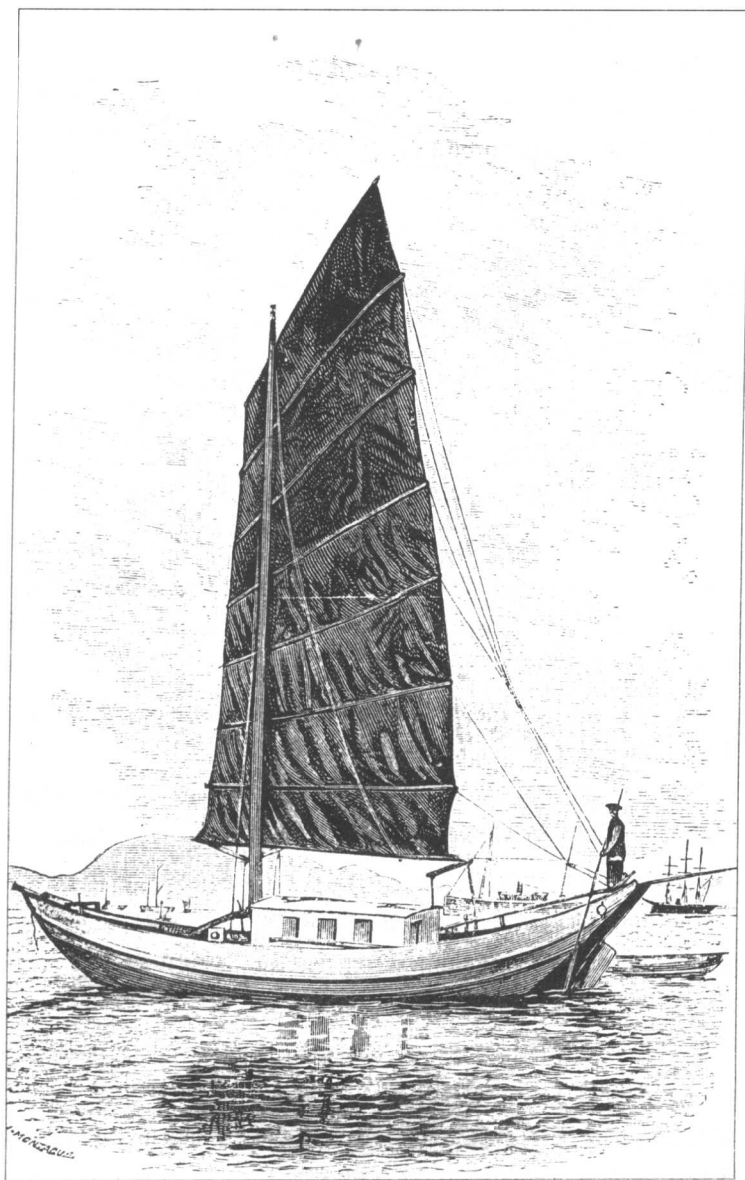


图 42 新式的厦门传教船

差会有 31 位受按立的牧师, 13 位女性传教代表, 8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和 72 位未受按立的助手和大约 4000 名教友, 以及 2000 名在校学生。如果考虑到当时基督教在中国所处的困境, 那么这已经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可观的成就了。

1842 年, 中国对外门户开放, 传教士开始大量到中国居住, 修订《新约》译本或者重新翻译《新约》就成为当务之急了。由不同教派组成的一个代表委员会于 1847 年 7 月开始工作。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是麦都思牧师、裨治文牧师和施敦力牧师 (John Stronach), 他们在两年内完成了工作。新译本是一个学术性的成果, 风格明晰, 表述地道, 是一个可信的译本。鉴于这项工作的成功, 代表委员会准备对《旧约》作类似的重译, 米怜牧师被补选入委员会。1854 年, 这项工作圆满告竣。很快, 《新约》的北京官话译本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重要译本完成后不久, 死神之手便伸向了麦都思博士——这位资深的委员会主席。不列颠和外国圣经公会马上作出决定, 广为散发这一新译本。由于安杰尔·詹姆斯牧师 (J. Angell James) 的真诚呼吁, 《新约》印行了 100 万本。圣经公会派代表前往监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分发和销售工作。

## 第十六章 后有来者：美国和大陆差会

上帝之手并不在虚空中播种，  
长眼中有心爱的种子发芽；  
四季来了，变化着然后消逝，  
而所有的心田里尽是丰收的庄稼。

——洛威尔

紧随着伦敦差会之后想方设法进入中国的是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1826年它派遣郭实腊牧师(Charles Gutzlaff)作为随军教士，肩负着荷兰政府的使命前往中国。郭实腊于1827年抵达爪哇岛，但在1829年辞去了工作，以便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祷告、写作和分发基督教书籍，访问停泊在暹罗、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的港口的船只。马儒翰死后，郭实腊继任香港当局的中文秘书一职直至逝世。他成了一个学有专攻的汉学家，完成了《圣经》的一种译本。他还撰写了一些历史和宗教书籍，这证明他是一个好学和勤奋的人。1832年，陆特嘉牧师(Herman Rottger)继他之后来到中国，陆特嘉牧师在澳门和香港服务了多年。到1846年郭实腊退休的时候(原文如此——编者注)，荷兰传道会也解散了。郭实腊死于1851年。

美国人随即前来，到这个重要的地区来冒险。1829年美部会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代表美国公理会派遣雅裨理和裨治文牧师来中国。1830年2月,他们受到马礼逊博士的接待。这两位富于牺牲精神的传教士在马六甲海峡定居点的马来人和华人中辛勤工作,但从1842年起,直至1846年马礼逊去世,雅裨理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建立厦门教会的工作中,传教事业在这座城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虔诚和开创事业的热情。

美部会随后很快又派遣了許多人前往中国。杜里时牧师(I. Tracy)和卫三畏牧师(S. W. Williams)在1833年相继而来,居住在新加坡和澳门。同一年,詹思文牧师(S. Johnson)和文信牧师(S. Munson)前往曼谷和苏门答腊。迄今为止,只是为了打开这个伟大黑暗帝国的大门,该传道会不惜人力和财力。现在,美部会在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四个大的传教中心,它们又管理着若干个小的传教站。这些大的传教中心有以下四处:一、福州,其下属拥有15座教堂;二、华北,包括北京周边地区,张家口、天津、通州和保定府,围绕着这个中心传教区的各个地区有若干较小的传教站;三、山西,有两个传教点(这一地区由于种植鸦片而应受诅咒);四、香港,那里有一位传教士,过去7年来,主要从事面见和设法招募中国人前往美国,再接待从美国回来的中国人。在通州,狄考文博士(Mateer)主持创办了一所书院。通州是中国科举考试的中心之一,因此可算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狄考文博士相信,现代科学之光与中国人的迷信呈现鲜明的对比。所以,他和他能干的妻子一道,向他照顾下的年轻人和孩子们教授天文学、数学、自然哲学和历史。结果是他把那些年轻人都塑造成了在整个华北地区可以胜任教师的人才。他特别培训的那些讲解《圣经》的年轻人员也显示出他们是本土宗教事务中最出色的人才。后一项工作得到了倪维思牧师(Nevius)和郭显德牧师(Corbett)两位的合作,他们每年有部分时间在芝罘对获选从事宗教事务的人进行神学教育。

美部会下属一些主要传教站、大的药品分发站和医院、男女寄宿学校及为本地学生开设的书院,还有其他一些为传教的大目标而服

务的设施。美部会有 28 位传教士、16 位女传教代表、10 位医药传教士、4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105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近 1000 名教友，还有 450 名学员。

其他美国传道会很快仿照公理会，委派传教代表以他们的名义去协助中国的福音化事业。

**美国浸礼会 (The American Baptist Board)** 于 1834 年派遣怜为仁牧师 (William Dean) 前往中国。他原先居住在曼谷，后来移居香港。1835 年，美国圣公会派雒爱华牧师 (H. Lockwood) 前往巴达维亚。1837 年，美国长老会任命厄珥牧师 (R. W. Orr) 和米切尔牧师 (J. A. Mitchell) 前往新加坡。这些传教会都雄心勃勃地推行着一项宏伟计划，今天，有大量的从业者在他们各自的传教使命中辛勤耕耘着。浸礼会在宁波、汕头和其他地方有 16 位传教代表，其他 6 个浸礼派传教团体在这一地区也有传教站和传教士，虽然其中一两个团体的工作还很薄弱。

**美国圣公会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 把总部设在了上海。他们在上海拥有非常充足的雇员，工作很有成效。继骆爱华牧师之后，神学博士文惠廉牧师 (W. J. Boone) 于 1837 年前往巴达维亚。他后来迁往厦门，但 1843 年他又被调往上海，成为中国教区的主教。很快，寄宿学校纷纷创办起来，一家医院也开了业。施约瑟牧师 (Dr. Schereschewsky) 被分派以“北京语”翻译《圣经》新译本。他于 1875 年完成了翻译工作。在上海，另有一所医学学校，用以培训本地大夫、外科医生和护士，还有一所书院用来培训本地的传教士。武昌、汉口、芝罘和北京的传教站，再加上上海的传教站，美国圣公会共有礼拜场所 43 处，10 位传教士、3 位医药传教代表、3 位女传教代表、17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3 位未受按立的助手，大约有 500 名教友。

**美国长老会 (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America)** 于 1843 年改派他们的两位传教士从新加坡前往中国。现在美国长老会已经发展到拥有四个大的传教中心。1845 年，美国长老会进入广州。但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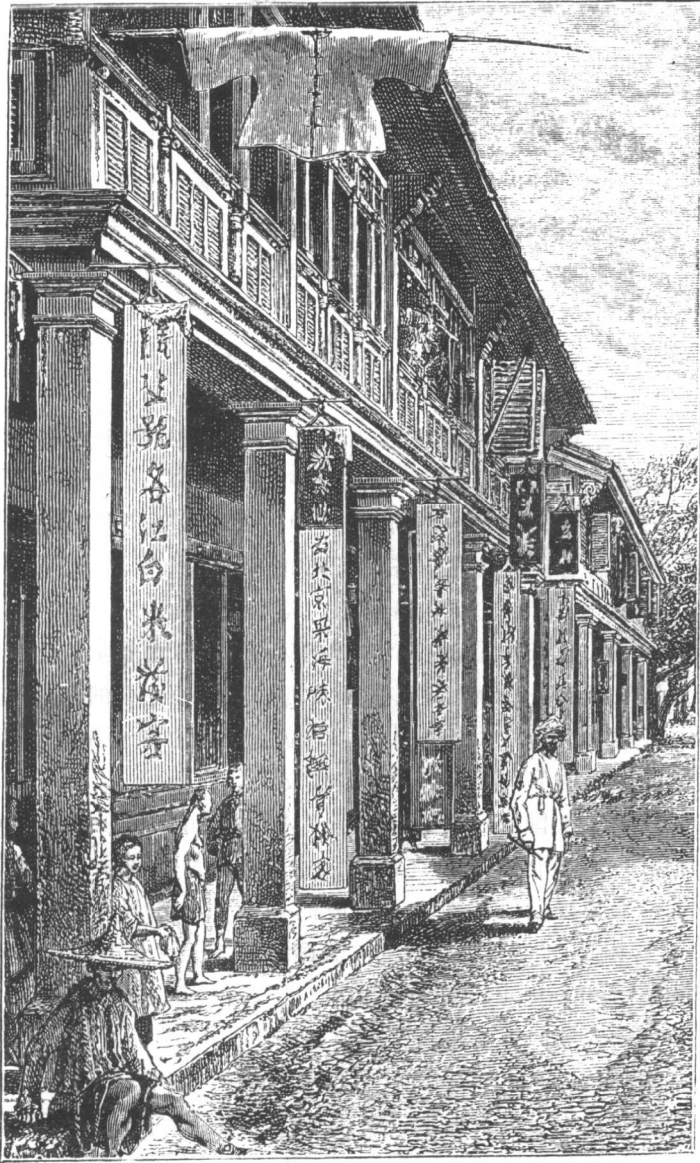


图 43 香港街景



到 16 年前,他们才可能为第一位皈依者施洗。今天,在这座城市中有 400 多人由于这些坚持不懈的传道者而获得了坚定的信仰。拥有一所医院是传教事业中起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澳门和海南的传教工作就因为有了医院才得以支撑下去。在传教事业中,医院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伯驾医生于 1835 年开办了博济医院。1845 年它被移交给美国长老会,由嘉约翰医生(Kerr)负责管理。美国长老会总会分为 5 个主要中枢,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包括宁波、上海、杭州、福州和南京。在上海,长老会要经营很广泛的印刷业务。这些业务不仅仅是几家一直有效运作的印刷厂,而且还有一家字模厂。在这家厂里,7 种规格的汉字字模,另加上英文、高丽文、满文、日文、希伯来文和其他文字的字模已经浇铸成型,拥有全套的电镀锌模和雕板印刷的设备。美国长老会还完成了大量出色的翻译工作。长老会编写的基督教历史和基督教教义的手册,正为中国大多数新教传教团体所采用。山东的长老会从其省会济南府向北拓展至芝罘,设立了许多传教站。据报告,大约有 3000 名信徒。北京教区是一个新兴的教区。该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在一个广阔区域内、热忱地向从北京周边地区直到皇城的芸芸众生宣讲福音真理。美国长老会的全体成员包括 48 位传教士、18 位女传教代表、23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84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还有近 4000 名教友。

1842 年,美国归正会(荷兰)(American Reformed Church (Dutch))继美国长老会之后进入中国。现在它拥有 7 名传教士和 114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厦门是其主要传教中心。大约有 15 个与其相关的教会。1847 年,美国美以美会(北方)(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Society, North)进入这一地区传教,其传教代表和信徒的人数一下子超过了其他教会。美国归正会的先驱人物就是柯林牧师(Judson D. Collins)。他极力呼吁美以美会进入中国传教。当他获悉教会没有这笔资金用于这项事业后,他写道:“在前往中国的航船扬帆启航之前,请给我订购一张船票。以我自己的力量让我进入中国,并在我抵达中国时让我坚持下去。”这样的传教热情

是无法阻挡的。柯林先生被派往福州。在福州,他经过 10 年的精心筹划,启动了一项宏伟的工程。这项计划涉及包括 60 个传教站的 6 个大区。一家印刷厂始终不停地运作着,仅 1888 年这一年,该厂就印刷了 1.4 万页宣传基督教的文字。一所大型书院通过当地一位乡绅的慷慨捐助也已经开始教学。传教也像风一样吹遍了扬子江两岸长达 300 英里的区域,南京和其他大城市都设立有传教站。往北方,北京、天津和遵化都建起了教堂,全都附设有学校、医院等全套相关机构。向西,美国归正会一直拓展至离大海 1400 英里的内陆城市重庆。美国归正会有 32 位传教士、91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和 4000 多名教友。

两家浸礼会已经宣布计划每年从美国派人前往中国。1848 年,美以美会(南方)仿照其姊妹教会的成例,派代表前往上海。在上海,他们经过努力,把影响扩展至几个邻近的城市。他们拥有 10 位传教士,5 位女传教代表,雇用了大约 198 位本地工友。他们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书院,从事分发救济物品和医疗的工作。

后从美国去中国的传道会,已经建立起来的有:长老会(南方)(Presbyterian Board, South),1867 年进入中国;加拿大长老会(Canadian Presbyterian),1871 年进入中国;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1826 年进入中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公理会(American Scandinavian Congregational Society),1889 年进入中国。传教事业中的这些年轻的新生力量很快占据了许多重要的领域,从而保证了他们今后更大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欧洲大陆的教会组织也投入他们的力量用来对付中国的异教教义。1847 年,巴色福音差会(Basle Evangelical Mission)传教士抵达广州,一位是韩山文牧师(T. Hamberg),他卒于 1854 年;另一位是黎力基牧师(R. Lechler),他至今仍健在,仍管理着教会事务。以广州为中心,在其周边地区有 11 座教堂,大量的财力和劳力都用于印刷宗教小册子、教科书和基督教教义手册。

就在同一年,礼贤传道差会(Rhenish Society)派遣柯士德牧师(W. Koster)和叶纳清牧师(F. Genaehr)前往中国。他们定居在广州,但是传教工作经历了重重困难和挫折。礼贤传道差会有4位传教士、3位女传教代表、8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工友和大约150名教友。

柏林传道会(Berlin Society)在1850年派代表前往中国,到1873年,传教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还保留了一些基地。但在1882年,他们又做了一次努力进入了这一领域。现在,他们已拥有了3个传教中心站,运作良好。4位外国传教士和35位本地代表一同工作,聚集了大约500名教友。

柏林育婴堂(Berlin Foundling Society)也在香港设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哈特曼牧师(F. Hartman)在4位女传教代表的协助下,正从事着热忧的慈善事业。这个机构创设于1850年。那一年,郭实腊牧师访问柏林,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中国的令人揪心的苦难。一位路德派牧师的妻子,名叫克纳克(Knack)的,决定设法减轻这种苦难。郭实腊博士说,在中国,有大量的婴儿被其父母遗弃。克纳克夫人成立了一个妇女组织,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救助这些弃婴。他们在香港租了一间屋子,这项慈善事业就这样开始了。在香港所能找到的弃婴并不多,他们是用篮子从中国的乡村地区带进香港的。一些弃婴被收养后,生活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很快就死去了,但不久,又有大量的弃婴被收养安置,接受教育。1861年,新起的和扩建的房屋竣工,驻港的外国侨民加上好善乐施的德国人的慷慨解囊,建立了基金。在20年的时间中,收养了300多个孩子,但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死去了。他们接受了精心的宗教教育,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他们还学习了算术、地理、历史和唱歌,学会了做各种家务。学校处在政府的监督下,女孩子们在考试中表现都很出色。她们通常都被调教得很听话,一些人还嫁给了当地的基督徒,一些人嫁给了学校教师,还有些人侨居外国。想一想,这些被遗弃的孩子获得了拯救,被调教成主耶稣基督冠冕上的珠宝,真是令人欣慰的事。

1884年,德国信义宗(General Protestant Evangelical Society)

派遣花之安牧师(E. Faber)前往上海,他只身一人在那儿工作。

于是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欧洲新教国家的传道会为了拓展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正在采取广泛、多样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毋庸置疑的是,基督教意识作为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伟大帝国的迫切需要,使中国人意识到它更适于激发人们的责任感,而已经采取的那些手段将会发挥多方面的作用。这恰好说明,对英国传道团体所做的工作不能给以过高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 第十七章 后有来者：不列颠差会

你丰沛的雨暖暖地落下，淅沥地落下；  
你是神的甘露，使大地温润肥沃，  
那在燃烧的沙地上干枯的根  
会绽放出花蕊，然后再次结果。

——金斯莱

追随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和先驱者的脚步之后，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英国差会是英国圣公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在《南京条约》签订、中华帝国的大门打开后不久，他们就派出使者前往中国。上海是这些传教代表最先登陆的城市。接着是宁波，然后是福州，再下来是香港和北京，更往后的是杭州、绍兴和广州。福州及其邻近地区的传教工作特别让人感到鼓舞。进入中国 11 年后，还没有一个人皈依，而在这一时期，已有两位传教士去世，两位传教士退休了，只有一位仍在坚持。这时，上帝恩准的收获季节来到了。在过去的 25 年里，在建立了宣讲福音场所的 130 个城镇村庄里，超过 7000 人表示皈依基督教，其中大量的工作是由当地的福音派宣教士做的。为了培训这些宣教士，除了建立了几所寄宿学校之外，还创办了神学院，医药传教士也得到了精心的培养。来自宁波和杭州的报告报导了类似的令人兴奋的成果。在杭州，除了开展通常的传教

活动外,还开办了一处戒烟所。对这个戒烟所,甚至还有这座城市的官员捐款出力的。英国圣公会传道会还用罗马字母或教会所在城市的几种方言出版了各种经文的若干章节、祈祷书和其他基督教书籍。该传道会有 28 位传教士、5 位女传教代表、11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8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2832 名教友和 2041 名在校就读的学生。

浸礼差会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在 1845 年进入中国。当时,浸礼总会的胡德迈牧师 (T. H. Hudson) 和嘉维廉牧师 (W. Jarro) 到了宁波。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提到该传道会在印度的早期传教士。他们在印度时对有关中国的一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语言学家的马士曼博士 (Marshman) 已经把《圣经》翻译成了中文,编写了《中国文法》,还把孔子的著作翻译成了英文。浸礼会的传教活动始于 1845 年,由于没有成效而停顿了一段时间。1877 年,传教工作又重新启动了,并在山西、山东两省做了一些很有益处的工作。浸礼会通过对本地产教士的悉心培养,为该会未来发挥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医药传教士也得到了该会的重视。现在该领域有 21 位传教士、1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和 8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还有近 1200 名教友。

英国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在 1847 年决定到中国开展传教活动。宾威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接受了前往中国传教的任务。他启程前往中国,先定居在香港,后移居厦门。<sup>211</sup> 10 年后,施密士牧师 (George Smith) 加入了他的事业。宾威廉先生是一个热情洋溢、勇于奉献的人。他和同事一道,在不利的环境下,在种种挫折面前,为建立今天已是中华帝国最广泛而繁荣的一个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老会的主要中心是汕头、厦门和台湾,这里有几个非常完备和出色的传教机构,包括教堂、传教活动场所、医院和学校,人们可以免费在这几个场所就医、就学和从事宗教活动。长老会的资深传教士是麦肯齐牧师 (H. L. Mackenzie), 他有硕士学历,长住汕头; 麦克葛莱牧师 (W. McGregor) 也有硕士学历,居住在厦门。施密士牧师是宾威廉先生的助手,但在去年 2 月 (1891 年)

过世,他是一位品格极优秀的人。英国长老会还得到了一个女性团体的大力支持,通过这个团体,长老会才得以从英国派遣女性传教代表前往中国。她们中的一些人有从事接生的执照,掌握了一些普通的医疗知识,这使她们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当地妇女的生育痛苦。英国长老会在中国和新加坡有 106 个传教站,聘请了 15 位受按立的传教士和医药人员,有 9 位女传教代表、5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和 93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大约有 3600 名信徒,培训学校有 400 位学员。

英国循道会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 1852 年派遣俾治牧师 (W. R. Beach) 和郭修理牧师 (J. Cox) 前往广州,随后,循道会在汉口建立了大本营。现在,汉口和湖北省的其他一些地方成了循道会的主要基地。在李修善牧师 (David Hill) 的指导下,教会所属的非宗教机构是汉口的循道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循道会还进行了一些实验,尝试在一些传教士中进行医疗培训,以便他们可以把宣教和医疗服务融合在一起。这些实验的成果也引起了其他传道会的极大兴趣。

1884 年,英国循道会决定开办一所附属于其中心传教团的书院或高中,具有文科硕士学历的巴修理牧师 (T. A. Barber) 被任命为负责人,他早在 1885 年年初就到了汉口。这所学校的目标是为中国官家子弟和富家子弟提供西方式的通才教育。他们试图购买一块土地,用来建造一座合用的建筑,但未能成功。1887 年,他们在武昌的一条主要街道租了一所大宅子,学校才得以开办。这所学校后来取得了成功,正如他们所预期的,学校直接或间接地对循道会的传教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英国循道会传教活动的方方面面的进展几乎都是振奋人心的,就连一个妇女协进会也有意派遣女性从业人员前往中国。循道会早期在华从事传教的有 25 位传教士、6 位女传教代表、2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33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和 975 名教友。

圣道堂 (Methodist New Connexion)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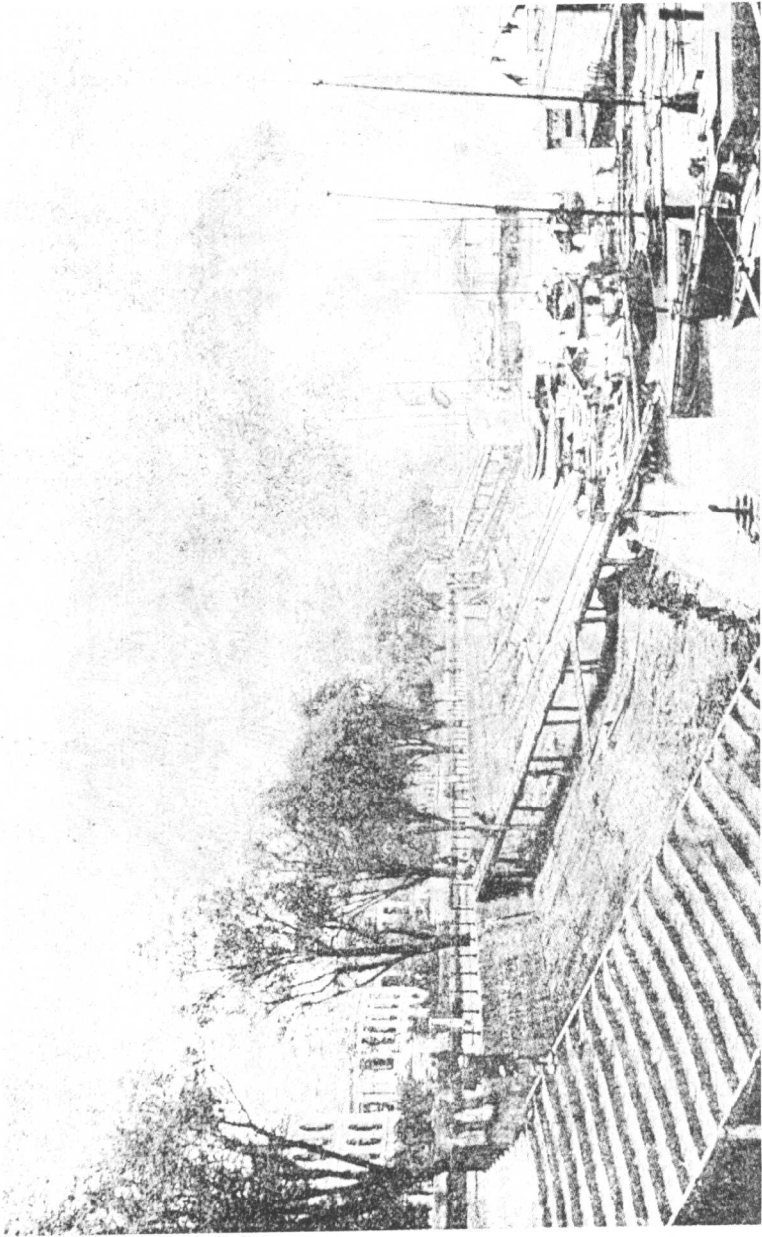


图44 江岸，汉口英租界的滨海道





图 45 殷纳逊牧师

束、《天津条约》签订后的 1860 年立刻就进入了中国。《天津条约》的签订显然为基督教会在全中国的传教打开了大门。圣道堂的先驱人物是殷纳逊牧师(J. Innocent)和何乃淑牧师(W. N. Hall),他们落脚在天津,当时那里还是传教活动未开垦的处女地。何乃淑牧师在 1878 年因染上热病而逝世,但殷纳逊先生依然健在,而且是传教事业的耆宿。天津城有三处布道场所,其中一处位于通衢大道上,每日

布道不断。而在天津的英国租界内，有一个传教大本营，包括一个培训本地学生为基督教服务的书院、传教士的住所和一所按基督教生活和工作方式培训本地妇女和少女的寄宿学校。罗宾逊牧师(J. Robinson)是该书院的负责人，华勒小姐(Waller)则负责管理女校。

圣道堂最大的传教区域是在山东省的东北部。那里方圆约 300 里范围的农村地区有 50 处左右的教堂。而这一传教圈的大本营是乐陵地区的朱家(Chu Chia)，朱家建立了传教场所、药品分发点和医院。殷纳逊先生现在仍是那一区域的领袖人物，而医院则由施拉伯肖尔(W. W. Shrubshall)和马歇尔(F. W. Marshall)负责，在这一地区还有一位牧师罗布森(J. K. Robson)，他也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奉献给了这里的传教事业。

最近，唐山煤矿建立了一个新的传教点，此地靠近直隶北部的开平。这一传教点由德辅廓牧师(F. B. Turner)负责，传教工作很快就有了进展。在永平府老城靠近老城墙的东方建起了一座教堂，在开平周围地区还建起了几座小教堂。

圣道堂的工作主要由几位当地的传教代表进行。通过培训学院的学习，大量优秀的人才得到了培训。几位虔诚的本地妇女被作为向女性宣讲《圣经》的代表，其中有一位胡女士，在这一领域效力了近 25 年，是中国第一位以此身份出现的传教代表。圣道堂现在已经拥有 7 位传教士、2 位医药代表、1 位女代表、46 位本地助手和 6 位女性本地助手，有 1300 多名教友，还有大约 250 名在日校和寄宿学校学习的学生。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The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Society of Scotland)在 1864 年派出传教代表前往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在宁波传教，接着扩展到芝罘，但后来这些传教点被放弃，满洲成了该会传教的中心地区。神学博士韦廉臣牧师(W. Williamson)是该会传教的早期开拓者，自 1855 年起他一直呆在中国传教，在好多地区服务过。晚年，他把全副精力都献给了以著述来传教的事业，撰写了好几本论述基督教史和基督教教义的书，这些书对未来的中国学

生和皈依者必将极有裨益。满洲的传教工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罗约翰牧师(J. Ross)和麦坚提亚牧师(J. McIntyre)在1872年进入中国,是海城和奉天这两个大的传教中心的领导者。长老会在这些地区都建立了医院。罗约翰先生后来完成了《新约》的高丽语译本,从这个译本来看,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在高丽的传教工作在短期内会有成果。据报告,他们聘请了7位传教士、1位女传教代表,有14名本地助手和大约800名教友。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其不同凡响的历史开始于1865年。在上帝的指引下,创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人物是戴德生牧师(J. H. Taylor),他是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会的会员(M. R. C. S.) 1853年,他作为中国福音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派遣的医药传教士前往中国。1857年,他脱离该传道会。1860年因健康恶化回到英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宁波管理一家大医院。独自管理这样一个大机构的紧张压力弄得他精疲力竭。在他返国途中,他还关注着中国的情况,祈祷上帝能让他在回到祖国后继续推进中华帝国的皈依。他特别请求为浙江省宁波的传教事业派给他5名传教人员。为此,他致信英国的一位友人,询问他是否了解英国有什么忠诚而愿意奉献的年轻人,除了生活开销外,在报酬方面也不要太多,可以跟他前往中国,在那儿服务。他一踏上英国国土,很快就和几个年轻人见了面,这些人愿意在戴德生所能提供的条件下去中国工作。美多士(James Meadows)是第一位志愿者。他和年轻的妻子在1862年抵达宁波。由于第一次请求就找到了5名传教人员,戴德生相信,可以从上帝那儿期待和争取到更大的赐福。因此,他请求再派24名传教人员深入中国内地,进入除了汉口以外所有传教努力尚未触及的地区,这就促成了中国内地会的建立。在中国的基督教化着手建立一个新的传教团体的过程中,戴德生先生关心的是不要受任何现有传道会的干扰,但他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和增加更大的力量。事实上,1865年在这个国家每300万人口中大约只有1名传教士,18个省份中有11个省未有任何基督教代表涉

足。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任务的艰巨性。中国内地会从以下原则入手：1. 受雇用的传教代表不管是什么教派，只要他们服膺福音教会所接受的真理即可；2. 他们出外工作是基于上帝对他们的支持，没有任何收入保证，只需清楚中国内地会在传教基金许可的条件下一定会支持他们即可；3. 不要敛财或受金钱的诱惑。

戴德生先生在 1866 年携 15 名传教士一道，乘船前往中国。这是这一了不起的事业的真正开端。从那时起，传教开始向不同的方向拓展。中国内地会在 15 个省份建起了基地，共拥有 91 个主要传教站，还有大约同样数目的分站。中国内地会的收入在第一个 10 年是平均每年 5000 英镑，但后来的几年，每年的收入从 3 万英镑上升到 4 万英镑。中国内地会的成员从 1865 年的 15 人增加到 1891 年的 424 人，其中包括传教士的妻子们，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受雇于中国内地会，现在仍在继续她们的工作。传教代表则通过极公正的方式从每一个新教徒团体中选拔出来，其中有许多人家境非常贫寒，而另一些人则既富有、又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都乐于自立，并大量捐款给传教事业。1888 年，戴德生又特别请求派 100 名传教士前来中国，那一年，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他高兴地看到超过了他所要求的慕道者源源而来。除了大量的传教代表直接和中国内地会联系外，还有 7 个传教团体——主要是欧洲大陆的——派出了 79 名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会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内地会的教友经统计已经有近 3000 人。这一数字低于那些仅为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人数的 1/10 的传道会所呈报的人数，如果考虑到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打开局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考虑到那些由于对外国人的反感而给传教工作施加了无数阻力的事实，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内地会的代表中有许多人是巡游的布道者，他们走村串乡传播福音真理，而不像其他传教团体一样，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担任牧师和教师，那么，这一数字算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回报了。以上事实记录主要采自戴德生的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戴德生先生的努力得到了中国内地会全职干事海文君先生 (B. Broom Hall) 的高度赞扬。

**偕我公会 (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在 1864 年进入中国,由富勒牧师(W. R. Fuller)担任首任代表,他定居在宁波。不久,马锐牧师(J. Mara)加入了他的工作。盖乐宾牧师(F. W. Galpin)在 1868 年进入中国,一直在宁波工作到 1890 年。1891 年,燕牧师(R. Swallow)被委任为偕我公会的代表,到宁波工作。1887 年,文慧廉牧师(W. S. Soothill)前往万州,他记下了大量有趣的皈依故事。这位后来的传教士经历了 1888 年教案的严峻考验。当时中国人捣毁了传道会的房屋以及其他外国人的财产,这场暴乱导致中、法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所有外国人的损失全部由中国政府作出赔偿,中国政府还保证建好合适的房屋。偕我公会有 3 位传教士、2 位受按立的本地牧师、8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和大约 350 名教徒。燕牧师在传教以外还从事医疗工作。

**爱尔兰长老会 (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 在中国的传教始于 1869 年。该会选择满洲作为其传教区域。其传教代表把牛庄(Neu-Chuang)作为大本营,向北推进其漫长的福音传播路线,并设法在他们足迹所至的一些大城镇中扎下根来。他们有 3 位传教士和 1 位医药传教士、9 位未受按立的本地助手和 28 名信徒。

**外部宣教会 (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多年来一直尝试在马六甲海峡定居点进行传教活动,只是到了 1874 年才寻求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传教基地。该会任命了一名华北教区主教,并配了 4 名助手,正以培训年轻人来推进传教工作。其他几个传道会近来也进入了中华帝国传教,以有助于中国的福音化进程。在这些传道会中有**苏格兰国定教会 (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该会在 1878 年进入中国。**圣经传道会 (Bible Christians)**,在 1885 年进入中国,并和中国内地会合作传教。**公谊会 (Society of Friends)** 在 1886 年派遣了一名代表进入中国,随后有另外几个人跟进。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显示出在基督教会中正在兴起的对中国的广泛兴趣以及从内心里对中国需要基督的恰当回应。

如果略去**苏格兰圣经公会 (Scotland Bible Society)**的莫维廉牧

师(W. H. Murray)为中国盲人所做的杰出工作不提,是有欠公允的。他于1871年前往中国,但他知道,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大量的盲人。启程前,他研究了为盲人的阅读和书写而创造的穆恩盲字母和布拉耶盲文体系,也听了介绍贝尔的可视语言系统的课。在抵达中国时,他发现贝尔的系统有助于他掌握中国语言。他精心为他学会的每一个字注音,把常用汉字减少到了420个。面对每次工作中所遇到的成群的盲人,他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希望教会他们阅读来缓解他们的愁苦。他开始致力于模仿布拉耶体系来化解这些音符使之成为一个点阵系统。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他终于成功地创立了一个代表一种语音的符号系统。然后他找来一个受试者,在那人身上检验他的系统。他找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小乞丐,那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地露宿街头。莫维廉给他洗澡、穿衣,如果那人能掌握他教的方法就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那人为能改变目前的状况而欣喜万分。6个星期后,师徒两人都非常高兴,那个孩子已经能流利而准确地阅读了。后来,他又找了两个盲人乞丐来学习,先学会的那个孩子就做他们的老师。两个月后,其中一个人读得很好,另一人虽然读得不那么流利,但已经非常快乐。戈登·卡明小姐(Gordon Cumming)说,站在黑屋子的门口,听这些4个月前还处在悲惨境地、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人阅读经文,让人极度感伤。16年以来,莫维廉先生在盲人中间追寻他的事业。通过他的引导,他的很多学生成了忠实的基督徒和受人尊敬的公民。在他以这个新颖的方式行善的时候,莫维廉还勤勤恳恳地履行着他为苏格兰圣经公会分发宗教小册子的职责,教导他的学生从睡眠中挤出时间。每一次不再给那些衣不蔽体的盲学生提供伙食、住宿和衣物时,他也得克制着自己。通过教导人阅读,他还为一些盲人妇女带来了上帝的特别赐福,那些盲人妇女由此不仅自己的生活增添了新的魅力,而且因为给她们的友人和邻里诵读经文,也形成了一个吸引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传教中心。

## 第十八章 中国的鸦片生意

人对人的非人道

造成了无以计数的悲伤。

——彭斯

在中国有一种祸害，因为它是人民福祉的可怕敌人，是推进传教事业的巨大阻力，所以在这里讨论一下这种祸害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祸害就是中国人普遍吸食鸦片。鸦片由一种罂粟头的汁提炼而成。虽然罂粟有作为药品的功用，但当人吸食成瘾后，它就成为了人的最可怕的灾难，而人也就成了它的牺牲品。鸦片能控制人的身体和灵魂，它先是麻痹人的身体，继而慢慢地麻痹人的心灵，并彻底地摧毁人的意志。吸食者会牺牲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以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渴望，他们会由此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这种祸害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威胁着整个民族的幸福。

259 大约 100 年前，鸦片还不为中国人所知。它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到中国，作为商品向中国人销售。一些中国人开始吸食，但他们却不知道这种东西的致命特性。吸食者喜欢鸦片的镇定作用和抚慰性质，因而欣然购买鸦片。这就鼓励了外国商人向中国输入更多的鸦片。慢慢地，这种毒品在中国扎下根来。

等到中国皇帝和大臣们终于发现了鸦片的危害正在泛滥时，他

们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来禁止人们购买、出售和吸食鸦片，违者必处以死刑。很快，鸦片买卖就被遏制住了。中国官员的腐败是众所周知的，英国商人便向他们行贿，让这些官员允许他们把鸦片运入他们管事的地盘，那些官员接受了贿赂后，鸦片买卖又照常进行了。这样，走私鸦片的勾当便更为盛行，更为普遍。英国船只运输鸦片很轻易地就可以抵达中国海岸。中国佬再乘着摇桨的船接应那运鸦片的船，把那些致命的毒药运到岸上。清廷渐渐知道了这种情况，严令各地官员，要他们逮捕鸦片走私犯，将他们关到监狱里，或是处死。

现在，英国商人发现鸦片贸易已成了他们财富的来源。由于中国朝廷订立的严格禁止令使走私变得不仅困难，而且还要冒杀身之险，所以，他们用配备武器和军人的小舰艇将鸦片送到广州，同时向官员提供更大的贿赂，以此维持他们穷凶极恶的鸦片买卖。最后，皇帝龙颜大怒，从北京派出钦差大臣去禁绝鸦片贸易。钦差大臣尽了一切努力对付鸦片问题。他把英国商人禁闭在他们的住处，在珠江的出海口伶仃岛收缴了200箱鸦片，并把它们扔进海里。东印度公司仗着有英国政府撑腰，反对这次禁烟行动，宣称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一场血腥残酷的并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在那个不幸的异教国家爆发了。最后，双方缔结了和平条约，中国人被迫支付2100万美元的赔款，其中包括赔偿被禁毁的鸦片的600万美元。接着，皇帝接到了一道提案，要他允许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这样他也可以从这项买卖中抽取税赋。这一提议遭到了断然拒绝。皇帝以一种值得某些所谓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仿效的高尚态度，宣称他不会以坑害自己的人民来使自己致富。

英、中之间后来爆发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英国的获胜而告结束。接着是中国皇帝被迫签署条约，使鸦片买卖进入中国合法化。英国只允许中国人从鸦片买卖中抽取少量税金，这点税金实际上并不足以阻止鸦片买卖的进行，这样，虚弱无助的本地人吸毒成瘾，只要他们吸食一次，就会产生再次吸食的欲望，男人和女人们渐渐就成了鸦片的奴隶。



在中国普遍吸食鸦片是在印度种植的。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所获得的钱财极有助于维持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的统治。在中国的鸦片买卖与在野蛮的非洲部落所进行的受到谴责的烈酒和火药贸易不同,因为后者是由私人或公司进行的,既不用政府也不用政府的支持者直接为之负责。在英国,鸦片贸易也与烈酒贸易不同,因为虽然英国教会是酒吧财产的最大所有者,但许多所谓的基督徒都因为从事烈酒买卖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过,英国当局没有直接从事这一买卖,也没有声称支持酿酒、卖酒或开设酒吧。但印度的英国当局必须对鸦片买卖负责。它从鸦片种植上敛取钱财;它收集和加工罂粟,然后制成鸦片,由英国当局垄断销售,从中,英国当局每年获得500万英镑的税收。为了保证中国那些通商口岸可以从事鸦片贸易,英国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和数以千计的人力。现在,英国仍然坚持维护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因为没有它就不行。基督徒们和慈善家们徒然地谴责遍及全世界的鸦片贸易,中国当局也在哀叹和抱怨中徒劳无功地寻找遏制颓败世风的办法。由于关系到维持印度政府的500万英镑,所以所有的考虑都毫无意义。

这种邪恶的贸易对中国传教事业的影响是令人沮丧的。在基督教福音传播的道路上,这是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当传教士们在城市的小教堂、集市、或者在节庆里,传播和平与爱的福音时,当他谴责当地寺庙里的偶像崇拜时,他就得被迫重提一些旧事,即关于鸦片战争的问题,关于“基督徒们”向中国人介绍并强迫他们吸食鸦片从而使他们家破人亡的问题,“基督徒们”因为这种遍及全中国的可怕恶习造成的明显的伤害而受到谴责。

现在,鸦片在中国本土也已经大量种植,吸食者们认为在中国种植的鸦片的纯度不如印度种植的那么好。百姓中染上这一恶习的人数在日益增加,这一嗜好削弱了人们的感觉上的敏锐度,更粗糙和更廉价的鸦片也吸上了,于是,正在为自己提供自我毁灭的手段。惟一可能战胜这种恶习的办法就是福音的强制力量,英国政府对它引进鸦片所造成的后果惟一可能做的补偿就是坚决杜绝鸦片买卖,即使

印度的税收不足,可能不得不由英国的纳税人来弥补,也要停止鸦片贸易。然后再成倍地增加基督教代表和代表机构,直到通过传播福音和圣经的力量,使这一恶习被纠正后,那片土地才能从巨大的灾难中得到净化。

今年3月,基督教会的每一个支派,包括来自英国各地和荷兰的257各个教派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鸦片贸易体系的种种罪恶,研究如何解决的办法。其中有一天时间是让热忱的祈祷者祈求神的指引,有三天时间用来对鸦片的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大约同时,有4.5万名教士集会,呼吁人们注意鸦片买卖的恶果。通过对仍在继续的鸦片贸易的口诛笔伐,2万英镑的基金建立了起来,并投入了运作。这次会议所体现的道德力量已经彰显出来,因为不久之后,下院的大多数人投票赞同约瑟夫·皮斯爵士(Joseph Pease)的动议,那就是任何仅仅出于维护印度税收的目的、希望维持鸦片买卖的人的想法都是不明智的。现在,以什么方式来执行议会的决定,已经成了英国政府的责任,利用个人影响来敦促这一计划的实施也成了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

## 第十九章 寻求基督的中国

哦，高贵而荣耀的君王，  
你所遴选的先驱者受遣  
去那遥远的天边，  
讲那古老又古老的故事。  
赋予爱与怜悯之心  
还有希望和热情的步履，  
穿过森林、原野和城市  
你的仁慈重现。

在中国，我们需要有一支传教人员的队伍，还必须要有一支由最优秀的年轻人组成的庞大的后续队伍，为了神圣的事业，时刻待命投身于中国的传教事业。我们有数以百计的青年男女、富家子弟和经济上阔绰的人。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特别的事情可做，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单调乏味的，没有什么快乐，生活的品质也很难有什么提升，除非他们让自己升华到崇高的境界，献身于“主的收获的田野”（Lord's Harvest Field）。他们的父母和友人们会赞同他们像保罗被召唤到“方外”（regions beyond）那样把自己奉献给神圣的召唤吗？会赞成他们像上个世纪卫斯理那样在半野蛮和彻底堕落的英国民众中激情昂扬地传道吗？

事实是,截至写作本书时为止,基督教世界为中国所做的全部努力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为中国每 35 万人提供了一名传教士。拿直隶省来说,它的全部新教力量只有 40 人,或者说,每一个传教士要向 67.5 万人进行传教。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会把 150 名传教人员安排在这个传教工作刚刚开始起步的地区,每个人以 20 英里为活动半径开展工作。

这个大国不可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当我们踌躇不前时,这个世界所有的邪恶势力——背信、赌博、淫荡、盲目崇拜、吸食鸦片、酗酒和欺压他人——都在泛滥肆虐,除非基督徒们在这一巨大责任面前警醒,唤醒沉睡了 2000 年的中国人。2000 年来,中国已陷入邪恶和沉迷在不信神的深渊,其沉迷之深几乎无法探测。基督教会对中国人的呼求每延宕一分钟,就会有 24 个灵魂沉落到无基督信仰的墓穴中;每延宕一天,意味着有 3.5 万多人离基督而去;每延宕一个月,意味着 100 万人没有收到“大喜讯”就迈向了来世。基督未能把这些人从罪孽中拯救出来。

人们希望聆听福音。如果他们慢慢地接受了福音真理,接受了以后便会牢牢地把握这一真理。按中国人的品性,一旦他们真诚地皈依了基督之爱,崇奉基督之爱,他们就会是一个高尚的人;一旦中国要求我们的救助,上帝也会要求我们,并让我们进入伟大的“收获的田野”,会让我们在中国取得辉煌的成功。

人们聆听我们坚持不懈向他们推介的福音,因为希腊和罗马城中把自己表现为是“上帝的拯救之力”的古老而全能的法宝,也要有“青春的朝气”来支撑它的存在。既然万神殿中的众神都不能顶住它的进攻,那么,诸神一定会在他面前倒下。“上帝将彻底毁掉偶像”,“上帝将像毁掉陶瓷器皿一样将它们砸得粉碎”。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一旦皈依基督教,就会显示出基督徒的禀性,坚定地恪守基督教教义,这一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教徒相媲美。如果你让他们权衡了背叛神性的得失,中国的皈依者就会表现出一种真正值得赞美的温厚与宽容;你让他们知道了

骄傲与自满,他们就会像小孩子一样听话;你让他们认清了贪婪与欺骗,他们就会表现出忍受迫害的决心,而且宁愿慷慨赴死也不背弃他们的主,或者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从现已掌握的数百个实例中,我们可以举出两三个例子。的确,很少有什么事例比中国传道会所记录的这些富有仁心的事例更动人、更振奋人心的了。

王先生是华北一座大城市的地方官和学者。60岁时他得了重病。在他养病期间,有一天,他的一位友人来拜访他,对他说:“看,本城的一位外国老师送给我这本书。现在,我还不想看,但你是一个书癖,所以我把书带给你,让你在养病期间阅读。”老人拿起书,仔细地翻阅。这是一本中文版的《圣经》,老人读了《圣经》,对书中所说的内容印象很深,但他不能完全读懂这本书。不久,他的朋友又来看他,他就对朋友说:“你能让那些外国老师找一些讲解这本杰作的资料,带来给我吗?”他的朋友遵嘱做了,带给他一本丁韪良博士(Martin)写的基督教教义手册,中国的好几个传道会都把这本书推荐给慕道者们去阅读。王先生怀着渴望收下了书,在翻阅此书时,他把它和《圣经》中的叙述进行了比较,蒙昧开始从他心里消散。现在,他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宗教的两大基本精神:1. 世间只有一个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2. 上帝愿意倾听和回应祷告。在这些伟大真理的影响下,当他的医生再次来给他看病时,他告诉医生,他不再请他为自己治病了,只求万能的造物主来治愈他的病,而上帝会答应他的祈求的。病一康复,他就去了教堂,那儿每天都在宣讲基督福音及其拯救众生之道。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聆听来自上帝的讯息;集会结束后,他还留下来向神职人员请教,他也像其他许多中国的皈依者一样,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一连许多天,他怀着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对每一件事都打破沙锅问到底,让自己完全弄明白。最终,他的疑虑和困惑统统烟消云散,他怀着一个孩子般的单纯信念,把自己的全部拯救寄托在基督身上。他在新近获得的安详中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了。但现在,他的信仰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他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反对他,他被从他那个圈子里赶了出来。

他的那些文人朋友不再和他来往；他的孩子们也反对他，并把他赶出了家门。在这个孝敬父母为人生第一根本的国家，这样的情形显示出宗教迫害在这个国家的状况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但所有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动摇王先生的信念，他在传道会的会所找到了一个栖身处，忙于从事福音宣教士的准备工作。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忠实的、有成效的福音布道者。几年来，他大胆地直言宣称耶稣是罪人的朋友和救世主，并坦承自己是上帝的力量所拯救的对象。他一直用这种方式在大庭广众和公共会堂布道，直到年老体衰，再也不能胜任这样繁重的工作为止。后来，他忙于撰写一本论基督教的书，书名题为《天路明灯》。在他完成这部著作时，他已经体力不支，接近生命的终点了。他把传道会驻该城的传教士们请到病榻边，向他们道别，并再次表示他内心深处对耶稣不灭的信仰。他还对其中一位即将回英国度假的传教士说，让他回国后给那位为他送来上帝福音的英国朋友带个信，告诉他，他会在天国的门口恭候他们，等到他们前往天国的时候，他会带领他们去到上帝的宝座前，对救世主说：“这就是引领我进入永生的人们！”

在他逝世后，他撰写的那本书搁置了很久未能出版：钱当然不够，可能做事的态度也不够好。但在1886年，隶属美国教会的克罗塞先生（Crossett）借阅了这本书，他为书中的雄辩和所体现出的学养所折服，因此他把这部书稿交由北京教会的印刷厂印出。华北传教士中的几位重要人物——丁韪良博士、艾约瑟（Edkins）和白汉理（Blodgett）以及其他人士，预订了几百本。其他多数被分发到南方的传教站，这样，虽然王先生已入天国，而他犹能以书代言。

胡先生生于白河口岸边的一个大城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拥有几艘能出海的帆船。胡父让儿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培养他将来经商。后来他成了他父亲的一艘商船上的货物管理员。有一天，在他前往南方的航程中，海盗登上了他们的船，抢夺了他在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他被身无分文地抛在上海的海岸上，不得不去寻找别的活儿干。因为能讲北方官话，所以他在领事馆做了一名教师，

他的一名学生就是马理生 (Martin C. Morrison), 即本书传主马礼逊的幼子。一天, 他在上海的繁华大道上闲逛, 看到一间传教小教堂, 门洞开着, 一个外国人正在向集会的人们讲道。他受好奇心的驱使, 走进了教堂, 聆听了那位牧师的讲道。后来, 他经常造访那个教堂, 并得到了一本《圣经》。经过仔细研读, 主打开了他的心灵, 他成了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者, 并把自己和那间他初次聆听圣言的小教堂连在了一起。这以后不久, 他非常希望回到他早年生活的邻里们中间。他离开上海时随身携带了一封推荐信, 是由上海的传道会写给他即将重返的那座城市的传道会的。一回到故乡, 他就去了传道会, 呈上了他的推荐信。接待他的传教机构当时正祈祷上帝, 希望有人能来帮助他们即将展开的传教事业。他们很欢迎胡先生。胡先生也很快证明自己是一个富于奉献精神的、有能力的传教助手。胡先生仪表堂堂, 嗓音动人, 谈吐很有个性。他既聪慧过人, 又颇富勇气。在他熟悉了福音真理后, 便在布道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在他被授予牧师职位后不久, 山东北部的许多城镇和乡村爆发了令人激动的重振宗教运动。胡先生被派往那里进行考察和处理事务。他去了, 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在那里工作了 12 年左右。作为一名福音宣教士, 他跑遍了那里的村镇, 管理着那里的教会房产, 监管着各个教会的账目, 以超凡的勤勉履行了一个牧师的全部职责, 并且获得了成功。在一次巡视东部教区以后, 他被致命的疾病击垮了。当最后一刻来临时, 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和愉快, 他把手放在胸前, 说道: “这里一切安然。”怀着对救赎之爱的感谢, 他升入了天国。

黄先生是福建省一个大城市的年轻的风景画家。他的一位挚友, 姓胡, 也是一位画家, 一名基督徒, 也是教会的一员。他引导黄先生读经、参加宗教活动, 经过多次的祷告和劝说, 黄先生在他的引导下, 也开始读经、参加宗教活动, 其结果很快显示出来。黄先生的母亲非常喜欢自己的儿子, 她经人提醒说儿子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应该好好地管一下了。她问: “有什么不对头的呀! 我儿子总是很勤奋, 很有责任心。出了什么事了?” “他与洋人的教会搞在一起。” “不可

能！”她叫道，“我儿子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经过询问儿子，她发现自己的担忧是真的，儿子宣称，他发现洋人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生活有所熟悉，理解父母在孩子的成年生活中拥有的支配力。画家的母亲把孩子紧紧地圈在家里，尝试用各种办法动摇他的决心，哀泣、斥责、威胁，轮番采用，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毫无用处。母亲在听到儿子祷告说“主啊，保佑我母亲”，又连连叫着耶稣的名字后，更加愤怒。最后母亲说：“儿子，你得停止祷告。”儿子回答说：“母亲，我一向总是温顺听话的，但这次我不能这样了。”“但你弄出来的这些声音让我很难受。”“那好吧，我就静静地祷告。”“你要再祷告，你就离开这个家。”“母亲，”黄先生说，“我不能放弃祷告。”“那么，这个家就不能留你了。”她大声叫道，“我就不能再认你这个儿子了，等我死后，你也不要和家里人一起参加我的葬礼。”

黄先生被赶出了家门，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和他的朋友胡先生住在一起，他的学养和仁厚程度都迅速得到了提高。一天，他母亲派人来请他回去见她。他认为这是一个设计抓他、杀害他的陷阱，但经过一番痛苦的心理斗争，他对教长说：“我要回去，为我祈祷吧。”黄先生回去了。母亲问他是否仍不放弃做一个基督徒。“母亲，我心意已定。”他满以为肯定会受到斥责。“那好吧，”母亲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想法，那只好我改变我的想法了。你可以做你的基督徒，也可以住在家里。”黄先生闻言，沉浸在狂喜中，跪下来，感谢上帝。

黄先生以画为业又过了几个月，接着就投身于传教事业。作为一个福音派宣教士，他充满热情地工作了4年左右。后来，在传教士们中间爆发了一场争论，是有关用中文如何正确地翻译“God”一词的事。黄先生不同意采纳代表们提出的译词，所以他辞去了他的职位，但很快又加入了另一个传道会。那个传道会不仅很乐于接纳他，而且还任命他为教长。他以前同教派的教友们也衷心认同他的改



会。由此,中国人用他们坚定的信仰和热情证明,福音真理在中华帝国就像在普天之下任何地方一样,拥有推行它的最好的人才。

传道会在中国最大的困难和最急需的需要是找到接近中国妇女的方法。

206 女人通常都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年长的女性可以被允许拥有一定的自由,但所有年轻的女性、特别是未婚的女性,都被严厉的清规戒律所束缚,这种束缚就是完全不得抛头露面,因此让她们在公共场合参加宗教活动通常是极困难的。女性们事实上是生活在深闺之中,男人是看不见她们的,她们甚至不和家里的男性一起用餐。如果你拜访一个中国家庭,你不会见到主人家的女眷。除非主客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否则探问一个中国太太或女公子的健康是不礼貌的举动。中国人的观点一般是反对妇女读书识字,在上层社会中,有少数女性可能会识字,但为数不会很多。除非是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否则你很少能遇上一个能读书识字的女人,你也很少能遇上一个愿意读书识字的女人;再者,她们很少有空闲时间。在乡村地区,女人的工作比男人还辛苦。她们纺棉花、织布,为全家人做饭、缝补、裁制衣服。她们很少下地干农活,但在谷物成熟的农忙时节也要下地分摊一些农活,像打谷、扬场、脱粒等。所有这一切辛勤的劳动都不会顾及女人那双很多事情都不适合做的小脚。惟一有空闲时间的是老年女性,而教这些老年女性读书,如果不说是毫无可能,也几乎是不可可能的。

但是,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元素。她们在家庭中的影响就像在英国一样,是非常巨大的。知识越少,她们就越少受儒家观点的影响,而儒家思想是中华帝国最正统的思想。女人们的天性比男人们更富有宗教精神。男人们不很把自己的信仰当一回事,女人们则很诚实;她们能够实践自己的信仰,男人们则很少能这样做。一般来说,家庭中的男性是儒家信徒,女人则是佛教徒或道教徒。去寺庙中朝拜的总是女人。慈眉善目的佛陀面前的香炉中总是香火不断,而焚香、添香的主要是女人们。那些在神灵塑像面前叩头跪拜的也总

是女人。她们烧十张纸钱,男人们才烧一张纸钱。男人们拜的是佛爷、三清、十八罗汉、观音、关云长、药神、财神以及无数的菩萨。男人们仅仅是为敬神而敬神,而女人们则一直保持着信仰那些神灵的热情。就此而论,女人们远比男人们更富有基督教精神。男人们满足于儒家的教条和道德格言,他们所感兴趣的不过是尘世间的一切或人类生活的种种。女人们则有一些真挚和感情的东西——她们对精神和永恒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男人们对他们的信仰谈得多,做得少;女人们却用心去感受她们的信仰,并由此而实践信仰。男人们没有信仰也无所谓,女人们没有信仰则不行。最诚心的偶像崇拜者不能创造出最虔诚的基督徒。缠绕在虚幻的神像上的感情和希望,是一种追求新的生活和神圣的生活的动力,能使人转向永生的基督和永恒之爱的神。对宗教事务不感兴趣的异教徒只能成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基督徒。一辈子都对宗教不诚实和怀疑的习惯,常常与对宗教的虚幻信仰相联系。通过皈依,他们才能保留住真。

267

在中国,作为家庭的主要力量和模铸下一代的影响因素的女人,在她们认可和领会基督教的精神之前,传教士的努力大部分只会是一场空,但随着另一项伟大的推进基督教的运动,让女人们都进入教堂后,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从总体上而言就成功了。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在变革中的国家,她正在度过其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旧事物正被弃置一边,正慢慢由新事物取代。制度和常规已经慢慢走向老迈,正在蹒跚地步入衰亡,灌输于人民生活中的旧迷信思想正在丧失它的市场。这个国家像一个正从沉睡中觉醒的巨人。传教士们向他们传播神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了唤醒这种沉睡。现在,一种新奇而不确定的感情正引导着这个国家去寻求他们以往从未有过的一种美好事物,现在,他们必须去进行一场新的伟大战斗。外国人的入侵、西方文明模式和战争模式的引入,必然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旧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实践的崩溃必然会对中华帝国趋向好或坏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尽全力促使中国基督教化,那么在所有可能的意义上而言,情况

268

都会是向好的方面转化。在过去 100 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训练一支献身于基督教的特遣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现在,来自各个省份和各个城市吁请更多帮助并派遣更多人员的呼声更强烈了。

在鸦片买卖和鸦片战争中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的英国,就不能仁慈地把基督教的爱遍播中国大地吗?

佛教在亚洲是讲仁慈的宗教。它以千手观音解除千种疼痛的形象来把这种善的观念具体化。但基督教的救助机构和慈善机构在现实生活中更能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痛苦。没有什么力量能像爱那样给人以安慰,没有什么力量能像爱那样挽救人。这就是上帝的力量。

来自中国的呼声真正是马其顿尼<sup>①</sup>式的呼声。它是来自“人”的、对一种不可言说的和不可估量的善发出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福音,就是对人自己和世界的诅咒。这种呼声源自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最深切的需要,源自中国社会只有伪教义或根本没有宗教的各个阶层,源自无数的因性别和疾病不幸过早夭折的孩童。这是女人们在人格受到侮辱的痛苦中发出的呜咽和希望,中国女人从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祉和自尊,这是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残疾人、盲人的呼声。它表达了一种挣脱邪恶的奴役进入神性自由的精神渴望。尽管沿着偶像崇拜和禁欲主义之路前进能逃避空虚或是上天的惩罚,这也是一种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为目标的语言、情感和抗争。这是一个被束缚住手脚、双眼已瞎、被强制在毫无希望之下的强人的呼声,他们在最后的绝境中向拯救者伸出了乞求之手:“哦,我知道可以在哪里找到他!”

对那些来自中国、的确也是来自全世界所有异教国家的祈求帮助的回答,只能通过全能的教会对基督教王国的神圣化来满足。就像斯蒂文生博士所说的:“教会通过主而把这一工作神圣化,当这种神圣化被接受时,宗教的渗透不仅进入了集会和议事机构,而且还渗透到每一小团体的基督教徒。这种潜移默化就像一团火在人们的心

① (?—362年)基督教神学家,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译注

里燃烧,然后,在冲动和激情中升腾出火焰。我们会从中看到像基督所做过的那样,有关福音传播的历史,每一位牧师都能告诉人们,在每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会是每日祷告的必修课,人人都为自己学习福音传播。正如卡农·韦斯特科特(Canon Westcott)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当代的十字军征服史。孩子们会相信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这种信仰并伴随着这种信仰而成长。教会将配合他们伟大的传教计划,派出最杰出、最能干的人,加入这场他们必须加入的关乎基督之爱的战争。这会使人们把时间倾注在他们迄今所知的最伟大运动中的原因。现在是教会寻求这种神圣化的精神的时候了。它们寻求的彻底神圣化,也是进入这一领域的每一个男女所寻求和期望的。”

一年以前,430位传教士在上海集会,讨论在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的议题。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在此领域中极受尊敬的代表。7天的会议,与会代表一直在祷告和就中华帝国的归化等一些眼前的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会议主要的成果是决定对基督教世界发出热情的呼吁,招募多才多艺的传教代表,会议闭幕时发表了动人的、富有感召力的闭幕词。闭幕词激昂的言辞如能在本书所有读者心中激起共鸣,就是本书作者的最大愿望。

### 《向基督教世界征募1000名新教徒》

亲爱的敬主的同道:

我们,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向您作出特别呼吁,我们需要大量的受按立的传教士,在这片伟大国土上传播基督福音——建立教会,教育本地牧师和传教助手撰写基督教文字,从事和指导基督教宣讲福音的工作。还有,我们还决定特别招募未受按立的人、福音教士、老师和医生——到边远地区分发宗教书籍,向民众讲道,为伟大的基督教教育事业出一把力,在治疗人们的病痛的同时,向中国人民展示基督教仁慈的一面。

因此,我们现在向你们——基督教国家的新教教会——发出呼吁,回应我们的请求,派人去往中国吧——

我们需要 1000 人,从现在起服务 5 年。

我们代表 3 亿尚未福音化的异教徒向你们呼吁。我们这样做,像人们全然迫于眼前工作的重大意义和责任感一样,是凭着我们全部的真心;我们这样做是凭着我们对基督复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基督复活的力量会召唤人们进入主的葡萄园;会开启将受遣的那些主的仆人们的心扉,并支持他们。我们不会停止向主大声祈求。主会做到的,而我们会见证这一切。

会议代表:

主席: 倪维思牧师,神学博士;

李修善牧师;

终生委员: 戴德生牧师;

耶士谟(W. M. Ashmore)牧师,神学博士;

郭显德牧师,神学博士;

狄考文牧师,神学博士,法学博士;

里德(C. F. Reid)牧师。

1890 年 5 月于上海

杨格非牧师在近期重返英国时,曾对一群年轻人发表演讲。他说的以下这番话或许可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对年轻人说些什么来激励他们投身于传教事业不是我习惯做的,因为我对受神启示的传教事业有一种审慎的敬畏。但我不能白白放过这次机会,对准备投身此业的年轻人一言不发。我怀着最诚恳和虔敬之心感谢上帝,我恰好是一个传教士。我从未遗憾多年前我违背挚友的强烈祈愿所选择的这一步。如果有一种真诚的渴望在我心头燃烧,那就是我可以在异教徒们中间、在为基督的劳作和痛苦中生与死。这是多么荣耀的工作!我知道,没有任何工作拥有这份荣耀!——如此真切、如此无私、如此富有使徒精神、如此与基督相

像！我知道，没有任何工作能使基督如此贴近人们的心灵，使一个人完全彻底地皈依上帝的怀抱，使伟大而古老的福音如此真切、如此宝贵、如此富有神性地展现。那么，想一想我们伟大而崇高的目标吧！我们呼求，中国基督教化！印度基督教化！整个世界基督教化！想想中国及其数以亿计的人民正在成为我们主和耶稣基督的子民，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想法？展望这一宏伟远景，还有什么比这——教会全力以赴所获得的丰硕的成果和你们最高贵的力量所做的最丰富的奉献——更动人心魄？再想想由于参与这一工作所带来的那种不可言说的特权和荣誉，传教事业必将使你们享受到这份令人欣悦的成果。哦，年轻人！想想这一切吧，仔细琢磨琢磨，如果你听到上帝的声音，召唤你从事这一事业，勇敢地带上你的十字架，出发吧。为自己值得做一名传教士，你将永远不会停止感谢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 译名对照表

- Adam Clarke 亚当·克拉克  
Adam Schaal 汤若望  
A-Fo 阿发  
A-Heen 阿兴  
*Alceste* 阿尔塞斯特号  
Alsager 阿尔萨奇  
Amherst 阿美士德爵士  
Anderson 安德森  
*Anglo-Chinese Dictionary* 《英华字典》  
Asam 亚三  
*Atlas* 阿拉斯号  
A-Tso 阿冲  
Baird 贝尔德  
Ball 鲍尔  
B. BroomHall 海文君  
Bec 贝克  
Bexley 贝克斯利  
Blair 布莱尔  
Blodgett 白汉理

- Bogue 博格  
Bogue 虎门(地名)  
Boyer 博耶  
Bull 布尔  
Butterworth 巴特沃斯  
Calthorpe 卡尔瑟普  
Canon Westcott 卡农·韦斯特科特  
*Canton Register* 《广州纪事报》  
Carrington 卡林顿  
C. Buck C. 巴克  
Celestial Empire 天朝  
C. F. Reid 里德  
Charles Cowie 查尔斯·考伊  
Charles Gutzlaff 郭实腊  
Charles Sumner 查尔斯·萨姆纳  
Che-foo 芝罘(今烟台)  
Chinnery 程耐里  
Choo-Foo-Tsze 朱夫子  
Choo-Seen-Sang 朱先生  
C. H. Thomas 托马斯  
C. Majoribanks 梅杰里班克斯  
College of the White Stage Valley 白鹿洞书院  
Cowie 考伊  
Cowper 库珀  
Crossett 克罗塞  
C. Simeon 西缅  
Cuthbert Henderson 卡斯伯特·汉德森  
C. W. Mateer 狄考文  
David Abeel 雅裨理



- David Hill 李修善  
De Stael 斯达尔  
Dill 迪尔  
Doddridge 多德里奇  
Downs 当斯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E. C. Bridgeman 裨治文  
*Eclectic Review* 《中庸评论》  
Edward (Edwin) Stevens 史第芬  
E. Faber 花之安  
Eliza Armstrong 伊莱扎·阿姆斯特朗  
*Evangelia Quatour Sinice* 《四福音书》  
Farquhar 法夸尔  
F. B. Turner 德辅廓  
Feast of Lanterns 灯节  
Ferdinand Verbiest 南怀仁  
Festival of the Tombs 清明节  
F. Genaehr 叶纳清  
Flint 弗林特  
Fourmont 福尔蒙特  
Francis Xavier 沙勿略  
F. W. Galpin 盖乐宾  
F. W. Marshall 马歇尔  
G. Burder 伯德  
George Robinson 乔治·罗宾逊  
George Smith 施密士  
George Staunton 乔治·斯当东  
George Stephenson 乔治·斯蒂芬森  
George Thomas Staunton 乔治·斯当东爵士

- G. H. Bondfield 文显理  
*Gleaner* 《印支搜闻》  
Gordon 戈登  
Gordon Cumming 戈登·卡明  
G. Owen 文书田  
G. Payne 佩恩  
Griffith John 杨格非  
Haddington 哈丁顿  
Hannah 汉娜  
Hans Sloane 汉斯·斯隆  
Hardcastle 哈德卡斯尔  
Harris 哈里斯  
H. Corbett 郭显德  
Henry Puttinger 璞鼎查  
*Hercules* 赫尔克里斯号  
Herman Rottger 陆特嘉  
Hervey 赫维  
H. F. Burder, DD. 伯德  
Highbury College 海伯里学院  
Hirschberg 何斯伯  
Hislop 喜施来  
H. L. Mackenzie 麦肯齐  
H. Lockwood 维爱华  
Hobson 合信夫人  
Hodgson 霍奇森  
*Horae Sinicae* 《中国春神》  
Howard 霍华德  
Hoxton Academy 霍克斯顿学院  
Humboldt 洪堡

*Inglis* 英格里斯号

I. Tracy 杜里时

James Gilmour 葛雅各

James Legge 理雅各

James Meadows 美多士

James Morrison 詹姆斯·马礼逊

James Nicholson 詹姆斯·尼科尔逊

James Urmston 詹姆斯·厄姆斯顿

J. A. Mitchell 米切尔

J. Angell James 安杰尔·詹姆斯

J. C. Bruce 布鲁斯

J. Chalmers 湛约翰

J. Clunie 克卢尼

J. Cox 郭修理

J. Edkins 艾约瑟

J. Elphenstone 益花臣

Jem 杰姆

J. F. Davis 德庇时

J. Fletcher 佛莱彻

J. F. Gleland 纪里兰

J. G. Kerr 嘉约翰

J. H. Taylor 戴德生

J. Innocent 殷纳逊

J. J. Erskine 厄斯金

J. K. Robson 罗布森

J. L. Nevius 倪维思

J. Macgowan 玛高温

J. Mara 马锐

J. Mcintyre 麦坚提亚

John and Alexander Stronach 施敦力兄弟

John Brown 约翰·布朗

John de Monte Corvino 孟高维诺

John Eliot 约翰·艾略特

John Fenwick 约翰·芬威克

John Hutton 约翰·赫顿

John Robert Morrison 马儒翰

Jonathan Lees 理一视

Joseph Banks 约瑟·班克斯

Joseph Pease 约瑟夫·皮斯

J. Owen 欧文

J. Robinson 罗宾逊

J. Ross 罗约翰

J. Sadler 山雅谷

Judson D. Collins 柯林

J. W. Roberts 喇佛

Kalgan 张家口

*Kent* 肯特号

Kew-a-gong 屈亚昂

King 金

Knack 克纳克

Ko Seen-Sang 高先生

Laidler 莱德勒

Leang-Tsin-Tih 梁进德

Lee 利先生

Le Seen-Sang 李先生

Li Hung Chang 李鸿章

Lintin 伶仃岛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

- Lord Minto 明托爵士  
Loveless 洛夫莱斯  
Low Heen 罗谦  
Lynch 林奇  
Mackenzie 马根济  
Maddison 麦迪逊  
Maloney 马洛尼  
Margaret John 玛格丽特·约翰  
Marshall 马士曼  
Martin C. Morrison 马理逊  
Mary Rebecca 玛丽·丽贝卡  
Mason 梅森  
Mateer 狄考文  
Mathew Henry 马修·亨利  
Mathew Ricci 利玛窦  
M de Saci 萨齐  
Milne 米怜  
Milnor 米尔诺  
Miss Cowie 考伊小姐  
M. Klaproth 克拉普罗特  
Montucci 蒙杜齐  
Morton 默顿  
Mosheim 默谢姆  
Moukden 奉天(今沈阳)  
M. Remusat 雷慕沙  
Mungo Park 芒戈·帕克  
Napier 律劳卑  
Nestorian 景教  
Newcastle-upon-Tyne 泰恩河上纽卡斯尔

Nicol 尼科尔  
Nirvana 涅槃  
*Observer* 《观察家》  
*Owell* 奥威尔号  
Parry 帕里  
Pearson 皮尔逊  
Peiho 白河  
Peter Parker 伯驾  
P. P. Thoms 汤姆斯  
*Quarterly Review* 《评论季刊》  
*Remittance* 雷米登斯号  
R. I. Wilberforce 威尔伯福斯  
R. H. Inglis 英格利斯  
R. Lechler 黎力基  
Robert Burn 罗伯特·伯恩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  
Robert Peel 罗伯特·皮尔  
Rodan 罗登  
Romaine 罗曼  
Rowe 罗  
Rowland Hill 罗兰·希尔  
R. Swallow 燕  
R. Wilson 威尔逊  
R. W. Orr 厄珥  
Samuel Dyer 戴尔  
Samuel Johnson 约翰逊  
Sancian 上川岛  
Schereschewsky 施约瑟  
Se-ngan Fu 西安府

Serapore 塞兰波尔

*Shin Taou* 《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

Simon Magus (行邪术的) 西蒙

Simpson 辛普森

S. Johnson 詹思文

S. Munson 文信

S. W. Williams 卫三畏

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巴特罗买医院

T. A. Barber 巴修理

T. Bryson 布赖森

Teaou Kin Keaou 挑筋教

Teighmouth 泰莫斯

T. Gilfillan 纪菲兰

T. Gillison 纪立生

T. Hamberg 韩山文

The great Canal 大运河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传教杂志》

Theophilus Metcalf 觅加府

The Selected Committee 特选委员会

The Ultra-Ganges Mission 恒河外方传教计划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威斯敏斯特信纲

T. H. Hudson 胡德迈

Thomson 汤姆森

Timbutoo 廷巴图克

*Triden* 三叉戟号

Tsae-Ako 蔡高

T. S. Grimshaw 格里姆肖

Tso-Tang 周党

T. Stamford Raffles 莱佛士

T. Townsend 汤森  
T. W. Peerse 皮尔斯  
Tyndale 廷达尔  
Valignano 范礼安  
Vanderkemp 范德尔坎普  
Vasco de Gama 达·伽玛  
Vater 沃特  
Waller 华勒  
Walter Scott 司各特  
W. A. P. Martin 丁韪良  
W. Atkinson 阿特金森  
Waugh 沃  
W. C. Milne 美魏茶  
W. Fraser 弗雷泽  
W. Gillespie 纪里士卑  
Whampoa 黄埔  
W. H. Medhurst 麦都思  
W. H. Murray 莫维廉  
Wickliff 威克利夫  
William Bentinck 威廉·本廷克  
William Chalmers Burns 宾威廉  
William Dean 怜为仁  
William Morton 威廉·默顿  
Wilson 威尔逊  
W. Jarron 嘉维廉  
W. J. Boone 文惠廉  
W. Koster 柯士德  
W. Lockhart 雒魏林  
W. M. Ashmore 耶士漠



W. Mcgregor 麦克葛莱

W. Moseley 莫斯利

W. Muirhead 慕维廉

W. N. Hall 何乃淑

W. R. Beach 俾治

W. R. Fuller 富勒

W. S. Soothill 文慧廉

W. Williamson 韦廉臣

W. W. Shrubshall 施拉伯肖尔

Wynn 文

Xerxes 薛西斯

Yang Sam-Tak 容三德

Yu Lan Shing Hwny 孟兰盆会



## 图版索引

扉页图:神学博士马礼逊牧师和他的中国助手在翻译中文版《圣经》。由霍尔依程耐里先生原画刻板

- 图 1 p. 2 中国篷船
- 图 2 p. 4 长城
- 图 3 p. 5 着夏装的中国官员
- 图 4 p. 7 一群中国乞丐
- 图 5 p. 8 卖灯笼的人
- 图 6 p. 10 中国的戏曲演出
- 图 7 p. 14 中国古庙
- 图 8 p. 15 佛的流行形象
- 图 9 p. 17 祖宗牌位
- 图 10 p. 19 在供桌前祭祀的中国家庭
- 图 11 p. 24 北京一瞥
- 图 12 p. 31 中国儿童
- 图 13 p. 39 位于珠江入口处的香港岛
- 图 14 p. 50 澳门
- 图 15 p. 53 广州一瞥
- 图 16 p. 56 广州街景
- 图 17 p. 57 中国人拜祭

- 图 18 p. 59 用筷子吃饭
- 图 19 p. 70 澳门海滩
- 图 20 p. 73 米怜夫妇
- 图 21 p. 76 中文的主祷文
- 图 22 p. 82 北京中国皇宫
- 图 23 p. 86 中国皇帝
- 图 24 p. 88 北京西直门
- 图 25 p. 96 中国书生
- 图 26 p. 99 广州五百罗汉堂
- 图 27 p. 101 广州药铺街
- 图 28 p. 104 一群中国商人
- 图 29 p. 115 中国书商
- 图 30 p. 123 中国人的迎亲队伍
- 图 31 p. 133 曼谷,暹罗
- 图 32 p. 141 中国茶园
- 图 33 p. 145 中国僧侣
- 图 34 p. 148 中国公堂
- 图 35 p. 153 鸦片瘾君子
- 图 36 p. 159 轿夫
- 图 37 p. 160 澳门的马礼逊墓(程耐里画)
- 图 38 p. 168 宁波港
- 图 39 p. 169 葛雅各牧师,硕士
- 图 40 p. 172 天津的布赖森学校
- 图 41 p. 174 纪里生博士和汉口医院的布道者
- 图 42 p. 176 新式的厦门传教船
- 图 43 p. 181 香港街景
- 图 44 p. 189 江岸,汉口英租界的滨海道
- 图 45 p. 190 殷纳逊牧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

Robert Morrison

The

Lionet of Chinese Missions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其开创性的基础性的工作，为以后中西文化的深度交流奠定了基础。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马礼逊的生平及其翻译《圣经》、创办英华书院、编纂《华英字典》等事迹，同时也介绍了基督教新教各派来华传教的历史，并对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有趣的比较。书中附有大量刻板插图，对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风尚，颇有裨益。

ISBN 7-5347-2858-4



9 787534 728587 >

ISBN7-5347-2858-4/G·2316

定价：15.50元